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 著



真相 谬误与谎言

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真相 谬误与谎言

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的这本著作视角开阔、发人深省。你可以不同意其中某些观点，但本书清晰地展现了人类正面临的挑战，也揭示了通过人文、实践以及协作得出解决方案的可能。

马丁·沃尔夫，《金融时报》

本书对目前世界经济政策发展的描写，既是对20世纪最后20多年来起主导决策作用的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抗议，也是对过去20年来经济思维中一些偏差的客观评价。尽管我不认同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关于新自由主义者漫天谎言，而新左派动机纯良的说法，但我相信本书是对当前世界经济中涌现的经济政策的非正统研究的一种宝贵思考。

埃德蒙·S·菲尔普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在世界经济领域，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拥有长期的经验和学术积累，堪称世界经济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一。他的著作常常成为全球化政治经济讨论和辩论的重要出发点。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作者

在波兰经济转型过程中，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国际经济发展的主题和潮流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见解。凡对经济发展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从本书中获益。

罗伯特·A·蒙代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本书凝聚了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这些源自一位身处现实政治与经济转型时期的思想者、实践者毕生的工作与观察。

林毅夫（贾斯汀），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的博学令他的读者震惊，而这本经济学著作中的一些真知灼见也令人大开眼界，他从不会让人感到无聊。将经济、历史、社会学、政治和文学融为一体，浅显易懂又不乏理论的厚重，既适合消遣阅读，也适合放到大学课程里。

《外交月刊》



上架建议：经济

ISBN 978-7-119-07339-2

定价：4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相、谬误与谎言 ：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 /
(波) 科勒德克著 ；张淑芳译.
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2
ISBN 978-7-119-07339-2
Ⅰ. ①真… Ⅱ. ①科… ②张… Ⅲ. ①国际政治－研究②世界经济－研究
Ⅳ. ①D5②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3475 号

出版指导：李振国　胡开敏
责任编辑：杨春燕　佟　盟　曹晓娟
内文设计：北京夙焉图文设计工作室
装帧设计：天下书装
印刷监制：冯　浩

真相、谬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

（波兰）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著
张淑芳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1-4443

出 版 人：呼宝民
总 编 辑：李振国
出版发行：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中国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网　　址：http://www.flp.com.cn　**电子信箱：**flp@cipg.org.cn
电　　话：（010）68320579（**总编室**）（010）52881098（**发行部**）
（010）68327750（**版权部**）（010）68996190（**编辑部**）

印　　制：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4.25
版　　次：2012年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19-07339-2
定　　价：48.00元

真相、谬误与谎言

——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

（波兰）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著

张淑芳　译





致所有人



目　录



导读器

www.wedrujacyswiat.pl

为了让本书更具可读性且更吸引读者，在写作过程中我尽量避免使用表格、图表以及地图。因此，书的末尾也并未按惯例附一个按字母表排列的冗长书目，书中所有引用的文献都以篇末注的形式加以表述。此外，本书还有一个特别的工具，那就是导读器。

本书的导读器是一个网站，网址是www.wedrujacyswiat.pl，这是为对本书感兴趣的读者精心准备的。网站上包含了与本书所用资料相关的大量统计数据和信息。在这个网站，你可以找到许多表格、图表和地图，对我在书中讨论的一些现象和过程做进一步解析说明。上面还有一些珍藏在我相册中的图片，展示了我们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的不同角落，以及我在书中谈到的一些地区和国家。

此外，这个独特的网上导读器所包含的数据都会定期更新，更新的频率按季度、半年或一年不等。因此，读者在这个网站上总是能很快找到最新的信息。

当然，导读器只是为那些希望更深入了解这些统计数据和经济绩效指标的读者们所准备，因为他们喜欢阅读图表、曲线图以及欣赏地图和照片。导读器所

提供的重要背景知识和统计信息，其意义远大于仅作为本书的补充资料，今后数年，导读器的使用者都将可以获得我讨论主题的最新信息。学术性的注解、事实和逻辑虽然不变，但作为背景的统计信息却将不断更新。

导读器里还列出了一个范围极广的参考书目，那里面有我在本书中讨论一些问题时参考的著作。鉴于书中涉及知识的广泛性和跨学科性，要使这些书目涵盖其所有简直不可想像。然而，这也足以使那些充满好奇的读者深入钻研诸如人类与经济、世界与发展以及历史与未来等各种问题。这些参考书目与许多原始资料相链接，点击这些书目将会打开重要的源文档。这将会成为学者进行研究的辅助材料。

最后，导读器里还设立了一个博客。在这里，有关国际社会、全球经济和人类命运的讨论将一直延续，每个人都可以发表对自己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思考以及自己的观点。通过这种方式，读者可以与我以及其他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们保持学术上的联系。

因此，这个导读器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它将辅助并促使我们完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穿越时空的伟大旅程——在这个“多变的世界”里探寻更美好未来的旅程。读者有了手中——更准确地说是指尖下的导读器，就能在“旅途”中更轻松地找到正确的方向。

第一章　世界、文字和含义

在政治和经济中，真相、谬误和谎言从何而来？我们通达真相的途径是什么？

文字都有丰富的含义，但它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清楚明晰。

有人曾说，如果不是为了有意激怒某人，就不值得用文字写作。尽管这并不是我写作本书的原意，但毫无疑问，我的文字总会让某些人头疼。因为，真相总是会让人不快，而我们所要探求的正是经济及其发展过程中的真相。问题在于，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境况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这样的事实更不会让每个人都高兴。甚至在有些时候，真相还会招致反感，因为它使人们那些阴暗的意图和举动都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偶尔，真相也会浮出水面。当然，真相出现的“时机”非常重要，最好是正当其时，在恰当时机被肯定的正确性要胜过普通意义上的正确性。。

毋庸置疑，人们生活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探求真相，而是要尽可能让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过得更好。每个人为了达到这种生存状态所采取的途径以及受到的限制都各不相同，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所受教养以及每个人对自身行为的自我意识都会对其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一个社会——包括其精英阶层——的状态。因此，从根本上说，体现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身上的社会印记不会有什么不同。获得真相

当然不是政治的目的，但对真相的探求应该始终指引着学术研究。不幸的是，有时候并不是这样。

语言文字是具有含义的。对于那些擅长使用文字的人而言，它是一种强大的武器。我们靠文字战胜无知与愚昧，借助文字理解事情为什么会按照这种而不是别的方式发生。然而，也有人使用文字不是为了阐释意义和使彼此理解，有时是因为他们做不到，而有时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

要探究问题的核心，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文字。此外，即使在经济领域，文字也可以被用来含糊其辞而非阐明事实、使事情复杂化而非简单化、掩人耳目而非明晰事理。这种使用文字的方式应该避免，尤其要避免使用浮夸、含糊和矫揉造作的言辞，因为这样的语言空洞无物。早在1580年，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主义大师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就在其人文主义巨著《随笔集》(*Essays*)[1]中写道："没有人能做到不说蠢话，但糟糕的是，有人花大力气去说这些蠢话。"更不幸的是，有人还绞尽脑汁这样做。这甚至使得读者感觉他们要是无法理解文章的意义，就该受责备了。事实上，有问题的恰恰是这些作者。他们的辩论表面上充满专业的腔调和科学的味道，或者至少是言之凿凿，但实际上，这样的语言不仅暴露了作者对所讨论问题的无知，也反映出其对读者的傲慢，他们辜负了读者的信任。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都很相信文字，尤其是对那些公众人物，如牧师、教师、记者、政客、学者和哲学家所说的话，我们更是深信不疑。事实上，当文字使人混淆而非明了时，它们就变得有害了。因为通过这样的文字，读者知道的不是更多而是更少。

然而，专家和评论家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许多评论家不只是分析市场，还希望通过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来影响市场。他们通常会在公共场合发表见解，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言论，他们的重要性就无从体现。他们所说的还需要被传布和散播，而这正是记者和媒介的工作。每时每刻，电视媒体、平面媒体以及覆盖广阔的网络媒体都需要一些东西来填塞，于是，对于文字的需求与日俱增。不幸的是，这种需求里还包括一部分对空洞言论的需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电视和报纸上那些专家喋喋不休的节目或文章总是长盛不衰。这些专家在节目或文章里与他们的同行争吵不休，而不是对他们的读者、听众或观众阐明事实、给予指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专家们常常自己也变得困惑起来——他们是如此巧舌善辩，以至于不仅迷惑了别人，也迷惑了自己。

人们往往热衷于无休止的争辩，于是就有了所谓的相对真理（relative truth）和公认智慧（accepted wisdom）。不过，即使对于充满善意的研究者而言，这种争辩也总会使问题复杂化。古典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绝对真理（absolute truth）——可概括为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和事物真实状态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人们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它能够无限接近客观世界）——常常受到其他哲学家的质疑。他们认为，观念与其所描述的事物并非总是一致的。于是，有关真理范畴的各种概念不断出现、发展、完善。

一些繁复芜杂的方法论和语义上的讨论也开始出现。除了真理与谬论、诚实与谎言这类刻板的二选一问题之外，仅就法学领域而言，真理至少还有六种概念范畴：实质真理、形式真理、真实真理，以及下面三种非传统的形式：

——融贯性真理（coherence truth），如果某种陈述作为前后一致且不相互矛盾的理论的一部分，则该陈述即为真理；

——实用性真理（pragmatic truth），被其实际结果证实为真的陈述即为真理；

——合意性真理（consensual truth），如果该陈述在讨论各方存在潜在的一致性，则该陈述即为真理。

至于“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这个概念，大概是半个多世纪前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2] 创造的。然而，他自己却逐渐偏离了这个概念，因为他意识到智慧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总是得到普遍认可，知识则更是如此。而“公认智慧”（accepted wisdom）却总与“共识”（consensus）密切相关。然而知识并非共识，共识亦非知识。弄清这点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还应该深入理解。“共识”（consensus）即“一致”（agreement），对政治而言是个好事，但对于科学来说，真理，只有真理才是好的。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追随“共识”的事例不胜枚举，其中之一便是认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此外，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通过投票认定位于库伊伯尔带（Kuiper Belt）的蓝色天体2003－UB313是一颗行星，这也是追随“共识”的例证之一——这种行为竟然发生在天文学这个纯科学领域，而非社会科学领域。就是这么一些人，通过武断而不是科学的方式将行星定义为一种半径至少为1000公里的天体，其理由就是若将半径的数值定为100公里未免小得有些荒

谬，而10,000公里又会把地球排除在外。认为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是不正确的；同样，认为某个天体因为半径小于1000公里就不是行星也是不正确的，但这些都已是公认的事实。这种情况就是前面所说的“合意性真理”。

科学应该告知人们事物的真实面目，但科学并非私设之法庭。在法庭上，你如果没有把真相和盘托出或说出的事实与真相不符，会面临作伪证的指控。而在科学领域，你可以选择保留部分意见却不至于偏离真相。一些真相被忽略或不受重视的事实不胜枚举，还有一些真相被发现时已为时太晚。那些期望从科学中获得真相的人很可能会失望。科学界的普通人员，甚至学问渊博的科学家也不可能完全知道这些真相。

聪明的人很少能做到无所不知，但他们却十分清楚哪些问题应该有答案，这已经很了不起了。波兰杰出的经济学家塞斯洛·波勃罗夫斯基（Czesław Bobrowski，1904－1996）曾用反讽的语调说，经济学并非一种科学，而是一个知识的集合体。众所周知，事物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相互影响的，为了使它们至少可以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知识就必须要被应用到实践中。

相较于知识储备的功能，科学更应该被视为一种思维方式。知识也许全面而普遍，但科学的标准更高。对于知识而言，人们读相同的书，就会知晓相同的事物。并且他们会满足于这种传统知识，因为他们已知道了别人知道的东西。当然，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会和其他人一致。但是，对于科学，尤其是推动知识发展（包括经济知识）的科学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思考，尤其是不囿于传统的思考。这就意味着人们要阅读一些新的著作，当然先要有人能写出这样的著作。只要你仔细观察，就总能发现这样的著作。

如今，不用说是一位经济领域的研究者，就算是一名既有天赋而又好学的经济学学生，知道的话题都可能比几十年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要多。然而，知道并不意味着能完全理解发生在变化环境中的全部过程。知识不过是信息的积累，而且是那些别人已经发现和证明的信息。通晓许多事物也许是博学之士的标志，但未必能证明其拥有创新观点以及运用科学的方法证明这些观点的能力。这就如同发明、创新和模仿的关系一样。通过模仿他人所发明和使用的技术，一些企业能很快跟上这些先进技术，但却始终不能自己发明新技术或生产新产品。因此，知识意味着复制，而科学意味着创造，而只有创造才能为原有的知识增值。换言之，拥有越

丰富的知识，就意味着需要花越多的时间阅读别人的作品。但是，谈到科学，你必须知道怎样创作自己的作品，怎样把自己的著作放到书架上。这种观点放之整个经济学领域而皆准。

我认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通病是没有善始善终以及缺乏完整性的观念和数学的精确性。这种现象出现在经济学领域多于在纯科学领域，但少于人文科学领域，毕竟经济学横跨了这两个领域。一方面，经济学将人及其思想与金钱、技术关联起来，显得更为有趣，但另一方面，这也使事情更加复杂化。我想，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经济学才成为比数学和物理学更难的一种科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总是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以至于当最终能对某个现象做出科学的概括时，在现实世界中已经找不到以当初所描述的形式存在的现象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银行自1969年起颁发（而其他几个奖项的颁发则始于19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了毫无争议的贡献的人士，而他们获奖之时都是在这个贡献做出二三十年之后。这与医学、化学和物理学奖的颁发有明显区别，那些学科的诺贝尔奖一般都是颁给上一年在这些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而在经济学领域，这样颁奖是行不通的。而且，任何经济学的假设在获得普遍认同之前都不可避免地经受过质疑。在60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他们最初提出的创新性假设或理论无一例外地受到过质疑甚至彻底的反对。

经济学不能保守，否则它就会变得过时或缺乏客观性。经济学犹如一条林中小道，让人很容易迷失其中。当你转身往回走，表面上依然面对一些相同的问题和矛盾，或面对看上去与以前一样的市场，但事实上早已时过境迁。除了那些永恒的老问题之外，一些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济关系的变化过程是自然而然的，也是显而易见的。变化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学范畴，而且变化可以非常深入地延伸至所描述现象或过程的内里，触及实质。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变化的速度非常快，甚至比经济学家更新换代的速度都要快，这也是一些经济学家有时发现自己跟不上时代的原因之一。他们无法对现今的经济现象做出准确的理论判断，因为他们依然用昨日的视角看待今日的问题。而当他们死守自己已经过时的见解时，就开始出错了。因为他们无从知晓真相，而当他们对真相一无所知时又怎能揭示真相呢？于是，真相被湮没在历

史的长河中。时代已经发生改变，观点也应随之改变，科学观点亦如是——只要新观点正确，旧的就应当改变。

不幸的是，事实常常并非如此。当学者们意识到应当改变时，他们往往将目光投向那些更为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一般有着更先进的技术、更成熟的体制和迥异的文化，他们从这些国家借来观点、解释、理论元素、甚至是整个思想流派，运用到自己的境况中。问题随之出现了，因为即便这些理论能准确描述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但对于借用这些理论、概念的国家来说还是会面临尴尬，就像有人穿了一双一顺的鞋。这是今天的经济学家最常犯的一个错误，而且近些年由于受"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单一思维模式影响，这种错误变得更加普遍。"新自由主义"思想往往是那些拥有巨额国际资本的强大利益集团施加给他人的，它将自己标榜成为"万用良方"，倡导在实施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忽略区域差异。正是在这个被广泛鼓吹，但不免有些天真的自我标榜的影响下，已经有不止一个国家为忽视区域与国家差异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是，即使在国家付出高昂代价之时，也总会有人因此狠赚一笔。

对那些最发达经济体的依恋，使得人们不加批判地引入在那些国家受到追捧且被认为是主流社会科学的观念。对于经济学而言，这更像是一种流行病，如果上述思想发射出光点，那些本土的分析家和评论家就会跟着反射出光点。其实，没有人期望那些本土的分析家和评论家能像太阳一样能放射出自己的光芒，但他们至少应该像一盏灯或一根蜡烛一样能自己发光。不幸的是，目前的情况更像是高速路上拥堵的车辆，数不清的尾灯皆因其后车前灯的照射而闪烁。

而当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杰出经济学家（这两者并不总是相符）对某位本土经济学家大加赞赏时，就会引发一些骚动。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教授是经济学领域最为广泛引用的权威之一，当他谈到一位波兰经济学家的理论时，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尽管这位波兰经济学家的理论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3]。且不说这个事件本身怎样，这位波兰经济学家在国内的反对派们就已经被激怒了。一名新自由主义的激进分子试图诋毁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并呼吁联合抵制他的著作。所有这些都起因于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引用了一位不受新自由主义激进分子欢迎的波兰经济学家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是创新的、并已被实践证明的。那位"党派路线"的刻板鼓吹者写道："斯蒂格利茨不值得重视的原因可从其《全球化及其不满》中写波兰的段落里窥见一斑。他

写道：‘波兰引入了一种渐进式私有化政策，同时为市场经济建设完善基本制度，例如银行贷款制度、依法破产制度。’（斯蒂格利茨）将格泽高滋 · W · 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łodko）当作权威来引用，他说我们的国家‘没有进行快速私有化，也没有把降低通胀置于其他宏观经济考虑之上。相反，它强调用民主的表达方式支持改革，通过努力降低失业率……和为市场经济良好运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阅读这些漂亮的文字，你一定会认为这肯定是在描写其他国家。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认真看待斯蒂格利茨，也不应该重视其所描写的其他国家及这些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的作品。”[4] 可见，人的愚蠢、或者说诽谤精神是没有限度的。

对于文学来说，事实与虚构、记述与创造相互融合或许是件好事，因为与科学相比，语言在这里有不同的功用。在文字的运用方面，马克 · 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可谓大师。人们往往很难判断他到底是在编造事实还是在纪实报道，是玩笑还是认真，是述说真相还是满口谎言。这正是他所追求的效果——尤其是在其小说和随笔中，而且他在这方面也做得非常成功，他甚至可以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虽然他从未得过。

将当今科学的通用语言——英语——简单地转化为本国语言的做法很盛行。鉴于经济学在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高度发达的事实，这样的做法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在这些国家正确的理论在其他国家则未必正确。原因很简单，很多经济学理论所涉及的是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人们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进行经济活动，并彼此影响。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必须与现实相符，而现实则会因为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不同。在这里是今天，在另一个地方也许是明天，而在某个地方则是昨天。

在经济学里，不存在任何最终定论，也不存在任何穿越历史的绝对或永恒真理。我们要把握的是一个社会有机体的脉搏，这个有机体正经历着无休无止的质变，而这些质变可以否定那些在逻辑上曾经正确或已成为基本结论的假设。即使某种合乎逻辑的假设在形式上正确，只要它不再反映一个迅速变化的新现实，那结论也可能是错误的。现实变化如此迅速，以至于科学还未对前一阶段有个全面的认识，现实又已步入到下一阶段。

我将经济学视作一种科学，它不仅阐释了支配经济过程的各种机制，如生产与消费、储蓄与投资、购买与销售、资金与资源的流动以及在这些过程中发生的社会

互动等等，而且还是制定和实现长期发展的有效战略的基础。优秀的经济学不仅是一门记述科学（descriptive science）——描述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且是一门规范科学（normative science）——为事物发展的方向提供暗示和指示。换言之，经济学不仅能对未来做出分散的、被动的预测，还能成为制定和实施积极发展规划的起点。

事实上，“记述”与“规范”二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渗透、相互重叠的。而且，“记述科学”和“规范科学”这两个定义本身就有争议。因此，有些严肃的著作否定并拒绝使用这种泛泛的二分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仅如此，很多人还对“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和“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之间的区分也持怀疑态度，前者推崇用事实验证，后者则推崇价值判断。在我看来，这些作者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将经济思想划分为“记述”与“规范”，会使得对现实经济学的思考转变为导致未来变革的行动更为容易。当然，这里的变革是指向更好的方向转变，即为发展而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作为科学的经济学需要与哲学范畴的真理相结合，那么最好是与实用性的真理相结合。毕竟实用性的真理可以在实践中获得检验。换句话说，一种陈述只有在被其实际结果检验为真时才为真。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观点的正确性和事实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以此类推，实践经济学，或者说是经实践行为证实的知识，是最恰当的经济学概念。

然而，与物理学、医学、结构工程学或农学等学科不同的是，经济学并非一种实验科学。当你提出一种假设时，不可能先找一个实验室开展一些试验来检验其正确性。通常，这个假设一开始就会被正式宣布，然后在现实的经济和社会集体中检验是否正确。许多历史经验表明，这种探寻真理的方式确实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样的教训在我们这几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尤为明显，用历史来检验中央计划的效用和效果，让我们代价惨重。这种中央计划虽然有助于解决许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但最终却成为加重经济负担并削弱经济应变能力的体制。但似乎这样的代价还不够，在一些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末期的波兰，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又实行了以制度转型（systemic transformation）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同样对经济造成了伤害。

事后看来，所谓的制度转型也是失败的试验。但是，经济学是非实验科学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经验中学到知识。相反，有时花如此漫长的时间来获得如此姗姗来迟的教训同样令人感到惊喜。因此，选择实践经济学（pragmatic

economics），即依赖于实践、行为和真正的经济进程来检验科学假设的正确性的经济学，就需要我们拥有开展实用经济学（applied economics）的技巧和能力。因为，人毕竟不是实验室中的小白鼠，况且对待小白鼠也不应该这样。

科学是强大的，但有时也并不具备足够强大的能力以获得成功。不幸的是，科学真相往往被人们忽视。有时，那些习惯于简单阐释而不是复杂科学论证的伪科学家或科学文盲会占上风。一位英国文学批评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完美的总结，他写道："每个地方都有傻瓜……我们最大的缺点在于，我们更倾向于相信那些明显的无稽之谈，只要它们恰好与我们过于简单、陈旧、理想化或自我满足的世界观相符合；我们最大的缺点还在于，我们天真地认为那些用假象、语言、金钱和权力控制我们身心的人会始终把我们的利益放在心上。这些傻瓜不一定是政治领导人，也可以是媒体、跨国公司、其他经济大国、文化运动、价值体系以及各种意识形态。"[5]

对于傻瓜最好避而远之，对于愚蠢的行为最好将其忽略。要做到这些，首先我们应该知道怎样区分愚蠢的行为和那些明了且合理的事情。无论是在经济学中或是在其他社会科学里，这都绝非易事。毕竟，一般而言，"杰出的经济学家"（eminent economist）与"知名的经济学家"（well-known economist）二者可以划等号。但是，知名的经济学家并不是那些发现了某种重要现象或过程的经济学家，而是那些经常出现在电视上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经济学家们。对于他们而言，引人瞩目的高姿态最重要，至于写些什么则无关紧要。那些受赞助商资助、观点狭隘的银行分析家们，已成为被舆论塑造的"独立"经济学家。他们胡乱说出的只言片语都被发表在报纸上，并被成千上万次翻印。而科学书籍对真理精心阐释，印数却只有几百份。教授们追随报纸（比较经常），报纸追随教授们（比较少见），他们各取所需，而在这个过程中其他人也就接受了他们所阐述的观点。谷粒经过碾磨，丢掉了米粒，却留下了谷糠。

众所周知，纠正愚蠢和愚昧的最佳良药是智慧与知识，它们可以使争论变得有价值。换言之，要广阅读、多聆听、精写作并和那些愿意倾听的人交谈；而最重要的，是要勤思考。在如何努力锻造自己的语言方面，有位诗人曾问道：

"为什么我总是
把坏事当成好事

又怎样

不再犯同样的错误？”[6]

只有知识才是最佳的答案。

尽管加入一点想象和夸张从来都无伤大雅，但科学毕竟不同于诗歌。这就使我们更有必要关注一个常常被忽视却又真实存在且举足轻重的问题，那就是经济学以及经济政策中的真相和谎言。这不仅仅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们犯错误很可能是因为从错误的假设出发考虑问题、使用了错误的信息、运用了不准确的统计信息或引用了错误的结论。人们也可能是受到了某些不确定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后来才发现其他的意识形态其实也不错，甚至可能更好。从道德角度讲，所有这些都是情有可原的。犯错是人之常情，经济学家也不例外。

政治思潮和经济思潮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也面临很多的曲折，它们开辟的道路有时会赢得赞许和共识，有时也会遭到摒弃和否定。这些思潮总是在某个特定政治背景下形成，于是谁在什么时候做出评判或者被评判就显得举足轻重了。出于截然相反的动机和由不同心理因素导致的两种极端态度，判然有别。一方面，我们会遭遇保守的观点，这种观点表现为对既有教条的非理性的忠诚，采取的是一种可称之为教条主义的姿态；另一方面，是温和派和激进派，他们早期倾向于为保守的观点辩护，后来则转变为完全的批判，旧有的思想和观念被修正，这就是为什么如今谈论“修正主义”变得很时髦。

50年前，正值斯大林之后的“解冻期”（post-Stalinist thaw，1953 – 1956），波兰领导人、工党主席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就曾质疑，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哪个对社会主义的危害更大。他将前者比喻为流感，把后者比喻为肺结核，在尽量避免前者的同时，他更惧怕后者。站在他的角度看，或许他是正确的，因为事实上正是标榜为“极端修正主义”的变革导致了社会主义体系的衰败（虽然他没能活着看到这一天）。在社会科学领域，一场类似的争论持续了很多年，经济学家也参与其中，争论的双方都把彼此称为教条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最终，教条主义者做出妥协，修正主义者占了上风。这些修正主义者首先成为改革者，而后又成为他们所选择的后社会主义转型体制的清算者。

修正主义尽管常常被嗤之以鼻，但它实际上也是有创造性的、有价值的，

思想上是进步的。这方面不乏其例，在经济学领域中，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łodzimierz Brus）教授和卡齐米日·拉斯基（Kazimierz Łaski）教授都是波兰杰出的“修正主义者”。1968年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分别移民英国和奥地利，并合作出版了一本著作，书名就让人一目了然——《从马克思到市场》(*From Marx to the Market*)[7]。

虽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堪称经济学家中的公共关系大师，但当他的著作《终结贫穷：如何在我们有生之年做到？》(*The End of Poverty: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 in Dur Lifetime*)[8]于2005年出版后，他就不再是那位在20世纪90年代初把激进自由主义移植到波兰，并试图将其移植到波兰周边国家的受人尊敬的伟大人物了。《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将他称为“左派”，这个名词在那些英语国家中，多少有些谩骂的味道。而杰弗里·萨克斯只是用眼睛关注事实，并意识到现实与他引进新自由主义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于是他逐渐偏离了自己原来的立场。

像这样的转变，即一种既非激进也非对自己原来立场竭力否定的转变（他原来的立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政治环境下也许是恰当的），不见得就很没面子，或者就该受到谴责。只有牛才一条道走到黑。适时适当地做出改变才是开明的经济学家，只要他们不走向极端，不像狂热的宗教徒——皈依到另一宗教后就对自己原来的信仰口诛笔伐。

假如出于某种偶然性，苏联存在的时间比原来延长了10年——这其实并不难想象——所有后苏维埃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和20世纪90年代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必定成为原来共产主义国家体制中的高级党内领导或政府官员。那么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界的知名人士都会在他们的著作和演讲中采用一种与他们在1991年大肆宣扬的观点截然不同的观点。同样的情况会出现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或前捷克斯洛伐克，但不会出现在波兰、匈牙利或前南斯拉夫。这些只是举例，类似的情况在世界上屡见不鲜。

有些人反对循序渐进地从修正主义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或从市场原教旨主义向更注重实效和发展的方向转变，这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他们或通过媒体的舆论影响，或通过伪科学式的操纵，或通过严重损害经济实践，对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些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出版物，封面有时借用之前其他领域作品的封面设计，只要加上一个类似“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的标题，并弄成烫金字

放在红色背景上，就照样上架大卖。有些人甚至讽刺说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艰难转型期。

在社会科学和政治领域中，类似宗教的新皈依者所特有的敌意并不鲜见，尤其是当声望和金钱受到威胁时，这种敌意就更为明显。许多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摇身一变，就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辩护者，纷纷迫不及待地从“左”跳到“右”（而过去，人们则是从“右”往“左”跳）；自由市场的拥护者变成国家干预主义的宣扬者。自由主义者迷恋上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者又变成自由主义者；工党成员逐渐转变成保守主义者；黩武主义者成为和平主义者；殖民主义“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的支持者成为民族主义社会政治运动中的战士；怀疑论者和世俗知识分子又变成宗教思想家。黑变成白，白变成黑，仿佛世界上就没有别的颜色。从心理学角度讲，这种类型的极端主义者往往是因为想要或下意识地去补偿以往的过错，包括那些他们从未犯过的过错。既然无法使过去的自己变得更好，于是就下定决心在未来成为真正的圣人。事实上，这种想法本身就已让人觉得可怕，只是那些皈依者和他们的支持者并未发觉而已。

坦率地说，以上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最糟糕的是，在所谓的经济科学里存在着许多谎言。我用“所谓”是因为这里所提到的经济学已经变成一种伪科学。谎言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事实上就成为了伪科学。蒙田曾写道：“假如谎言和真理一样，只有一副面孔，我们还可以同它相处得好一些，因为那样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从反面理解撒谎者。可是，谎言却有千百副面孔，无法将其限定。”[9]

事实上，就经济学或所有的社会科学而言，真理与谬论（从认识论范畴）或真诚与谎言（从伦理角度）之间存在着很微妙的关系。不幸的是，我们对这种关系却知之甚少。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自己似乎身处一场科学辩论中，但事实上我们正陷入一场有关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辩论中；而一篇围绕利益之争的政治演说，往往用追求公共利益来做幌子，而且充满溢美言辞。

科学家们都有各自的见解，包括政治见解，这点无可厚非。毕竟，他们都是国家的公民。但是，当他们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或者更糟糕的是被人收买，去发表一些带有偏见的言论，将科学当成政治武器时就不对了。然而，最坏的事莫过于科学家们将自己拖进无休止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用他们的科学来反映政治利益。如果凡事可以分为非左即右，那就应该有左派或右派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然

而，政治绝非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可以概括，而当科学为政治服务时，就会反映这种复杂的政治形态。即使在普通人看来，这些科学家们在为真理而奋斗并遵循着客观的科学程序，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卷入政治斗争之中。这种斗争的核心是利益，而非真理。

事情还有另一面。一些政客利用今天影响广泛的大众传媒攻击那些追求真理的无党派科学家，试图干扰科学进程。如果这些科学家的发现或理论导致的某些理性行为触及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就会抨击这些学者并宣称其观点是错误的。如果另一些科学家加入到这些争论中，事情就会变得更加令人尴尬。他们常常还没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在争论的外围挑唆，而后又冲动地投入到争论中去，就像古罗马的格斗士或是老鼠一样到处乱咬。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围绕重要理论问题的争论和辩论不是在专业学术期刊上进行，而是在诸如平面和电子媒体等大众传媒中展开的原因。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是具有政治性的。一些经济学家出于种种动机而说谎：或者由于对意识形态和教条的狂热，或者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甚至仅仅因为被收买了；此外，人的惰性也是原因之一。在一堆谎言里随便跟着叫几声总比站出来承认自己的错误容易得多，仿佛错误坚持下去就能变得正确。

当某位博学的经济学家的言论或著作出现了错误，我们可以就错误本身继续讨论。但是，如果这些经济学家明知事实的真相却为了迎合某些狭隘的精英阶层而不那样说和写，或者他们被某些利益集团收买用错误的观点来阐释这些理论，将之拉进伪科学的陷阱中，这就是道德的问题了。

尽管心理学对说谎的实质有诸多解释[10]，我们仍然很难区分某人仅仅是在不断地犯错误还是在故意撒谎。即使我们知道他是在说谎而不是屡次出错，也很难证明这一点。如果他们是在故意撒谎，那我们劝说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就是在白费口舌。

眼前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对所谓单一税（flat tax）的伪科学辩论了。其实这就是一小部分受益人为了减少自己的纳税额，而将削减的部分转移到低收入的纳税人身上（这是真正目的）。其支持者却宣称，或者在这种情况下应是谎称——除非有人因不明白事情的真相始终坚持错误的观点——这样做只是为资本形成和投资创造更好的条件（对外宣称的目的）。

上述原因解释了为什么不可能使我们的一些对手——有的似乎还是很有见识的

经济学家——相信某些显然正确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明白这些观点是有道理的，但就是要发出不同的声音。对此，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那就是至少要使其他人，如听众、观众、尤其是读者能够认识到同我们辩论的一方是错误的。受众会有这样的印象，即认为我们的反对者是错的，这已是不小的成就。换句话说，当不可能证明某些人在故意误导他人时，至少要向公众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有很多伪科学的辩论无法达成学术上的共识，这是因为根本的分歧并不在于彼此表面所宣称的观点不同，而是其背后的意图迥异。这种情况在政治领域比经济领域更常见，但我们也不必对后者心存幻想。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即利益冲突），经济学受利益之争的影响尤为严重，但危险同样存在于其他学科中。例如，药理学、医学或涉及人类自然环境的生态学都不能幸免。对于某些药物效果的争论和如今对全球变暖会产生什么影响的争辩都是最好的例证。有时是为了金钱，一大笔钱，有时什么也不为，就买下整个科学机构，消费者想要什么就证明什么是可能的。凭什么经济学就不能这样？有时，还真是这样。

当然，雇用学者尤其是比较有份量的学者往往需要花上一大笔钱。这些学者随时都能够站在伪科学的立场上，为其赞助人提供对方所需要的观点。除了雇用政客，雇用知识分子可以说也是一种获利颇丰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投资。而且，只要某人的想法对一个既定利益集团有用，或者只要他会说这个集团的好话或符合该集团立场的话，或说一些尽管不正确但对该集团有用的话，他都可能被这个集团雇用。

受此影响，许多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里的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纷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向新自由主义立场。而且除个别情况外，这段时期大学开设的商学院也都有自由主义色彩。杰出的美国人类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写道："尽管有明显证据表明，商界精英和金融利益集团通过投资各种研究中心、培养技术官僚和控制大众传媒，广泛干预观点和意识形态的形成，统治阶层的精英们设置流行话语的可能性被忽视了。"[11]

既然经济上无后顾之忧，新自由主义的研究中心、分析机构和那些支持拥有巨额资金的特殊利益群体及其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的机构，就变得尤为活跃。在美国，尽管"自由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趋势，但新自由主义者有时也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他们宣扬完全自由的市场和资产私有化，与政府作斗争，要求

政府大幅缩减对经济的干预、对预算再分配和社会政策的控制。他们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利用诸如自由和创业精神、选择与法制这些概念，甚至操纵这些用语的含义来服务与这些用语相关的过程。与正确推广这些价值的真正、真实的自由主义相反，新自由主义与真正的民主政治、经济效率和社会理性毫不相关，新自由主义者只会将这些美好概念拉来为狭隘的精英阶层服务，而将广大民众的利益置之度外。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新自由主义者们是操纵这些概念的高手。

在全世界，尤其是英语国家，无数的研究中心构成一个发达的网络，为新自由主义摇旗呐喊，他们还同时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对于这些中心或机构来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名字至关重要。在华盛顿，除了自由主义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成立于1977年，每年的经费预算超过2000万美元）以外，还有影响力巨大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以及汇集了新保守主义精英的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伦敦有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瑞典有商业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Business and Policy Studies），意大利有布鲁诺里昂尼研究院（Istituto Bruno Leoni）。莫斯科的经济转型研究会（The Institute for the Economy in Transition）和其他不计其数的英美研究中心分支机构都做得非常出色。华沙也有一部分这样的机构，其中亚当斯密中心（Adam Smith Center）尤其吸引人们的眼球。用这位举世公认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创始人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极端自由主义的研究中心，简直就是一种学术上的嘲弄。

一段时间后，这些忠心耿耿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就会成为自己一时狂热的牺牲品，而他们的作品也开始变得空洞无物和缺乏严谨性。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相信宣扬同样意识形态的媒体和那些不断教唆他们的利益集团。于是，问题就变成关乎信仰而不是知识，关乎意识形态而非科学了。从这点来看，他们似乎是为了自由、为了理想而不懈奋斗。但是如果说他们的这种自愿奉献精神是为了那些被社会摒弃的穷人、失业者、无家可归者或艰苦奋斗的工会，或是为了广大人民以及经济的发展而服务，就会让人感到奇怪了。因为这些人进行的研究，要么是有“私人机构奖学金”的资助，要么就是政府资助，而对于新自由主义者而言，政府恰恰是他们的头号敌人。

在这种无休止的、激烈的公共辩论中，那些掌握巨额资金的人以及他们的说客需要一套专业的说辞和具有说服力的声音，来使广大民众相信某些解决方案（即

那些对少数人和特殊利益集团有利的方案）要比其他方案（即那些对广大民众有利的方案）优越。在民主社会，这样的声音尤其重要，因为它们必须压过那些独立媒体的声音，这些独立媒体往往顶住压力和诱惑，拒绝屈从于垄断资本、拒绝停止对其口诛笔伐。归根结底，垄断资本不仅支持市场，还拿出大笔钱用广告填充这个市场。不管广告能不能卖出去，每人都得想办法谋生，而且还想要生活的更好。

媒体总是处在比较强势的位置，因为它们总能让大众听到自己的声音，也总能比其他任何人都叫得欢。荒谬的是，尽管人人都知道这是媒体，但它依然能保持某种匿名性：当媒体和记者被普遍批判时，你永远也弄不清楚到底谁在被批判。这种情形与人们对政客和政治的抱怨有点类似。但与政客不同的是，媒体可以采取那种贼喊捉贼的策略。几乎每个人都对媒体颇有诟病（需要强调的是几乎每个人），因为媒体从来不会自我批评。媒体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即媒体之间不互相批评。媒体会批评政客，但这既不会针对所有政客，也不会一直针对某一个人，它们会有选择地进行批评。通常，它们只批评那些有人出钱让他们批评的，而不是那些应该被批评的。这种批评既可以是意识形态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其真实意图总是被伪装所掩盖。

政界对媒体充满恐惧，进而试图操纵它们（这是政客的意图），但这经常会把自己搞得很被动。媒体会有效且有力地操纵政客，并且不是通过政客们所设想的表达民意的方式，而是塑造民意的方式。政客们如此惧怕媒体，以至于对媒体的指责往往泛泛而谈。很少有人对媒体信息进行必要的研究并将结果公之于众，而且，这种结果又总通过媒体本身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

不同派系、不同政党以及公共生活领域，都对媒体的偏见有过指责。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对媒体颇有微词，尽管民主党应该少点抱怨，毕竟媒体对他们还算比较客气。当有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新闻见诸报端后，共和党的支持率就会比民主党低16 – 24个百分点；而当有关失业率的报道出现时，这个支持率差距则为0 – 21个百分点。共和党上台时，《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发表的积极的经济评论明显减少，这与西海岸的《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形成鲜明对比[12]。

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发现，坏新闻并非就最好卖，至少关于经济领域的坏新闻卖得就不好。鉴于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我们以美国的情况为例，好新闻会导致对

同一事件产生更多的后续报道，而且这些后续报道往往会写得更好，更全面也更深入。民主党当然会指责这些研究的作者屈服于共和党利益集团，并谴责掩盖民主党成就的媒体有偏见。

所报道的事件的性质，决定了媒体在报道时伪造、扭曲和偏向的程度。在主管波兰经济期间（1994－1997年间和2002－2003年间），我有机会从内部见证了这一过程，而其他时间则总是在外部看到类似情况的发生。在新自由主义政府领导时期，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那些新自由主义的报纸、广播和电视都会“报道”经济状况得以改善；而在以实用经济为中心的左派政府领导下，当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时，同样还是这些媒体的“报道”，就会不是说增速太慢，就是说增速太快。而那些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报纸则一直在抱怨经济增长太慢，当然，还抱怨增长缺少了公平性。

经济学家应该向我们描述并解释正在发生的经济事件。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并且能够说服我们。但是，一旦他们出现以下情况时，问题就来了：

——他们知道，但不能说服我们；

——他们不知道，但仍然试图说服我们；

——他们知道真相，却试图以假象说服我们。

对于第一种情况，除了帮助他们把信息传播出去，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尽管这项工作看起来没什么实质性，但做起来却并不容易，需要出版商、资讯节目、教师、独立媒体、进步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善良的人们——这样的人有很多——共同努力。当然，这些人首先要弄清楚事情的本来面目。

对于第二种情况，即人们没有弄明白究竟怎么回事却试图说服我们相信他们的观点，那么他们仅是犯了个错。我们只需要冷静地与他们辩论，同时注意事情的另一面，因为人人都会出错，我们也不例外。我们能分辨那些提出错误观点的人其实是出于好意。他们看到了事情的一面，于是想尽力找到真相，并和我们分享。因此，他们是我们探索真理的同盟军，需要让他们（或者我们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回到同一战线上。

最糟糕的情况是第三种，即人们有意散布谎言。在政治领域，这不过是家常便饭，政治在乎的是结果，而不是真相。有时，规避真相可以得到所要的结果，这就

是为什么在政治领域真话和谎言都被当成工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经济学家一步入政坛就身陷谎言之中，不能自拔。在学术会议上，真相是好事，但在政治集会中则不尽然，更何况当今的政治集会大多在镁光灯和摄影机下进行。毕竟，如果波兰政府在1989和1990年时对外宣布，按照当时的政策在未来两年内国民收入将减少20%、在未来四年内将有300万失业人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公众不会答应这样的政策，也不会接受制定这些政策的人。当时，虽然正直的经济学家发出了经济预警[13]，但被其他经济学家压下去了。俄罗斯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如果它在1992年对外宣布，当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仅不能刺激经济发展，还会导致连续7年的经济不景气，使生产下降一半以上，很大一部分人将面临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这无异于玩火自焚。

在经济领域，真相很容易被隐藏起来，不过人们对各种推诿搪塞的忍受能力也要比其他科学更强，尽管明知这种行为没有好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经济中人们更容易被欺骗，也更容易相信一些在经济过程中并不真实存在的关系，如储蓄、积累、投资、生产、贸易和金融。当经济学家的言论被证明是错误时，我们就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他们到底是真错了还是之前说的都是谎话？没有其他的可能，除非他们一半真错一半撒谎。许多国家在不同时期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而这些观点和例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时坏事在报纸上读起来像是好事，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些背景材料来避免犯错。

在真正的科学领域，探寻真理的过程需要培养一种批判的精神。通往真理的道路常常需要一场真诚的公共辩论，尽管在公共辩论中常常无法明显区分真理与非真理，但这是一种赢得探寻真理同盟的方式。在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传播和普及研究结果往往是实现这些结果的重要因素。历史上，曾有这样的事例，人们为了在公共场合捍卫真理而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因为保守且残忍的审判需要这样的结果以示众。今天，一些媒体自愿扮演起身体、心理和政治恐怖审判的角色。我们需要提醒自己，这种审判在短期看来很残酷，但从长期来看不会有任何效果。

公共辩论和它的工具——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离开媒体，我们就无法将知识的火炬传递给更广泛的受众；另一方面，一些政治煽动家和说谎者也可以利用它们影响广大的受众。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抓起文字这把利剑，使自己大展身手

的同时尽可能少受攻击，而这并非易事。

最好的斗争方式是明辨是非。如果要针对一件不合理的事情采取合理的行动，就要了解其不合理的本质，例如其根源、机制和状态等。有时，这比屈服于自己的学术惰性，听从那些吹牛者和愚蠢者的观点要难得多。卡尔·萨根（Carl Sagan）写道："最悲哀的历史教训是：如果我们长期被欺骗，我们就会抵触任何证明自己被欺骗的证据。我们不再急于找出真相。欺骗已经俘虏了我们。要承认——即使对自己承认——我们是如此轻信他人，简直是一件令人痛不欲生的事。"[14] 这种欺骗会影响一些将波及许多人的重要过程。我们曾经记录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在科学领域人们如何被带入歧途、又怎样长期坚持这种错误，将他们的信任建立在废话、谎言、伪科学、谬论和煽动性语言之上[15]。不幸的是，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却很少提及。

在《胡言乱语是如何征服世界的：现代谬论简史》（*How Mumbo-Jumbo Conquered the World*）[16] 一书中，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用戏谑和讽刺口吻、颇具洞察力地写道：也许胡言乱语应该成为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一个特殊的门类，它在经济学中就发挥着不小的作用。

经济学中的胡言乱语往往表现在为经济开出最简单的处方。首先，就是尽可能简化，并夸大。例如，如果把一切私有化，那么一切都会很快改善；或者反过来，把一切都国有化，那么一切也会变得越来越好。这两种情况都取决于什么时候这些胡言乱语想要搞乱我们的脑子。惠恩把这些言论的深远影响（或荒谬解释）看作是"撒切尔式"的新自由主义（没有选择余地）或福山的"历史的终结"。[17]

事实上，即使在撒切尔主义盛行的时候，也从来不缺少可选择的发展道路，只是他们不愿发现或拒绝接受与其霸权梦想不符的其他任何选择罢了。而且，在新自由主义逐渐衰落的现在它也不缺少其他选择余地。至于历史，则一直在延续，正如人类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尤其是历史范围内，但仍然是生机勃勃的。

另一个胡言乱语的例子是那个经典的口号"不创新即灭亡！"。最近，这句话成为各个管理学学校的普遍信条。当然，稍有头脑的人都不会怀疑创新对提高生产力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深远意义，但是，我们也知道，几个世纪以来，即使没有创新，经济也照样增长。甚至在今天，大多数国家（国民经济）和很大一部分企业也没有因为缺少创新而灭亡，它们依靠模仿不仅能生存下去，还能生存得不错。

破产的企业不是那些在引进新生产方式和新产品时不能创新思考和行动的企

业，而是那些缺乏竞争能力的企业。企业即使没有创新也完全可以参与竞争。媒体、政府、商界领袖、商学院教授、各种顾问以及管理学大师不断重复这个空洞的口号，是为了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商业成功真正的源头和要求中转移开[18]。创新适合于那些善于创新的人，但并不适合于每个人。

不幸的是，不论在学术领域还是在现实中，上述胡言乱语的例子以及其他很多例子已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毕竟，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仅有语言还有行为，包括错误的行为和有害的行为。很多伤害是无法弥补的。需要付出的代价和造成的损失由现在承担，而任何可能的收获都已属于过去。时间总是一个重要因素。即使有时在做出了牺牲和承担了后果之后，会有好的结果出现，但由于人类的发展总是一代接一代，到那时曾经付出代价的这些人或许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后社会主义世界，老一辈人对试图通过强制施行农业集体化以改善生活的政策记忆犹新，而年轻的一代则正在承担幼稚且有害的新自由主义教条（shock therapy，即“休克疗法”）带来的后果。“休克疗法”的失败造成了巨大损失，而这种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相比之下，其带来的好处屈指可数，而且可以通过选择其他的路径达到。有些人选择遗忘诸如“休克疗法”这样的垃圾政策（或者有人宁愿让自己相信这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这样的事实使得弄清问题的实质变得很有必要，正如需要弄清两三代人之前的农业集体化的实质一样。这种必要性不仅仅是为了探寻历史的真相——这种真相在当时往往被歪曲，也为了事后更容易地得出精确的经济学分析。此外，这种做法也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世界上不同地方不同阶段都是不一样的，弄清问题实质还可以让后来者少走一些弯路。我们需要的是从别人的经验、其他国家成败的教训中得出恰当的结论[19]。

伊朗现在正在推行一项“公平股份”（Justice Shares）的改革计划，该计划主要是向低收入者廉价转让国有公司股票。这种方式远比将这些股票放在资本市场以尽可能高的价格销售，再把所得收入用于各种社会扶贫计划要好得多。伊朗人避免了犯毫无经济意识、完全受意识形态支配而免费分配的错误，而很多后社会主义国家却犯了这样的错误。

在波兰，我们还有“全面私有化计划”（Universal Privatization Program）的教训。这个词曾一度占据波兰各大报纸的头版，尤其是其中某份报纸的头版。不久，经济上的清算不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来执行这个道理就众所周知了，但我们已

经开始承受这种做法的后果：微观经济转型的目标和尽快形成中产阶级的社会目标都未能实现。而那些煽动“全面私有化”或类似项目的野心家们则如愿以偿，那些金融和法律中介机构更是赚了一个盆满钵满。

对于波兰而言，我们现在也可以避免另一个糟糕的主意，即实行单一税，这在上文有所提及。我们的一些邻国就施行了单一税，在这些国家，经济上的谬论反而超越了经济常识。到将来某一时刻，这些国家将不得不彻底否定目前的政策，除非它们能在缺少一种先进税制的情况下，还可以应对老龄化的问题。随着退休人口的不断增长，社会中的劳动力群体必须比退休人员和丧失劳动力的人群缴更多的税，否则社会保障系统就会失衡。富人必须缴更多的税，否则社会体系也会失衡。单一税并非像其提倡者（或潜在受益者）所声称的那么简单。相反，它被过分简单化来骗取很多人的信任。这是经典的谬论与手法的组合：一种简单但被歪曲的事物，似乎可以惹恼某些人。谁会喜欢缴税？事实上，这仅仅符合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一些人已经被欺骗，但还天真地把他们的信任建立在事实上对他们有害的观点上。这也正是这类经济学垃圾的目的，欺骗某些人，造福另一些人。

让我们总结一下。总结将有助于我的观众、听众、尤其是读者在这些无休无止的经济辩论中自由穿梭，这种方法上的指导对理解媒体中和政治领域的公共辩论更有效果。如果某个人、某种意识形态的代表、某个党派、某个研究机构、某张报纸或某个个体发表了一个观点，例如，限制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并削弱它的地位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么，我们应该同意还是反对这个观点？我们应该相信它吗？我这里所描述的情景不是人们对经济情况一无所知，也不信任任何人，并且对此很满意的情形。他们这种境界真是让人嫉妒！评估某一个观点——到底该赞同还是该反对——这个过程本身就需要人们对这个经济问题有相当程度的了解。那些对此知之甚少的人只能选择信与不信。显然，知道真相总比盲目相信要好。

在接受或反对某人的观点时，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假设该观点的支持者可以分成如下三种情况：

——他们相信自己所说的，并将其视为真理；

——他们将自己所说的视为真理，并认为其反映了事物的本来面目；

——他们知道自己所说的并非事实真相。

对于第一种情况，即他们相信自己所说的并将之视为真理，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信仰的表达，它属于意识形态而非科学领域，带有教条主义色彩而丧失了客观性。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辩论无济于事。而在社会转型的艰难时期，对那些熟知历史的政治煽动家采取辩论的方式更是白费力气。在经济学领域和经济政策中，这种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的大有人在。在现实的经济进程和经济政策运用过程中，教条主义将构成巨大威胁。最危险的状况是，两种错误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的支持者迎头相撞，而这正是目前波兰的状况，新自由主义者刚好遭遇民粹主义者。

对于第二种情况，即他们认为自己所说的是真理，并认为其反映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又面临两种非此即彼的选择：

——他们是正确的；

——他们错了。

如果他们是正确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我们所能去理解他们的观点，并且把这种见解以及从中汲取的教训与他人分享。如果他们错了，我们就应该进行一场严肃认真的辩论，提出一个用理性论据支持的观点。需要补充的是，对反对观点进行沉着、坦率和严肃的辩论是每一个非教条主义者和非谎话连篇者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段时间后，我们就能辨别出这些教条主义者和谎话连篇者，他们不愿意参与或直接拒绝坦诚辩论，这样的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们更愿意喋喋不休而不是聆听。另一方面，那些认为自己所说的是真理、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并不是对狂热教条主义者和愤世嫉俗谎言者的背叛。他们对辩论采取开放的态度，在试图说服他人的同时也仔细聆听别人的观点。他们边诉说边聆听。

对于第三种情况，即他们知道自己所说的并非事实真相，而有预谋地宣扬了一种错误的观点。这种观点也许被伪科学的花言巧语所包装，但是它的提出者深知他们是在传播错误的信息。正如第二种情况的某些衍生状况一样，他们不是简单地出错了，而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受众带入错误中。说谎者不会出错：你出错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如果你撒谎则肯定是有意识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原因有三：

——他们有意散播错误观点是因为某些个人或利益集团花钱让他们这样做。

——他们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提出错误理论和观点。这与第一种情况中所说的教条主义态度不一样，因为这里并不涉及根深蒂固的信仰，而是与犬儒主义有关。他

们清楚自己提出的意识形态对官方希望实现的目标没有任何帮助。例如，新自由主义并不能为社会公平的目的服务，而民粹主义也无助于经济发展。

——他们或许一开始就出错了，但仍顽固地坚持原来的观点。或许执着于经济辩论中的争强好胜，或许对职业声望过分看重，他们开始有意维护自己的错误观点而犯下了学术投机主义的错误。人们尤其是经济学家讨厌出错，更讨厌承认错误，对于公开承认错误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当他们开始为错误观点辩论时，他们就不再是出错，而是故意将他人带入错误中了。

需要补充的是，对于故意误导他人的行为在伦理层面有不同层次的划分。上面所说的第三种情况在道德上要比第一、二种情况好一点。然而，不管动机如何，这三种情况在现实中同样有害。

有意的欺骗总是建立在巧妙策划和资金充分支持的基础之上，而且由极其老练的专业人士来实行。有时，甚至欺骗被连续实施了很多年都只有那些赞助人知道内幕，因为那些执行欺骗的人也不清楚他们到底在为谁服务，他们只是被人雇佣的工具。公众对此更是一无所知，最多有时会起点疑心，不过整个欺骗过程实施得谨小慎微，他们即使怀疑也找不出任何证据。冷战结束了，但是心理层面的冷战仍在继续。利益的冲突仍然存在，与之伴随的斗争也在继续。仅仅依靠自己，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推向斗争的前沿。现在，斗争的武器就是文字。而当我们发现欺骗的过程时——如果我们真能发现的话——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了。

在各方都千方百计使自己观点占上风，想方设法追求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认为在全球政治和经济博弈过程中，媒体中没有被植入一些精心编造的材料就太过天真了。各国情报机构都会渗入一个地区或国家，将一些材料植入这些地方的文章、书籍、广播和电视中。其目的不仅仅是要操纵大众舆论，还想借此向意见领袖和统治精英施加压力。有时，这种手段会得逞。这种博弈一直在继续。未来岌岌可危，或者成为像某些人所期望的新世界。在这样一个唯一的世界里，人们所拥有的空间会越来越少，而不平等的现象会越来越严重。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乏味。

回顾这些年世界上主要的论辩以及媒体中的重大事件，不难发现，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些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或西方媒体）、专业研究机构一心想诋毁

中国，而近几年俄罗斯正面临类似的情况。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其巨大的经济成功（并非所有人都愿意看到，但每个人都想从中获益），这种境况稍有改善，但俄罗斯却仍然遭受着各种攻击，究其原因是因为有些人不愿意看到这片广阔的土地重复中国的成功。这两个国家都通过他们各自的专业渠道对这些攻击做出迅速反击，在各大媒体包括西方媒体中植入自己的声音。目前，伊斯兰国家和西半球的西班牙语国家则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媒体抹黑，媒体中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

这种媒体的偏见并非因为意外或无知，或单纯的教条主义态度。几十年前，苏联的特务机关克格勃在各个国家的媒体中——从第三世界国家到第一世界国家都不能幸免，甚至包括美国——植入各种报道和言论，这都绝非偶然事件。这些言论在当时各国的博弈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相应地，美国中情局也并非无所事事，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在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媒体中植入了自己的言论。这两个机构的区别在于，目前中情局还在国家安全利益幌子的遮盖下躲在暗处，而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却被公开了，或者各种曾经的绝密信息以各种方式被泄露出来，而这些信息被外泄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国家利益。

需要补充的是，在这个真相、真诚、无知、错误、谬误和谎言交错的网络里，人们很容易迷失。不过，我们都能够通过自我意识以及自己的探索，在经历一段时间和空间之后，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些人长期说谎以至于成为谎言的奴隶，最后变得相信谎言，从一开始的撒谎者成为谎言死心塌地的追随者。这种现象在经济学领域尤为明显。当然，也有一些人，在人类道义原则的指引下，使自己站在正直的科学立场，关心事实真相。这种情况也不乏其例。例如，在正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一些有见识的经济学家都或早或晚地从当时的教条中脱离出来。他们成功地站在一个科学的角度，又没有让自己走向另一个反社会主义的极端。来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雅诺什 · 科尔奈（János Kornai）是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他的最新力作《思想的力量》（*By Force of Thought*）[21] 中，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形象地描述了这种转变的心路历程。

在接受我们所阅读到和看到的事物时，尤其是在辩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非常重要。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方式与我们不赞同的、但科学上正直的人辩论，采取同样的态度与观点过于超前、我们不能彻底理解或跟上的人辩论。但是，对于教条主义

的说谎者、伪科学派或媒体黑客，我们必须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与其争论。一般而言，这种现象在真正的科学里并不存在，在这个领域，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一种对弄清事实真相和事物发展规律的真诚渴望。在公共生活领域，包括伪科学界，以及公共辩论中，我们常常发现自己会与其他三种可能性作斗争：即教条主义、谬误和谎言。

现在回到前文所举的例子，即限制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显然，这种观点并不正确，我们在下文会进一步解释。此外，很多关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著作也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22]，但有几个其他的观点还是值得在这里引用一下。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观点的相反假设，即加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和提高其地位会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也是错误的。而简单地取上述两种观点的平均值，即不改变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会促进经济增长亦不正确。事实上，问题远比简单的增加、减少或不变复杂得多，我们目前能说的是，政府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其地位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但就具体的过程而言，这还要取决于以上论述中完全没有涉及的其他因素。如果某个关于上述问题的观点不正确，那么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那些提出该观点的人是属于教条主义，或是简单地出错了，还是在说谎？除了这三者，没有其他可能，除非我们把三者综合在一起的另外一些变量也考虑在内。现在，遇到这种左右为难的问题就相对好解决了，因为我们知道需要弄清楚什么，该问怎样的问题，以及怎样形成判断标准；而其他人则仍然迷失在美丽的经济学迷宫之中。

用一种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来写十分复杂的经济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哲学、文化、社会和政治问题始终是可能的。也许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这是能切中要害、拥有更广大受众的唯一方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沉溺于这种懒惰和讨巧的想法，简单笼统、泛泛而谈完全私有化、削减税收以及限制政府在经济中作用的必要性。这些幼稚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在其发源地波兰和其他地方已经造成了足够多的损害。

当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写作时，我们仍然应该遵循科学的严谨性，同时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听起来很科学”的现象屡见不鲜，但这只是表面科学。在能用简单文字说清楚的地方用浮夸的语言、夸张的证据和华丽的辞藻并不能为辩论增加概念上的份量或学术上的权威性，反而会使其含混不清。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反对学术上的庸俗和形式主义。

在进行科学领域的写作时，讲求精确永远没任何坏处。数学方法和数学语言就对经济学很有用。尽管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但数学的精确性会帮助懂得怎么运用它的人理解许多复杂的关系。因此，“数理经济学”（mathematical economics）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使用一种与社会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同的话语也就不足为奇了[23]。当然，还有一些大的概念、现象和进程，如世界、全球化、发展、进步、转型、体制、规则以及最重要的人类等等，都不能用精确地数学公式来表示。

一位朋友曾建议我：写一本超级巨著，拥有高度的学术性，运用大量的公式，这样就没有人能理解到底写了什么。我仔细考虑了这个宝贵的建议，然后决定做相反的事情：即不在书中使用任何一个公式，这样每个人或几乎每个人都能理解我所写的。我不知道哪一种写法更困难。

经济学中可以使用数学，但并不像物理学那样非用它不可。数学可以而且应该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但是，它不需要也不应该被强加给只需要知道研究结果的读者，这样他们就更容易理解。重要的是，要使传递的信息具有科学性，也要尽量使更多的人理解这个信息。在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领域，用一种复杂的方式思考复杂的问题很有必要，但需要用尽可能简单而不是复杂的方式将其说出来或写出来。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很幸运，因为虽然这样做很不容易，但还是可以做到。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则没有那么幸运，但这并没有妨碍其中最伟大的科学家因此而声名斐然。

1931年，也就是艾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定居美国的前一年，他第二次访问美国时表示希望与另一位20世纪的杰出人物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会面。当《城市之光》（*City Lights*）首次公演后，观众起身为这两位杰出人物鼓掌。卓别林说：“这些人为我鼓掌，是因为每个人都对我了如指掌；这些人为你鼓掌，是因为没人能弄懂你。”[24] 经济学的发展路径介于虚构（如电影）和精确（如纯科学）之间。当然，它越接近后者越好，最好是能像数学一样精确，同时像电影一样引人入胜。

还有一次，爱因斯坦自己曾说：“物理学应该尽可能简单，而不是更简单。”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经济学。许多人认为，与物理学相比，经济学更有趣也更容易理解。但是，经济学同样也应该是尽可能简单，而不是更简单。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时想要传递的信息。至此，已写了13,000字，而后面还有16.8万多字。这不是一部电影，但它应该不至于单调乏味。我希望这些文字只对那些无

知的人有害，但能够帮助我们对当今世界的经济运行有一个更好、更广泛、更深入和更准确的认识，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复杂的经济命运是遵循这样而不是其他的轨迹。这个过程本身以及那些解释这个过程的科学引人入胜又充满挑战。既然复杂的问题可以用简单的文字来描述，这至少值得我们去尝试一下。

当有人用简单的方式解释复杂问题时，复杂的经济学也就更容易理解了。

注释：

1. 米歇尔·德·蒙田著，查尔斯·考顿译：《随笔集》，1887年，第3卷第1页。

2.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58年。

3.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极其不满》，纽约和伦敦：W.W.诺顿出版社，2002年，181页。

4. 罗伯特·葛威亚兹道斯基，《斯蒂格利茨：假先知》，《财富》（波兰版），2006年12月，144页。

5. 安德鲁·雷诺德为维克多·叶拉菲耶夫《有傻瓜的生活》一书撰写的前言，安德鲁·雷诺德译，伦敦：企鹅出版社，2004年。

6. 维斯拉瓦·辛波丝卡：《清单》，摘自斯塔尼斯洛·巴然扎克和克莱尔·卡瓦纳译《一只狗的独语》，奥兰多：哈考特出版社，2006年，83–87页。

7. 弗拉基米尔·布鲁斯和卡齐米日·拉斯基：《从马克思到市场：寻找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

8. 杰弗里·D·萨克斯：《终结贫穷：如何在我们有生之年做到？》，纽约：企鹅出版社，2005年。

9. 米歇尔·德·蒙田著，查尔斯·考顿译：《随笔集》，1887年，第1卷第9页。

10. 例如，可参见保罗·埃克曼：《说谎：市场、政治和婚姻中的欺骗》，纽约：W. W. 诺顿出版社，1985年；克里斯·瑟曼：《习非成是》，纳什维尔：托马斯·纳尔逊出版社，1989年。

11.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牛津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

12. 约翰·R·罗特和凯文·A·哈赛特：《经济事件的报道有政治偏见吗？》，社会科学研究网（www.ssrn.com），2004年。

13. 例如，见卡齐米·拉斯基，《波兰的稳定计划》，*Wirtschaftspolitische Blatter*，1990第5期，444–458页。也见马里奥·D·纳迪《中东欧的危机、改革与稳定：前景以及西方反响》，《大欧洲，新欧洲：机遇与风险》，锡耶纳：MPS出版集团，1990年。自1989年以来，本人也就这个问题在多本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大量文章，也见与杰弗里·萨克的辩论，萨克对波兰的财政部长和当时其他的政府高官均有极大影响，见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病人已就绪》，《华沙之声》，1989年12月4日。

14. 卡尔·萨根:《探测谎言的艺术》,《旅行》,1987年2月1日。

15. 迈克尔·舍默:《为什么人们相信怪异的东西: 伪科学、迷信和我们时代的其他困惑》,纽约: W. H. 弗里曼出版社,1997年。

16. 弗朗西斯·惠恩:《胡言乱语是如何征服世界的: 现代谬论简史》,伦敦: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出版社,2004年。

17.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纽约: 自由出版社,1992年。

18. 艾萨克·戈茨和艾伦·G·鲁滨逊:《不创新即灭亡: 这是事实吗?》,《创造力和创新管理》,12,3(2003年9月号),130－136页,www.blackwell-synergy.com。

19. 本书作者与其他学者对波兰转型进行了研究探讨,例如哪些政策有用,哪些没用,以及怎样把这种经验和教训应用到其他复杂体系的转型之中?以上思考可参见作者与其他学者合著的《波兰奇迹: 新兴市场的教训》,伯灵顿弗蒙特: 阿什盖特·阿尔德肖出版社,2005年。

20. 克里斯多夫·安德鲁和瓦西里·米特罗欣声称,1976年克格勃曾在印度媒体植入超过1980篇文章,1977年在巴基斯坦媒体植入440篇文章。这些只是冷战时期,冷战双方普遍进行信息操纵的例子。《世界正朝着我们期待的方式前行: 克格勃和第三世界的战役》,纽约: 基础读物出版社,2005年。

21. 雅诺什·科尔奈,《思想的力量: 学术探索之旅的另类自传》,麻省剑桥和伦敦: 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

22. 世界银行:《变动世界中的国家》,华盛顿: 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 雅诺什·科尔奈:《后社会主义经济体中政府的作用: 杰出讲座系列》,华沙: 科依敏斯基管理学院出版社,2001年,www.tiger.edu.pl;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政权建设: 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4年。

23. 张文斌:《经济增长理论: 资本、知识和经济结构》,伯灵顿弗蒙特: 阿什盖特·阿尔德肖出版社,2005年; 埃尔赫南·赫尔普曼:《经济增长的秘密》,麻省剑桥和伦敦: 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在前一本书中,数学公式多于文字,占据大量篇幅; 而后一本书根本没有公式,却是当今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最杰出的著作之一。

24. 阿尔布雷希特·弗尔辛:《爱因斯坦传》,纽约: 企鹅出版社,1998年,457页。

第二章　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经济过程——科学、政策以及偶然事件与其有什么关系，谁提出的这种理论

事情以某种特有的方式发生是因为同时有很多事情发生。

这个阐述尽管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却是解释那些或古或近的历史的关键，也是阐释那些发生在我们周围（或近在咫尺，或稍有距离，或远在千里）的事件的关键。最重要的是，它也是我们展望未来的基本指南。某些人认为未来不可预测或预知，另一些人则试图勾画其轮廓，并或多或少取得一些成功，但失败的时候居多。

尽管“未来学”（futurology）这个词仿佛暗示有一门关于未来的科学，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头脑运动罢了。未来学的主要方法论是外推法，即利用过去到未来趋势的连贯性，由一些设想的可能发生的场景组成。未来学虽然有些道理，但并非“硬”科学。它只是运用分析、描述和阐释，来对支配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客观规律进行一个系统的采集。比简单的外推法更有发展潜力的是前瞻性研究，这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研究那些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或以动态变化为主要特征的问题，能够预测一种全新现象的出现，也能预测一些因科技进步可明确辨认的趋势，或文化和社会演变的必然趋势。前瞻性研究使用越来越强大的科学分析和预测技术，而且知识与想象力的融合在其中至关重要。

这种预测有时很准确，有时却不尽然。实践证明，有时候一些作家，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史坦尼斯劳·莱姆（Stanisław Lem），比学者所做的预测更为准确，或者说在想象力方面更加准确。也有的时候，科学和小说相互交织，更深刻地向我们揭示了隐藏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然而，实际上，编造未来要比合情合理地描绘未来简单得多。尽管这类书籍都标上暗示未来的题目，但很少有作者能冲破过去和现在的束缚，自由自在地构想[1]。

我自己对描述未来的困难深有体会。许多年前，在成功完成了名为“波兰战略”（Strategy for Poland）的项目（一个经济结构改革和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复杂项目）后，我开始着手一个大胆的计划，目的是为波兰经济制定一个长期的发展规划。我邀请了20多名经过精挑细选的专家加入这项计划。尽管给他们的任务明确规定要描绘下一时代的图景，但对他们来说描述目前和较近将来的事情显然更为简单，最简单的是描写过去。我这种试图将观察延伸向更远一些的未来，即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尝试只成功了一部分。项目的结果是，其中有很大的篇幅用来描述过去发生的事件，一部分描述现在发生的事件，不幸的是，只有很小的篇幅谈及将要、注定或可能发生的事件。

尝试用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趋势预测未来会怎样可能是正确的，但不一定都得使用这种方法，而且依此得出的结论也常常会是错误的。19世纪末，有人曾警告巴黎人说，如果二轮马车的数量持续增长，巴黎将变成一个巨大的马厩。当然，如果在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看到卡米耶·毕沙罗（Camille Pissaro）那些可爱的画作，及其所展示的蒙马特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出租马车时，也许我们会更倾向于相信这种充满悲观色彩的预测。在20世纪70年代的波兰，有人曾预测，将来每个农村公社都将拥有一台电报机。20世纪80年代末，在布拉格的温塞斯拉斯广场上，霓虹灯闪烁的标示牌上写着“永远和苏联站在一起！”最终，在巴黎，汽车的闯入使得马车成为技术遗产和供游人观赏之物，巴黎人今天仍然忍受着交通拥堵的噩梦，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而在波兰，再也找不到农村公社了，只有城镇；电报机陈列在技术博物馆里，而传真机和电子邮件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苏联及其政治经济体系已不复存在，而布拉格现在已在欧盟的范围内，但是出于安全考虑，这次它没有宣称加入欧盟的决定会恒久不变。所谓恒久不变，众所周知，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恒久

不变，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永垂不朽。苏联没能这样，欧盟也不可能这样。恒久不变的似乎只有问题。

事实上，有很多的现象和过程——不仅在技术领域，更主要是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人们从未预测到，而是往往在事后察觉到，并且还认为这些现象是无可争议或微不足道的。这个道理适用于科学领域，甚至在科幻作品中亦如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播放的《星际迷航》（*Star Trek*）的早期片段中，有一个展示“企业号”控制室的场景，里面每个控制台上都摆放着一个烟灰缸！每个人都在抽烟。《星际》的制片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不仅是运动员和宇航员不再抽烟，连纽约酒吧里的普通人恐怕也是无烟人士。要看青蓝色烟雾缭绕之中的影星，我们只能去看《非洲女王号》（*The African Queen*, 1951）里的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和《大理石人》（*Man of Marble*, 1977）中的克里斯提娜·杨达（Krystyna Janda）了。

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即我们丢失的是知识还是想象。答案是，兼而有之。更主要的是，我们没有理解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许多事情以某种特有的形式发生是因为同时有很多事情发生。技术手段改变了，但同时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偏好也改变了。而且，因为上述因素的改变，价值判断的标准也随之改变了。与此同时，种种外部因素，不论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千里，也都会跟着起作用。而当这种种改变发生时，身处其中的各方甚至都未觉察到。而且，远处发生的事情也越来越像“近处”发生的事情一样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后来”，当一切结束之后，所有的事情似乎看起来都是清晰的，尽管“当时”甚至“现在”一切都十分模糊。

大约一个半世纪前，因受益于与紧邻的加拿大频繁的皮毛以及其他商品贸易，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北部经历了一段经济繁荣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商业贸易逐渐衰落（其中也不排除经济、社会因素的干扰和政治原因），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兴起的谷物种植业，以及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周围地区建在密西西比河瀑布区域的水力磨坊（用于大规模的谷物加工）。最后一批磨坊关闭是在1965年，距今时间不算太长。当时很少有人相信一家新的福特皮卡工厂可以为那些面粉厂的下岗工人（这些人需要重新接受汽车知识的培训）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但事情真的发生了，40多年来福特公司为这些工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直到2007年，由于面临丰田公司强大的竞争压力，福特公司关闭了其不再盈利的汽车装配线，开始向高端电子工业转

变以及增加知识密集型的电讯、教育和研究发展机构。现在，那些曾经受雇于皮卡公司又重新接受网络和金融知识培训并受雇于服务行业的人们很难想象，他们目前就职的公司在2050年左右会被关闭，因为这些服务已经过时，或是被某些现在无法知晓的服务、工作方式和生产方式所取代。由于生物学的进步，这很可能会发生，但是现在准确预测到底会怎样还为时尚早，我们也还无从知晓。很多事情必然同时发生，而且它们会在自己特定的时期发生。每个事物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段：猎杀可怜的皮毛动物、在水磨坊磨面、组装福特皮卡以及从事在线金融服务。而未来，则是属于诸如生物科技的时代。

这些我们都应该牢记。有时，我们很难理解所有事物，因为推理过程中的某个关键环节会被遗漏。你也许注意到了很多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只要忽略了某个重要因素，所得出的结论就值得怀疑。经济学研究中，将事物过分简单化或将某种模型套用到某些事物身上的情况时有发生。不过，不仅是经济学这样，在心理学领域亦如此。在研究童年时社会环境对人后期政治观点形成的影响时，心理学家们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结论，有些结论甚至明显相互矛盾。即使他们使用相同的数据，采用同样的实验，这种情况仍然会出现。

美国伯克利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童年时期社会环境中过多的压力和不稳定因素容易使人形成改革主义倾向，而稳定的环境易使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趋于保守。而新墨西哥大学的科学家们则得出相反的结论：受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影响，常常处于焦虑状态的孩子长大后倾向于保守；而那些在稳定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则更愿意进行改革。这些都是严肃的科学研究结论，发表在《进化与人类行为》(*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2] 上。因此，很可能这两种研究结论都忽视了某些对政治观点的进化与成熟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经济价值判断的影响。

即使生活决定意识的理论是正确的，人的意识也要由其他现象和过程来共同决定。这一点不论是心理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应记住。我们无法知道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知道决定他们长大后什么样的因素远不止童年时期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我们还必须记住，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应该更加注意。合理的经济论证和有影响力的政治观点需要在形成过程中不断进行补充，因为公众的觉醒情况很大程度上约束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决定着人们实行明智的发展策略的可能性。我

们也知道，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变化的敏感度会越来越低，这会阻碍进步。而从技术或经济的角度看，这些进步都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将科学知识与肤浅的解释混淆，将想象与错觉混淆。想象可以接近梦想，从而激发行动欲望并将其付诸实施，想象也会触及噩梦，从而警告我们避开潜在的错误。但是，错觉只能把我们引向具有破坏性的荒唐念头。我们知道和理解的越多，就越能够想象出未来，或者至少能预测出某些可能会真的成为现实的变化或情景。这也会使我们创造一个这样的未来变得更简单，至少是稍微简单一点。

文学作品会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促使其思考诸如事情为什么注定以其特定方式发生之类的问题。历史上一个令人惊奇的巧合是，两位作家都在其作品中，即英国小说家吉姆·克雷斯（Jim Crace）的小说《隔离病院》(*The Pesthouse*)[3] 和美国作家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小说《路》(*The Road*)[4]，同时描绘了美国全面崩溃的凄惨未来。两书都写到了崩溃后的迁移：与美国人当年征服狂野的西部相反，这次人们是往东海岸迁移。在那里，人们开始了一次新的穿越大西洋的迁移，只是这次的目的地是欧洲。在美国生存已变得不可能，于是人们决定离开，集体迁移。这是白日梦吗？当然是。然而，从类似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出，某些灾难的集合的确会改变历史的进程，历史上已经有过这样的事例。

想象人类的下一个大迁移也许是回归欧洲，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在大西洋两岸正处于空前竞争的特殊阶段，这个想法对于长期担心美国高生产率的欧洲而言，显得很乐观。但是，惊慌很快随之而来，因为接踵而至的是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应该把这么多的美国人安置在何处？我们怎样养活他们？而且，他们背包里的大量美元将促使欧元升值比以前更快，从而对欧洲制造的产品造成更大的冲击。目前，美国仍然比欧盟有着更大的优势。一些人认为，欧盟落后于美国不止20年。至于真是20年[5]，还是“不止”20年，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贝宁导演西维斯特·阿玛索（Sylvestre Amoussou）曾经拍摄过一部对未来持独特见解的电影。在泛非电影节（Fespaco），即瓦加杜古泛非电影和电视艺术节（The Panafrican Film and Television Festival of Ouagadougou)[6] 上，阿玛索展映了他2006年的作品《非洲天堂》（*Afrique Paradis*），这部电影将非洲描绘成了人间天堂。那些一度生活在曾经更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的人们，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剥削非洲的人

们，现在开始向往去非洲生活。非洲是牛奶与蜂蜜富足的人间天堂，而那些西方国家则充斥着腐烂的恶臭、污物、不幸与穷困。然而，要真正搬到那里并非易事。

这是幻想吗？当然是，至少短期来看这是异想天开。然而，这仍然需要我们牢记。尽管，如果我们告诉那些从非洲西海岸——现在的贝宁和加纳，即达荷美共和国和黄金海岸——被绑架、奴役和拐卖到美国的非洲人，200年后，他们的后人会拼命离开现在的国家，祈祷去他们的祖先曾被残暴地当作奴隶贩卖的地方，他们一定会觉得荒谬至极。同样，当年的那些奴隶贩子们——英国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荷兰人、瑞典人和丹麦人——如地下有知，肯定也会觉得不可思议。

那么，阿玛索影片中的情形只是一个幻想吗？至少在可以预见（或决定）的未来，这确实只是一个空想。然而，不久以前，在上沃尔特共和国举行泛非电影节这样盛大的艺术盛会也只不过是一个幻想，而上沃尔特共和国这个在很多人听来很奇怪的名字，是布基纳法索的曾用名称，这个国家曾经历过白人殖民者长期残暴的统治。如果未来美国人和欧洲人大规模迁移到那里，除非有很多事情同时发生。现在看来，这似乎有些不大可能。但是，对于何种原因会导致何种事情发生能了然于胸，总归是好事。除了作家和导演们所描绘的那些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原因，要使美洲人和欧洲人大规模迁往非洲，非洲又应该处于怎样的发展状态呢？在非洲还应该有哪些别的事情“同时发生”，使它即便不能成为“人间天堂”，也能打破目前停滞的僵局，踏上发展的道路？而未来如果美国人不用逃到欧洲，欧洲人也不用逃到非洲，又需要哪些事情“同时发生”呢？或者，就目前的现实而言，要有哪些事情发生以及怎样发生，才能阻止非洲人从他们的“富庶之乡”大规模迁往欧洲和美国？或对于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尤其是年轻人而言，怎样才能不用迁移到爱尔兰？或对于乌克兰人来说，怎样才不会被经济和政治压力逼得背井离乡，越过布格河来到波兰？而波利尼西亚人怎样才能不再不惜任何代价地前往澳大利亚？或墨西哥人怎样才能不再在夜色的掩护下潜过里奥格兰德河进入美国？

这些都不是空想，而是鼓舞人心的、充满创造性的想象，最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利用知识，无论是科学理论还是实践经验，来解释哪些因素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和停滞。为什么一些人、国家和地区能迅速地发展起来，而另一些则只能跟在他们后面举步维艰甚至停滞不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一些人（少部分人）生活在富足甚至是极大丰富的物质世界中，而另一些人（大部分人）却生活在贫困之

中，忍饥挨饿，甚至被活活饿死？

其实，不用追溯太过久远的历史。就在两个世纪前的1807年，英国就正式结束了奴隶制。而事实上，在距离现在还不到两代人的时候，美国著名爵士乐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仍在吟唱：

为什么会这样？
我没有一个朋友
我唯一的罪……
写在皮肤里……
我到底犯下什么错……
却要如此地被人欺凌？[7]

半个世纪前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布朗第二案”（Brown II）也是事实，只是这个事实对于有些年轻人来说不大熟悉，而有些人则选择了遗忘。这个判决为美国有些州保留种族隔离的教育体系留下了空间。于是，当加纳挣脱英国殖民统治，成为非洲第一个独立国家时，白宫还派出军队前往小石城镇压废除种族隔离的运动，这一运动旨在反抗坚持种族歧视的当地政府。而现在，一些人仍然需要接受教育——有时是以武力的形式——才能明白什么是民主，以及怎样尊重人权。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出生在阿肯色州，当军队开到那里阻止那些充满仇恨的白人学生时，他才9岁。当时似乎很难想象克林顿会成为美国第42任总统，而看起来似乎更不可能的是，不到20年后，另一位民主党人，作为非洲后裔的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8]会成为最有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他的养祖母萨拉·安杨格·奥巴马至今仍然生活在肯尼亚的小村庄科格拉，并依然对殖民统治时期印象深刻。

同样是在半个世纪以前，比利时、法国、荷兰、卢森堡、德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共同签署了《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或更确切地说是其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由此成立。而欧洲经济共同体是由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演变而来的，1951年，同样是上述几个西方国家成立了这个共同体，而再往前追溯6年，这些国家又都参与了一场残忍的、破坏性的战争。尽管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出现并不

是非常必要，但它最终还是成立了。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包括为克服刚刚结束的战争造成的后果而出现的具体现象与进程都对欧共体的诞生产生了作用。当时，欧洲大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同时，各国急需一种相互协调的政策来重建战争中遭受重创的重工业。与此同时，东西方之间的冷战阴影依然挥之不去，而非洲即将摆脱殖民统治对当时的政治也产生了影响，例如苏伊士运河上的政治军事危机。

在此后半个世纪中，欧洲共同体的演进和发展，超出了当时最为大胆的预期。目前，欧盟人口占世界人口的8%（5.15亿人），其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2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9]，27个欧盟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34亿美元）。欧盟早已忘了自己的前身是煤钢共同体，现在，它正试图在2010年实现其成为地球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型经济体"的愿景。欧盟在世纪之交签署的《里斯本条约》（Lisbon Agenda）里，提出2010年时将实现这一目标，现在看来，不免有些不切实际和过分乐观。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50年后，这个世界将会是怎样的面貌？欧盟到21世纪中期又将怎样？答案无人知晓。然而，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预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里指的是几十年而不是几年），美国将仍然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能将知识和智力转化为生产力的国家。美国和欧盟这两个世界经济火车头之间的差距会逐渐缩小，而它们与第三个快速前进的火车头——中国经济之间的差距会更小。

此外，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事情应该做，但由于政治原因没有去做。正如卢森堡大公国首相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曾含蓄地说道："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但我们不知道做了以后还能不能在大选中连任。"问题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提法并不准确，很多人并不知道，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并不知道。

我们知道，在欧盟成立半个世纪后，目前正面临着三个棘手的问题。除了所谓的欧盟宪法和统一货币欧元的命运之外，欧盟的边界问题始终是最根本的问题。对于欧盟而言，除了更全面的一体化，还有更进一步的扩张，现在克罗地亚已经有望加入欧盟，而欧盟的版图还将继续扩张。

相比之下，美国更为幸运，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但如果它遇到，例如它要与人口众多（1.08亿）、国内生产总值却仅为其24%的近邻墨西哥一体化，我们就会立

刻观察到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变缓，因为政治和商业焦点将从使美国企业和经济体保持高度竞争力的优势项目上转移开。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会加快，因为一体化会带来巨大的市场，也能够降低生产成本。目前，整个美洲大陆，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已面临诸如贸易自由化进程迂缓、创建单一美洲自由市场步伐缓慢等诸多问题。而正是类似原因，使得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远远落后于美国，正如美洲作为一个整体远远落后于欧盟一样。

在欧盟内部，它应该或者明确宣称扩张的进程已经结束，或者对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能否加入欧盟的问题给出答案，尤其是对于那些位于巴尔干地区、欧洲东部以及位于欧洲大陆边界的前苏联国家。将来某一天，欧盟肯定会关上大门，宣告说：这里席位已满，不再接受新成员了。这是必然的。目前，毋庸置疑的是，将上述两个地区的国家吸收入盟仍然符合欧盟的长远利益，只要它们符合入盟的标准，同时政治条件允许。马其顿是个例外，它于2008年就启动了加入欧盟的谈判，但要真正成为成员国估计要等到2021至2030年。

然而，现在排除任何一个国家都还为时尚早，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区域附近有多少个国家，以及它们都是什么类型的国家。科索沃将会独立，但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前途会怎样？这中间的“和”字到底意味着这两个区域仍然属于同一个国家，还是会分裂成为两个甚至是三个？而罗马尼亚人所称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也即俄罗斯人所称的普利得奈斯脱维，事实上已不属于摩尔多瓦。

欧盟50周年庆典的时候，《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充分发挥想象力，展望了欧盟在100周年庆典时会是何种模样[10]。按照《经济学人》的说法，到那时，土耳其、乌克兰等都已经成为成员国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北非第一独立国家、法国前殖民地摩洛哥也将在21世纪30年代初成为欧盟的成员国。此外，欧盟第49和第50名成员将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到2020年，塞浦路斯（自1970年分裂）重新统一的唯一途径就是将这个国家置于欧盟政治、经济和社会机制之中。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也不得不承认解决棘手的中东问题的唯一方法是让这些国家成为欧盟的成员国。当然，这也是因为让它们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显然更不可能。这两国中有一个国家也许想加入美国，但另一个国家肯定永远也不会。

* * *

是的，一些预测会逐渐变为现实。历史的进程在不断展开，世界每天都在改变。历史在继续，而未来仍然是一个问号，而且带问号的不只是未来。或许将来某一天，我们会饶有兴趣地选择乘坐圆顶马车——这种曾经在沙皇时期用来运送流放者的马拉厢车——搬到欣欣向荣且环境优美的西伯利亚。或者，也许波兰的总统会是个中国人。为什么不会呢？一名来自多米尼克的非洲裔妇女就曾被冠以“法国小姐”的称号。或许，到时维斯瓦河两岸的高生活水准吸引了太多的德国人，以至于波兰不得不考虑限制德国移民；而瑞士人则会争相将存款放到波兰银行。

到那时，你也许已经放弃美元转而购买人民币和卢布了。今天，做这样的设想比在十一二年前设想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要简单得多。当然，可以理解的是，出售美元和日元而购买人民币和卢布并不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要比美国和欧盟好，因为至少目前还不是这样（但有一天也许会成为现实）。事实上，很多条件同时相互作用，才导致了货币相对价值的改变。同样，在现实世界的这些领域，事情按照他们特定的方式发生是因为很多事情同时发生。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哪些条件的共同作用导致了这些事情的发生。

理解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辩论，虽然这样做似乎很有趣。对于过去，我们只会稍作回顾，看看身后发生了哪些事情，哪些事情本应该发生却没有发生。但是，我们一般会把这些思考留给历史学家来做，让他们得出一个共同结论，看看真正发生了哪些事情。我们也没有必要对目前世界上一些地区的现状忧心忡忡。除非在表示同情之外，还能提出明确的建议甚至是行动，否则，这样做毫无意义。只有建议和行动才是塑造未来所需要的。

掌握有关发展进步的实用知识，是打破经济和社会停滞的首要条件。如果人们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那么人类目前的现状就会比较凄惨，未来也会一片黯淡。在世界各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总是挤在镜头前面，鼓吹应该让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来塑造我们的命运。而我们应毫不含糊地回应，这并不是正确的道路。人类的未来以及发展进程，需要我们去积极塑造。这个过程需要通过深思熟虑的行动设置决定经济进步的种种条件，以带来最大程度的发展，同时尽可能减少停滞。过去那些成功做到这一点的国家，现在不论在生产还是消费领域都已经是世界领军者。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应该遵循类似途径。我们知道事情以其特定的形式发生是因为同时有很多事情发生。现在，我们需要对这些事情，或更准确地说是这些现象和过程做进一步考察。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它们又是怎样沿着我们的思路展开的？此外，我们对事情的发生过程以及结构安排能产生什么影响？或许经济史学家、19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11]的话是对的，他说："为了获知未来，我们今天应该知道我们明天将会知道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目前应该尽可能多地知道经济增长以及未来的经济状况取决于哪些因素。

现在，"但愿你生活在不无聊的世界"这句古老的咒语已成为现实。我们周围的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有趣。我们经历过的一些事件已足够骇人听闻，而那些将在未来出现的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问题是，尽管经历了时间的洗礼，那些过去的事情却并未真正过去。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曾写道："过去从未消逝，而且它还在继续。"[12]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都还深陷于过去的麻烦中，我们无法理解过去，用相互矛盾的方式理解其不同方面，或故意去伪造它。我们对现在的理解受制于过去，使得我们无法回答表面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事情究竟是怎样的？"此外，过去还会对未来产生举足轻重且常常是不利的影响。因此，为了获得进步，即使只是为了避免犯错误，我们也必须回顾无法摆脱的过去。钻研过去很有必要，关键是不要沉溺其中。

过去的影响有时也会被夸大。人们在解读一些现象和过程时，如果过分关注文化、制度、政治以及物质的延续性，就容易夸大过去的影响。其结果就是，我们过度强调了这些影响对现在以及未来一些事件的作用。当然，即使不是所有，也至少有很多事情都是过去的产物。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演进迫使我们遵从由某种程度的延续性所决定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上面所说的有些解读就是路径依赖的结果。环境会改变，而且，最重要的是人们的学习过程一直在继续。有时，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即现在，学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例如，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后殖民地国家由于长期受制于人而无法自我管理，这显然是错误的。当然，试图将现在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的进步归功于沙皇时代的精神、行为和政治遗产，以及这些遗产对广大民众、尤其是做决策的精英阶层的影响，也是错误的。21世纪初，在波兰，有人把波莱谢省的企业少于卢布斯卡省归咎

于前者在19世纪是受俄罗斯人统治而后者是受普鲁士人统治，这种观点不免有些夸张。20世纪90年代，曾有一个普遍的假设，认为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前南斯拉夫（该国在社会主义时期就已经展开了广泛的市场化改革）等，不可能培养出一个专业、有效的管理阶层，事实证明，这样的观点大错特错。这种假设只是为了凸显一些外国投资家的重要地位，认为只有他们才可能知道怎样改进企业的经营，从而使其更具国际竞争力以及更具增长势头。事实很快就证明了，本土培养的专家完全可以胜任这种挑战。

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有时路径依赖真正出现时会很难克服。当路径依赖阻碍了所必需的发展趋势、减缓了增长速度，就应该打破这种依赖。突破路径依赖需要一系列的综合努力，包括从教育到政治、从结构创新到机制改革等。当这些努力得到恰当组合，就会出现“经济奇迹”。20世纪30年代，美国通过引进基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的一系列新政（New Deal），战胜了当时的大萧条，这就是一种由综合努力创造的“经济奇迹”。20世纪的最后25年，西德在二战，或者说是东南亚战场失败后很快重建，并创造了“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这也堪称“经济奇迹”。后苏联时期的几个波罗的海国家，在21世纪的前10年，一跃成为欧洲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区域，也是“经济奇迹”的例证之一。此外，中国30余年的发展也正是这种奇迹的演绎，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国家改善了大量人口的基本生存状况，这是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曾发生过的。

未来，类似的“经济奇迹”还会出现，甚至出现在一些伊斯兰国家和南美洲国家。毕竟，过去和现在对未来发展产生的作用有限。最重要的是将来会发生什么，以及哪些能够发生。一些国家，例如迪拜、塞内加尔、哥斯达黎加和智利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将其融入到它们的政策之中，促进自身的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如科威特、苏丹、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等，对此还不能领悟。

在现实发展中，我们总是在解读延续与变革。有时，延续占上风，有时则是变革。长期以来，这明显矛盾的两者始终在相互作用。进化一直在进行，而变革有时也会出现。我们面前仍然会有很多变革，只是不知道它们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爆发，以及它们中的哪些会像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一样，成为开启新纪元的历史时刻。但是，我们应该弄明白它们为什么会发生。因为，它们一定会爆发，也一定会成为划时代的事件。

进化则是一个永恒的过程，而且它的结果有时也可以预测。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发现，历史上在各种剧烈变化中生存下来的，既不是那些最强大的物种，也不是最聪明的物种，而是那些最会适应环境改变的物种。尽管我并不赞同“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但达尔文的发现在经济分析中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适应客观条件变化的能力是长期或更长远生存的唯一保证。

进化在继续。市场上，一些产品消失，另一些产品涌现；过时的技术被现代技术取代；老楼被推倒，新楼又被竖起；一些重要的制度消亡了，另一些又开始出现；新价值迅速取代旧价值。周围的事情一直在改变，然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只是在空间上发生改变，本质上则没什么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经济，尤其是一些区域经济中，停滞对于发展来说始终占据主导。这正是世界经济的现状，然而，这种现状并不是一定要出现，它还会继续吗？

人们普遍期望，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结出持久、快速发展的果实。结构改革和制度变迁应该有利于资金的有效利用，以及人力、金融和自然资源的优化配置。而这一切，又应该促进竞争力的增强以及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然而，在现实的经济体制中，这种情况往往不会出现。

很少有这种情况，即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经济成功，这种成功带来的是文明飞跃、生产水平明显提高、整个社会生活标准的提升。更多的时候，一些社会群体和地理区域被推到经济发展的边缘。这种现象很正常，也不属于所谓“没有一个规律没有例外”的“例外”，它是这个体系的永恒特点，并与其在“新现实”中的运行紧密关联。

于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就出现了：这些事情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发生？什么决定了这一系列条件——除经济（金融、投资、商业和组织）外，还包括文化、制度、政治和社会等条件——的组合形式，从而使得差异出现，即一些地区正享受经济的成功或从落后的状态奋起直追，而另一些地方则被甩在后面，差距越来越大？

在发展（或停滞）的真实过程中，变化（或没有变化）总是以某种而不是其他方式发生（这总是需要以一种学术的方式去调查、理解和解读，有时还需要在一种层级结构中对其进行评估和定位）。因为这些过程总是由一系列综合条件决定的，其中包括许多复杂的结构、事件、现象以及一系列的偶然情况。而这些结构、事件、现象和偶然情况的本质不仅具有经济性和金融性，还具有政治性和文化性。政

治和文化元素或要素非常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我们应该在理论上更充分地理解其作用，并运用于实践中。

几十年来，结构改革不断以各种方式进行，极大地改变了经济运行方式以及所运用的经济规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很多情况下，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之间存在一个“缺失的链条”（missing link），或者说这两者没有以社会期待的或政治宣言中所说的规模发生。此外，真实的进步（增长和发展）或后退（停滞和惯性），似乎也没有证实那些经济增长理论（或更广泛地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假设。有时所谓的社会经济实践标准的确会与这些理论中某些原理截然相反。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国家或某些特殊的社会和行业团体，曾经历过一些特殊的时期，如国有化和国营经济，或新近的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或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被过分限制等时期。在其中某些时刻，关于结构改革的争辩总是与改革的努力如影相随，并还会出现其他种种问题。

以上评论既适用于整个世界经济，也适用于某些区域经济。发展已经造成很多问题，而且未来的发展依然如此。在发展过程中，世界不同地区——不论这些地区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怎样——都会受到各种质疑，比如在非洲（它仍然在为摆脱其社会劣势而挣扎），以及在有着更高发展层次的欧洲（但不是最高），虽然欧洲现在还远不及美国，也还不能成功开展自己签署的《里斯本条约》（Lisbon Agenda）。这种发展规律同样适用于那些正在经历后社会主义转型的经济体，在这些地方，尽管有着巨大的地区差异，但是其过去的经济本应该发展得更好（这个评论今后还会被重复）。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需要弄清楚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向“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抱怨，以及我们要抱怨什么。虽然，不论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家都不能逃避自己需要真正补偿的罪过，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些并不属于他们的责任或麻烦归咎到他们头上，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

这种争论的源头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发展过程的理论解读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国际上，或某个区域、某个国家以及某个地区不同参与方的利益分歧？这些问题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战略有着重要影响，它们都是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巨大现实意义的实质性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我们都没有充分发挥现有的发展潜力。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发展潜力，以及怎样才能调动这种潜力使之发挥作用，从而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增长？更迅速的增长有可能吗？这种增长的成果该怎样分配才能提高人们对社会经济进步的满意度，同时系统地减少不满、压力以及紧张的情绪？理解这些问题不仅对维护整体的经济和政治平衡意义深远，甚至对世界经济乃至全人类的平稳运行和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只有通过一种综合的途径，我们才有机会理解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发生什么、为什么会以这种形式发生以及哪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着经济的停滞或发展。这种途径的获得有赖于从三个维度来理解全世界的各个发展进程，包括理解其发生的条件、过程和意义。在这三个维度中，第一个是空间维度，即地理维度。第二个是时间维度，即历史维度。第三是跨学科维度，即使对经济学而言也是如此。

那些不能透过各学科交叉的棱镜进行观察的经济学家会忽视一些事情。而他们所忽视的，将始终不为其所察觉。事实上，他们不但不能彻底将事物弄清楚，还仍在到处发表言论和著书立作。当其他人聆听他们的言论或阅读他们的著作时，这些学术误解和实际问题就会越积越多。

要把握事情发展的经过，需要将其放置在不同国家、地区甚至全世界的范围中进行考察，因为不同经济的进程总是在不同的地方发生，而且这些进程之间的相互依赖度越来越高。现在，所有这些信息不是“明明白白摆在手中”，而是写在电脑屏幕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同时从全球的角度和特定地区的角度观察事情的发展。当然，为了更清楚、更近距离地观察事物，频繁的旅行也很有必要，这种旅行不仅仅是像哥伦布或达尔文那样的旅行。媒体、包括网络都无法替代旅行的作用。

经济进程还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从这个维度考察经济问题往往会相对简单，但这也需要把所有迟滞、延期、期望和因果关系都考虑在内。在因果关系中，一般情况下，总是因前果后。然而现在，众所周知，原因不仅在前，而且也可以在其他地方，甚至是在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

此外，原因也可以存在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不是存在于诸如缺少资金或需求不足这些经济所研究的范畴内。原因可以存在于其他学科交叉的一些领域，例如地球科学、生态学、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人类学甚至哲学等交叉领域。而且，新的学科不断涌现。它们往往出现在最有趣的地方，在不同学科交界的区域。例如，有一种“网络科学”（web science），它是传统社会科

学和先进的计算机科学的派生物。它既不是两者的总和，也不是两者的简单混合，而是一种派生。它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圈子中的各种关系怎样与网络世界中的各种关系相互作用，两个世界又怎样相互作用，而这些作用的直接结果中有一些则属于经济范畴。

如果没有深入探索这些交叉领域，或没有仔细研究经济、社会和技术层面的相互重叠和渗透，还能成功解释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吗？恐怕不行。当某些经济学家用一种狭窄的思路（因此也是错误的思路）来检验他们基于经验数据的理论模型时，得到的结果也许会相反。例如，严格按照经济假设预测投资会增加，而事实却是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胡乱修补这种模型（或是责怪政治家，这种方法更简单易行）都无济于事，因为真正的原因也许在心理学或文化领域。有时，这些领域的一些因素对经济决策者的影响会大于诸如利率或税收水平等的影响。

因此，为了理解全球经济正在发生着什么，或者为什么一些区域欣欣向荣，而另一些区域却落后或衰落，我们有必要不断地从地理、历史和跨学科这三个维度去探索。即使我们没有将一切都弄清楚（这本身也不可能），也必定会了解更多，这样达到的效果也将非同小可。如果我们在研究和分析中把比较研究加入到上述三个维度中，就会取得更多的成就。没有任何事物比比较更具有教育意义了，这种比较把不同科学的技能特点应用到空间、时间和跨学科维度。比较和对比会产生一些重要的结果，我们也因此会发现一些在现象和过程中很容易被忽视的层面。

只有比较才能获得知识。

注释：

1. 尽管这些书的书名都暗示书中的重点内容是未来，但作者谈论的基本都是过去，或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如，托马斯 · L · 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一部21世纪简史》（纽约：法勒 · 斯特劳斯 · 吉若出版公司，2005），是一本有趣的反映目前全球经济进程的书；或斯塔尼斯洛 · 格拉宾斯基小有名气的《21世纪：将是怎样的以及将带来什么》（华沙：佩雷赛特出版社，2006）。前一本书几乎没有提及未来，而后一本书，尽管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并试图描述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但作者自始至终并未摆脱过去的束缚，屡次在书中提及过去。还有一些作者成功地摆脱了过去，如马丁 · 詹姆斯的《21世纪的意义》（纽约：河源出版社，2006）。

2. 见兰迪 · 汤姆赫尔和科里 · L · 芬奇：《环境、生活与政治价值的关系是什么？》，《进化与人类行为》，总第28卷，2007年第4期，215–222页。

3. 吉姆·格雷斯:《隔离病院》,伦敦:斗牛士出版社,2007年。

4. 科马克·麦卡锡,《路》,纽约:迪滕出版社,2007年。

5. 2007年3月5日,托拜厄斯·巴克在《金融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欧盟现在的经济发展只达到美国20年前的水平……泛欧洲商业组织欧洲商会的一篇报告显示,美国在1985年就已达到欧盟目前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研究发现:欧洲落后于美国20年》,http://www.ft.com/cms/s/0/9ebc7f02-cb3e-11db-b436-000b5df10621.html,2009年7月31日登录。

6. 1969年以来,两年一次的泛非电影节由布基纳法索组办。泛非电影节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盛事,对整个非洲大陆有着深远影响,并成为非洲年轻导演走向世界电影舞台的助推器。2007年2月至3月,在泛非电影节20周年庆典时,尼日利亚导演牛顿·阿杜亚卡执导的影片《以斯拉》(*Ezra*)获得最佳影片奖。影片讲述了塞拉利昂内战中一名娃娃兵的命运。这场内战使得塞拉利昂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人均GDP为900美元,以2007年的汇率计,这相当于200美元,刚好够在这个战事频繁的国家的首都弗里敦最好的宾馆住一晚。

7.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蓝与黑》,选自《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精选辑》(第二辑),圣·劳伦,魁北克:艾克赛尔斯瓦—圣·克莱尔娱乐集团公司,1995年。

8. 贝拉克·奥巴马:《我父亲的梦想:种族与遗产的故事》,纽约:皇冠出版社。

9. 购买力平价,常常被用于国际经济比较之中,是指不同国家商品(货物和劳务)的价格比率,也就是基准国单位通货所能购买的商品数量,在对比国购买时需要该国通货的数额。例如,在中国花2元购买一个"购物篮"的消费品,而如果在美国购买同一"购物篮"的产品需花1美元,那么用购买力平价计算,1美元相当于2元人民币,而不是像用汇率计算的8元人民币。这个例子与实际情况贴近,因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按汇率计算时的4倍。事实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欧盟的78%,而不是按官方汇率算出来的18%。对波兰而言,这个比例是1.5:1。

10. 《50岁了,还好吗?欧盟50周年特别报道》,《经济学人》,2007年3月17日。

11. 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5年。

12. 福克纳在《修女安魂曲》中所说:"过去从未消逝,而且它还在继续",威斯敏斯特,麻省:古典书局,1951年,第一部,第三幕。

第三章　世界简史以及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而另一些国家贫穷，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吗？

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在时间维度之外。

要理解发展问题，就必须在广阔的时间背景下进行分析。这里所说的时间背景是指一种时间框架，从一个点延伸向另一个点，而不是消逝在未来的单个矢量。为了以更理智的方式展望未来，我们必须善于回顾过去。一切曾经的新事物都会变成旧事物，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消失。伟大的文明、辉煌的帝国都是这样消逝的，而那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事物，也许最初可称为文化或技术的突破，也会逐渐被推向边缘，最终变得无关紧要。1858年，当第一根电报线穿越大西洋底连接英国和美国时，谁也不会想到某一天人们会最后一次使用电报，而这个情景就发生在2007年。将来的某一天，会是人们最后一次发送电子邮件吗？也许会。现在，我们还无需考虑这个，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思考，并提出疑问。那些从不提问的人也永远不会知晓答案。

沿着时间的轨迹向后回望，并辨别出形成经济史进程的机制，这个过程本身就非常有趣，并且这也能帮助我们窥见未来之一斑。展望未来时，我们往往会加上自己的一些希望，因此，需要提醒以下几点：

——我们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们分析什么会发生；

——我们（并非所有人，也并非总是）唯一知道的是那些我们希望发生的事。

为从方法和本质上确保对未来分析和预测的精确性（这绝非小事），我们应该从尽可能广阔的维度去思考问题，并将时间往前后两个方向延伸。尽管前方的视角最为重要，但向后延伸也很有必要。这就像徒步旅行，只有在展望前方地平线的同时还环顾四周，才能拥有最宽广的视野，也才能看到最多的风景。

无论我们怎样赞美目前的时代、怎么敬仰人类今天所取得的成就（虽然我们今天的成就仅是1000年前的20倍，单位生产量是当时一年的生产量），当我们回溯过去时，就会发现，不论是在经济发展、增加产品和服务的数量，还是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大多数时间人类都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虽然不是每个人，不是一直如此，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是这样，但不幸的是，就整体而言，这种情况的确存在。这一说法适用于人类历史上的古老文明、时代、世纪以及世代，更不用说近代与当代了。杰出的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用他特有的讽刺笔调写道："将无用与有用，荒谬与理智，恐惧与希望捆绑在一起购买或许是人类在其历史上做过的最好的买卖了。"[1] 确实如此，而且还有比这更糟的，即只购买了无用、荒谬和恐惧。我们应该弄清楚是什么促成了人类的这些行为，以及未来我们能否做到只购买有用、理智和希望？

如果人类发展的道路蜿蜒曲折，那么我们应该追溯这条道路上的每一步，而不是局限于其中的某些重要步骤。如果不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而是从发展经济学需要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是一条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不平坦的道路，仍然可以概括出其中某些现象和过程的特点。这样得出的观察结果对于解读发展经济学有着深远意义。无疑，从较近的历史中可以得到更多经验和教训，而那些从久远历史中获得的教训也不应被忽视。

毫无疑问，我们已进行的投资原本可以收获更多的回报，或者说本可以用更少的投资得到目前水平的回报。对于经济学家而言，以上的评价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它是对我们已有经济行为的评估，是对这些行为合理性的考量。而经济学是一门关于合理性行为的科学。合理性的缺乏或不够充足是从来都不能小视的问题。事实

上，我们也很有可能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却取得比现在还小的成就。换言之，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事情的结果总是可以大相径庭。与过去相比，它们本可以更好或更差，与现在相比也是如此。

人类发展的结果取决于什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及我们所遵循的道路？这应该是智慧与愚蠢以及创造与破坏等人类永无止境的挣扎与斗争的结果。当理智和创造占主导时，人类取得进步，科学、文化和经济繁荣昌盛。而当愚蠢和破坏占上风时，人类社会不仅仅会涌现蒙昧与痛苦，还常常会伴随流血。尽管人类发展进程中总处在或好或坏（往往是更糟）的状态，总体而言，更糟的情况出现得更为频繁，持续的时间也更长。除了另类历史（alternative history）[2] 的开创者们，很少有人会问“如果不是……会怎样？”这些另类历史学家向我们展示，不论是幸运还是不幸，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件中很大部分仅仅是一些意外事件的组合。事情以它们目前的方式发生是因为很多事情同时发生。一些历史进程完全可能以与现在大相径庭的方式展开，所得结果更是相去甚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如果人类发展的结果与现在不同，也许人类可以处在一种更高的文明水平。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真理和知识会传播得更快，而各国政府及其政策也会朝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努力。今天，我们也可以说这种情形将在明天或后天实现。不幸的是，在由各种不同因素组成的历史道路上，我们将来也照样很难达到目前看来可以实现的一切。今天，人类也许可以打败愚蠢、谬误、破坏以及贪婪，但永远无法将它们彻底清除。将来依然如此。

除地理因素外，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中，战争与政治决定着世界地图的轮廓，而目前和平、商业以及科学等因素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在描述出现在大约5个世纪前的一个伟大转折点时，写道：“在短暂的清晰阶段，即当愚蠢和暴力不再发号施令时，花朵盛开在麦堆上。”[3] 一般认为，1492年是哥伦布（Columbus）发现美洲大陆，或者说他首次远征到达安的列斯群岛的那一年。阿塔利在他的书中恰当地将这年描述为关键的一年，认为它对于此后持续了几代人的划时代变革至关重要。毕竟，那一年除了飘扬着卡斯蒂利亚王国（Castille）旗帜的船队——尼尼亚（la Niña）、平塔（la Pinta）、圣玛丽亚（la Santa Marí）以及其他跟随的船只——进行的远征外，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发生。紧随哥伦布远征而出现的各种伟大的经济发现，如同雪崩一样，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难以

估量的影响，这些发现中包括今天无处不在的全球化。

然而，1492年发生的事件远不止这些。1492年还标志着现代社会的诞生，这对此后几个世纪的文化有着深远影响。在那几年，不仅有一个突破性的发现，还出现了一个对文化有着革命性影响的事物，即印刷媒体。15世纪中期，拥有最大馆藏的图书馆藏书约为600册，远少于今天我们很多人放在一间屋子里的藏书。当时，欧洲的图书总数约为10万册。到1500年，这个总数已超过900万册（当然这个数目与现在波兰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数还是远不能比）。那几年为欧洲提供了一个影响世界的机会。最有趣的是，站在遥远的几个世纪后回望那段历史，我们才能够逐渐看清这种机会。

谈到图书馆藏书和世界的图像，我总会记起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看到16世纪早期绘制的一个地球仪时惊愕的表情。罗伯特·蒙代尔是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年，他在参观位于克拉科夫的玛伊乌斯大讲堂图书馆时，对馆藏的一个16世纪早期绘制的“雅盖隆地球仪”（Jagiellonian Globe）惊讶不已。当时，美洲已被“发现”，但是这位匿名的欧洲地理学者却将美洲放在地球仪上一个错误的位置。如果哥伦布当时在场，也肯定会吃惊不小，因为很明显，欧洲和东亚之间只隔了一个大洋。蒙代尔教授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也是研究全球经济的智囊机构——全球经济复苏追踪指标学术委员会主席。他始终无法释怀，自己的家乡美国怎么会被放在了地球上另外一个地方呢？

在历史上，很少有像1492年前后出现的这样的转折点，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不论是人们的思维和行事的方式、文化和价值的层级体系，还是技术和管理水平都发生了变化。1492年之前的5个世纪，即公元962年，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转折点。当时，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s）在奥托一世（Otto I）的领导下崛起，塑造欧洲未来几个世纪的政治基础已经成型。国家体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丹麦、匈牙利、波西米亚、英国以及波兰都已经成为有着国民经济的国家实体。与此同时，欧洲之外的其他地方也在独立地发生着变化。中国正在发展，而遥远的高棉帝国（Khmer empire），即今天的柬埔寨、老挝以及泰国等也在逐步发展。在地球遥远的另一边，其他一些文明（其存在甚至未被觉察）在印加帝国（pre-Inca）文化中繁荣发展，这些地区即今天的秘鲁和厄瓜多尔；还有玛雅文化（在后古典时期早期）所存在的区域，即墨西哥、伯利兹、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

在1492年之后三个半世纪，迎来了不同寻常的1848年，这一年是“民族国家之春”（Spring of Nations）时期的顶峰，在此之前两代人的时间，法国大革命爆发，18世纪也宣告结束。这是一段对经济的实质性变迁有着深远意义的时期，也是英国在世界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同样是在1848年，马克思（Marx）和恩格斯（Engels）发表了《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奥地利帝国废除了农奴制，并赋予加利西亚省农民土地所有权（在奥地利本土，18世纪末特蕾西亚女大公和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就已经废除了农奴制）。美国和普鲁士模式的农业资本主义都取得了成功。遵循着英国或欧洲大陆转型的模式，工业化和现代化在欧洲不断加快步伐。第一次科技革命正加速发展，与之伴随的是海运、铁路运输的飞速发展和电报的迅速普及，工业高速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当时的一些重要文化成就今天仍然广受欢迎，这在文学和音乐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和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正在撰写自己的著作。埃克托尔·柏辽兹（Hector Berlioz）正在创作他的《感恩赞》（*Te Deum*），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正在德累斯顿指挥他的歌剧并写作《罗恩格林》（*Lohengrin*），弗雷德里克·肖邦（Frédéric Chopin）还在到处演出。美国及随后日本的经济扩张正在进行。现代时期似乎又重新再来，与前次不同的是，这次涉及的范围跨越不同大洲，并试探性地延伸至位于地球另一半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且更大胆地伸向刚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拉丁美洲。由于技术、经济和政治的普遍进步，在19世纪中期，创新的想法和大量商品更容易渗透到世界最遥远的角落。

或许，我们也很幸运。因为许多迹象表明，我们生活的时代——往前推一代人再往后推一代人——也是一个转折点。几百年后，或几十年后，也会出现一本名为《1989》的书吗？也会像波兰的流行歌手玛丽拉·洛多维茨（Maryla Rodowicz）所唱的那样：

“我是如此幸运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
在波兰
生活
我是如此幸运

生活在这样一片乐土
有趣而真实……”[4]

1989年以及当时的各种环境，对历史进程，包括经济史，有着突破性的意义。1989年的春天，波兰的圆桌会议（Round Table）达成了集体共识，对于当年秋天柏林墙的倒塌起到推动作用。这个伟大转折点的积极方面包括：冷战的结束，因特网时代的开启，智利、南非、罗马尼亚和韩国等国家独裁政府的倒台，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大批国家实行开放、允许自由的国际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遗传学取得突破，无线通信飞速发展，纳米技术和卫星电视出现，太阳系之外的太空飞行和大规模跨国旅游的实现，致力于气候保护的国际协作的开启以及全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等。

然而，不幸的是，历史还由一些罪恶的、甚至是非常罪恶的事件构成。在德黑兰，伊朗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对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宣布了一个法特瓦（fatwa），即伊斯兰教的法律裁决，判处他死刑。这个裁决的影响在20多年后仍旧存在[5]。

现在，世界上出现了新的疾病、变异和瘟疫。更糟糕的是，今天，一些不可预知的疾病还在不断出现，而在那不同寻常的1989年，即使是最出色的未来学家[6]也无法预测发生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如此规模的恐怖主义，以及艾滋病的蔓延。宗教审判和奴隶制废除了，但是罪恶的东西仍然存在。

* * *

回顾宇宙的历史，可以发现，人类主宰地球的时间不算太长。总体而言，人类存在的时间还很短暂。鉴于在之前的几千年中人类的进步非常缓慢，也许一些人会认为，人类在近代的成就已经非比寻常。自宇宙大爆炸以来，150亿年已经过去了，而人类的存在也不过300万年左右。如果把宇宙大爆炸后的时间比作一天，那么人类的出现不过是这最后的17秒或35秒。因为最终，或者说从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存在的确切时间。人类的进化一直在进行。

人类出现的最早痕迹大约可以追溯到700万年前。当时，最古老的南方古猿已经在地球上游荡。而后，大约在260万年前，出现了第一个人类。这段时期，也出现了

原始的、粗糙的工具，考古学家曾在奥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发掘出这样的工具（约210万年前，所谓的奥杜威文化出现在塞伦盖蒂平原上，这片区域现属坦桑尼亚）。约140万年前，最早的直立人出现在亚洲西南部。随后，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阿舍利文化（Acheulean culture）开始在中东地区发展起来，并在约70万至30万年前向世界其他地方传播。直到30万至25万年前，我们更为熟悉的智人（Homo sapiens）才出现，而智人的欧洲分支直到约18万年前才出现。我们很现代，但最早出现的智人却非常古老。之后出现的是克鲁马努人（Cro-Magnon humans），他们存在的年代离我们更近（大约在4.5万年前）。克鲁马努人曾短暂地居住在洞穴中，大约在3万年前，他们在欧洲逐渐灭绝了。在克鲁马努人与智人同时存在的那1.5万年里，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充足的机会）与智人交换基因。这种融合与碰撞应该很有趣。

如果把这短短的几秒钟，或者说自人类出现以来的这300万年，当成24小时制的一天，那么人类经济就出现在这一天中的最后7分钟里。有意识的人类经济活动大约出现在1.5万年前。在这个背景下，当今的全球化就如同人一生中眨眼的一瞬间。但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眨眼的这一瞬，因此，这段时间对我们而言就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1.5万年中的经济活动是指固定的经济活动，尽管人们对这种说法持有不同意见。虽然经济活动的萌芽出现在4.5万至4万年前，即所谓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Upper Palaeolithic Revolution）时期，但早期的人类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生活，他们主要以狩猎、捕鱼、采集为生。我们注意到，墓葬及一些人类最早的宗教活动痕迹，出现在大约10万年前。稍后，大约在3.5万至3万年前，第一批艺术品（或至少是我们现在所知被保存下来的第一批）开始以石洞中岩画的形式出现。

直立人最先出现在这个缓慢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的一位祖先站立起来，望了望四周，然后发现站立起来后的视野更加开阔，可以一直看到地平线。也许正是这种原因成就了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当然，直立行走也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如要想要更深切地体会这种变化的伟大，你可以先手脚着地趴在地上，往四周看看，然后再站立起来环顾四周。

智人可以四处迁移并交换工具。关于交换最先出现的时间，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争论不休，但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即认为交换开始的时间要远比曾经认为的早。早在大约5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交换的迹象，而实际出现的时间或许比这更早。

智人会使用种子，并且挖出了专门用来存储种子的洞穴。这段时期，也有人类精神文化元素出现的迹象。一些简单的历法符号表明，大约3万年前，人类已经开始注意到月球运行周期的变化，已经开始探寻时间流逝的原因。这会影响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这也会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大约1.4万至1.2万年前，即所谓的“新石器时代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之后，人类开始出现了定居生活。定居现象最先出现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而今天，在那片区域，美国人正在向伊拉克人灌输民主政治。在逊尼派（Sunni）和什叶派（Shi'a）还未出现的那些年代，经济和文化在这片纳图夫人（Natufian，因纳图夫地区苏巴克洞穴的考古发现而命名）居住的土地上蓬勃发展。纳图夫人（历史学术语上将其称为中石器时代社会或像其他人所称的旧石器时代末中石器时代初期）最先开始驯养动物。从狩猎向驯养（山羊或绵羊）的转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人类，也许是北欧和近东地区的人们，开始驯养狗，这也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想法之一。

智人开始尝试种植植物。这首先出现在约1万多年前半干旱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随后，灌溉的出现直接导致智人不再依靠采集，而只需种植大麦和小麦。大约8500年前，在亚洲东南部，人类开始种植水稻，于是农业逐渐兴盛起来。大约在1万年至7000年前，在中美洲，玉米和南瓜开始在小范围内种植。有趣的是，自然界约有45万种植物，其中，人类用作食物而进行种植的仅有200种左右，我们营养的基础主要来源于8大植物群中的20种农作物。几千年后，这些植物中某些种类的基因被改良，于是，那些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植物种子被人类理所当然地用于各种商业目的。

不久，大约在6500年前，最早的城邦出现了。人类开始用石头建造房屋和坟墓。在一些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狩猎和采集依然盛行，并一直延续下来。时至今日，有些地区的人们仍然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例如在新几内亚和纳米比亚东南部的一些山谷以及博茨瓦纳的西部，还生活着“桑人”（San people），即“布希曼人”（Bushmen）。

历史学家认为，有意识的人类经济活动至少产生了两个结果：贸易和积累。这两种现象出现的时间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时期，即新石器时代之前的2万至3万年。贸易既是劳动分工最初的标志，也是其结果。随后，出现了几千年之后

我们所说的“专业化”。那时贸易的形式非常简单，以至于它对劳动效率的影响微不足道。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文明仍然主要在简单再生产的框架下发展，在一个不变的水平上重复着一个静态的生产周期，这就是停滞。即使是停滞也需要供给和储存，于是便出现了积累。正是积累的出现促成了对生产周期的规划以及对一些生产结果的递延，这种现象在农作物生产中尤为明显。当后来人们发现存在剩余物时，一个伟大的念头诞生了——这就是交换，人们发现可以将生产的剩余物用于交换。

交换进一步频繁。人类交换最初采用的形式是物物交换，后来出现了一般等价物，即货币。货币是人类第四个最伟大的“发明”，另外三个是直立行走、火和车轮。我在“发明”上加引号，是因为就像今天的全球化一样，货币并不是由某个人构想出来的，它是在长期的交换过程中逐渐出现的。而贸易的产生也经历了类似的历程。

货币的普遍出现是在公元前7世纪，这与腓尼基人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腓尼基人的流动性对经济发展贡献显著，他们是当时贸易界的领军者，推动着贸易的不断扩张。通过贸易，他们促进了一些重要领域的劳动分工，使得劳动效率有了很大提高。旅行与贸易加速了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毫无疑问，这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增长。在比布鲁斯、西顿、提尔和乌加里特这些在3500多年前就已经欣欣向荣的城市，腓尼基人与整个已知世界（即被他们和他们同时代人所知的世界）进行着贸易。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使得商品和货币交换的经济进程处在运动之中，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使其停止（尽管不久前有人曾试图这样做）。

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在地球上各个彼此独立的地方分别出现。在一些区域，可计数的或可分割的商品成为货币。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牛也成为货币，这虽然容易数，但不容易分割。一般情况下，成为货币的都是金属：起初是铜，然后是银、金和各种各样的合金。在一些分散的区域，如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和比热戈斯群岛，即现在的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海岸，贝壳也常常被用作货币。现在，比热戈斯群岛中的如班纳岛（Ilha de Rubane）和若昂维埃拉岛（Ilha de Joao Vieira）上的居民还过着像几千年以前一样的生活。他们除了进行物物交换外，还使用贝壳进行交换，或者用从蓝色大西洋里打到的鱼交换从绿色椰树上采集的椰子。必要时，他们也用当地货币与外界打交道，也不排斥使用美元或欧元。

有那么几千年，虽然人类已经在地球表面四处游走，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人类缓慢地延伸着自己的足迹，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从今天的非洲和亚洲西南部慢慢向欧洲和亚洲其余部分扩张，而人口数量却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如果某个地方人口稍有增加，随后部落间的争战、瘟疫和饥荒又会使人口数量降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文化逐渐出现、进化和发展。大多情况下，各个文化之间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科技以每年大约5至10公里的速度传播着。这就意味着一个地方使用的某项灌溉技术或制造的某种工具一两百年后会传到1000公里以外的地方。

同时，在我们的时代到来之前的几千年里，一些伟大的文明兴起又衰落。它们留下的物质遗产让我们惊叹不已：今天埃及的底比斯伊普苏特（Ipet-Sut）神庙和吉萨金字塔、伊朗的波斯波利斯古城（Persepolis）、中国的长城、雅典的卫城、土耳其西海岸的贝加蒙古城（Pergamon）和特洛伊古城（Troy）、罗马广场（Roman Forum Magnum）和耶路撒冷古城。至于世界七大奇迹，除了埃及金字塔保留下来之外，罗德港巨人雕像（Colossus of Rhodes）和其他五大奇迹都已消失了。公元前776年，首届运动会在希腊的奥林匹斯山举行。公元前五六世纪之交，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和文化一片繁荣。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这两个国家的发展也令世界感到惊奇。

回到2500年前，在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出现之后的一两个世纪里，佛教也开始出现（公元前563－前483）。这些哲人的智力成就至今仍为我们所用，就像中国人至今仍受益于与佛祖同时代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的思想一样。同样也是在那个时期，波斯王大流士一世（Darius I）在公元前518年开始兴建壮丽的波斯古城，后世称之为波斯波利斯。在那里，即今天伊朗的东北部和土库曼斯坦边境，拜火教的创始人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创立了一个最古老的一神宗教（monotheistic religions）。他是否如一些学者所说，生活在公元前660至583年，我们无从知晓，这些学者根据他的不朽著作《泰珈》（*Gathas*）（拜火教圣典《火教经》的一部分）推算他大概生活在那个年代，或更早几个世纪，即公元前11世纪和前10世纪之交。

不幸的是，我们对新纪元之前一千年生产的发展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发展水平比新纪元之后的第一个千年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地中海文化区域最为活跃，中东地区，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中国也非常活跃。而人口分布

相对稀少的美洲和非洲则相对平静。大洋洲的大部分地方还没有人类居住。总体而言，人类在经历着经济的增长，更宽泛地说是经济的发展，因为增长总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在这个背景下，文化也开始繁荣。

公元初期，基督教刚刚兴起，古罗马皇帝泰特斯（Titus）的军队在公元70年洗劫耶路撒冷城时，世界上人口最多也只有3亿人，少于今天的美国人口，或者说约为波兰人口的8倍。这些人所生产的产品也只是今天我们所生产产品的一小部分。从价值角度来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时整个世界创造的价值仅为今天波兰人所创造价值的1/3。当然，从物质角度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用今天的方式计算，古代世界最发达区域的商品和服务的人均产值不到800美元[7]，这仅相当于今天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水平。但在当时，除地中海盆地和亚洲一些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包括除印度和中国的部分地区之外，人均产值的数目还要更少。

当时不同区域和国家间的收入差距远比今天小。如果比较各大洲之间的平均水平，这种差距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当时，收入水平最高的区域是西欧和除日本以外的亚洲，按1990年价格水平计算约为450美元，或按今天的价格水平计算约为800美元；非洲的平均收入水平是425美元（按今天价格水平计算是755美元）；世界整体平均水平是455美元（按今天价格水平计算为790美元）。在公元初年，北美和非洲的人均收入水平都差不多（比西欧和经济更发达的亚洲部分区域低），但今天美国的人均水平是非洲的20倍。

在一些高度发达的地中海国家，收入和财产相对分散。在那些区域，不均衡的现象比较明显。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贵族阶层掌握了大量财富，而为数众多的奴隶们却基本一无所有。在世界其他地方，即那些与古罗马帝国没有关联的地方，原始公社占据着主导地位，整体产出和消费都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当时，中国的情况就已与其他地方不同，在某些地方与古罗马的情形相似，而其他方面又与原始公社相似，但整体的收入差距要比今天小。

此后的1000年里，世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直到公元5世纪和6世纪，当罗马帝国衰落时，世界才出现深刻的变化。罗马帝国的衰败犹如瀑布直落千里，而其他地区的转型则沿着一条相对平和的道路前进。当时，科技发展缓慢，文化的发展也保持在较低水平，战争不断，经济停滞。在此后几代人的时间里，全世界人口数量基本维持在基督教刚出现时的水平。这一时期，埃及是举世闻名的，最灿烂的文化中

心，亚历山大港的灯塔成为古建筑的七大奇迹之一。公元1000年时，世界文化的中心是科尔多瓦，这座城市当时拥有多所大学和几十个公共图书馆。当时世界上约有3.1亿人。1000年后，纽约以其前所未有的资本和智力积聚取代了亚历山大和科尔多瓦，成为世界中心，此时世界人口数量已达到65亿。那么，公元3000年时，哪座城市将成为地球上最壮丽的城市？也许，现在这座城市还不存在。继非洲、欧洲和美洲之后，它也许会出现在亚洲。从亚历山大到科尔多瓦再到纽约，我们可以大致画出一条直线。如果把这条直线往西北延伸，就会到达西伯利亚东北的某个地方。

公元1000年，人类的总产值与此前1000年时的水平基本相同。因为人口有了稍许增长，人均产值稍稍下降。欧洲西部直至易北河以及欧洲南部（这部分大陆包括捷克但不包括匈牙利），富裕程度与欧洲东部不相上下，人均约400美元（按今天的价格水平计算为710美元）。这个数目比非洲的415美元（今天价格水平计算为740美元）低，其中，北非因为受高度发达的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其人均水平更高，只是在人口相对较少的亚撒哈拉地区发展较为落后，拉低了整个非洲的水平。最富裕的地区是亚平宁山脉地区的一些法语国家，朗巴蒂和加利西亚。拜占庭非常富有，而斯堪的纳维亚则非常贫穷。如果当时欧盟就已存在，那么土耳其早就成为其成员国了，因为拜占庭及其独立的领土版图一定会成为欧盟的骄傲之一，而当时贫穷的北欧国家想要入盟则会遭到强烈反对。

所有人，包括那些特权阶级，即我们现在称之为的精英阶层，都没有意识到，在公元5世纪后的第一个千年，尤其是这千年的后500年里，世界经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当时，社会的主流是停滞而不是发展。人们肯定觉察到有些年头生活不如以前富足（或更加困顿）。当时的统治者一定对经济形势有个大概的概念，因为他们感觉到国库不如以前充足，可用于战争的资金也更少。然而，他们并没有从这些觉察到的信息中领悟到需要对抗停滞、刺激经济的发展。他们只会祈祷能有更好的收成，而不是想出一些系统性的方法来增加产量。空荡荡的保险箱只是成为新的搜刮和抢劫的动力，而没有成为寻找促进生产增长途径的信号。惯性在这里起了主导作用。停滞的剧痛逐渐促生出倾向发展的想法，这种想法逐渐战胜贪欲和占有欲，成为新的主导思想。创造性的经济思维开始出现并缓慢传播，但其传播的速度要慢于技术进步的速度。

* * *

可以看到，尽管人类历史风云变幻，但准确地说，经济领域里数千年来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波澜。变化微不足道，有时甚至几乎不存在。停滞成为主角：它不仅影响着人口数量也影响着生产，而这两者息息相关。人口要增长，人们首先必须知道该怎样更多地生产，包括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生活必需品和人口。在相当长时间里，由于生产方式领域缺乏适当变革使得这种增长不可能出现。历史上除了一些辉煌（并非是属于每个人的辉煌，奴隶和古罗马的格斗者就不曾拥有）的古老时期外，全面的变革发端于近现代。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变革的步伐才逐渐加快，而直到上世纪的前500年，许多现代因素才不断涌现。

公元1000年至1500年，在易北河东岸和喀尔巴阡山脉北部地区，农业技术方面一个引人注目的改良出现了。在那几个世纪里，城市网络和道路体系发展迅速。如果以读和写的能力来衡量，人们的教育水平也有显著提高。第一批大学成立了，而第一批银行和第一种“欧洲”货币也相继出现。在这段时期，哥特式风格颇为流行，并且出现了大批需要丰富知识和高超技术来完成的哥特式建筑。

然而，直到近代，才出现充满活力的经济变革来容纳迅速增长的生产和人口。甚至直至200年前，世界人口还不到10亿，比今天的印度教教徒人数还少[8]。一个世纪后，世界人口变成16.5亿，此后50年，这个数目变成25亿。而达到60亿仅用了另一个50年。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是法国大革命或波兰最后一次遭分割时世界人口的10余倍。那么，公元3000年时，世界人口又将是多少，是更多还是更少？或许会变得更少。

尽管世界人口在公元元年后第一个世纪几乎没有增长[9]，但现在的人口已是当时的20倍。世界的人均产值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几乎没有变化，甚至稍稍下滑，但在此后的一千年，人均产值增长了13倍。于是，世界的总产值成为前一个千年的300倍。在公元1000年和1800年间，世界总产值以每年0.05%的蜗牛速度增长，这个速度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几乎无法察觉。在这800年里，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微不足道的50%，与中国在过去五年里平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当。

直到1820年后，在我们的曾曾曾曾祖父生活的那个年代，世界经济才开始起飞。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8倍，而创造这些产值的人

口增长了5倍。与此前的人类历史相比，这才可称为真正的爆发。可以理解的是，在这段时期里，不同地区实现经济增长采取的道路并不相同，这也导致了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有着巨大差异。1820年，西欧、北美、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人均收入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两倍，而现在这个比例扩大至7:1。

在人类历史上有几个世纪，停滞曾一度成为就业和生产结构的特点。直到我们之前的两个世纪，一些显著的变化才开始出现。美国的发展数据能更好地说明这一点。200年前，85%的美国人从事农业和采矿业（大部分从事农业），从事服务业的人数不到其人口的4%。今天，这个比例变成3%的人从事农业和采矿业，而79%的人从事服务业（还有约18%的人从事世界上最高产的制造业）。

在公元1000年，由于整体发展程度较低，以及缺乏基础公共医疗服务，人类的平均寿命仅为24岁，令人震惊。婴儿死亡率非常高是拉低人口平均寿命的主要因素。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婴儿在出生后的第一年就夭折了。饥荒和瘟疫不断，而且这种情况直到18、19世纪才有所改变。尽管难以置信，但是基于一些陆续发现的材料估计，直至14世纪，英国的平均人口寿命依然是24岁。300年后，这个数字增加到41岁，而法国才勉强达到39岁。200年前，即在拜伦（Byron）和司汤达（Stendhal）生活的年代，婴儿死亡率在这两个国家分别是144‰和181‰。这与现在非洲一些最贫穷国家的水平相当，而这些国家也是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与我们的期望相比，200年的发展是太长了还是太短了呢？

此后，世界发生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现在，按统计学计算，一个新出生的世界公民可以活到66岁（在波兰是75岁）。具体而言，各地的情况差别巨大。在一些富裕的国家，如日本和加拿大，可以比这个平均年龄多15年；而在一些最贫困的地区，如斯威士兰和坦桑尼亚，则要减少30年。

* * *

尽管我多次使用“革命性的”这个词，但是通过对历史的粗略回顾，首先应该得到的教训是，在人类历史和文明史上发生的每次变革都大不相同，这一点对于我们预测未来也至关重要。这种变革既不是单调、均匀、微小的改变，不是那种直到一个时代过去，才从“量变发展为质变”的改变；也不是（除特殊情况外）完全停

滞阶段与大跃进式进步阶段交替的改变。这是逐渐增进、积累和重叠的改变，就像瀑布一样，最终推动历史的车轮沿着崎岖不平的道路前行，有时迅速，有时缓慢，而有时则以逐渐累积的形式（这也是我们可以最清晰地观察变化的时候）。而未来的发展，也将遵循这样的道路。其实我们已经踏上了这条道路，因为我们已经花费了毕生精力与这些大大小小的发展的瀑布打交道。

对历史的简单回顾让我们知道，没有批判就没有进步，这同样适用于经济发展。这是第二个显而易见的历史教训。对形势状况作出批判性评价是分析事情发展的关键，也是决定正确行动的不可替代的条件。古文明衰落后，人类批判的能力逐渐下降并近乎消失，这导致了绵延近10个世纪的中世纪时期。在此期间，即从公元5世纪古罗马帝国瓦解到14世纪文艺复兴之前的这段时间，杰出的伊斯兰思想家培养了批判性思维，并继承了后古典主义哲学传统。这个事实导致了两个相邻的文明完全不同的际遇。在原来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由于制度上的缺陷、多重的冲突、统治阶层的短视和愚蠢，以及因基督教教条的桎梏而导致的精神腐化和保守，古文明逐渐消失，经济进入停滞阶段。而批判性思维正是在技术与贸易繁盛的地方，即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间发展起来。更确切地说，这些地区形成了一种良性反馈机制，活跃的经济激发了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又反过来激励经济行为。

当宗教的教条（即扼杀好奇心和探索客观科学的欲望，这种欲望会导致新发现、新思想和新应用产生）在基督教世界占了上风时，伊斯兰世界幸运地处在另一番景象之中。当基督教世界处于停滞时，伊斯兰世界在开明统治阶层的领导下发展迅速，当时这些统治者愿意接受科学、艺术并且不让宗教主导生活。中世纪基督教的教条压制了人们创造性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当时的人民，甚至统治阶层，所拥有的财富非常稀少，而且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经济产品还是文化成果，都来自上帝。与此同时，在伊斯兰世界，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维蓬勃发展，推动着数学和天文学的进步，并且带动了物理学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副产品之一，便是挽救了一些即将被遗忘的古代成就，并将之传承到现代社会。早在公元前1世纪，希腊人就已经能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安提基齐拉器械（Antikythera Mechanism），这被一些人认为是世界上首部电脑，而事实上这是用于计算宇宙和地球时间的复杂器械。公元6世纪时，曾出现过一部类似的机器，然后，就目前我们所知，直到公元13世纪，在当时仍处于伊斯兰文化影响下的繁荣的伊比利亚半岛上，又出现了一部类似的机器。

对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的需求创造了一种供给。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具体互动对于维护发展趋势至关重要。那些有能力为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逐渐占据上风。又过了一段时间，到13世纪，与1000年前各种有利和不利条件混杂的情形相似，整体局势发生了变化。欧洲迎来了宗教改革时期，宗教教条的松动释放了人们获得新知的欲望，他们开始通过知识而非信仰探寻新事物。而在此之前，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挽救了古文明，不仅仅是因为设拉兹的哈菲兹（Hafiz of Shiraz），这位至今仍被伊朗人深深敬仰的14世纪伟大的波斯诗人，写出美丽的诗篇来讴歌蜂鸟对玫瑰的爱情，更重要的是，哈菲兹及其同时代的人们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前的那几个世纪里捍卫了人类批判思维的能力。

在那几个世纪里，伊斯兰哲学家、学者、艺术家和政治家的思想远远超越了同时期基督教思想家们的思想，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留下了后世无法磨灭的印记。这里举其中两位的例子，即伊本·西纳（Ibn Sina，980－1037年）和伊本·路士德（Ibn Rushd，1126－1198）。第一位也称阿维森纳（Avicenna），是伟大的学者、哲学家和医学家，波斯人。第二位也称阿威罗伊（Averroes），是阿拉伯伟大的哲学家和医学家，来自安大路西亚。有趣的是，当时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都是医学家，就像今天一些思想家同时也是经济学家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科学家。正是这两位思想家，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评注，挽救了古希腊哲学，使其免于在欧洲中世纪时期被完全遗忘。

记住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持一种怀疑态度对待当今文化与政治的分歧（有些人称之“文明的冲突”）。1993年，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后，“文明的冲突”这个词就变得流行起来。亨廷顿的这篇文章是对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早一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的尖锐抨击。1996年，亨廷顿将他的这些观点写入一本书中，他认为，目前世界上几个主要文明之间的冲突和敌对将塑造新的世界政治格局[10]。国际冲突不是来源于不可调和的经济矛盾，而是来源于文化差异，尤其是那些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文明。原著的封面上，在书名的下面，印有两个优美的现代柱廊，一个是阿拉伯式的，另一个是希腊式的。而当波兰版出版时，封面插图为两名来自不同文明时期的战士，彼此互相对峙。需要补充的是，“文明的冲突”这个词语带有故意神秘化的贬义色彩，因为它明显将这种冲突夸大了。显然，使用这个词的意图是为

了挑起争论，虽然一个众所周知的、浅显的道理是只有和谐才具有建设性。

因此，尽管一两千年前不同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别很小，而且本身发展水平也都很低，但是这种增长率的差别导致了今天北美地区的人均产值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而非洲的平均产值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均产值则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从1820年至2000年，西方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相对状况或购买力平价计算）以每年大约1.51%的水平增长。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日本，为1.93%，美国和西欧则分别为1.75%和1.51%。同一时期，拉丁美洲的年增长速度为1.22%，西欧之外的其他欧洲地区为1.06%，中国为0.86%，非洲为0.67%，而亚洲其他地方则为0.92%。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价值似乎微不足道，其间的细微差距也无足轻重。但这是一个巨大的假象，因为这些数据是以单年平均值计算的。如果我们用复利计算整个时期的这些价值就会发现，日本的产出水平增长了3022%，而非洲只增长了233%，这是多么大的差距！这就是发展与停滞的差别。即使是表面看来西欧和北美之间非常小的增长差别（每年0.25%），用复利计算，在6代人之后，这个差距就会变为786%，因为西欧和美国的收入增长分别变成了1385%和2171%。由上述这种简单的数学计算可以窥见经济增长的威力，长此以往，这种增长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伟大的艺术家往往从不幸与苦难中找到创作的灵感，然而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如果要使其精神和文化繁荣昌盛，就必须有充满活力的物质基础，从长期来看，这种物质基础则需要经济增长来做保障。这就是人类简短的历史给我们的第二个重要教训。

需要补充的是，过去几年的经济发展打破了麦迪逊计量（Maddison's calculations）的模式，更具有动态的特点。从1998年至2007年，全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按实际数值计算，即去除通胀因素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平均增长率为3.5%。这个数值减去1.3%的人口增长率，得到的人均增长率为2.2%。与之前180年间的水平相比，整整翻了两倍。许多亚洲国家以每年6%的增长率增长。东南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高于这个平均水平，为3.6%[11]。非洲地区的增长率为2.1%，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发达经济体增长率稍低，为2.0%；日本则更为缓慢，为1.2%。

然而，这个阶段也只占一代人生活时期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需要记住的是，如果非洲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且在未来180年中西欧[12]生产增长的速

度与过去这10年的1.8%相同，那么到2187年，非洲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比现在高4213%，西欧国家则比现在高2481%。

西欧国家最近五年的增长速度放缓，年增长率约为1.28%，而非洲则有所加快，为3.38%。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百分点的1/10都将翻上几倍。54年后，年1.3%的增长率将翻倍，年1.8%的增长率将在39年后翻倍，年3.4%的增长率翻倍需要21年，而年8.5%的增长率翻倍仅需要8.5年。如果西欧和非洲分别长期保持1.3%和3.4%的增长率，并假设目前非洲的年平均收入是3000美元，西欧是32,000美元，那么6代人之后（即我们的重重重重孙生活的年代），西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2,190,000美元，非洲“仅”为316,000美元。那时，非洲还会成为“天堂”吗？

如果这不是历史发展的方式，那么我们会对上面的结果感到不可思议。在某些区域曾经可能发生，并且在中国和其他几个国家正在不断涌现的事情，在其他一些国家的未来就不可能发生。那些过去发生在当今富裕国家的事情，正在中国发生，但不会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发生。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5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30年里以每8.5年翻一倍的速度增长。2007年，尽管中国人口增长了，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8300美元，与1977年相比，增长了12倍。

现在，跨越了如此漫长的时空征程后，我们需要思考一下自己所处的位置。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前，即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一年以后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现在的价格水平计算是700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马拉维和布隆迪的水平，也相当于一两千年前整个世界的平均水平。通过旅行到另一个地方，我们也就到达了另一个时代。比较非常必要。通过考察非洲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生产效率以及生活水平，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进步了的中国在一代人之前的面貌，也可以看到今天富裕的欧洲1000年前的景象。

前文在比较收入时，我们曾谈到西欧和南欧，这些国家当时远比东欧富裕，现在依然如此。如果把当时的西欧比作现在的布隆迪或刚开始改革时的中国，那么当时的东欧就相当于今天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中最贫困的那部分。如果想要知道“勇敢的”波兰国王波列斯瓦夫（Bolesław）时期波兰的生活状况，可以在30年前去中国看看。如果当时没有去成中国，那么还可以现在去马拉维和布隆迪看看，或者去马里多贡人那片美丽的土地上走一圈，在那里你还可以看到一两千年前村庄的景象。要把那里设想成以前的波兰，你只需把他们的猪和牛换成山羊和绵羊，大麦换成粟。

至于鸡，如果这些村民们能养得起的话，应该两个地方都可以养。

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是波兰的一半，是美国的1/5。如果中国在未来一代人的时间里保持前一代人时期的增长率，那么30年后，其国内生产总值将是现在的12倍。通过简单比较就可以发现，203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是1977年的140倍，人均收入为97,000美元，是目前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卢森堡的35倍（卢森堡有48万人口，中国人口是其2750倍）。

中国不只是在今天才成为例外。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曾一度远比现在强大。当欧洲才缓慢摆脱中世纪时期的停滞，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的苏醒阶段时，中国不论在文化还是经济上都已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相对而言，这种贡献远比今天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大。160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的29%。100年后，由于中央集权化，中国增长的脚步放缓。此后，由于当时统治阶级的保守（今天我们将此称为“反改革”的态度）和官僚作风，中国经济所占比例缩减为22%。后来，由于朝廷统治者采取开放和积极的改革立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到1820年时这个比例达到1/3。

当中国的发展由于中央集权制和削减与外界的合作急剧放缓时，欧洲和北美的经济正踏上飞速发展的轨道。两代人的时间之后，即1870年，中国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为18%，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个比重缩减到9%。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仅为4.5%，这个不到5%的比例一直持续到其改革开放之前。同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也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今天，中国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又一次回到了16%，与140年前的比例类似。

我们已经知道，事情以其特有的方式发生是因为很多事情同时发生。尽管我用现在时态来表达这个观点，但它同样适用于过去。那么，在过去那些不同的历史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经济的发展沿着我们现在看到的轨道，而不是其他路径发展呢？那些变革的历史高潮期，有时持续十几年，有时是一两个世纪，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事件的集合。某些时候，偶然事件的影响巨大。然而，人类的智慧以及细致周全的策略还是能在一片混沌之中[13]，指引着事件的发展，有时甚至能扭转其发展。不幸的是，另一方面，人类某些落后或愚昧的思想以及战略的缺乏也会使自身完全屈服于混沌状态，从而置发展于不利的环境之中。于是，有利和不利的力量交

混，它们共同作用的产物将决定新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规划和体系。随后出现的或者是停滞或者是发展。

当以下五个条件都具备时，就会出现长期的发展：

（1）技术进步；

（2）文化和经济中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想超越教条主义成为主导；

（3）经济意识以及组织扩大生产和交换的能力；

（4）统治阶层进行深刻制度变革的意愿，这种变革将释放人类的能量和创业精神，并促使他们更具创造力；

（5）对外开放，尽可能扩大交流，其范围不仅包含商业领域，也涉及知识、信息和文化领域。

以上五个条件缺乏其一，经济发展就会放缓或停滞不前。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落后于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和波斯）以及中国，就是因为不具备上述条件。反过来，近代中国统治阶层的保守和闭关锁国将这个“中央帝国”（Middle Kingdom）推到了世界边缘。事情完全可以以另一种轨迹发展。正如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推动了整个国家向前发展，与此同时，印度也在实行开放并经历着国家的统一。当然，上述条件即使缺乏其中某一个，发展照样实现，这样的例外也存在。例如，在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尽管当时周朝基本与外界隔绝，且受宗法思想的影响也不善采纳批评，但这个朝代的封建社会却蓬勃发展，发展速度甚至超过同时期的希腊。这个事例也可以说明，有例外才能证明规律的存在。

此外，任何时期都可能出现经济衰退，它既可以出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可能出现在最近短短的几十年间。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没有出现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但一些国家确实经历了产出的绝对递减，有些国家这种递减如此明显，以至于它们再也没能回到自己曾经达到的最高水平。可以简要归纳出遭遇以下4种不同灾难的国家：

——经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开放型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的国家；

——非洲亚撒哈拉地区后殖民主义国家；

——挣扎于地区争端、宏观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之间的拉丁美洲国家；

——单一经济形式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主要依靠石油出口的国家。

第一组的划分有些争议，因为后社会主义国家产值的下降不能无条件地将之称为灾难。这些国家产值下降的程度，尤其是在一些下降严重的国家，可以用“灾难性的”来形容，但整体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一方面，转型带来的衰退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转型也会对一些领域起到疏导作用，净化经济中那些结构上的低效实体，这些实体只是经济的负担而不是资产。然而，经济转型衰退的程度远超过应有的水平。错误的经济制度也加剧了衰退。但这并不是上帝的指示，而是人类选择的结果。

于是，中东欧和亚洲这29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前苏联的各个共和国以及蒙古，花了整整18年的时间，才使经济产值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水平”这个词很关键，因为经济结构已完全不同，变得更加现代化、对消费者的需求更加敏感。这种结构传递着一种品质，使其在很多情况下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目前，只有阿塞拜疆、保加利亚和立陶宛的产值能达到曾经的最高水平。有9个国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马其顿、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塔吉克斯坦和乌克兰）目前产值仍然低于1988和1990年间的最高水平。情况最糟糕的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要到2017年它们才有可能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此时刚好是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

然而，令人更为忧虑和不安的是许多非洲国家的形势，以至于现在还有人认为殖民主义也没那么糟糕（总体而言，殖民时期的情况更恶劣）。目前的现实情况是，许多国家发现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自己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差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是长期的民族冲突、接连不断的局部战争、领导阶层的无能、有缺陷的经济政策、人力资源投资不足、严重受损或根本不存在的基础设施、破坏严重的自然环境以及从旱灾到蝗灾再到涝灾的一连串自然灾害。南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最高值是在1981年，多哥和纳米比亚是在1980年，尼日尔和马拉维是在1979年，加蓬、塞内加尔和赞比亚是在1976年，而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马达加斯加则是在1975年。

拉丁美洲最贫穷国家的情形同样糟糕。武装冲突、无能的独裁政权以及对外界剥削的顺从，使得巴拉圭和秘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至今仍低于1981年的水平。目前，洪都拉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其1979年的水平，萨尔瓦多低于其1978年的水平，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低于各自在1977年的水平。对于一些更大也更发达的拉丁美洲国家而言，由于接二连三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它们也失去了

十余年的发展时间。阿根廷、乌拉圭以及与之有密切经济联系的近邻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普遍低于1998年的水平。墨西哥至今没有达到其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委内瑞拉的情形则更加恶劣，它聚集了拉丁美洲最糟糕的特点（政治动荡、民粹主义运动和软弱无力的宏观经济调控）和石油出产国的特点。

那些石油出产国则属于第四组，虽然表面看来，它们应该可以逐渐赶上，因为它们有着大自然如此丰厚的赠予。但事实上，有了这些赠予并不代表就一定有合适的政治文化和有能力的领导阶层。尽管这些国家拥有储量丰富、价值高昂的资源，但它们却不能维持较为平稳的经济增长。当石油价格抬高时，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迅速，而当油价较为平稳或更糟糕（对于它们而言），即油价下滑时，它们就会陷入结构性的衰退和漫长的停滞期。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对于它们而言，很难称为危机），这些国家经历了一段经济繁荣期。但最近10年，尽管石油价格回升，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很少能回到当时的水平。沙特阿拉伯的国内生产总值至今仍没有达到其在1978年的水平，科威特和阿联酋仍低于各自在1977年的水平。这种情形正是由于一些条件共同作用而出现的：单一的文化、欠发达的服务业、依赖于单一产品的国际价格、缺乏全面的发展战略以及缺少实用主义。这些障碍使得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始终低于过去的年代。

需要强调的是，长期发展所需的决定因素非常复杂，因为这些因素不仅相互补充同时也相辅相成。如果没有技术进步，那么即使领导者们有最强烈的发展愿望，也难以实现生产的持续增长。同时，单有技术的进步而没有政府的恰当支持，增长也不可能实现。即使这两个因素都具备，如果缺少了科学和文化的进步，也很难使经济踏上快速发展的轨道，当然，只有科学和文化的进步也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数学、医学或音乐和诗歌可以因为某些智者的出现而繁荣，但经济则不行。经济的发展是以上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还必须具备对外界的开放以及经济经验和知识的不断积累，才会取得显著的发展成果。这也正是欧洲在15世纪以及西欧在19世纪和20世纪后半期所经历的情形。现代人也许会觉得，这种情形将一直保持下去。也许会如此，但也不尽然，尤其是当以上那些因素链条中某一个缺失就更不会实现了。

毫无疑问，技术进步是历史上生产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现在，我们常听到的一个词是“知识经济”，即强调智力在创造新价值方面的特殊作用。然而，当我们仔细观察历史，就会发现所有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都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但

是，并非所有时期，也并非所有地方，都必须创造知识。从日本的长期发展和中国目前的发展经验来看，也可以是创新和模仿的配合。无论何时，只要其他四个因素与技术进步协同作用，经济就会矫健地向前迈进。这种协同作用解释了为什么同一时期有些地方经济欣欣向荣，而有些地方却停滞不前，例如西欧和东欧[14]。同样，这种协同作用也揭示了为什么同一个地方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会有如此大差别，例如伊斯兰国家和北美。

重要资源如矿石和石油等的发现，会大大加快经济的发展，而战争则会抹去所有的发展成果。尽管今天让人觉得难以置信，但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时，玻利维亚波托西城（Bolivian city of Potosí）有着20万人口（和80座教堂），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堪比今天的纽约和巴黎，因为在塞雷里科（Cerro Rico）发现了大量的银矿。直至今天，西班牙语里“波托西的山谷”就是喻意巨额财富。但是，也有自然宝藏成为发展绊脚石的例子，正如今天一些中东和非洲产油国的情形。当石油价格昂贵并持续走高时，拥有大量石油（或需求量很高的原材料）是一件好事，但当其价格变低并持续走低时，就不见得如此了。因为这些国家出于政治或文化原因，没有充分利用自然给予它们的时间，进行实质性的体制改革来实现技术与经济的发展。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尼日利亚，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非洲国家，有着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之一（第九大生产国和第六大出口国），但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400美元。

也有一些战争刺激了经济繁荣并助力其发展的例子，这种情况首先出现在那些战胜国，如一战后的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然后是出现在某些战败国，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失败了的德国。然而，战争永远都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机制，只有在以上五个关键因素的联合作用下，发展才能出现。

不难发现，世界人口越多、生产和贸易的水平越高，不论从空间还是时间角度看，世界也就越复杂、越多样，当然，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因素也总是相互关联。从按大洲划分世界的传统角度看，我们会发现，即使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各大洲之间产量的变化也呈现显著差别。此外，每个大洲在不同时期产量变化也不相同。直到近代，世界才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出现相对同步的经济阶段。于是，当我们用相同的指示值来观察几十年或几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产量增长水平，就会发现有些区域的平均增长加快，而有些区域则减缓。例如，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经济总体的变

化是中国经济加速增长，同时欧洲经济逐渐放缓。

这样看来，20世纪的发展很难称为统一。从时间表上说，20世纪始于1901年（而不是普遍认为的1900年）。尽管不论从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而言，人们普遍认为19世纪直到1913年才结束，这13年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都与上一个世纪有许多共同之处。1900至1913年是世界经济显著扩张的阶段，特点是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和日渐密切的国际交往。当时，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增长，而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那黑暗的37年间，增长率仅为0.9%。

20世纪的后5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不同步。其中，1973年是特殊的一年。中东地区的冲突和危机之后，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带来对经济收益和增长速度的一系列影响，最为重要的是，这次石油危机使得进一步加强生产力的结构性改革成为必要。类似的改革主要在一些最发达的经济体中展开，当时，即20世纪后25年，这些国家战后经济繁荣期已过，逐渐进入缓慢发展时期。从1951年至1973年，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超过2.9%的速度增长，但从1974年到2000年，下降到1.4%，低于20世纪初的水平。但是，这个1.4%的增长率仍远高于整个千年的平均水平。在中世纪时期经济停滞的最初5个世纪里，经济增长几乎趋于零，为0.05%。刚过去的200年里，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约1.17%的速度增长。而上个千年以每年平均0.26%的速度增长。这样看来，1951年至1973年以及此后的年份可谓世界发展史上难得的繁荣期。

为了便于统计分析和比较，我们将世界总人口分成数量相同的几组。四分之一的人口为一个四分位。换言之，一个四分位也就是25%的人口。如果把这几组按照平均收入水平排列，我们可以得到一组收入从低到高排列的四分位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贫困的25%的人口（当时4亿人为一个四分位）人均收入稍稍超过700美元，这相当于900或1900年前整个世界的平均水平。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时，这个数目上升到3100美元[15]。而对于收入最高的那个群组而言，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人均收入水平是6300美元，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时是32,000美元。3100美元是其中16亿相对贫困人口在2000年的人均收入水平，它相当于100年前第三群组（即比较富裕的群体）的人均收入水平。这也展示了过去100年中我们所取得的进步。

如果100年前的一个富人来拜访今天她的某个后人（在经历了20世纪的变迁之后，处于中间阶层或较低的中间阶层的某个人），她会震惊于他们的高生活水平。她会看到当年自己家里没有的东西，或一些当时还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如电冰箱、

洗衣机、收音机、电视、电脑、手机以及其他许多先进的设备，有些在她的那个年代也许已经出现，但只有极少数人才拥有。她的大部分同辈人从来都没机会见到这些东西，尽管他们也许曾听说过它们的名字。

她也会惊讶于厨房与浴室有如此多的功能，装备各种配件，提供各种方便。房间里的藏书也会让她感到惊奇，她也许会想，这书多得都赶得上拉比（译注：犹太学者）和牧师的收藏了。如果看到家庭影院，她又会有什么反应？她还会为盥洗室橱柜里即将扔掉的各种药物耿耿于怀，因为她周围的人似乎都很健康，寿命也都很长。在屋里跑来跑去的那些年轻人，耳朵里似乎插着某种装置，这种装置又连接在一个鼻烟盒大小的物件上，而且显然这个物件里传出十分嘈杂的音乐。他们告诉她音乐是从mp3里传出来的，在她还为此摸不着头脑时，他们又告诉她，电子邮件里刚收到一张电子机票，他们要去希腊的罗德岛海边度假，还计划去玩滑翔伞，在那里还能看到巨人像曾经矗立的地方，这是他们一直以来梦想要做的，但直到现在才有钱去做。她会感叹这些曾经遥不可及、而且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受的事情，现在是如此靠近、便宜，并且有如此多的人可以享受。

我们这位100年前的客人确信她的重重孙要不就是发了大财要不就是个阔佬，唯一让她不能理解的是，他们怎么居住在这样小的公寓或房屋里，因为她自己的房屋要比这个大。但她一定会兴奋地发现屋里装修得如此好，而且各种设备是如此方便，它的主人们却似乎对此毫不在意。

反过来，如果今天一位中产阶级带着所有财产回到100年前，他很快会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一名富翁。一些人想去征他的税，另一些人想抢劫他，但大家都会很羡慕他。至于他自己是否会觉得富有，那又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了。当然不会，相反，他会为人能在如此简单、初级的物质水平上生存感到惊奇。他会发现，原来离开了收音机、电视、汽车、信用卡，尤其是因特网这个人类的第七大发明，人照样能生活下去。

这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21世纪的中产阶级绝对比20世纪初期的富裕阶层拥有更高的生活水平。还有一些国家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这个跨越。在一些地方，有些人能在年老的时候就实现自己幼时觉得是富裕的生活。

其实，不用举很远的例子。我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放假时，我会随母亲到图霍拉森林附近的一个村庄旅行。当我们乘坐带梯子的四轮马车沿着从格拉德克到

卡拉普勒维斯的马路颠簸前行时，我常会激动地喊："看！砖头屋子！"现在，当我开车经过华沙郊区前去大学上班时，常常会激动地对我女儿说："看！一间木屋！"我曾见过第一间砖头房屋也见过最后的木屋。时代已经变了，尽管表面看来没有变化，因为这还是我们的时代。我们中有多少人，生活在世界上不同的中等发达或高度发达的国家里，感受到了类似的变化？尽管有时我们没有辨认出这种改变，或是不想辨认。

今天，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很多人应该高兴，但他们却感觉不到自己的富有。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志向更远大了，也因为富裕的标准也已有了很大提升。人们主观上似乎感觉财富已接近所渴望的水平，但是富裕与过去较低生活水平或非常低的生活水平的客观距离却改变的不是那么明显。

贫困的认定标准也随之提高了，所以今天在世界上一些富裕国家，像英国和澳大利亚，即使是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在过去看来也已经很高了。与此类似，如果将现代东欧的贫困地区用时光机器送回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或追随老人们的记忆回到那些年代，那么这些地区的生活水平也已经令当时的中产阶级以及富人们感到惊讶。

贫穷与富裕都是相对的概念。在这一点上，它们与绝对贫穷有所不同。即使是用绝对的观点来看，无论是在现代还是过去，绝对贫穷的含义都没有改变。拉丁美洲和非洲农村地区的贫穷与几十年前或是几百年前没有什么区别。至于城市的贫穷，差别在于过去并未意识到这种贫穷，因为如今的那些贫民窟当时并不存在。现在北美和欧洲的贫穷，与当年狄更斯（Dickens）或雨果描述的那些苦难和不幸已完全不同。

一些人如果非常想知道恩格斯书中所描写的160年前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可以到加尔各答（这座城市曾以"欢喜城"[16]的名字而闻名遐迩）的贫民窟看看，或者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好好体验一下。你必须注意到的一件事是，很多人虽然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却很快乐。这是因为人类的快乐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状况的好坏，这真是一件幸事。

既然现在经济发展已经取得很大进步，那么与此相应，社会的满意度也应该随着经济产量前所未有的增长而提高，但我们仍然抱怨，有时抱怨还不少。我们仍然担心，其中之一便是忧虑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收支平衡，因为与以前相比，现在的收

入和支出都提高了很多。所以，我们总在抱怨，抱怨自己或抱怨他人，并且希望自己能获得更多。这样做对吗？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看待问题的角度，从价值判断方面来看，不论哪个角度都有些目光短浅。

抱怨也许是人天性的一部分，但我们不应将其与批判的态度混为一谈，后者是应该予以鼓励的。真诚的批评需要一定的基础，否则就会变成毫无理由的抱怨。虽然有时只是抱怨，但在政治中，这种抱怨源于通过削弱对方而巩固自己地位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不论政府做什么，在野党总会到处抱怨，直到两者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他们的观点也才会随之改变。这就像孩童们玩警察抓劫匪的游戏一样，只是在现实生活中，其结果远比游戏严重得多。那些执掌政权的人会迅速转变立场来赞扬各种事情，并且肯定所有的积极方面，而且他们会发现这种积极的方面越来越多。而那些刚变成在野党的人，会很快转换角色，去抱怨一切事情，也不考虑有些现存的不足之处其实是由于他们原来的工作所造成的。而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那些富裕的人会把他们的富有主要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足智多谋和辛勤工作，而那些相对贫困的人会责怪他人或外在力量造成了他们的贫困，他们尤其会对那些富有的外国人耿耿于怀。

* * *

在简略地回顾了世界历史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假设过于简单化。换句话说，这三大假设更多的是代表了经济学家们的愿望，而不是现实。这三大基本假设是：

——利益的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理性是做出经济决策的基础；

——市场及其机制本身是有效管理的保障。

首先，如果无条件地认为国家对财富的追求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和发展的激励，这种观点未免过于简单化。然而，对于这种观点的认可是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对增加财富的方法和渠道的讨论，则成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要素[17]。但是，在现实世界里，行动和决定的背后往往不是对发展的渴望，而是对统治的欲望，这种欲望常

常通过摧毁他人来达到。当然，与不同精神价值间的争论、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或教条主义态度相关的，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即使对财富的渴望是微观经济行为（在公司、家庭和个人层面）的目的，却不一定是宏观经济（国家和民族的层面，尤其是全球经济层面）的目的，因为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就都已经非常富有了。

其次，经济学另一个基本假设是理性是决策的基础。然而，这种观点也必须留有许多余地。从微观经济层面看，它或许是正确的，虽然在这个层面也经常出现缺乏理性的情况，从破产的频繁出现就可见一斑了。企业曾做出的许多非理性的决策，并不是因为无法避免自身的局限性，或所获得的信息被歪曲，而是因为短视、贪婪和无知。进取精神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在经济政策中，从生产过程的角度看，许多决策都不是最佳的。更多时候，宏观经济决策是某种政治逻辑而并非纯经济理性作用的结果。至于政治决策，更多的是主流意识形态或是某个占统治地位的利益群体作用的结果，而并非出于实用主义逻辑。如果意识形态是积极且具有前瞻性的，那么它所反映的世界前景就是以实用主义逻辑为基础。这种情况虽然不可能一直如此，也不可能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但它有时会出现。如果某个国家在某个时期将实用主义逻辑与理性融合起来，那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幅度就会立刻提升。不幸的是，当我们仔细回顾历史，包括古代和近代历史，我们立刻会发现，非理性一直贯穿其中。有时，非理性的情况还非常普遍。因为世界上总是存在非理性的受益者和鼓吹者。也正因为如此，非理性有时甚至被当成理性。

第三种假设，即认为市场在其本质上总是有效的，常常被毫无争议地接受。尽管市场有这种能力，但现实中它并不总是能发挥有效作用。市场的有效常常通过恰当体制的调控和补给来实现，这种体制又依赖于一个进步的政府。市场本身不可能自动保障其有效性和平衡性，更不用说和谐性了。我们简要的历史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有趣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自己曾明确指出这一点。今天，如果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能传播到爱丁堡的那小片公墓，那他一定会在自己的坟墓里辗转不安。这些思想试图劝说人们，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是把一切或几乎一切都放任给私有资本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这不论在字面意思还是精神本质上，都与亚当·斯密的学说相差甚远。历史表明，只有按照自己所需（不多也不少）让市场来发挥调控作用，才能得到好结果，这一点不论对于国有经济还是个体经济，甚至全球化下的经济都适用。

最后，这段简洁但有趣的历史还留给我们另一个普遍的教训，即从长远角度看，“谁将成为下一个主角”永远也没有定数。经济史学家们强调的一个事实是，1000年前，欧洲成为世界主导的机会几乎为零[18]。5个世纪后，这种说法几乎成为现实，不久后就真变成现实。1000年前，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似乎更有扩张能力和主导世界的潜力。然而今天，事实恰恰相反。那么，未来又会怎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历史犹如时间，只会朝着一个方向前进。我们也知道，经济史前进的方向也是如此，但经济史本身，并非一直在进步也并非总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进。这其中，曾有过而且将会有加速和减速，起伏和跌宕，发展和停滞。总而言之，这个过程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不平坦，未来也一定如此。

目前，非洲成为世界主导的机会几乎为零。在可以预见甚至是可以想象的将来，情况依然如此。但不一定永远如此。不久前，北美将失去其统治地位的概率还可以忽略不计，但现在，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确定的事实。亚洲，或更准确地说是亚洲的一部分，将主导世界的概率越来越高，正如欧洲和美洲的一部分曾主导世界一样。毕竟，发展与停滞并不一定以大洲的边界来区分。而未来也将如此。

发展与停滞不一定以大洲来划分的另一个原因是，从长远角度看，气候因素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小，正如在过去的1000年中，地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小一样。因此，在某个时候，那些一度不可想象的事情会变成现实。

即使事情已经开始变得明朗，最好也要使之更加明确。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段回顾历史的征程应该始于、最好也结束于强调气候因素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根本性影响。硅谷不可能出现在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或接近北极圈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Spitsbergen），瑞士硬干酪和手表也不可能在这些地方生产，更不用说银行也不会建在这些地方。这些地方都非常美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但这些地方却不能生产需要用于支持一部分人口的粮食，工厂也不可能雇佣工人在这里劳作，后工业经济中的物流服务也不可能在这些地方繁荣发展。

生产与服务的特定分支总是在而且只会在有需要的地方出现。同时，它们也只会在物理条件和气候条件都允许的地方出现。科技正在改变这一点。正是出于上述两个原因，银行首先出现在阿拉伯地区，接着出现在意大利的各大城市，今天，它们也在西伯利亚出现，在世界各地办理业务。精密工业在欧洲和北美兴起，今天，这种工业的延续——电子产业，包括硬件和软件，也可以在印度南部地区兴起，而

这些地区曾一度被认为“不适合居住”。

所有这些都必须在一些气候条件允许的地方（同时还有其他一些有利条件）出现，并经历漫长的发展期后成熟。如果让德国人和他们的老殖民地坦噶尼喀的居民交换一下，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德国人不可能在非洲发展出一个鲁尔区或萨尔区。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交换，我们同样也会很快发现，仅改变一个地方的气候，或仅促使人们更加勤劳，仍然不足以实现经济扩张。如果我们可以把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人以及布隆迪的特特瓦人迁到弗兰德斯和沃罗尼亚地区，那么比利时也就不会成为今天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了。比利时人也不可能在基伍湖和坦噶尼喀湖湖岸创造出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同样，布尔人（祖先大多是荷兰人，也有邻近弗兰德斯地区的人）只有在气候条件更好的南非地区发展得更为成功。

在极端的气候环境下，人不可能高效率地工作。至今，对于当初那些决定在沙漠里建立凤凰城的人们，仍有着一种诅咒，即让他们的子孙一直生活在那里，仿佛在当时看来似乎辽阔无边的美国国土上，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至今，对于延巴克图能在它所在的位置繁荣发展仍让我们惊讶不已，因为它的附近也许曾有一条河流经过，但它仍然处在沙漠之中。以上这两个例外告诉我们，有时只要值得去做，那么气候的障碍也可以被消除，但这只是偶尔，只是部分消除，并且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通常，消除气候障碍不仅无利可图，还不可能实现。因为地球的构造方式决定了人们只能在一些有着“宜人”气候的地方生活和工作。一般说来，在历史进程中，技术的进步已经不断扩展了我们居住的区域。我用“一般”是因为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使得一些原来可以居住的区域变得不再适于居住，这些区域不仅包括一些古文明曾经繁荣的地方，如古苏美尔文明（Sumeriar），还包括仅在几十年前或更短时间前人们还频繁进行商业贸易的区域，如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边境逐渐消失的咸海（Aral Sea），以及西非不断沙漠化的荒漠草原（Sahel）。同样，掠夺性的开采使得亚马逊河岸那些刚刚由热带雨林变成的耕地进一步退化。

即使在今天，人类也很难在地球表面上的大部分地区工作和生活。在过去更是如此，因为过去资本更少、技术更落后、适当的策略也更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期望经济奇迹在一些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地方出现。对于那些在恶劣地区生

存的躯体和灵魂，我们应该感到深深的敬佩，如终年在埃塞俄比亚南部酷热的奥莫河谷（Omo Valley）生活的哈马尔部落（Hamar Tribe），或是在安第斯山脉喀喀湖（Lake Titicaca）漂浮的岛屿上生活的乌鲁斯印第安人（Uru Indians），或是终年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的中国藏族人，以及阿拉斯加州北部有半年生活在极夜的黑暗中的因纽特人（Inuit，也称爱斯基摩人，Eskimos）。人可以在这些地方生活，我自己也曾短暂地体验过上述几个地方的生活，甚至还怀着满心的喜悦。但是，在那些地方，要像在其他具有不同地理条件的地方一样开展经济活动是不可能、也是不切实际的。

农业为后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奠定了基础，它可以在欧洲温和的气候下发展，却不能在非洲长满热带灌木的地区，或亚洲和南美洲的近赤道地区发展。曼哈顿不可能建在戈壁滩或终年冰雪覆盖的格陵兰岛（Greenland）上，1000年前，快乐的海盗埃里克（Erik the Red）将其命名为“格陵”（Green，绿色的意思）。纽约也不可能矗立在拉普拉塔河（River Plate）入海口，这里最终只能出现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同样，纽约也不可能建立在地球的另一边，即后来悉尼建立的地方。纽约正好在它所在的位置，是因为当时的气候和季风把富有探险精神的欧洲人正好带到了那里，而且还是在恰当的时机。

因此，气候在世界各地的经济进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就在人们觉得由于科学、技术以及医学的进步，气候因素不再那么重要时，气候的影响又一次增强。至少目前，在我们还无法控制气候的时候，它的影响一直存在且不断加强。因为，从现在起，不仅气候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也会反过来影响气候。截至目前，经济对气候的影响是破坏性的。如果人类想持续发展，就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改变，不仅是政治气候的改变，还应是真正的气候的改变。

今天，如果我们把曼哈顿的空调全都关闭，那么这里很快就不会那么拥挤了。尽管这里不可能像撒哈拉沙漠那样酷热，但是很多人仍然无法忍受炎热的夏天。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拉各斯安装全套的空调设备，那么，尽管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把这个大火炉变成现代欧洲或美国大都市，但这里的发展前景肯定会远比现在好。

人类和骡子都知道，顶着烈日、背负着各种人类独创的东西行进非常痛苦。而思考又会加剧这种痛苦。人类需要越来越多的思考，因为增长和发展的过程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在现代，在一切都发生得如此迅速的时期。尽管物理时间仍然

像1000年或几十年前一样流逝，但经济的时钟却以远快于一个世纪或几十年前的速度走动。

今天，时间在经济全球化中飞速流逝。时代已经改变。

注释：

1. 齐格蒙特·鲍曼：《捣碎人生》，克拉科夫：Znak出版社，2004年。

2. 尽管本书对另类历史只是稍稍提及，一些西方主要历史学家关于这方面的著作仍然很值得我们研读。罗伯特·考利：《如果不是？权威历史学家对一些假设情况的另类设想》，纽约：普特南出版社，2001年。

3. 见雅克·阿塔利：《1492》，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91年。

4. 《声乐和管弦乐探戈》：格雷格日·汤姆克匝克作词作曲，玛丽拉·洛多维茨演唱，波兰保利金唱片，1996年。

5. 英国女王授予萨尔曼·拉什骑士封号，引起国际局势的紧张。甚至在美国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同盟之间，也出现紧张关系。拉什迪颇具争议的《撒旦诗篇》（伦敦：维京出版社，1988年）发表后，立即招来保守伊斯兰主义者将其判处死刑。1998年，伊朗当局取消了这个裁决，但是2007年当拉什迪以萨尔曼骑士的身份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时，这个事件又被重新提起并激发许多愤怒。

6. 见著名未来学家约瑟夫·F·考特和詹妮弗·贾拉特的调查：《未来派信徒信什么？》，贝塞斯达：世界未来社会出版社，1989年。

7.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1年。本书是关于过去2000年产量变化研究引用最多的著作。麦迪森估计，公元1000年时，西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400美元，比此前1000年时少了50美元。当时的估计是以1990年的价格水平为参照。如果计入通胀因素，并按2007年的价格计算，这两个数字分别是710美元和800美元。

8. 一些人认为居住在印度的人就是"印度人"，有时会错误地将这些人称为"印度教徒"。印度教徒不论生活在什么地方，都信奉"印度教"这种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世界上大约有10亿印度教徒。

9. 根据约翰·D·杜兰的《世界人口的历史学评估：分析报告》（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口研究所，1974年），公元1世纪，世界人口约为3亿，而在公元1000年，约为3.1亿。麦迪逊（《世界经济》，28页）认为，第一个千年世界人口增长了16%（增长速度为几乎不能觉察的0.02%），从2.31亿增长到2.68亿。也可参见马西莫·李维·巴兹的《繁衍——世界人口简史》（英国牛津、麻省剑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6年）。帕尔默·C·普特南的《未来的能量》（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54年）认为，公元1世纪世界人口约为2.75亿，而公元1000年时，世界人口约为2.95亿，到1200年才达到3亿。

10.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1998年。

11. 这个经济增长的指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5个欧洲国家的统计中使用的方法和术语一致，这

15个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克罗地亚、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马其顿王国、马耳他、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土耳其。通常，马耳他和土耳其都不被认为是"中东欧地区"。另一方面，这个计算没有包括一些后苏联时期的独联体国家，如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尽管这些国家显然属于中东欧地区。

12. 在这些分析中，"西欧"是指15个高度发达的老成员国中的12个欧元区国家，不包括英国、瑞典、丹麦和冰岛、挪威、瑞士这些欧盟成员国以及统计学上不太重要的安道尔共和国、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和圣马力诺等国。这对于统计结果没有影响，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那些欧盟成员国差不多。从1998年至2007年，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4%，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比欧元区的增长率高0.6%。这就意味着西欧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整体比原计算的要高0.1%。

13. 见迈克尔 · 舍默：《历史的混沌：历史次序中反映偶然性和必然性作用的混沌模型研究》，《非线性科学》，1993年第4期，1–13页。

14. 要了解与西欧相比东欧迂回曲折的经济发展历程，见伊凡 · 伯伦达的《历史出轨：中东欧在"漫长"的19世纪》（伯克利–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以及《20世纪欧洲经济史：从放任经济到全球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

15. 这些数据是按照2007年的价格计算出来的购买力平价水平，假设比麦迪逊使用的1990年的价格高了75%。四分之一群组的数据是基于麦迪逊的《世界经济：历史统计》（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3年）。1990年价格水平的概算也可见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世界经济瞭望》（华盛顿，2000年）。

16. 这是拉佩瑞一本有趣的书的题目，后被改编成电影，变得没那么有趣了。书中的一个主角是来自波兰的天主教传教士斯蒂芬 · 科瓦尔斯基，在电影中变成一名美国护士，这并非因为与德蕾莎修女有什么联系，而是出于商业的考虑。多米尼克 · 拉佩瑞：《欢喜城》，纽约：华纳书屋，1985年。1995年的电影由罗兰 · 约菲导演。

17. 因此这种观点至少始于1776年亚当 · 斯密的《国富论》。

18. 见大卫 · 兰德斯：《国富国穷：人类贫穷与富裕的命运》，纽约：W. W. 诺顿出版社，1998年。

第四章 全球化——接下来呢?

全球化起源于何处，它在这个世界各国彼此依赖的时代里又将怎样发展?

全球化没有一副人的面孔，但应该为它设想一副。

全球化不止有一副面孔。许多人想让它拥有一副尽可能和善的面孔，有些人甚至认为，它的尺寸设定应该和人差不多。经济转型、一体化和全球化研究所（Trans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其缩写TIGER，同时也是英文单词“老虎”）也是这么认为的。目前，我是TIGER研究所的主管，该所于2000年在华沙考明斯基大学建立，它的口号是“有着人面孔的全球化”。老虎能有人的面孔吗？这仅是一个口号，还是另有含义？

这样的口号只是一种表达信念的方式，它传递的思想是，世界经济的运作和扩张需要良好的经济判断力，也需要管理层对社会维度的真诚关切。回到描述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区分上，我们不能将全球化描述为带有一副人的面孔。诚实的分析和描述不可能得出类似的说法。因此，我们这样说只是表达一种建议或愿望，尽管这不一定是满心期望的结果。愿望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实现的。愿望应该解读为一种方向，我们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行动；或解读为一种提醒，提醒我们未来应该注意什么。毫无疑问，遵循现有的模式来继续全球化已不可能，它只会将我们带入荒

野。对于世界经济而言，这是非常残酷的，甚至是“非人性的”。不幸的是，一些人或一些地区有可能误入这片荒野，但不会是整个世界都误入其中。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应该对即将使用的概念做出充分且明确的定义。很少有词汇拥有像“全球化”这样的经历。毫无疑问，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全球化”是用来描述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变动的现实的最普遍用语。这种变化的现实不仅包括经济，还包括文化、社会和政治。这样的概念本身就会引出许多问题。因为“全球化”这个过程（我们这里说的是过程）会影响人类公共行为的各个领域，它适用于不同学科范围，从历史学到政治学，从社会学到心理学，从网络科学到管理学，甚至包括生态学和神学，当然，最重要的是也包括经济学。因此，全球化不止有一副面孔。当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它时，它就会呈现不同的模样。因此，全面理解全球化，需要运用跨学科的视角。

对我们而言，从最有趣的经济角度来看，“全球化”被用得太宽泛了，有时甚至是滥用。尤其让人恼火的是，在经济领域，甚至一些学术作品里，经常出现诸如“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或“世界的全球化”等语汇。这是一种纯粹的重复，用某种事物的定义去定义事物自身，等于什么也没说。“世界”在本质上就是指全球，这也是它被称为和被定义为“全球”的原因。“全球化世界”与“世界化全球”一样，都没什么实质含义。

因为没有“世界化”这样的词汇，所以我们仍然说“全球化”。不久前，“全球化”这个词汇在其他语言中都还不存在。如在1974年波兰版的《世界百科全书》（*Universal Encyclopedia*）里找不到“全球化”这个词，因为当时这个词使用的范围还很小。英语的“全球化”也许最先出现在1959年的《经济学人》杂志中[1]，并被1961年版的《韦氏词典》（*Webster's Dictionary*）所收录。当这个词已经开始流传时，它还不能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们编撰的“当代经济学词典”（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中占有一席之地[2]。目前，还没有人提出“全球化”起源于英语国家之外，毋庸置疑，它应该起源于英语国家。也正是在这些国家，最先出现了对全球化至关重要的一些过程，而正是这些过程的特殊构造使得人们意识到“全球化”已经开始了。

在20世纪90年代初，使用诸如“国际化”或“跨国界”等词语已经足够。一些波兰的大学还在教授“国际经济关系”课程，美国教科书的目录里也还写着“国际

经济学”。后来，这个话题逐渐被“全球化”或类似的词语所代替，尽管一些大学教员还继续使用他们的旧讲义，只是在新的课程名称下对讲义稍作更新。这正是一些理解上的误区和错误发生的源头，尤其是当一些人认为全球化只是更大范围内的国际化时。事实上，“全球化”在本质上已是一个新概念。如果用谷歌搜索英语的“全球化”，耗时0.11秒就会得到2870万个结果。由于我在这方面有所研究，所以其中128,000个结果与我有关[3]。如果用谷歌搜索波兰语的“全球化”，耗时0.02秒就能得到767,000个结果。当然，这些结果中很大一部分都与全球化没什么关系。

很多时候，是生活创造了概念，包括现实中和想象中的概念。一个事物往往在还没有名称时就已经发生，或至少已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有时，一些事物在被描述、被理解和命名之前就已经出现，而后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同样，所有人包括那些最具智慧的人们——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都不知道自己生存的时代的名称，或者将来某天它会被称为什么。尽管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博学多知，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古代，无名氏高卢人（Gallus Anonymus）从来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编撰中世纪波兰的编年史。那些生活在封建时代的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封建时代”。在1727年出版的关于法国议会的著作中，龚特·亨利·德·布兰维里耶（Count Henri de Boulainvilliers，1658－1722）使用了“封建主义”这个词，作为一个社会经济体系的定义，这是该词最贴近现代含义的首次使用。

至于全球化，这个我们如此频繁地谈及和写作的概念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我们还未真正将其理解和完整描述时就已经被命名了，而距离这个过程的完成还很遥远。我们也无从知晓自己生活在哪个时代。一些人甚至说我们生活在“过渡时代”（inter-epoch），即旧的时代已经逝去而新的时代还未到来，或者说还未完全成形。将来某一天，有人会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命名，并且这个新名称也会被所有人接受。它不会是“全球化”：这个词既不是描述一个社会经济体系，也未表示一个时代；它是一个过程，或指向某个方向的某种事物。我们生活在全球化中，就像我们的前辈们生活在殖民统治中或工业化中一样。这些只是指向有着质的区别的新体系，如殖民统治指向殖民主义，工业化指向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至于90年前，列宁基于此形成了帝国主义理论。他指出了这个时代的一些特点，并着重强调了以下几点：

（1）资本的集中和集聚导致了垄断的形成；

（2）银行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导致了寡头政治和金融资本的诞生；

（3）资本转移（输出）的扩大；

（4）跨国公司的形成分割了其对国际市场的影响；

（5）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对世界领土的分割。[4]

不能否认，这些对帝国主义的概括、以及对通向帝国主义的那个时代现实的分析非常精确。而且，用其中一些特点来分析目前的时代也非常适合。那个时代与现代的最大差别在于：100年前，是国家实体，尤其是那些有着帝国主义野心和利益的最强大的国家实体主导着世界舞台。虽然当时那些跨国公司的所有者和国际投资商们的力量在不断增强，但他们仍要常常面对在政治家们的休息室里空等的尴尬。现在，这种现象有了明显改变，国际资本拥有了空前的自由。这既不是一种狭隘的自由，也不是需要考虑是在诺曼底还是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投资的自由。这种自由考虑的范围是整个世界，且一般不用顾虑国家及其政府的自由。国家和政府的选择越来越小，权力属于那些拥有自由决定权的人。

但是，当把帝国主义称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预言资本主义不久将结束时，列宁以及许多志在掌握政权或建设更美好世界的人们都错了。最初，在其俄文版的手稿中，列宁将他的书命名为"*Imperializm kak novieyshaya stadiya kapitalizma*"，在这里，他使用的不是"最高阶段"而是"最新阶段"，"不同阶段"（俄语的*otdielnaya stadiya*）也在书名中出现了。然而，不久后，这个自信的论断就将帝国主义认作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了，尤其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之后，这本书在世界各地的版本都在题目中加上了"最高"这个词，强调这一点才是书的主旨。可见，文字是有含义的。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确经历了一些艰难的时期，有时甚至其最强大的支持者也都不再迷恋它。这些阶段包括：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法西斯主义时期、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兴起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与社会主义激烈交锋并且社会主义似乎占上风的时期。但最终，资本主义从这些挫折和偏颇中走了出来，并带领着世界经济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其间，资本主义的特征一直在改变，而这也正是由于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

对此，一些作者（也包括我）评论道，如果列宁活到现在，他也许会将其著作

命名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许他已经这样做了，因为列宁所有的价值观和概念都指向这个方向。然而，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这个体系和这些结构都不是最终形式。无论在质还是量上，它们还会一直进化发展。一些人曾认为列宁错了，但这些人都已不在人世。半个世纪前，加纳获得独立后不久，其开国领袖克瓦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出版了一本书，该书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题目《新殖民地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5]。在这种逻辑下，我们可以推演出如下结论：即在这个主题下的一系列著作中会出现像“全球化是新殖民地主义的最高阶段”之类的题目。在将来的某一天，某个阶段也许会成为“全球化的最高阶段”。

先不考虑这些概念，我们首先必须意识到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在人口规模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中，一些新的实体会出现。现在，我们还无法预测出现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预测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重大问题，正如人类历史上所有复杂的经济转型期一样，这些时期都会解决一些问题，同时产生另外一些问题。当后来产生的问题超过之前解决的问题时，这个进程就会被打破，经济随之崩溃，与之相对应的体系也会在历史中淡去。在将来的某一天，全球化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但是，在这天到来之前，一定会发生许多事，因为直至今日，全球化还远未发挥出它扩张的潜力。

全球化过程的完成会导致某种时代的出现，这个时代至少应该可以被明确地界定和描述。问题是全球化的进程永远不会结束。在全球化特征要素形成的过程中，现实或许更成熟或更幼稚，全球化过程本身也许会更先进或更落后，但是这个过程就其本质来说，永远不会结束。这是因为全球化不仅仅会导致一种新的社会政治体系形成，它所涉及的元素不仅包括经济和政治，还涉及文化关系。而且，全球化还深陷于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各种矛盾之中。我们可以努力去拆解这些矛盾，但永远也不可能将所有矛盾都化解。此外，全球化也是一个永远变动的进程，它不会总是、也没有必要仅指向一个方向。

因此，使用术语和定义的意义远不止于语义学层面。上文所说的同义反复定义对逻辑思维会产生负面影响，也不利于辩论。许多全球化的批评者和反对者（包括反全球化者和另类全球化支持者），将他们所有的炮火一会儿瞄准资本主义，一会儿瞄准市场、科技进步和文化模式的国际化，一会儿又瞄准跨国界的环境污染，但他们不一定瞄准了全球化。如果你总是认不清楚敌人，那你永远也不可能将其打

败，你必须首先辨认清楚谁是敌人，并且叫出它们的名字——正确的名字。如果能了解敌人那就更好了。否则，我们可能只是看到堂吉诃德（Don Quixote）以及全球化的风车罢了。

学术领域中经常乱用全球化的概念，更不用提报纸专栏里的情况了，重要的是，这样的混乱甚至会使我们对客观存在的相互依赖和反馈机制视而不见，使全球化现象本身以及全球化过程变得模糊不清，有时还会使辩论难以继续。世界经济中的许多事情都与全球化有关，但不是一切事情都与之相关。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发生在区域、国家、地区或个人层面的事情都能归因于全球化。由于这种概念上的混乱以及长期以来缺乏明确的定义，许多作者会对全球化进行一些非常随意、不严谨的解读。许多项目在命名时，简单地在题目上加个“全球化”，中间再简单地用一个连词，有时甚至是一个标点符号，就将其与当今的某个重要议题连在一起了，好像这样摆放就能表现出两者之间有所关联。问题是，这种关联很可能只是表面现象，也许只是几个完全独立的现象和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偶然的相遇，就像一个村庄上空飞过的鹳的数量和该村庄人口的出生率一样风马牛不相及。

人们钟情于流行与时尚。我们现在经常用类似“在全球化条件下……”的题目去摧残听众和读者，就像“卢布林地区妇女的角色”这样的题目本身似乎不够分量，非要加上“全球化”才行。“全球化”真会影响到“在加尔沃林贮藏饲料作为天然肥料的效用”吗？还是“华沙的全球化”真的是“21世纪的一个战略问题”？

或许有人真的认为这些都相关，那他们就应该说明题目中这些话题间存在的相互关联性，说明是通过何种机制建立的联系，是因果关系还是反馈关系等等。有时，这样的尝试是被迫的，并且做这样的尝试也没什么意义。也许有人想说，因为全球化使得自然环境恶化，于是反过来或影响着华沙郊区那些农场的施肥技术，或没造成影响；或者有人试图证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传统上使用女性员工的部门或地区现在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在现实世界的机制中，应该明确展示原因和结果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关联。我们已经知道，事情以其特有的方式发生，是因为有很多事情同时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事情都彼此依赖，或都依赖于全球化。当然，全球化也非一切。

那么，什么是全球化？如何在经济范畴内定义全球化？那些变得“世界性的”或“全球性”的事物，主要是指经济和市场，但并不局限于这两个。全球化是旨在

减少和消除国际经济间交流限制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一方面指克服自然和物理的障碍，使“遥不可及”的事物越来越少，使越来越多的事物变得近在咫尺，技术进步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这还不是全球化的全部，除非它也满足另一个条件，即消除了人为的政治障碍。因此，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自发的自由化过程，同时，伴随着体制的一体化逐渐成为一个在商品、资本、技术、信息以及劳动力方面相互依赖的全球市场（其中的劳动力因素最初是市场的组成要素，被分离出去后看起来关联不是那么紧密了，但这里也将其包括在内）。以上的叙述中，三个词最重要：自由化、一体化和相互依赖。另外两个词——历史的和自发的——也很重要。

根据以上定义，我们很容易明白全球化还远未结束。而且，全球化本身并不平坦，因为世界舞台上最强有力的一个因素——资本已经为其自身的运动需求获得了巨大的自由，而劳动力仍被束缚在国家的界限中，不能大范围地自由流动。如果纯粹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即只用经济学的角度并用绝对诚实的态度应用这些观点，那么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劳动力应该拥有与资本同样的自由运动的权利。也就是说，劳动力应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运动，不受任何限制。人们也可以说这是一项基本人权，由上天赋予的，人有权利到处行走！毕竟，人的行动并非一开始就受到限制，而是在某个时期以后，一些人首先对某片土地声明了所有权，继而限制了其他人在这片土地上出现或定居。这种情况最初出现在小部分土地上，但现在已扩展到整个大洲。只要限制还存在，人们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工作地点，那么全球化就是不全面的和有瑕疵的。自由意味着人们在这方面也应享有自由。资本已拥有自由，但劳动力还远没有。

因此，目前全球化的完整性要求消除劳动力领域的歧视，完全无限制地向移民打开疆界，并防止新障碍的出现。我们曾成功地推倒柏林墙，但现在，新的藩篱又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并且比以前更加坚固，例如隔离美国和拉丁美洲的疆界。像为资本打开疆界一样，如果能为人口的自由流动打开疆界就会彻底改变世界的面貌。国际市场的机制会将成千上万的人从最贫穷的地区，尤其是非洲以及中南美洲转移出来。这些人会史无前例地扩大北美和欧洲的劳动力供给。供给的增加会导致价格的下降，也就是薪水的减少。而在劳动力大量流失的区域，薪水则会增加，因为这些区域供给的减少会导致价格上涨。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世界不同区域之间收入

差距的显著缩小，这也正是18－20世纪欧洲向北美大移民时期出现的情形。

上述情形真的会发生吗？会的，它正在发生。事实证明，现在人们雪崩般地从非洲向欧洲、从南美向北美迁移的情形越来越难以限制，民主以及和平的方式并不奏效。最有效的预防措施，是改善那些贫穷地区人们的生活质量，因为这些地区的生活已经到了如此凄惨的地步，以至于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不管付出何种代价也要从中逃离。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一种完全不同且能长期发展的途径。我们应该找到一种方式，使得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明显高于富裕国家，并将其付诸实施，而不是仅在报纸或会议上翻来覆去地说明这种观点。否则，我们面对的移民压力只会越来越大。不幸的是，这也正是上世纪最后25年全球化作用的结果。

全球化不全面的另一个原因是农业部门的开放还远远落后。在一些最富裕的国家，农业部门的补贴非常高，这些国家每年花4000亿美元来维持其国内的农业生产。这个数目超过了波兰国内生产总值的1/5，是仅有6600万人口的刚果的国内生产总值的9倍。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如果完全实行自由化和开放农业市场，使其真正地参与国际竞争，会导致这些发达国家的农业部门迅速边缘化，并且在极端情况下会彻底消失。只有通过补贴，这些国家才能维持他们的农业部门（以及农业部门雇用的人们，这些人同时也是选民）。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事实上，已经发生了部分改变，即主要是通过农业市场系统的、缓慢的自由化，以及通过对反生产力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的修订。从全球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极端不公平的政策。然而，这只是一小步，美国、日本以及欧洲都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这些国家应该取消对生产棉花和水稻的农民的补贴。当前这些有差别的政策使得在马里依靠小片土地为生的农民们入不敷出，也导致越南种植水稻的农民们陷入贫困。

在这里，我们必须意识到，全球化的不全面性（这主要体现在但不仅限于劳动力市场和农业市场）将会在国际层面形成越来越严重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被隐藏多年，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会失去控制。要从不断累计的紧张关系中完好无损地脱身，就需要双边以及多边的共同协作。政治领导人们还没有准备就这个议题进行合作，而许多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学术界人士又似乎还没有彻底理解这个问题的意义。这些学术界人士更热衷于就某些空泛的议题进行空泛的讨论，而不愿意在一些现实的、实际的问题上花点时间。这虽然很容易为

世人所理解，却并不会那么容易被宽恕。波兰每年也会给农业许多补贴，这是将整个欧盟纳税人的钱给了农业部门。这样做，使得全球经济中其他区域的生产者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这种情形有必要尽早结束。没有什么比一边这样做一边对地球另一边的穷人们表示担忧更虚伪了。事实上，我们更关注怎样扩大国内这一小部分中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关注怎样改善世界上那些贫穷人们的生活。

* * *

全球化的主要贡献是自由化、一体化和相互依赖性。

自由化，即扩大和深化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自由，使之进入共同的技术、组织、生产、贸易、金融和投资关系中。自由化是发展更深入、更长久经济关系的关键和先决条件。自由化与自由和自主直接关联，有时依赖于这二者，因此，也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自由化。自由化最重要的是在价格设定方面的自由（这需要从超越国界的角度看）。在这里，自由市场机制不可或缺。自由化也包括与合作者建立共同关系方面的自由，尤其是通过面向所有商品，包括对产品和服务[6]的购买和出售协议建立共同关系。这些协议应该用最广泛的角度来界定，因为目前它们的目标不仅是基础资本，也包括各种形式的金融资本。最终的自由化是自由、无限制的经济行为，换言之，就是自由地（这并不意味着以不受调控的方式）参与和退出商业，包括没有能力继续时的退出（完备的破产程序）。

一体化，即将分块的市场如产品、资本以及更小规模的劳动力市场整合成一个大市场的过程。这不只是狭隘的字面上的聚合以及开放本地、本国和本区域市场，一体化还包括通过发展恰当的经济规则来支持这个过程。这通常能导致培育自由化和一体化的机制的形成，如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等，这还能导致一些国际范围内协调政策的出现。

这样的市场意味着对大规模的来自其各个分散部分的需求流和供给流进行开放。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世界市场是代表各种产品需求集合的曲线与代表供给集合的曲线的交叉点。在这样一个统一的市场，供给流和需求流将在两条曲线的交叉点达到平衡。这个点可以定义一个单一的价格，所有提供的产品都会被销售掉，而所有的需求都会得到满足，不会出现由于生产力过剩而产品积压的情况，也不会出现

需求得不到满足或消费欲望无法实现的情况。但现实中的情形并非如此，而且永远不会如此。这只是一种设想罢了。

一个地区的农贸市场可以像上述这样运行（这也是全球化的作用之一），e-Bay网上的各种拍卖也是如此，这已经是目前最接近运作良好的全球市场模式，即一种单一的、一体的、运作良好的、完全不受不对称或不真实信息干扰的市场。这样的市场就像经典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描述的一样。然而，这并不是绝大多数产品在其流通的现实市场的运作方式。这些市场的价格只受当地供需的影响。

如果世界市场中的某个部分由于需求远大于供给，平衡被打破，那么（暂不考虑通胀导致价格上涨的压力）产品很快会从这个大市场的另外一些地方流动过来。当然，这种情况的前提是假设其他地方的产品充足，或者那里有现成的、且没有完全使用的劳动力可以立刻调动过来以增加供给。举例来说，如果新西兰北部岛屿的某个地方由于下雨，道路变得泥泞，一个位于波兰瓦尔米亚的生产胶鞋的工厂如果收到了订单，就可以加一个班次来增加产量。需求在那边，而供给在这边，只是现在“那边”与“这边”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了。如果这样一个相对巨大的需求，总是有超出当地供给能力的趋势，且具有结构性和长期性的特征，那么不仅产品会流到那里，资金、技术以及劳动力（如果必要的话）也会流向那里。在上述例子中，如果扣除运费后，胶鞋生产商仍然有利可图，那么一家生产胶鞋的波兰工厂也可能会在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建立。如果波兰人不这样做，也会有其他人这样做，因为那里有对胶鞋的需求，那里的人们会花钱买这个商品。

这就是为什么大众汽车公司不是把汽车从德国运到巴西，而是在那里建了一个汽车装配厂；瑞典人不是把家具运到意大利，而是在那里建了一个工厂；墨西哥人也不是把啤酒运到美国，而是在那里建了一个装瓶厂。当然，这种趋势没有导致波音公司到欧洲建立一个飞机生产线。这不是因为它不想这么做，而是出于对群体利益的考虑（包括地区的和国家的），还因为激烈的竞争和各种限制。全球化并未消除竞争，而是增强了竞争并改变了竞争。全球化之后，在更大的平台上出现了更多的竞争者，并且所争夺的利益也更大。这样的竞争越来越远离“国际化”，越来越接近“全球化”，因为资本变得越来越超越国界，而且越来越不考虑所谓的国家利益，甚至那些最强势的国家也如此。时常，某个全国性的党派或某位政治家会提及国家利益，但这往往与真正的国家利益无关，而是与腐败或保全一己私利有关。

在国外建立制造基地的决策往往与大幅削减成本相关，而成本的削减一般又会通过考量当地劳动力成本和运输成本之间的差异而实现。资本转移，尤其是直接投资，通常都会伴随着技术转移。于是，当地政治、体制和基础设施状况是否具备开设生产线的条件，便成为外资企业考虑的主要因素，这也是日本、美国和西欧国家在东南亚和中国建立生产线的原因。让这些企业感到惊喜的是，由于这些地区空前的经济繁荣和人口的持续增长，这里也很快成为了快速成长的消费品市场。

于是，情况就变成两道相互交叉的曲线在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市场上不断上扬，即需求和供给——这两股来自不同方向的波浪合力把世界市场的海平面推得越来越高。世界产量不断上升，这种产量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出口”的拉动。我在“出口”上加了引号，是因为一方的出口就是另一方的“进口”，因此更准确的说应该是“贸易交换”，尤其当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整个世界时，更应这样使用，因为现在唯一封闭的经济区域就只有“世界”了，其他所有的子集，包括区域和国家，都或多或少是开放的。

世界经济这片海洋远不同于太平洋，而且太平洋也不像西班牙探险家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Vasco Núñez de Balboa）描述的那样平静。1513年，巴尔博亚从巴拿马西海岸看到太平洋时，惊讶于其水面的平静，于是脱口道：“真太平！”（“Que pacifico！”）此后的许多年，这个名称误导了很多人，因为大洋平静的部分只是巴尔博亚看到的部分，即从巴拿马的西海岸线延伸向地平线的部分。在更远的地方，海水总是在涌动着，有时甚至是猛烈的风暴。世界市场的大洋亦如是，虽然多数是适度的长波浪，并使越来越一体化的市场处于相对平衡状态。这些波浪溢出边界的次数不会比太平洋的波浪溢出的次数多。出现这种情况时，多是因为平衡其动态洋流的机制不足。在现代的全球化阶段，由于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这些机制运行就表现得相对良好，商品的流动将传统经济学里的“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综合在自身体系内。在我的母校，华沙计划与统计学院（Main School for Planning and Statistics，SGPiS，现为华沙经济学院，Main School of Commerce，SGH），25年前还把“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划分成不同的系别，以反映这两个古老的二元体系。目前的这些平衡机制还需要不断完善，它们还不能处理资本交易和金融的流动，而世界市场的这部分将会在未来导致全球性的危机，这比海啸破坏太平洋的宁静还要厉害。

正如我们应该避免将全球化与一体化混为一谈，我们应该牢记，作为全球化要素之一的经济一体化，其进步只不过是各种市场的集合，这种集合是由于各个市场间的开放、政治和经济壁垒的出现（如关税）、可兑换货币的引进以及运输和交流成本的降低而导致的。一体化还关系到创建一体化的国际结构。目前世界上最先进也是最好的例子便是欧盟。然而，欧盟最多也只代表“欧洲化”，而不是全球化。此外，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也远未结束，许多欧洲及其周边国家还没被纳入其中，而其27个成员国之间也还存在诸多问题。

现代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依然漫长，北美也在追随欧洲的脚步，但美洲的一体化还未扩大到南美（也许有一天会）。北美由最初的13块风格迥异的领土增加到50块，其中有一些是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有一些是从西班牙征服者的枪口下夺取过来的，还有一些是非常具有异域情调的领土，像前俄罗斯的领地阿拉斯加，或美国人自己的殖民地波利尼西亚人岛屿夏威夷，这些都统一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下。美国的北边，9个省和3块领地合并到一起，组成了加拿大。

在南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前殖民地的解放，以及圭亚那（Guyana）摆脱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殖民统治（法属圭亚那仍然是法国的一个海外省，换句话说就是一块殖民地），导致了十几个独立国家的兴起，这些国家之间还未形成一个单一的南美经济体。当然，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实体已经形成，其中最大的是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这个共同“南方市场”的各成员国之间关联不是很密切，也没有强大的体制结构，目前主要成员国有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委内瑞拉，其余的拉美国家，如玻利维亚、智利、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秘鲁则作为准成员国。但是，有着1.35亿人口的广大中美洲地区仍然被排除在这个共同市场之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最初是政治和文化的原因，后来也包括经济原因。

不难想象，如果将各种条件重新排列，也许会出现一个统一的南美洲市场和一个分裂的北美。南美统一市场的建立主要基于各国之间深厚的文化联系，它们可以有统一的货币，如波利瓦（bolivar，译注：委内瑞拉货币名称）；可以发展成为单一国家，如中南美洲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国土面积从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岛一直延伸到格兰德河），拥有基于同一国家国内市场的坚实的市场结构。在格兰德河的另一端，则有各个不同的国家，如说西班牙语的德克萨斯、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稍远一点是弗罗里达，还有说法语的路易斯安那和密

苏里，盎格鲁撒克逊的新英格兰以及北边和东边的一些国家，当然还包括说俄语的阿拉斯加和说波里尼西亚语的夏威夷。或许这样的安排还能保留下一些当地的土著部落，达科他也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于是那里的苏人（Sioux）仍然会说当地的土语。而奥马哈人（Omaha）或许还生活在他们的家园内布拉斯加，140年前这里也不会成为美国的第37个州。上述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货币、体制和利益。这些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应该远比今天南美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巨大，因为美国著名的种族和文化“大熔炉”永远也不会出现。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或差异巨大或差别较少，它们的资源、收入和国家财富都远比今天少，因为它们今天在现实世界中的经济是全面一体化的结果，即“美国化”北美的结果。

虽然曾有人设想过南美洲的一体化，但从未彻底实现。现在，这些人仍然在做着这样的设想，如果这些设想付诸实践，那将会产生一些影响。大约两个世纪以前，南美伟大的英雄、被称为“解放者”的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曾试图在挣脱了殖民主义束缚的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大国，即“大哥伦比亚共和国”（*Colombia la Grande*）。然而，由于内部的纠纷和阴谋，这个大国的根基像纸牌做的房子一样垮塌了。1830年，47岁的玻利瓦尔临死前躺在床上，感叹在那片领土上（包括今天的巴拿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以及一部分的秘鲁和玻利维亚）建立一个共同的国家容易，但要维持这样一个国家却无比艰难时，他还不无讽刺地补充道：“历史上有三个大傻瓜，那就是耶稣、堂吉诃德和我。”

于是，统一市场（包括统一的结构、体制、规则和目的）的积极影响一直未能在这片土地上实现。除了文化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这个事实也说明，这些区域在发展程度上有着巨大差别。哪里的一体化更彻底，哪里的经济就更繁荣。彻底的一体化不仅意味着更巨大的市场以及生产规模扩大带来的好处，同时也意味着更低的交易成本，以及生产与贸易关系中更多的确定性。正如加利福尼亚的企业不用担心纽约的汇率上涨还是下跌，因为它们使用的都是美元。但是，如果阿根廷比索与巴西雷亚尔的汇率下跌时，在巴塔哥尼亚的制造商们就开始担心他们的出口竞争力了，反之情况也如此，因为汇率会上升也会下跌。一个统一的市场也意味着更少的经济争端。因此，我们需要像联邦政府这样的仲裁机构来调解这些问题，使市场既能促进增长也更公平，但同时需要注意避免可能会出现的官样文章、腐败或是将少数人利益凌驾于大多数人利益之上。

从文化、社会和政治角度看，北美的“美国化”同样非常成功。当然，其问题也不少，例如超过1000万的非法移民（有1/3的美国公民赞成将这些人遣返）以及巨大的收入差距。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从历史角度看，“美国化”的成功也是建立在种族灭绝的基础上，有人估计，超过1000万的美洲土著人在这个过程中被杀害。然而，今天，如果世界上只有北美洲，那么我们可以说全球化已经完成了。这个例子是解释全球化过程的最简明也是最直观的方式。但现实中，这不可能实现。对于要实现这样的结果来说，已经为时过晚。因为现实中存在着许多充满敌意的矛盾，这些矛盾不可能在现行体制下解决，也不可能按照美国的方式解决。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要实现上述的图景还太早，因为这些矛盾还太多、太复杂。

时间一直在流逝，而且在飞快地流逝。16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7]。它的开篇让左派和右派都感到恐惧，右派尤其感受深刻：“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会认为它可怕，他们在宣言的结尾发出这样的呼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几十年来，左翼报纸，尤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报纸，都曾把这句口号当成报头。然而，全世界无产者始终未能联合起来对抗剥削他们的私人资本，相反，后者却正是通过资本在全球市场联合起来。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更加迅猛，其中也包括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在未能在共产主义模式下联合在一起后，世界各国（或者说几乎世界各国）的工人通过其他各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联合起来。某个国家的劳动力供给、就业的可能性或劳动力价格与其他地方所发生事件的关联越来越紧密。

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已过去了六代人的时间，生产的工艺和技术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应地，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会告诉我们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政治价值观、制度和相对应的各种关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些在几代人身上发生的改变导致社会结构的彻底重建，即城市和农村中工作和非工作人民之间社会结构的彻底转变。工人，或者广义上说雇佣劳动力的数量有了明显下降。无论从绝对还是相对角度，中产阶级的数量都有了明显增加。现在，中产阶级的人数甚至超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总人口数。当时的世界人口为25亿左右，现在人口为65亿。因此，辩证地说，从那时到现在，中产阶级不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已发生了根本改变。而从社会角度看，由于全球化而组成的联盟又显然不够完善。

最后，全球化的第三个贡献是相互依赖性，即因果关系以及全球各地发生的现象和过程之间反馈机制的综合。有趣的是，2000多年前就有人察觉到了这种关联。麦加罗波利斯的波利乌比斯（Polybius）是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罗马编年史学家，生活在约公元前200年至前118年之间。他认为："虽然现在每件事情都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但世界上早年发生的事情却很少相互关联。"[8] 在波利乌比斯所说的"现在"之后，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出生，我们的世界也已从地中海地区扩展到全球，尽管有人认为我们的世界是有边缘的。例如，生活在埃塞俄比亚西部的阿努阿客人（Anuak）就坚信，如果你走得足够远，走到世界的尽头，就会掉进深渊之中。而另外一些人，像美国记者托马斯·L·弗里德曼，就充满讽刺地提出世界又一次在变得扁平[9]。但可以认真地说，至少在我们进入外太空之前，现在世界已是完整的。这就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地球。

相互依赖性不仅仅是经济的特点，也成为文化和政治事件的特征。几乎世界上所有人都可以同时观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或纽约世贸中心遭恐怖袭击的现场直播。我们可以猜想谁将获得下一届的奥斯卡，或通过网上聊天在虚拟空间进行沟通。我们可以对乌克兰的大选造成影响，而媒体也可以对津巴布韦穆加贝（Mugabe）政权的倒台产生影响。在经济方面，世界各地市场的供给、需求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一连串复杂关联已经形成。每个最基本的范畴，如供给、需求和价格，都处在密切的相互关联之中，以至于似乎一个地方发生的变动可以影响到另一个地方。用"似乎"是因为在今天"另一个地方"已经越来越变成"这里"了，不同地方间的距离已不再遥远。最终，在将来，需求、供给和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对技术、制造技术、研究和教育的趋势、消费模式以及消费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有时这种相互关联性所遵循的是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偶尔，这条路径在分析中会被彻底地忽略，于是不为人所知。两个世纪之前，英法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导致蔗糖的价格上涨，而蔗糖主要由加勒比种植园里奴隶们砍下的甘蔗制成，最终，这些冲突和战争导致了那里奴隶制的废除。19世纪初，用东欧地区种植的甜菜制糖利润更加丰厚，对蔗糖需求的降低也削弱了加勒比种植园主们的地位和权力。与此同时，废除奴隶制运动在加勒比和英国本土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正如我们所知，1807年英国废除了奴隶制度。在全球化过程中，东欧无意中为西印度群岛奴隶制度的废除贡献了一份力量：1803年，成千上万被拿破仑（Napoleon，1769

–1821）派到海地远征的波兰士兵意识到，他们出生入死并不是为了大革命的崇高理想，而是在保护波尔多商人们的利益，于是站在了起义的图桑·卢维杜尔将军（General Toussaint L'Ouverture）这一边。作为被从塞内加尔绑架和贩卖到海地的黑人奴隶的儿子，图桑是一名反抗奴隶制度的伟大战士，但是终结这个制度的更主要动力是由于甜菜制糖利润更高而对蔗糖需求降低这种供需关系的变化。奴隶制度是因为跨大西洋扩张和全球贸易的兴起而出现的，它也在各种条件的综合作用下走向衰落。波兰的甜菜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回到现在，一家维也纳加油站的油价不仅仅取决于鹿特丹石油市场的供给情况。同样我们附近一家超市里咖啡的价格，绝不仅仅取决于巴西咖啡的种植规模。今天，中国服装的供给量决定着墨西哥纺织工厂的雇用人数，美国汽车工业从业人员的薪资水平取决于日本汽车装配线上生产出的汽车数量，而位于西伯利亚的雅库蒂亚矿山的私有化影响着纽约第五大道上钻石的价格。某个国家工业的发展状况受世界其他地区需求水平的影响。亚洲劳动力的规模影响着欧洲的失业率，都柏林人在为手中资金寻找投资对象时刺激了波兰楼市价格的上涨，而华沙人也推高了乌克兰利沃夫的房价。而这些因素又一起作用增加了西西伯利亚地区的价格压力。一个国家政府的决策影响着其他国家的经济。世界各国的央行通过操纵利率和外汇储备，影响着货币价格，也就是与其他国家的汇率。尽管在我们这些国家，工会在这个通过系统性转型和资本促进经济兴起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来自其他新兴市场的竞争压力也使这种作用不断边缘化，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世界其他地方还有廉价的劳动力，有时远比我们廉价，这就使得我们这里和其他地方的就业率紧密关联。我们都搭乘着同一辆全球化的汽车。

世界市场的相互关联性在日益趋同的金融市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0]。某些市场管制的解除和自由化，以及本国货币的自由兑换和信息革命，导致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储蓄、借贷和投资等行为逐渐发生在一个全球关联的系统中。现在，不仅在本国内，而且在世界经济中，事后投资往往相当于储蓄——某个地方的储蓄可以用于其他地方的投资。然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也开始变得全球化。这就意味着，各地独立资本市场的各种金融机构，如银行、市场、投资基金，以及各种投机者和投资者，都将越来越全球化。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对现实世界的就业水平、生产和消费都产生了破坏

性影响，这种影响首先殃及东南亚地区，接着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这次金融危机也是那种对事后投资水平和储蓄总数进行调整的机制运行的一个症状。考虑到巨大的金融失衡，尤其是美国的巨额预算和财政赤字，我们面临着更大的风险。由于这些现象和过程的相互依赖性以及激烈的利益之争，我们无法逃脱这些风险。既然我们都航行在同一片大海，就无所谓风浪是从哪个方向来，也不用计较风暴是风吹起的巨浪还是地震引起的海啸。这个巨浪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在这个相互依赖的市场上破裂、坠落，并带来一系列的影响。

这并非意味着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可以归罪于其他事情的影响。各国的政府和央行不能因此推脱它们所犯的错误，正如那些企业和公司的董事会不能拿全球化当借口，以掩饰自己的管理不当，尤其是不能适应经济形势改变的错误。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进行管理需要技能，而各种现象的相互依赖更大大提升了对这种管理能力的要求。如果认为一切事情都依赖于、取决于其他事情，那么可以说没有事情取决于我们。我们应该找到成功与失败的原因，而不是指责全球化。

此外，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某种现象的原因归结到某个只是刚好同时发生但毫不相关的现象上。遵循这种错误思维对相互依赖性进行的似是而非的解释不在少数。这只是一种“后来、因此、所以”之类的逻辑错误。我们应该避免在现今的经济和不断变化的全球化过程中寻找各种相互依赖性，尤其是当这种幼稚的解读成为一种风尚时。

有时我们会有这种印象，即最明显的无稽之谈也会被人们认可。例如，正常情况下波兰兹罗提的汇率浮动是一个百分点的1/10左右，毫无疑问这种浮动受到市场上投机波动的一定影响。当然，相应领域的专家们也会对这种波动进行评论，因为他们每天都会定时地给出这些评论，大概是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4点。这些评论也一定会被传递给那些无辜的读者、听众和观众。媒体提出问题，分析师们回答，喋喋不休的评论不断地走向报纸和公众。在波兰随便哪一天的报纸上，我们都会发现类似的评论，以2007年3月8日为例，“星期三上午，兹罗提变得疲软……专家认为，我国货币将会贬值得更厉害……兹罗提的疲软和我们周边地区货币的强势主要是受波斯湾事件的影响，国际投资者转向更安全的投资点……在有关伊朗战机对美国军舰开火的报道后，日元开始变得坚挺，这立刻对一些投资者本想撤出的新兴市场产生影响。”事实上，日元并未变坚挺，而兹罗提和中东欧国家的货币也没有出现明显

的疲软。不久，兹罗提的汇率上升。结果发现，甚至伊朗飞机也没有向美国军舰开过火。像这样的简报只是一些用来混淆视听的有害文字。

然而，总会有金融分析师和经济学家源源不断地作出这些荒谬的评论，而记者也总会给他们充当传话筒。他们这样做不仅因为可以随意评论而不受到任何惩罚，更因为类似的言论总有市场。正如人们会常常受骗购买没什么价值的商品一样，他们也会接受信息市场上的这些无稽之谈。逐渐地，在自由和民主的环境中，这些言论充斥整个市场，使人们无处可避，就好像小偷的数量比警察多，或许确实如此。所有这些都会使人们对到底什么依赖于什么感到困惑或者产生误解，甚至认为事实上所谓的“被强加到公众头上的相互依赖”根本就不存在。

全球化也意味着全球范围相互依赖的经济运作会带来全球性的问题。这一观点适用于许多国家及其周边的情况。这些问题所涉及的范围是如此之广、原因是如此之复杂，这意味着单凭某个国家甚至是某几个国家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同样，像欧盟和七国集团这样的国家集团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七国集团的成员，按照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小，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出于政治上的考虑，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也被邀请加入，于是七国集团成为八国集团。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国内生产总值的43%（除俄罗斯外的其他7国所占比例为41%，俄罗斯占2.7%），但这些国家仍然不能有效地解决某些问题。就政治层面而言，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在内的这些问题本身，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

在经济层面，最主要的问题是投机金融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金融危机风险会像瘟疫一样扩散。我们曾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金融危机，金融的动荡首先始于东南亚，尤其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并向世界其他国家扩散，俄罗斯和巴西随之受到影响，接着是阿根廷和土耳其。每个大洲上的不同国家都感受到这些金融动荡，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也受其影响。

在社会和人道主义层面，人类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威胁，例如，大范围疾病、快速扩散的瘟疫、许多难民危机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破坏性的身心影响、色情文学，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和儿童的色情作品等。

在这些威胁中，最主要的是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因为这些涉及人类文明的问题在地球上长期存在。这说明只有全球的自由合作才能

实现我们所期望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点，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在全球范围采取恰当的行动。虽然，气候变暖本身并不是由全球化引起的，某些生产技术的扩张，尤其是大范围的工业化和动力化，才是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但是，减缓和扭转这种变暖的危险趋势却需要人类的共同努力。显然，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们需要采取不同的行动，尤其是八国集团的成员们、欧洲其他国家以及中国和印度。同时，每个国家都应该为我们未来的生存而努力。

在经济层面，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越来越广泛的扩张。其副产品之一，是局部和区域性经济体逐渐一体化为一个单一的全球性体系。世界经济体中，国家经济体越来越少，现在仅有200个。逐渐地，这些经济体都会成为全球体系中相互依赖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不再谈论“国内”和“国外”，而是谈论“这里”和“世界经济的其他地方”。世界经济越来越变成“我们的”，而我们也越来越频繁地在这个框架内活动。但是，“我们的”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经济拥有所有权。相反，那些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的资本，比以前更多地被这个共同的，或者说相互依赖性更强的全球最强势的群体所占有。

尽管如此，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进程。根据我们的定义，全球化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其中只遭遇过较小规模的干扰和倒退，这些干扰和倒退至少经历了5个世纪的时间。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的地理学大发现之后，全球化形成了第二个浪潮，即伟大科技发现和应用的全球化浪潮。这个阶段的全球化在世界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形成后达到顶点。这些结构和体制也就是一系列的规则，它们控制着各大都市和殖民地、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关系，这些都与当时水上运输的发展相关。这段时期的全球化在1913年突然被急刹车，这个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变故让很多人都感到震惊。本来，一切都那么美好，似乎美好的时光会这样继续下去，许许多多的问题也会随着各方之间的妥协而解决，世界经济会持续快速增长，自然，它所带来的各种利益也会被那些最富有的国家纳入囊中。当时，很少有人关心别人的命运，相对而言，欠发达地区也没有今天这么多。当时的政治家们或其他公众人物，也很少像今天的政治家们这样假装对那些欠发达地区非常关心。

这段艰难的时期，即世界大战、独裁统治、大萧条、极端保护主义以及对思想、人才和产品的自由流通采取封锁的时期并未持续很长时间。不久，持续到现阶段的全球化开始了。根据一些作者的观点，这次全球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就立

刻开始，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开始最初阶段的大范围开放和一体化进程，日本和德国也迅速被纳入它们的轨道，进入战后复原期。不久，在20世纪60年代，新独立国家的经济也从殖民主义的阴影中崛起，虽然不是所有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国家遵循这些新的游戏规则。一些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选择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也在经济上与社会主义阵营建立联系。

“第三世界”这个说法恰当地反映了不只有一个“世界”。第一世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世界是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第二世界，不仅因为第二世界的人口增长率高，也因为越来越多的有着社会主义倾向的经济体加入到这个阵营。因此，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对抗更为激烈，不仅因为意识形态或经济水平，也为了控制第三世界。于是，冷战接踵而至，使得世界及其经济两极分化更加明显。20世纪70年代中期甚至有一段时间，似乎世界就会朝着这个两级的模式发展。苏联统治者和他们的情报机构相信，“世界以我们的方式前进”，苏联人和西方国家都在进行着争夺第三世界的无声战争[11]。然而，世界拒绝被永久地分成两个集团，于是逐渐联合成一个整体。历史的进程还很漫长，因为只有人类文明终结时，历史才会终结。这种情形显然不会在目前这个千年发生。

社会主义经济体几乎没有向第一世界开放，与之自由往来。它们常常闭关自守。今天，“反对进口制造”这个词听起来似乎很过时，但它曾一度成为拉动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世界大战后的两代人时间里，世界被清晰地分为两极，这种趋势比战前两个世纪更明显。这样的情形何谈全球化？但有些作者依然这样说，尤其是一些西方学者[12]。这些作者带着其特有的偏见，有时是明显的无知，将“世界”定义为他们所在的那部分世界，似乎易北河以及太平洋西海岸之间的这片区域就不算“世界”了，或者属于其他的世界。同样，今天很多人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界定欧洲，认为欧洲只包括这片大陆的西方部分。

因此，从定义上说，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几十年里，无论这个世界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无论是自由主义、开放、取消限制、合作或一体化，都不能算作也不是全球化。不论这些过程有多么深远的影响，世界上还有相当一大部分人口并没有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第三阶段的全球化真正开始，是当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前社会主义的“第二世界”国家加入到这个发展的主流过程中时。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很快被称为“新兴”市场，这正是那些早已兴起的高度发达资本主

义市场站在优先的角度看待这些市场时的感受。这段时期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此后，我们经历着真正的全球化，它在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间隔，即从1914至1989年的所谓的“缩减版20世纪”后，重新开始。世界不同地区被排除在此前的全球化的程度是不同的，这个沉睡的全球化现在正醒来并以巨大的动力前进。

这些伴随着前殖民地国家不断解放，以及后社会主义国家迅速且强劲转型的过程[13]逐渐超越其他一些重要的进程，并赋予目前第三阶段的全球化特殊的特点。其中，有些特点与前两阶段相同，而另外一些则是新出现的。正在进行中的科技革命及其经济影响，在这一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伟大的电子技术革命的全球化时期。目前全球化阶段有着以下6个重要的根本特征：

（1）世界贸易以两倍于产出的速度增长；

（2）全球资本转移以更为迅速的速度增加；

（3）移民不断挣脱国家政府的控制并且数量不断增加；

（4）新技术以空前的速度传播，改变了人们从事商业行为的方式，并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新型的相互依赖关系；

（5）后社会主义体系的转型进一步加快，使得来自35个国家的18亿人民融入没有限制的世界经济中；

（6）多方位的文化转型正在进行，出现对各种价值的多元化解读。

上述最后一点既包含积极的也包含消极的转变。这方面不可能达成共识，因为在某人看来某个现象或过程是增值的，而另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观察却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这种情况在有着较强传统和文化特殊性的国家尤为明显，例如阿拉伯国家。影响广泛的国际化或美国式的消费让一部分人感到震惊，但同时，按南加州或弗罗里达模式建立起来的购物中心及其附属设施会让另一些人感到高兴。一些人甚至认为，通往美国式成功的最短道路不是通过模仿美国式的生产及其工作信条，而是借鉴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借鉴当地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当美国大学的分校在这些地方出现时，如在巴林和卡塔尔，这些人会印象深刻。而大量快餐店的出现并不一定有这种效果。然而，科威特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你可以看到一辆法拉利停在麦当劳餐厅停车场的地方了。你在美国会看到这种情形吗?

全球化的确比以前进步了许多，但我们不应该忽略对它的批判。虽然许多不可

能的事情因全球化而变得可能，但我们不能失去立场。经济学写作中（不仅在报纸上）一个相当普遍的习惯是，不加批判地引用一些易于记住却过分简单化的观点，这些观点往往缺乏足够的思考。同时，人们的从众心理也起到一定作用。有不少人引用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但他在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所有东西都可以在任何地方生产和销售”[14]时，不免言之过早。这种话只能出自没有去过多少地方的人之口，或者，出自去过一些地方、但肯定不是各个地方的人之口。一切东西可以在任何地方制造的论断怎么可能会正确？地理学什么时候让位于历史学？这种事情，只有在企业满足下列条件时才可能会出现：

——在产品售价最高的地方无限制地销售该产品；

——在资金充裕的地方筹集资金；

——在价格最合适的地方购买到原材料；

——在效率最高的地方建立生产基地。

遗憾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的确，“美国”电脑可以在马来西亚“制造”（或组装），一些“日本”丰田轿车模型可以在土耳其组装，Skype也可以从爱沙尼亚提供网络服务。但事实是，这些电脑仍然不可能在近东地区生产，丰田轿车不可能在中非的生产线上组装，Skype也不可能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外向其提供网络服务。这就意味着，即使技术已经如此先进，地理因素的影响依然巨大。此外，世界上不同地区的生产潜力有着巨大差别，包括先进技术、体制成熟度以及具备资格的劳动力等。

此外，现代经济中服务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实体产品制造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服务一般不能在“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往“任何地方”，对传统的服务而言尤其如此，大部分传统服务不能将服务生产地和提供地分离。因特网和数字化革命使得传输某些服务成为可能，尤其是信息、一些教育和娱乐、金融服务等。但这并不能包括洗车、美发或就餐等服务。你不可能在网上为某人剪头发，也不可能通过网络为别人照顾小孩。这些服务以及其消费者必须在同一个地方。在虚拟空间中，世界似乎可以缩减为一个单一的点，但这也只可能存在于虚拟世界中。在现实中，销售和购买发生的距离和空间可以极大地缩减，但只要距离存在，就一定有运输成本，这就意味着地理因素依然起作用。

因此，距离“一切事物”可以在“任何地方”生产，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今天，我们比以往更贴近这个目标。这也体现了全球化在经济领域的进步程度。可以说，地理因素在资本增值这一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越小，全球化的过程就越先进，反之亦然。这是因为事情发生的总体方式及其文化、社会和政治后果，越来越渗透着现代全球化过程的各个特点。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全球化的自发性。截至目前，自发性既是全球化的部分本性，也是推动其发展的引擎。然而，如果缺乏全球范围内必要的规范，那么，全球化或许会不堪自身重负而衰退或崩溃。如果将全球化理解为将自由市场的运作原则向全球经济传播，那么本质上全球化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全面统治。从这个角度看，那些将全球化简单认同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伟大胜利的人是对的，或者至少在目前的文明发展阶段是对的，因为事实证明，世界不适合社会主义或甚至是共产主义的模式，尽管很多人不仅设想这两种模式的成功，也曾为此付出很大努力。然而，20世纪末国际社会主义体系崩溃，随后兴起的市场经济也已融入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后苏联时期的共和政体组成了独立国家联合体（Con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而中国和越南（与柬埔寨和老挝一起）都已实现各自的开放，这些国家以三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融入世界发展的主流之中。

后社会主义经济体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一体化，发生在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进化中占上风的时期。在此过程中，市场的自发力量有着明显优势，而国家及其积极政策的作用被减弱。于是，后社会主义经济体，以及其他处于中低发展水平、资本主义体系相对较弱并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都经历着一种由新自由主义规则带动的转型。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其优势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更是压倒性的。

在历史进程中，自发力量和由政府行为产生的力量之间的平衡一直在变化，即使当政府在国家范围内的作用远超过当下的时期（不仅指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也包括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这种平衡依然在变化。在全球化进程中，自发力量起着决定性作用。没有人发明了全球化，也没有人设置了其发展过程。尽管许多演员出现在全球化的舞台上，但没有人为这场表演写下剧本，也没有人来导演。因此，它更像是三幕剧中的一场戏剧，第一幕的道具里有一支枪，而这支枪毫无疑问会在第三幕中开火。显然，全球化这出戏剧中的演员们，包括各个国家及其政府、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商、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世界

级媒体集团以及犯罪团伙，都在尽可能地为自己积蓄力量。其中，某些实体比其他做得更好。每场比赛中，都会有赢家和输家。

人类关注的问题是这场比赛的结果。这场比赛能否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即使不能让每个人都赢（也不可能，这与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的本质相关），至少使赢家尽可能多，输家尽可能少呢？这是可行的，但不一定会出现，得视情况而定。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很多事情同时发生，然而，这些事情并未发生。这或许是因为其中有些非常强势的参与者，尤其是那些大国和势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或许是因为对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过程缺乏足够的理解。这两方面的障碍都令人畏惧，并且必须用不同的途径解决。对于第一种情况，需要彻底了解那些强势群体的利益，并相应地组织一些力量来从时间和空间上抵消其影响。对于第二种情况，需要不断地努力，去争取人心和人力，并且要向世界公众作出全面解释，目前阶段全球化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使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可逆转，以及为什么有必要用一种新的方式组织全世界的公众。

全球化正在获得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支持者们可以高枕无忧。为了使这个过程远离自身引起的危险，应该扩大全球化的有利方面，而尽可能减小甚至在可能情况下消除其不利方面。全球化的有利和不利方面都不少。一些人通过展示全球化如何汇集经济的能量、提高薪资以及使贸易往来更频繁来支持全球化，这样做也不无道理。但是，他们所用的统计数据说明的常常是国民经济或国家作为整体取得的成就，是集合数据或平均数据，这些都不是很有价值。我们应当看到，这种角度掩盖了各种差别。我们应该既看到美国的穷人，也看到俄罗斯的暴发户；既看到保加利亚人民的苦难，也看到尼日利亚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既看到中国经济的迅速繁荣，也看到刚果民主共和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停滞；既看到美国五大湖区便捷的因特网接入，也看到非洲大湖区还未开通网络。

然而，不论贫穷国家还是富裕国家的人民都没有看到上述事实，都抱怨全球化。这种抱怨既存在于商品市场，也存在于劳动力市场，既关乎就业难易程度，也关乎薪资水平。贫穷国家的人们抱怨富裕国家并未真正放开市场，允许这些具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商品进入，导致他们获得工作和收入的机会被剥夺。富裕国家的人们不喜欢贫穷国家，因为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转移到那些具有合格劳动力但更廉价的国家，即贫穷国家。那么，在全球化的开放环境下，贫穷国家确实夺

走了富裕国家的工作机会吗？北美和西欧国家是否确实应当责怪这些所谓的新兴市场，尤其是南美和东亚，以及不应忽视的东欧地区，夺走了它们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同时，构成全球化的过程，即产品和资本的自由交换以及知识和技术的自由流动，对富裕国家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贡献巨大。因此，这些地区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比以往更高。我们所面对的是两个同时发生的过程，一个过程使得收入中薪资比例下降，另一个过程促使绝对生活水平提高。结果是，有工作的工人们得到一个更大蛋糕中的更小部分，他们的实际收入稍稍有所提升。具体而言，由于这些过程的作用，在过去20年中，18个最富裕国家的实际收入水平以每年0.24%的增长率增长[15]。整个20年中，收入水平增长了4.9%。对于全球化益处的那些高调言论而言，这样的增长不足挂齿。因此，这样的结果所引起的不满、与日俱增的沮丧和抗议都不足为怪了。然而，全球化不应该对这样的情形负主要责任。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发达国家国民收入中薪资比例的显著下降确实是事实。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日本，在1980年至2004年间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美国和英国下降约3至4个百分点。这是从价值增值角度讨论雇佣劳动力薪资比例的情况。当然，这种下降是多个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因素便是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其他的重要因素包括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导致一部分人失业，并把新增的这部分价值转移给发明者以及发明的赞助者。当然，对工人不利的体制改革也是原因之一，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委婉地称之为“面向劳动力市场的政策”，这种说法也是淡化该组织在此过程中的消极影响。

与新自由主义的偏好和价值取向一致，这种变化的实现主要通过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归根结底是在资本的较量中弱化雇员讨价还价的地位。因此，这种结构性的政策将收入从薪资向利润转移就不足为怪了。这也正是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而相应资本比重上升的根本原因。这完全是遵循资本主义规则自然发展的过程，全球化只是促进了这一过程的发展。现在，这种转移不仅在地区或国家内部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然而，这种收入结构中对劳动力不利的转移并非是全球化本身作用的结果，而是资本将其功能性目的最大化，即追求利润的结果。在按照新自由主义规则形成的世界经济条件下，资本关注自身利益远胜于工会或政府，而后两者至少还宣称站在劳动力及其权利的立场上。

***

既然全球化需要在历史设置的重重挑战中生存下来，那么它的功能性就应该有本质的提升。一些作者，包括以其早期对全球化缺点的尖锐批评而闻名的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提出一系列结构上和体制上的改变，在他们看来，这些改变可以使全球化运作得更好。这是一种典型的规范经济学方式，他们为事情应该怎样发展提供建议，却忘了事情为什么以现在的方式呈现[16]。

全球化应该多一些协调性和规范性，少一些自发性和混乱性。如果全球化继续无序发展，它将使不同地区、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已经严重不平衡的物质状况（包括收入和财产）更加恶化。这些不平衡将挑战社会和经济忍受力的极限，其结果是所谓的“社会排斥边缘”会开始破坏经济的有效运作。我用了“所谓的”，是因为这种现象已经不是一种边缘，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它已经成为一种病态。许多人被推到社会经济生活的边缘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特点，这些人被剥夺了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

一旦突破了不平衡的临界点（我们离这个临界点越来越近），反抗和新一轮革命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这反过来会将世界重新送回一片混沌的荒野之中。荒野也许会吸引旅行者，但对人类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持续高涨的移民潮、国际恐怖主义以及许多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避开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道路等，这种种征兆都预示着日益加重的失望情绪，这些情绪越来越逼近爆发的边缘。如果屈从于目前全球化过程的惯性，这样的爆发就不可避免。避免将全球化良莠不分地抛弃的一种方式是使其制度化。应该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放在一个有规则的且有利于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框架内。应该找到一种方式，来限制全球化中实力强大参与者的特殊利益，因为到目前为止，世界对这些参与者的控制已经力不从心。

迄今，至少有两个全球性的负面进程凸显了面向全球的调控和协调政策的必要性。这两个过程即全球变暖和国际恐怖主义，这是全球化的自发性带来的后果。如果不是全球化的自发性以及相应的调控缺失，这些现代世界的瘟疫也不会如此大范围的传播。私人利益、不受限制的资本的贪婪、日益盛行的消费主义风气以及对这些生产和消费扩大的负面影响缺乏足够重视，已经造成大范围的环境污染和退化，程度之深已经很难恢复。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政府的作用被进一步削弱，同

时，对一些特殊贸易部门，包括武器部门，缺乏适当的管制，导致武装冲突和区域战争向私有化方向发展。世界恐怖主义正是这种疯狂私有化的又一结果。如果要使一切私有化，那么我们也应该使一些为“正义事业”的斗争私有化，而打着“正义事业”旗号的恐怖主义随时都会杀戮别人以及他们自己。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世界上没有人——无论是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还是像七国集团和欧盟这样强大的国家联盟——可以单枪匹马解决全球变暖、国际恐怖主义或其他严重威胁人类的全球性痼疾。这些前沿领域需要团队合作、协同政策和共同的组织，需要形成新的规则以及世界范围的经济行为，这也意味着需要新的体制。自发性对于在当地市场销售西红柿当然是好事，但并不意味着对全球市场的一切事物都是好事。“经济自由”这句诱人口号导致的适当调控的缺失意味着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满足少部分人的利益，虽然它带领人类在经济增长的道路上已走得很远，但是，人类本可以以更小的成本走得更远。

因此，按照经济理性的原则，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采取行动。不仅在当前，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全球化的未来将取决于人类是否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并将之掌握在自己手中。将自己的命运托付在别人手中、尤其是无形的手中没有任何意义。在很多领域都看不到这双无形的手，因为它根本不在那里。它会在某些领域出现，但即使在那些领域，它造成的问题也比它解决的问题多。通向未来的关键在使全球化更加理性化，这需要对世界经济及其相互依赖性进行制度化。如果我们能在当前实施这一项工程（因为这是一个跨越几个世纪的工程），那我们就能将全球化从自我毁灭中挽救出来。

全球化是一个划时代的进程。它的历史本质意味着它有一个开端、它正在继续，并且它会在某一点终结。因此，这个过程必然是从一点到达另一点。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它发端于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如欧洲和亚洲的封建主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美洲以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各个原始公社。这个过程开始时，世界正被当时不可超越的地理、技术和政治障碍分隔。它从当时那样的情形发展到今天我们共同生活其中的城市和乡村。现在，世界人口已有一半居住在城市，一半居住在农村。大量人口在各地之间流动。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将人类比以往更牢固地绑在一起。因此，也许将地球称为全球性居所比地球村或地球城市更恰当。

然而，我们也许或多或少知道自己来自何处，却不一定知道自己将去往何方。

我们都希望能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但这只是在表达一种信念、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科学的断言或一种知识。未来对于某些人会更好，对某些人则更糟，但对于大多数人仍然是未知数。人类面临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其中一些由全球化引起。如果我们这代人说全球化是最后的伟大文明进程，那未免过于幼稚和自负，一定会有其他进程出现的。当人们真正开始思考，并发现我们生存的唯一机会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使之基于环境的平衡，并转向真正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那时，一场新的绿色革命将再次改变地球的面貌。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场革命已经蓄势待发。

因此，全球化是一个有着开放式结尾的过程，但并不是一个无休止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它正在继续。全球化的本质是灵活变通的。它不一定是新自由主义风格的全球化。它也没有必要一定服从美国的利益，或服从其他强大的企业或金融集团的利益。现在，我们只是不知道遥远的未来会怎样，或地平线之外会有什么，虽然我们思维角度的不断变宽以及知识的不断积累已经使得地平线不断扩展。现在，我们能确定的是，全球化已经形成一个动态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特征与世界资本主义内部数不清的矛盾相互关联，换言之，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依赖。这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动态的有机体。未来还会发生很多事情，正如之前半个世纪发生了各种事情一样。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

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全球化仍然是一个新兴的范畴，而对这个过程的干涉会将其打断或中止。极端的情况是，它会通过重新塑造决定社会经济增长的结构和动力的资源的运动过程，来重新分配成本和收益。上述因素都很重要，但这种变化只会是数量上的变化而非质的改变。要出现极端状况，需要全人类以空前的规模对该过程重新评估并采取协同行动。远离全球化作为发展的范畴会违背其本质，这会导致历史倒退到从前，或出现向未来的新飞跃。

尽管目前全球化进程似乎像雪崩一样不可阻止，但如果出现第一种情况，即倒退的情况，不应该过高估计其影响。不同方向的风在历史上吹过，谁也不能保证这些风的风向不再改变。如果我们环顾四周，或远或近，都可以看到无尽的落后、地方主义、仇外情绪、孤立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过盛的官僚习气以及保守的政府干涉主义。我要再次说明，只要经济、文化和政治中的某些现象和趋势同时发生，就会使目前全球化的主流趋势偏离其历史轨道，正如1913年世界资本主义彻底失败一样[17]。100年前，当时欣欣向荣的全球化似乎不可阻挡，然

而，没过几年，它突然间就在几十年时间内成为一片废墟。幸运的是，在此后的几十年，它又一次站立起来。

如果出现第二种情况，即向前迈进一大步，那将会出现质的变化，形成一个新的、成熟的世界社区和全球经济，文明的发展会达到更高水平——不管是否会遭遇星外来客，这种情形在目前只是一种幻想。然而，这种情形也不现实，因为这种将人类当成宇宙中智能生命的主宰的设想更凸显了我们对宇宙的无知。那么，回到地球，向未来的这种大步迈进结果会怎样呢？也许会出现一个全球性国家或世界社区。这个全球性国家将不会按照征服、主宰以及对权力的屈服等原则来组织。历史上，按照征服、主宰和屈服等方式组织国家的例子不乏其数。许多或长或短的帝国都征服了世界的部分区域，如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罗马帝国、成吉思汗（Genghis Khan）[18]或菲利普二世（Phillip II）时期的西班牙帝国，当时这个帝国或许真的可以谓之“日不落”，但仍未控制整个世界。“千年帝国”（“Thousand-Year Reich”）的建立者们都有着超级大国的梦想，幸运的是，这样的“帝国”及其一系列可怕的后果只在世界上存在了十余年。

人类（尽管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仍然处于一种较松散的关联以及整合的状态中）将重新组织整体结构，从一个世界联合体转变成一个世界政体。世界经济将实现彻底的一体化。在这两个基础上，这个类似完整国家的大厦犹如建立在两根坚实的支柱上，它将出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和文化层面组织和调动全人类。这似乎是比预见星外智能生命更遥远的空想。人类还不能在全球范围进行这样的协同和理智的努力，这一切还遥不可及。

我们可以为经济自由化释放了人类巨大的能量和创造力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赞叹不已，我们也可以为突飞猛进的技术进步和技术传播兴奋不已。我们也可以体验回到古希腊的幻想——感受技术、知识和社会层面直接的、雅典式的民主，只不过这次是通过因特网和无线连接的间接体验，但至少可以是实时的体验。于是，人们就可以了解当公民聚集在斯巴达广场，并作为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的情形。斯巴达人称自己为“平等的人类”，尽管当时对妇女仍有明显歧视。但是，与其他区域甚至雅典的妇女相比，斯巴达妇女仍享有更多的自由。

一两百年前，对于我们这些国家是20多年前，一度曾有社会上百分之十的人可以决定百分之百的事务。今天，社会中百分之百的人决定百分之十的事务，因为其

他百分之九十的事务由市场以及控制市场的力量决定。事实上，许多对大多数人非常重要的事件的决策基本没有咨询这些人的意见，很多人甚至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或根本不知道其存在。这些决策也不一定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然而，所有的决策都是通过“民主”方式获得。要达到真正的而非有名无实的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1世纪“分而治之”的重要规则将会盛行。有时，这种治理方式会引起很多不满，并使得管理难以一帆风顺。

我们不应该沉溺于技术和经济的“科幻小说”或“纯小说”中。如果你愿意，从今天的角度可以这样幻想未来：未来将是一个充满友好氛围的幻境，将出现一个和谐且运作良好的超级大国和一体化的世界社区，技术为其服务，自然被其征服，它永远不会衰退。

有趣的是，当艺术家们，包括电影制片人、作家和画家等，幻想未来时（除去对外太空的幻想），他们更经常地把地球想象成猿猴的世界，一个人口日渐减少、伤痕累累的地球，自然灾害频发的地方或是圣经中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但从来都不是一个田园诗般的世界。这不是我们的未来。

向未来的巨大飞跃，抛弃目前全球化的种种阵痛、偏离和病态的包袱，同时保留其积极方面，需要满足许多条件。尤其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恰当的全球协作机制。这里所说的并非某种类似世界政府的机制，因为这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行。关键是，要创造一个可以形成人类共同目标的机制，这种机制还需要能创造出达到这些目标的政治工具。在这种体制下，没有世界冲突，而有世界范围的民主对话；不会有制度混乱，而建立起了新的世界制度秩序；不再有频繁的恶性竞争和冲突，而是进行世界范围具有创造性的政治合作和协调。

一切都应该着眼于提供有适宜质量的、恰当数量的公共产品。这里使用“产品”一词会让读者有些误解，因为产品总与有形物品相联系，而这里主要指的是无形的服务。传统的公共服务由政府提供，并由政府在公共金融系统框架内支付（通过中央或地方政府）。这类产品的一个特点是，一旦提供了这些服务，它们的使用就可以不受限制。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纯公共产品，包括国家安全体系、司法体系、外交和行政部门等等。所有公民都受益于这些产品，并且增加产品的使用者无需先削减原有使用者，也无需增加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成本。

如果所有的儿童都能享受免费的天花疫苗接种，或某个慈善的外国政府向这些

儿童提供每周一匙的鱼肝油，这也可以称为公共产品，尽管它们或是政府的惠民措施，或是一种老道的外交手法。以上情况与许多市政服务类似，都属于公共服务，如居民垃圾的收集处理和“公共道路”的使用等。港口的灯塔也是一种公共服务，因为它为每条经过的船只导航，无论它们是否为之付费。如今，GPS和其他类似的全球导航系统也发挥着这样的作用。用户只需为接受信号的设备付费，但不需要为发射信号的公共服务付费。同理，无线广播和免费电视（除收取电视牌照费的情况外）也属于公共产品。今天，越来越广泛的因特网准入也与上述情况类似。不久，因特网也将覆盖各个地方并且免费使用，成为一种纯粹的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的经济本质存在于以下条件中：

——如果供应的是服务，那么原则上，所有人都有权使用这些服务，例如无线广播；

——某个人对服务的消费量并不影响他人的消费量，例如路灯的灯光，某些行人受益于路灯灯光的照射，同时，其他行人享受路灯照射的权利并未被剥夺；

——增加用户并不会增加提供服务的成本，例如，某一时段打开电视收看天气预报的人数增加，但准备录制天气预报的成本并不会因此增加；

——与此类似，限制某人使用公共服务并不会降低提供这些服务的成本，例如禁止某人出席议会辩论并不会降低议会管理的成本；

——公共服务经费来自公共拨款，即来自社会消费基金，因此，尽管其消费者是个体消费者，但是由公共财政为其买单，其支付方式也是一种有组织的支付。

在公共服务方面，全球化引进了许多新的因素，也使事情更加复杂化。全球化下出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全球经济和世界社区的顺利运转就需要有全球公共服务的支持。这意味着许多组织和制度上的转变成为必要，包括融资和分配方式的改变。一方面，这两种方式转变的操作比国家范围的操作更困难，因为没有一个专门的世界体系，来完成资金筹集以及为公共用途进行资金分配。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许多问题无法在国家层面解决，需要全球范围的统一行动。这尤其适用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公共安全、支持信息、人口和商品相对自由运动和流动的基础设施、面向全球征集问题的有效和巧妙的行政途径以及保障最低限度的安全和社会福利等。就目前的全球化而言，或许由于其高度的自

发性，还没有形成任何可以提供令人满意的公共服务的实体，这些令人满意的公共服务可以通过组织其供应、为其筹备经费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其进行分配来实现。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以全球性公共服务为主题的研究、分类和描述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之前，人类就已经在相关领域小有成就。这种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各种方案和提议的交叉以及相互作用使得世界最强大的实体采取一种合作的途径，并彼此达成切实可行的妥协。紧接着，现实迫使另一些相对弱小的参与者遵循这些相互妥协形成的规则。这也正是全球性体系形成的基础或其组成部分。或许我们今天不以为然，但这正是历史上邮政服务的功能成型的过程，现在，从尼加拉瓜寄信到斯里兰卡花的时间甚至比从华沙的沃拉区寄到乌尔斯纳夫区郊外的时间都短。各种新的通讯方式已经涌现。尽管在公路上，有的国家靠左行驶，有的国家靠右行驶，但没有一个国家允许人们随意行驶，因为世界各地都已经建立了交通规则。尽管世界各地在历法上没有像交通规则这样一致，但即使坚持使用自己传统历法的国家也会熟知公历（Gregorian calendar），这种历法每3000年才少算一天。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但重要的是所有事情都会形成惯例和组织，先是在地区层面，然后是跨国层面，最后是全球范围。

有时，一个提供全球公共服务的国际组织的建立始于某种民间的倡议行为，例如1863年国际红十字会的成立。类似组织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些则是出于对人类安全的无私关注。这也正是世界种子银行成立的动机，这个最初由一些科学家提出的倡议，受到一个专门成立的基金（即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Global Crop Diversity Fund）的支持，现在成为受联合国粮农组织（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支持的机构。种子的贮藏设施位于挪威斯匹次卑尔根群岛（Spitsbergen），深埋在地下矿井中，但储存位置又具有一定高度，即使全球变暖致使海平面升高，这个位置也始终高于海平面。人类赖以生存的成千上万的植物种子被储存在这个种子银行，以备世界末日的到来或出现其他自然灾害。全球性的公共服务正是像斯瓦尔巴德岛全球种子库（Svalbard Global Seed Vault）这样为人类提供避难所。全球种子库一个最基本的宗旨是，它是公共的，而不是为了某种商业利益或特殊群体的利益。种子银行是一种高明的制度化或某种政策全球实施的最佳例子。

也有一些例子是某种早先的认知和随之而形成的传统最终变成一种全球性的机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人几乎都知道，米、千克、公升、公顷或摄氏度指的是

什么，并且会在相互签署的合同中使用这些单位。人们还能将这些单位换算成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历史悠久的英尺、英镑、加仑、英亩和华氏度，从而进行进一步的交流。于是，他们可以生产、运输、销售、使用并进行度量。换言之，这种换算是商业的基石，因为它几乎使世界各地进行比较成为可能。用“几乎”是因为仍然有些地方，如马拉维或冈比亚，人们仍然按堆卖西红柿，每堆第一层放五个，上面再摆三个，最上面放一个。在一些本地市场，我们当然可以按类似“从这里到篱笆那里”的方法进行度量，但是当我们想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就必须知道并使用这些度量方式。

* * *

然而，世界上仍然缺乏一些通用的度量方式，目前仍然没有一种全球通用的货币。在这方面，我们甚至落后于前几个阶段全球化顶峰时期的情形，即落后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那段时期，世界上货币的数量远少于现在，在金本位制下，黄金发挥着世界货币的作用。由于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原来的两种法定货币变成二十多种。尽管世界上出现了一些使用相同货币的共同货币区，但现在的货币数量仍远多于20年前。最早出现的共同货币是非洲法郎（African franc）[19]，始于1945年。此后几年，不断有国家加入，同时也有一些国家退出。接着出现的共同货币是东加勒比元（Eastern Caribbean Dollar）[20]，始于1965年。最近出现的共同货币是欧元（Euro）[21]，于1999年开始流通。一种共同的世界货币，或许可以成为“全球币”，将会降低交易成本，一劳永逸地消除货币危机及其对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从而提高世界经济的效率。

虽然世界货币的出现还遥不可及，但是世界与共同货币的距离已经开始缩小。如果你在太平洋另一边的巴尔博亚，站在位于斐济岛和萨摩亚群岛之间的小岛瓦利斯的海岸上，你将永远望着昨天，因为你距离国际日期变更线非常近。日期在改变，但当地货币与那些距离遥远的国家的货币的汇率却没什么变化。如果你手里揣着1000当地法郎，到了地球另一边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岸，你口袋里的钱将总是16列弗39斯托丁基。这是因为经济关系将这两个毫无共同之处的地方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两个地方的货币都是以同一个地方发行的货币作为锚货币。这个地方就是法兰克

福，欧洲中央银行所在地（European Central Bank），也是欧元的发行地。在那里，无论是1000当地法郎还是16.39列弗，都等于8.38欧元。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间这种原始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复杂的历史进程的结果。尽管不同货币的发展道路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在这些与全球化相关的进程的浪尖以令人惊讶的方式相互交叉。在马里的首都巴马科，几乎没有人察觉到他们的法币西非法郎与爱沙尼亚的克朗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样，在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法币与前葡萄牙殖民地几内亚比绍的西非法郎有着如此固定的兑换关系。流通于新喀里多尼亚、法属波利尼西亚以及瓦利斯群岛和富图纳群岛的太平洋法郎（Pacific franc），其与非欧元国家货币的汇率变动同其与立陶宛立特或波斯尼亚马克的汇率浮动一样。这些国家和地区，出于实际性的目的，都使用一种共同货币，而这种货币的汇率浮动又与美元、日元和卢布挂钩。

在经历了殖民时期后，这些非洲法郎国家与法国首都以及法郎有着千丝万缕的后殖民时期联系，而后社会主义国家对卢布的抵制又成为苏联的遗产之一，这些国家正朝着与欧盟一体化的方向进行转型。在经历了种种不同的历史命运后，诸如非洲法郎国家和后社会主义国家都将自己的货币与欧元挂钩，它们也成为欧元区的事实成员（de facto members）。尽管听起来很奇怪，但是今天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多哥和尼日尔的货币与欧元的关系，要比波兰兹罗提和匈牙利福林与欧元的关系更加密切，而多年来后两个国家的货币一直是市场经济改革中的领军者。

或许将来某一天，世界将会朝单一货币迈出大胆的一步。这首先需要使美元、欧元和日元的汇率固定，尽管现在看来这远远不够，因为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货币也不容忽视。欧元可以在波利尼西亚群岛流通，而美元可以在加勒比地区流通，这已经是相当大的变化，但是从世界经济角度而言，这还不能形成任何气候。只要美元和欧元这两种重要的世界货币没有整合为一种，它们与日元、人民币、卢布和卢比的汇率还未固定，那么距离世界统一货币就还很遥远。而今天，英镑和瑞士法郎甚至还不急于加入欧元区，更不要说加入某种世界货币中。我们也不能忽视某些货币，这些货币就像这些国家的足球队一样也是它们的一种骄傲，它们肯定无法想象失去自己的货币。然而，只要世界上的一些大国朝共同货币迈进，虽然不幸的是这在未来半个世纪几乎没有可能，那么其他国家也会争先恐后地加入其中。虽然可以有很多足球队，包括国家队，但对于货币而言，种类还是越少越好。

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或是或非问题。世界上关于是否应该维持多种货币，有着非常严肃的争论。多种货币的存在会带来一些好处，但是这需要人们知道怎样利用这种情形，并且避免将经济政策的目的（使经济繁荣）与手段（一种稳定的货币）相混淆。维持多种货币便于某个国家减弱经济面临危机的可能性，而这种危机是由该国与他国日益扩大的生产力差距所引起。遇到这种情形时，政府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即一时降低本国货币的汇率，从而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使国民经济暂时获得缓和。货币的贬值防止了本国商品在外国市场价格过高，而价格过高的产品会很快被市场淘汰。如果一个国家的产品在外国市场定价过高，其国内的产量和就业率就会下降。如果没有多种货币的存在，就不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商品的竞争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引入单一货币——美元是件坏事，也并不说明中国应该用不同的区域货币来取代人民币。在一个幅员辽阔、企业生产力和竞争力都差别巨大的领土上使用同一种货币（这正是许多大的经济体面临的情形），这个国家有时需要用比货币贬值更为痛苦的手段来维持经济。

2000年3月的一天，美元兑欧元的比例为1:1。那天，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A·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教授刚好计划来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举行讲座。蒙代尔教授最为杰出的研究成果之一是货币最优化理论，这为欧元区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22]，他也因此被称为“欧元之父”。在他的演讲中，蒙代尔教授主张形成一种统一的世界货币。他提出，第一步应该实现世界两种最主要货币的汇率固定，然后逐渐使两种货币变成一种。此外，可以使日元成为世界货币中的分币，因为日元兑美元或欧元的汇率基本上都是100:1[23]。就在那一天，波兰兹罗提与美元和欧元的汇率都是0.25。我开玩笑说，我们可以立刻采用一种货币体系，使兹罗提作为“四分之一”元。为了纪念这个时刻，我甚至送给蒙代尔教授一个兹罗提。然而，此后事情的发展与大家的期望大相径庭。我们都处在一个功能失调的世界货币体系中，这个体系不断提升世界经济运行的成本，减缓增长速度，并使我们生活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的阴影下。蒙代尔教授的观点将继续迎接考验。他也还保存着我送给他的1兹罗提，虽然在此后7年的时间里，兹罗提升值了近70%，现在，1兹罗提可以兑换0.18美元。

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假设在2000年，诞生不久的欧元就与美元和日元的汇率永久固定，而兹罗提也成为这个固定汇率构架中的一部分，其他一些国家，从拉丁

美洲到非洲再到中亚，都会加入到这个体系中。那么，谁会从中获益？毫无疑问，货币兑换市场的中间商将会遭受重创，因为他们的很多服务到时都已不再需要。那些指望汇率变动的投机商（常称为投资商）也将从世界核心资本市场消失，因为到时很少会有汇率变动。而那些根据汇率变动对变动趋势和变动强度的投机行为也会随之消失，就像现在德国和法国之间就不再存在类似的投机行为，而当马克和法郎还在使用时，就曾有类似投机行为。现实世界而不是投机买卖中，做出关于储蓄或投资的决策的风险将大大降低，相应地，这些决策也将更加精确。同时，误入歧途的投资将越来越少，经营决策将更加有效，公司的管理也将更加良好。

在现实层面，美国经济将被迫实行其推迟很久的结构改革和调整。美国人将继续他们的透支生活，很少储蓄，并通过其他国家的储蓄来支持美国绝大部分的经济增长，不断大幅推高其事实债务。不幸的是，美国可以通过其特殊的机制为其预算和贸易的巨额双赤字筹集资金，使得上述情形得以实现，这个特殊机制便是积极鼓吹美元是世界的储备货币，至少目前为止，其他国家都愿意储备美元。世界上约有65%的储备货币是美元（约有25%为欧元，其他10%为英镑、瑞士法郎、日元和韩圆）。令人感到荒谬的是，为美国的赤字买单的，是一些比美国穷但与其有结构性贸易顺差的国家，如中东石油输出国和中国等。过去几年中，由这些不平衡的累积导致的紧张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虽然有机会可以部分缓解这些紧张，但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将放缓增长，同时，欧盟经济产出和消费都将加快增长。另一种假设的情形是，欧元兑美元汇率的稳定使得更多的国家，包括英国也加入到欧元区。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Nicolas Sarkozy）也不再有理由说：“我们创建欧元区不是为了让欧洲再也造不出一架飞机。这是荒谬的。”创造欧元绝不是荒谬的。这是一种常识的胜利，并且也标志着拥有了进行超越国家特殊主义的长远行动能力。荒谬的应该是在新自由主义支配下形成的美元与欧元的汇率机制。

美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将使20世纪后25年以来在全球化浪潮中富裕起来的国家首当其冲为其买单。尽管有新自由主义的宣传，但这只涉及很少部分的美国公众，因为从1981年到2007年，绝大部分美国民众的实际薪资并没有上涨，而各种收益，尤其是来自于投机的收益，却显著增加。由于交易成本和金融风险的降低，在我们假设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将加快。美元将比现在强劲，但欧元区经济将更加强大。欧元区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收入和资产的差距将减小。不论从总数还是人均数

看，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再分配效应将导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比现在更快的增长，而增长成果的分配也会更为平均。简言之，世界经济将更加高效，也更加均衡。

对波兰而言，在这种假设情况下，2001年至2007年间兹罗提大幅升值的情况不会出现，兹罗提的升值大大降低了本国产品的竞争力。廉价进口产品的大量出现为其他国家的人们创造就业机会、为投资者带来利益，为其他经济体的政府增加税收，却使得波兰本土企业被挤出市场。同时，在兹罗提汇率有利情况下经营很好的出口企业，由于兹罗提的升值出口利润大幅下降，这些企业也逐渐消失。基于这种情势，独立的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同意或者说支持输出劳动力，即人们在国外寻找工作机会，而不是输出产品。这也使得贸易不平衡现象一直持续，同时外债的增长也到了一个危险的水平。如果兹罗提没有升值，本来可以有更多的产出和消费，创造出更多价值，人民生活水平也可以明显提高。波兰之外的国家拿走了这个国家国内生产增长的绝大部分成果。这种本质上错误的政策说明，我们缺乏使国家经济从全球化中获益的能力，媒体、伪专家以及政坛里的新自由主义派们，却将此说成是值得赞扬的事情。

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既然事情本可以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为什么没有这样？为什么最后选择的是导致不平等扩大、紧张形势加剧的道路，而不是正确的道路？如果决策正确，平衡发展的长期战略将可以达到最优化，但为什么处于决策地位的是那些不能、或者不愿意做出正确决策的人？ 回到现实而不是假设的情况，正如斯洛伐克加入欧盟后，克朗转变成欧元，2007年，兹罗提也将转变成欧元，但在此之前兹罗提为什么没有先与欧元挂钩？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事情这样发展的原因：不是因为缺乏对事物本质的科学理解，而是因为短浅思维占据主导，以及出于某些国家、阶级和利益群体的特殊利益考虑。此外，人类的愚蠢以及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是原因之一。那些对事情了如指掌的人也许不适合从政，也不适合作出决策，而那些千方百计挤进政坛的人或许对事情不甚了了，或者根本就不能做出正确决策。导致上述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特殊利益，以及缺乏提供解决国家、地区以及全球范围等各种利益冲突的最优途径的政治机制。为此，人类付出了高昂代价，目前人们只看到其中一部分，其他的代价会逐渐显现。更为可惜的是，在全球交流中某些群体被迫常常处于为此买单的地位。

如果为过去七年勾画一个更好的假想情形，即发展得更快的七年，就需要强调

提高全球宏观经济比例这一长远考虑的必要性，同时还需要开展艰难的结构改革，这些改革会侵犯到跨国企业的利润率，或者至少部分削减强大的金融投机商，如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等。换言之，改革的手将伸向那些最富有阶层的口袋，而不是像平常那样，伸向穷人的口袋。这种重新分配造成的巨大改变将改换世界经济竞争中主要受益人和次要受益人、赢家和输家组成的网络。这也许需要形成一个政治共识，但利益的冲突使得这种共识无法达成。因此，这场博弈依然按照旧有的规则进行。例如，美国不会限制国内的过度消费，而是实行偏向疲软的美元政策（因此汇率必须是流动的），以增加美国制造商品的竞争力，所付出的代价是将欧洲生产的产品挤出世界市场。结果，大西洋西海岸的美国国内产量增加得更快，失业率相对较低，而东海岸的欧洲经济活跃度不够，失业率也相对较高。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已经成功解决了许多世界范围的复杂问题，包括一些后勤方面问题。航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论“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地区的形势有多糟糕，也总有一些航班飞向那里。不论蒙古的共产主义政权怎样孤立，外国航班照样从其头顶飞过。不论2007年英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多么紧张，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每晚都会在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Imam Khomeini International Airport）降落，然后又起飞。

目前，全球正在经历着因特网的正常发展阶段。因特网的发展并非完全自发（它的发展过程中一般没有政府参与），而是由有远见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的共识支持的。此外，成千上万的用户对这些人制定的因特网标准和协议表示认可，甚至同意这些标准应用于如谷歌和雅虎这样的工具性网页。因特网的发展基于组织化和制度化，而且必须有人来完成这个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过程。因此，这一切都关系到标准化，无论是最初选择记录电视影像的最终格式，还是目前发行电子音乐的规则。目前，发生在最高技术领域的统一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关于企业商业运作间的争端（如纳普斯特音乐平台，Napster和苹果iTunes音乐播放器之间的争端）最终也会像早期影像记录系统之间的争端一样得到解决，不同的只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通过因特网进行统一化的年代。

长期以来，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使得技术和规则内部出现各种相互妥协。这也是为什么在每次飞机起飞前，我们都会听到系好安全带的提醒和怎样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氧气面罩的介绍。这些介绍通过不同的语言播放，而且，无论机组人员是哪个国

家的，无论她们是穿短裙还是戴黑色头巾。而当我们降落后，会发现每个地方的电压、插座和网络连接都与其他地方不同，但又都很容易通过使用转换器和连接器来解决这些问题。我在写本书时，多亏了信息和通讯系统的兼容性，才得以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进行写作。这是全球化的另一个成果。

在上述例子中，共同利益以及相互交流的需要如此强烈，以至于必须克服名称、技术、组织、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差异。然而，由于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当今世界及经济非常复杂，很多问题，包括一些根本性的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并不能靠自身来解决。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球范围的通力合作和集体智慧。反过来，这也需要各国和国家集团之间的协作和政策支持，以及企业和跨国公司的战略配合。同时，也需要将其他一些参与者拉进这场博弈中，尤其是一些非政府组织，由于它们是非政府的，因此还未被资本腐化。最后，还需要与“第四阶层”进行不懈的斗争（前三个阶层是指私营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第四阶层是指正迅速蔓延的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它们一直有紧密的组织，而且还采用各种不同形式，包括没有血腥的数字化形式。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将全球化视为一种当代富饶的象征未免过于理想化，然而，这正是全球化的辩护者们希望看到的[24]：冲突不再是世界秩序的主流，和平合作与更多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成为主导。这种兼容并蓄的全球化幻想几乎成为未来所有多变量情形的主要特征。这就导致了以下两种不同的路径：

第一种情况值得称颂，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设想，它强调抓住机会创造一个尽可能从每个角度看都更美好的未来。一些决定论者和理想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方式是必然的。这样的未来与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有些相似之处，乌托邦是一个没有阶级的世界，实行按需分配，或者按照理想主义的“爱的文明”的训诫进行。

第二种情况则应受到谴责，它对未来全球化的设想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屈从于这一理论的社会学的框架中。尽管这个学派的支持者对这样的全球化的未来深信不疑（他们相信自己显然不知道且不能证明的事情），其他的人则以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将其作为一种工具。也就是，他们会说谎，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提出的想法并不是真正的选择，但他们仍然推动事情往这个方向发展以实现自己对世界的设想，最重要的是这样做符合他们的利益。

考虑到世界的多样性、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与全球经济如影随形的大量利益

冲突，继续勾画乌托邦式的幻想难免有些不合时宜。虽然有些人认为这样的设想有助于激励人们去实现美好的未来，但人们更愿意在文学作品中接受它，因为作家更愿意通过用天堂般的未来激励我们，而不是用世界末日来恐吓我们。在其创作于公元前360年的著作《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柏拉图描绘了一幅理想的画面，本身就是哲学家的统治者领导着古地中海地区的城邦，他们相信真、善以及和谐社会之美。大约500年前，在1516年，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英国写下了《乌托邦》（*Utopia*），当时，人们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西班牙人正追随巴尔博亚的航行轨迹，将他们的船只停靠在巴拿马海岸，准备扬帆出海，以他们所谓的至高无上价值的名义，驶向印加人的领土，在那里他们即将摧毁一个伟大的文明。

“乌托邦”既可以理解为“美好的地方”，也可以理解为“不存在的地方”。而且，即使乌托邦里的政治既现实又务实，一切运作良好，它也不可能避开政治。因此，虽然有些人认为这种梦想中的世界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技术上都是可行的，但不幸的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它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实现。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可以并且应该继续乌托邦的梦想，就像我们应该继续试图抵达地平线一样，因为未来的进步依赖于此。

无论何时无论何处，经济进步的意义就在于它有意义。

注释：

1. 正如文森特·凯布尔在其《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1999年）所指出的。

2. 大卫·W·皮尔斯：《麻省理工学院当代经济学大词典》，麻省剑桥：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

3. 搜索关键词：“kolodko globalization”。

4. V. I.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www.marxists.org。

5. 克瓦梅·恩克鲁玛：《新殖民地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伦敦：托马斯·尼尔森和森斯出版公司，1965年。

6. 应该用“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商品和服务”。商品是以交换（出售）为目的的人力劳作的产物，既可以是产品，也可以是服务。因此“商品和服务”是一种同义反复，字面上可理解为“产品和服务以及服务”。

7.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伦敦：1848年。“共产党宣言最初在德国发表”，www.marxists.org。

8. 见费德里科·马约尔:《前面的世界: 我们正在形成的未来》, 伦敦: 塞得出版社, 2001年, 136页。

9. 托马斯·L·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 21世纪简史》, 纽约: 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克斯出版公司, 2005年。

10. 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运作、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金融全球化的益处和风险, 见《金融全球化及其对贸易、政策、劳动力和资本流的影响》, 华盛顿: 国际货币基金会, 2007年。

11. 见安德鲁和米特罗欣, 前引书。

12.《全球化、增长和贫困: 建设一个包容的世界经济》, 华盛顿: 世界银行, 2002年。

13. 对于全球化与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之间的关系, 见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世界经济和伟大的后共产主义转型》, 纽约: NOVA科学出版社, 2006年; 索尔·埃斯特里恩、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和米利卡·乌瓦里克:《转型及其他》, 纽约: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 2007年。

14. 莱斯特·C·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 当今各种经济力量如何塑造未来世界》, 纽约: 威廉·莫罗出版公司, 1996年, 115页。

15.《世界经济展望: 全球经济中的溢出效应与经济周期》, 华盛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7年, 尤其是第5章, "劳动力的全球化", 161–192页。

16.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起作用》, 纽约–伦敦: W. W. 诺顿出版有限公司, 2007年。

17. 杰弗里·弗里登:《资本主义会再次崩溃吗?》,《伯鲁盖尔随笔和讲稿丛集》, 2006年6月。

18. 约翰·曼:《发现成吉思汗: 出生、死亡与复活》, 伦敦: 班唐图书出版公司, 2007年。

19. 使用非洲法郎的有14个国家, 包括12个原法国殖民地, 以及几内亚比绍(原葡萄牙殖民地)和赤道几内亚(原西班牙殖民地)。非洲法郎区的总人口为1.2亿。非洲法郎最初与法郎保持固定比价, 后自1999年始, 与欧元保持固定比价, 即1欧元等于655.97非洲法郎。事实上, 有两种独立的法币, 贝宁、布基纳法索、几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和科特迪瓦使用西非法郎, 乍得、加蓬、赤道几内亚、喀麦隆刚果–布拉扎维以及中非共和国使用中非法郎。

20. 东加勒比元自1965年在8个东加勒比地区国家使用, 这些国家和地区人口总数为60万, 再加上安圭拉岛和蒙特塞拉特岛。东加勒比地区的英属维尔京群岛使用的是美元。1美元等于2.7东加勒比元。

21. www.ecb.int。

22. 罗伯特·A·蒙代尔:《国际经济学》, 纽约: 麦克米伦出版社, 1968年, 尤其是其中的第12章, "关于最优化货币区域的理论", 117–186页, www.columbia.edu。

23. 罗伯特·A.蒙代尔:《世界金融构架》和《欧元区及其在东欧地区的扩展》, 收录于《杰出讲座系列》, 华沙: 立昂科兹明斯基企业和管理学院, 2000年, www.tiger.edu.pl;《一个世界经济体, 一种全球货币?》, 收录于《杰出讲座系列》, 华沙: 立昂科兹明斯基企业和管理学院, 2003年, www.tiger.edu.pl。

24. 全球化的辩护者和批评者都不乏其数。辩护者包括，约翰·诺伯格《捍卫全球资本主义》（华盛顿：卡托研究所，2003年）；马丁·沃尔夫《全球化为什么可行》（纽黑文–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2003年）；贾迪什·巴格瓦蒂《为全球化辩护》（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至于批评者，可以参考威尔·赫顿和安东尼·吉登斯编《全球资本主义》（纽约：新书局出版社，2000年）；内欧米·克莱恩《没有标识：关注小品牌》（伦敦：哈珀科林斯出版公司，2001年）；曼弗雷德·B·斯蒂格《全球主义：新市场意识形态》（拉纳姆、博尔德、纽约和牛津：罗曼里特尔菲尔德出版公司，2002年）；以及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极其不满》。在这些争论中，也有波兰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的声音。目前也有很多作品参与到这场辩论中，其中一些以波兰语出版，另一些则以英语出版，包括《新兴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英国奥尔德肖特和伯灵顿弗蒙特：阿什盖特，2003年），关注的是全球化的积极方面，以及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的《全球化及社会压力》（纽约：NOVA科学出版社，2005年），该书分析的是全球化的消极方面。

第五章　世界是怎样的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人们该如何生活

虽然没有可以抵达理想世界的路径，但我们仍要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那么，我们这个精彩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呢？在一本古老的波兰字典中，“马”的定义是：“每个人都能看到它的样子。”这是普通人看事物的出发点，对于人们来说找到恰当的措辞并不简单。这种用“眼见”描述事物的方式对另一些人也大有作用。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堪称德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物，他是能画出自己眼见事物的绘画大师（虽然丢勒本人从未见过犀牛，但他画的《犀牛》成为不朽之作，一直到1939年该画还被用作动物学教学的演示图）[1]。4个世纪之后，帕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以这些大师为榜样。他说他不是画自己见到的，而是画自己知道的。然而，每个人知道的事情都各不相同。至少在艺术领域，这就是事情发展的方式，艺术有权展示自己想展示的世界。

科学的情况又怎样呢？科学有表现、反映和解读世界的义务。它必须客观地反映世界，但又不能像镜子一样机械地反映。即使是最好的镜子，它反映的世界虽然不是扭曲的，也一定是倒置的，更不用说镜面不平的镜子了。原物在镜子里的映像

是左右倒置的，而最近几年，现实中这种左右倒置的现象也逐渐增多。科学必须精确地，而不是错误地或有偏见地解读事物，因为知识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起作用。

看明白事情的真相并非易事。而要形成一种理论，知道事情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更不容易。那么，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虽然不可能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但可以指出其中突出的几点，当然不是像艺术领域印象派的描绘手法，而是用科学范畴里一种系统的方式指出。然而，即使用这种方法，也多少有些像绘画：我们描述出的其实不等于所见到的，理论的背后有我们个人的观点。描述人人都可以看到的事物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转型时期。在欧洲，“转型”这个词一般使用在某个体系处在一种复杂的、有着质的动态变化的背景下。在我的那些涉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或者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的作品中，我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使用这个词的。然而，如果我们从一个最广阔的或者全球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伟大转型的时期，其中也包括经济规则。

时间在现代世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奇怪的是，这些印记似乎与过去的年代遥相呼应：20世纪50年代见证了西欧的经济奇迹和斯大林主义的衰落；60年代则经历了殖民主义的一落千丈和反帝国主义情绪的日益激化；消费主义的膨胀和社会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则成为70年代的特征；其后的80年代见证了冷战的升级以及西方世界逐渐明显占据上风。接着是90年代，这段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后社会主义的转型和以全面的数字化为特点的“新经济”的兴起。我们现在正身处其中的这十年，则是全球化兴起和国际恐怖主义蔓延的时期。下一个十年，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从人口和经济角度看）将成为主要特征。21世纪的30年代或许会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不能排除一场巨大的全球性危机会为经济的无限扩张泼一盆冷水，并将迫使目前全球经济中不受限制的供需流趋向平衡。于是，21世纪40年代将会建成一个崭新的、合理的全球机制，从而实现相对和谐的发展。21世纪50年代的特征又将是什么？

在现实层面，经济将发生本质性的转变，包括资源的流动、积累和分配以及生产技术的应用等。在规则方面，或经济运行方式、运行所遵循的原理方面也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而政治则充分利用这些变化，并且通过经济对历史过程或至少是某

些重要进程的反馈效应，积极地适应这些变化。文化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和进行政治活动的方式。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正在经历着巨大转型，这三个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对象。

经济学应尽可能地感知、理解和描述这些变化，并且尽可能地为企业和政治家提出一条较为明智的道路，以使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当然，经济学不可能感知和把握一切事物。它只能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事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同样的事物从不同学科的角度看都会有所不同，有些角度观察的结果难免会被忽略，有一些观点则并非每个人都可以理解。这就是我们不能理解别人为什么以某种方式做某些事情的原因。有一次，我应邀去洛杉矶做讲座，在英国航空公司华沙办公室预订机票时，我和那位迷人但看起来不大高兴的售票员打招呼，问她最近怎样。“很糟糕，”她回答。为了让她振奋一点，我告诉她，还好她不是处在政治圈里，因为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当然有，”她说。我很好奇，问她那到底是什么，她只回答了一个词：“男人！”

就像男人有时不能感知女人观察到的事物一样，经济学家有时也会忽视别的学者注意到的事情。然而，我们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命运一定略知一二，也了解不同条件的综合作用怎样影响不同经济时期的停滞与发展，经济学家、尤其是有着跨学科背景的经济学家也一定更加容易看穿事物。现代世界有许多不同的维度，要概括其特点非常困难。我们可以将其基本特点归结为，一方面相互区别，另一方面相互依赖。我们可以首先考虑它们的不同之处，因为它对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对我们而言，未来比过去更有趣，因为对过去我们已经有所了解。

当我们比较不同地区的人以及社会的富裕程度时，差别最为明显。或者准确地说，我们比较一部分人的富有与另一部分人的穷困时，很容易看到区别。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类的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约为67万亿美元。因为世界人口为67亿，这就很容易得出人均的水平为每年1万美元。应该补充的是，这里所说的是收入，因此会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在国际比较中，这种收入变化一般按年来划分，虽然有时这样算会有些误导。

2006年，爱尔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4,500美元，超过美国的44,000美元。此前几年，爱尔兰就已超过英国（根据2006年的数据，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1,800美元），爱尔兰人大肆庆祝，其热情程度超过赢得足球比赛。然而，只要从都柏林

飞到伦敦或纽约，哪座城市更富裕就一目了然了。毕竟，生活水平不能仅仅看收入流，还要看消费品的累积程度。一些人虽然已经挣了很多钱，但仍然住老旧的房子，开不是很好的车或穿得还很糟糕。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正确解读有关收入（以及其他区别因素）的统计数据，这样才能得出与实际不会相差太远的结论。2007年，赤道几内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5,000美元，成为世界人均收入第二高的国家。这个数据是阿根廷或匈牙利的3倍，但反过来，后两个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却是赤道几内亚的3倍多。然而，如果这个人均收入比例像这样维持几十年，那么人均收入始终较高的国家的积累就会超过那些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的国家。因此，在比较人均收入，尤其是国内生产总值时，最好从一段更长的时间范围来看，与过去相比较，同时设想一下未来的情形。

人均收入反映了国与国之间巨大的差距。如果我们选取两个极端情况，把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卢森堡，71,400美元）和最贫穷国家的（索马里，500美元）放到显微镜下，那么这两个数据的比例是120:1。如果将最富裕的1%的美国人的平均收入（美国有3亿人，人均年收入为700,000美元）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最贫困的1%的居民的平均收入相比较，这个比例是5000:1。按照刚果民主共和国人均寿命为57年计算，在美国生活4天的花费足够在刚果生活一辈子。这种巨大的差距是历史的产物。要知道，5个世纪以前，美国和非洲都同样贫穷。然而今天，美国的人均收入是整个非洲大陆人均收入的20倍。

东亚和亚撒哈拉地区日益增大的生活水平差距则出现在最近约两代人的时间里。在东亚地区（显然包括中国），自1960年以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4倍，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然而在亚撒哈拉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25%，如果平均到每一年则增长近乎为零。40多年前，韩国和台湾地区与肯尼亚和加纳几乎一样贫穷，这两个非洲国家至今仍像当年一样贫困。现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25,000美元和30,000美元，肯尼亚和加纳则分别为1,200美元和2,700美元。1960年时，从经济角度而言，这四个国家和地区都一样穷困不堪。类似的对比还可见于现在仍非常贫困的喀麦隆和发展迅速的马来西亚之间。在过去40年中，马来西亚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十年翻一番，目前，马来西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市场汇率计算是5,8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13,700美元。1960年时，这两个国家起始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差无几（按市场汇率计算，喀麦隆为500美元，马来西

亚为700美元），现在，这个数据在喀麦隆变化不大，按市场汇率计算大约为92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2,400美元。更糟糕的是，在过去20年中，喀麦隆的实际收入水平也下降了，类似的情形并不少见，尤其是在非洲。

上述事例反映了一枚硬币的两面：停滞和发展。有些国家的发展受到阻碍或限制，而另一些国家则跨越式前进，于是国家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但我们不能把不同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看成是坏事，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高速发展源自节俭和进取精神，以及明智的政策和有效的策略。对于那些没能高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只能在深表遗憾的同时思考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国际贸易在推动发展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一个国家通过把自己境内生产的产品销往国外，扩大了自己的生产规模。这不仅刺激了销售额增长，也降低了单位成本。于是，利润也随之增长，增长的利润反过来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更多的人可以就业，纳税的人数也可以增加，国家的各项计划就会有更多资金。于是，国家机器开始向前运转。那些有能力出口的企业同时也具备发展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30年间，东南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地区缺乏发展的动力，如非洲、中亚地区以及目前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同时也是为什么过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逐渐被侵蚀的根本原因。

在过去短短几十年中，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为“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国家（即那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高度发达的成员国之外的国家），以及已经“兴起”的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占了国际经济贸易总额的1/3。十年前，这个数据是现在的一半，约17.3%。其中，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所占比重从1996年的13%下降为目前的不到10%。贸易扩张拉动了那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这些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从1996年的39.2%跃升为2006年的48%。2008年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较贫穷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赶上了那些富裕国家，当然，目前还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不是人均值。尽管如此，这已经标志着一个新的世界的到来。

当然，上述均为平均水平。这些数据会掩盖前所未有的成功，但也会隐藏一些悲惨的失败，例如衰退、萧条以及停滞等等许多真实的痛楚。当我们回顾过去的几十年，大部分的长期停滞都要归因于以下四个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首先是战争和武装冲突，处于贫困中的人们大约有3/4生活在一些仍然陷入战乱的国家，如刚果民

主共和国、巴勒斯坦、柬埔寨或危地马拉。其次，对于经济停滞的国家来说，不能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重要原因，如尼日利亚、苏丹、利比里亚或玻利维亚。第三，一些国家不能突破自身非常不利的地缘政治位置、地理因素以及糟糕的邻国等构成的恶性循环，如乍得、尼日尔、亚美尼亚或尼泊尔。第四，也是最后一个因素，它的影响力是最大的，这就是混乱的管理和错误的宏观经济调控。

当以上几个因素重叠时，我们看到的就不只是停滞，而是国民经济的显著衰退。

不幸不仅常常成双成对地出现，有时还蜂拥而至。一般情况下，在那些基础设施薄弱、缺乏充足的物质和经济资源的国家，遭遇自然灾害时会比发达国家遭受更严重的损失，就仿佛它们还不够穷困与悲惨似的。例如，日本和巴基斯坦遭遇相同等级的地震，这两个国家的伤亡人数和损失程度绝对不一样。同样，一场发生在捷克共和国的洪水和发生在孟加拉国的洪水也会造成不一样的结果，甚至洪水的规模都不一样。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旱灾和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的旱灾也不一样。当自然灾害足够严重时，它们会对发达国家的一些地区造成巨大破坏，但对于较小的国家而言，它们甚至会被击垮，生产水平倒退。当几年后，它们的生产恢复到原来水平时，这一段时间的增长率近乎为零。1992年，飓风“安德鲁”使美国损失了0.5%的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飓风“吉尔伯特”使牙买加损失了28%的国内生产总值，这场风暴使得该国从1990到2001年这1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0.5%。

收入差距及其后果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在不同国家、地区或城市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些差别。在里约热内卢，那条穿过富裕的加维亚（Gávea）区和贫民窟罗辛哈（favela of Rocinha）的街道就像两个不同世界的边界一样。与邻近的贫民窟相比，加维亚的平均收入是其17倍，失业率为其1/9，这也使得加维亚的人均寿命比毗邻的贫民窟多13年。这样不协调的比例在世界其他一些大都会同样可以看到，如墨尔本、香港、约翰内斯堡、罗马和芝加哥等。然而，在其他一些相对贫穷的国家，由于整体发展水平较低，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对于这样不协调的对比似乎已经无动于衷了。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一种普遍用于衡量收入差距的方式，它也可以用来衡量财富（资产）的不均衡分布。基尼系数以意大利人口统计学家、经济学家科拉多·基尼（Corrido Gini）的名字命名，他于1929年提出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按从0

（绝对平均）到1（完全不平均）表示，与其相关的还有基尼指数（Gini index），它通过基尼系数乘以100得到。因此，衡量收入差距就有两种表示方式，以波兰为例，其基尼系数和基尼指数分别为0.341和34.1（这是目前以家庭为单位估算的最新数据，2002年）。

基尼系数的计算和解读依赖于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此曲线表明了收入分配的累积分配功能。它以图形的形式表示每个百分比中的家庭及其对应的收入百分比。如果收入分配完全平等，洛伦兹曲线就表现为与水平方向轴成45°角的一条直线。这代表着平均主义，表示每个人分得的财富完全相同，每1%的人也得到总财富的1%，这是完全平均。另一种极端情况是，收入分配完全不平均，洛伦兹曲线成为沿着水平轴和竖直轴方向走的一条折线。这种情况意味着所有财富归一个人所有。

现实情况介于这两种极端情形之间。这就意味着洛伦兹曲线与45°直线总保持一个凹面。于是，这条直线和曲线就形成一个弓的形状——一个拉紧的弓弦和一个弯曲的弓柄。弯曲的弧度越大，介于洛伦兹曲线和45°直线之间的面积就越大。基尼系数就是这片区域的面积和由45°直线与绝对不平均时的折线构成的三角形面积的比例。因此，从理论上说，基尼系数必须介于0（绝对平均）和1（完全不平均）之间。在现实中，基尼系数一般介于0.2至0.7之间。

这里我无意把事情弄得很复杂，而是尽量想解释清楚，尽管如此，很难想象略去一些方法上的解释能把问题说清楚。这样大费周章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基尼系数常常被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有时是无意为之，有时则是出于政治考虑——这取决于某些人想要证明的是什么，是进步还是倒退。这就为随意解释留下了很大余地，不像那些更为“硬性”的数据，如通货膨胀率或失业率等。

有关基尼系数的第一种评论，与数据体现经济现象时往往有一段时间的延迟相关。有时，一些指数反映的是几年前的情况，甚至是10多年前的情况。这一点必须时刻记住，尽管现实中短期的变化一般都很小。问题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般的时代吗？对于那些处于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的国家而言，显然不是，这些国家正在经历收入分配的结构性改革。从1992年到2007年间，瑞典或比利时的基尼系数变化或许微不足道，但是在哈萨克斯坦和塞尔维亚，这个变化是非常巨大的。

第二种评论则涉及那些被基尼系数隐藏了的收入种类。上述波兰的基尼系数是通过国家统计办公室定期对每个家庭预算的随机调查得到的结果。除非这个系数只

是反映工资和薪水的差别，否则2004年的数据和2002年应有所不同，为0.345。虽然这两个数据差距很小，但是某个细心的观察员会据此"推断出"经济形势变得更糟（或更好，这取决于他们愿意看到的结果）。

第三种评论是，虽然基尼系数反映了收入差距，但却没有反映财富差距。将其简化，可以理解为，后者是前者长期积累的结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前者储存下来的部分。理论上说，的确如此，除非有其他的收入统计遗失。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收入分配相对平均的国家，也会存在大量财富聚集在少部分人手中的情况。例如，瑞典的基尼系数只有0.25（2000年），但据估计，该国最富裕的5%的人口控制了至少77%的财富。瑞典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大多数国家则没有可以比较的数据。

第四种评论是涉及对数据准确度的质疑。基于工资或薪水收入的道德基尼系数差别微小也许说明这个数据不够精确。这是因为"收入"的种类还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如资本收益和分红、残疾抚恤和津贴补助、一些国内生产总值未包括在内的活动的收入以及从国外转移的资金等。如果基尼系数的计算也将这些考虑进去，则会有很大的差别。

第五种评论关注的是计算基尼系数的机构。一般情况下，不同机构得出的结果相差不多或完全一致，因为它们基于同样的数据。这些系数一般都是每个国家的统计部门或一些值得信赖的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或者世界银行得出的。然而，有些差别如果没有细致的分析就很难解释。以亚美尼亚为例，联合国的数据是0.338，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数据是0.413。虽然联合国的数据是2003年的，而中情局的数据是2004年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在这样一段很短的时间内，也可以发生许多重大事件。

第六种评论虽然显而易见，但也有必要在此指出。基尼系数还与支出或收入的比例相关。以收入为例，既可以指现金形式的收入，还必须将以不同形式得到的商品和服务计算在内，如免费的医疗、保健或教育等。在这种情况下，基尼系数就会忽视掉一些重要方面，不仅包括消费，还包括一些重要服务的获得。

既然我们所要讨论的是整个世界的情况，暂不关注反映国内收入分配的统计数据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然而，很快转到别的话题也许会犯下一些错误，因为差异是世界全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地区来看，各地基尼系数有着很大的差别，从欧洲的0.25到南亚的0.33，再到拉丁美洲的0.57以及亚撒哈拉地区的0.7。自然，在这些大

的框架下，各个国家之间还有很大差别。我们可以将这些国家划分为三组来进行讨论：

第一组是不均衡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包括一些有着先进市场和积极政府的富裕国家以及一些后社会主义国家。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低的10个国家是阿塞拜疆（基尼系数为0.19）、丹麦（0.247）、日本（0.249）、瑞典（0.25）、捷克共和国（0.254）、挪威和斯洛伐克（0.258）、乌兹别克斯坦（0.268）、芬兰（0.269）和乌克兰（0.281）。德国（0.283）以及大部分欧洲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与上述国家相差不多。

第二组则是另一个极端，由世界上一些非常贫穷的国家组成，有些甚至是最贫穷的国家。其中，大部分是非洲国家，尽管还包括三个拉丁美洲国家和一个加勒比地区的国家。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包括纳米比亚（0.743）和与之相邻的博茨瓦纳（0.63），虽然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盛产石油的赤道几内亚和南非之后，分列非洲大陆的第三和第四位，分别是13,300美元和7,600美元。在这些地区，白人精英阶层拥有那些占世界总产出25%的利润丰厚的农场和钻石矿，而大部分居民则生活在喀拉哈里沙漠。莱索托（0.632）的基尼系数略高于博茨瓦纳，属于这一群体的国家还包括塞拉利昂（0.629）、中非共和国（0.613）、斯威士兰（0.609）、玻利维亚（0.601）、海地（0.592）、哥伦比亚（0.586）和巴拉圭（0.578）。

第三组国家包括七国集团中剩下的5个成员国，以及其他可以称为“另一七国集团”的7个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其资源、人口和军事潜力，在世界上有着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这组国家中，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08，意大利和英国为0.306，法国和加拿大为0.327，巴西为0.567，中国为0.447，尼日利亚为0.437，俄罗斯为0.399，印度为0.325，印度尼西亚为0.343，巴基斯坦为0.306。

考察收入分配比例的另一种方法是衡量特定组群人口的平均收入比率，从收入最高向收入最低排列。例如，可以通过将收入最低的1%的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平均收入相比，或者将收入较低的50%的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较高的50%的人口的平均收入相比。在比较统计学中，常常用到两个指标，十分位比率（指的是10%收入最高阶层与10%收入最低阶层的收入比）或五分位比率（20%收入最高阶层与20%收入最低阶层的收入比）。

在世界上、在我们各自的国内、在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属于某个十分位的组群。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属于哪个十分位，因为他们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然而，花时间弄清楚这个问题很有必要。正如前文所述，2007年，世界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0,000美元。我们可以知道自己与这个数据的关系，同时要记住，这不是一个按现金收入得出的数据，而是我们每个人所占有的国内生产总值数。当我们计算每个百分点群组的收入时，这个数据的累加就会使得事情更加复杂。

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十分位比率是怎样的呢？以十分位比率为基础画的图形与以基尼系数为基础画的图形会相似吗？当然会。欧洲和亚洲的不均衡情况会相对较少，非洲和拉丁美洲则相对较多。只有埃塞俄比亚不同，进入了世界上十分位比率最低的20个国家，除此之外，其他全是欧洲和亚洲国家。埃塞俄比亚的十分位比率是6.5（最富裕的10%人口收入占该国总收入的25.5%，而最贫穷的10%人口收入所占比例为3.9%）。这个令人奇怪的例外是该国仿社会主义的得尔格军事集团（Derg）的产物，该集团在1974年至1987年间推行了一种极端的平均主义政策。

不幸的是，其他大部分非洲国家则处在另一个极端，拉丁美洲的情况在用十分位比率衡量时，比用基尼系数衡量时还要糟糕。世界上十分位比率最高的20个国家中超过13个是拉丁美洲国家。不均衡比率最高的10个国家是玻利维亚（157.3）、纳米比亚（129）、莱索托（96.6）、博茨瓦纳（80.9）、巴拉圭（75.7）、中非共和国（68.1）、海地（68.1）、哥伦比亚（67.0）、巴西（57.3）和萨尔瓦多（55.4）。

平均主义的趋势主要见于后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市场发达的经济体中，这与用基尼系数衡量时的情形一样，孟加拉国（6.8）和巴基斯坦（6.6）属于例外情况。十分位比率低于或等于6的10个国家是：挪威（6.0）、斯洛文尼亚（5.9）、乌克兰（5.9）、阿尔巴尼亚（5.9）、芬兰（5.7）、匈牙利（5.6）、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5.5）、捷克共和国（5.2）、日本（4.5）和阿塞拜疆（3.3）。其中，高度发达的日本同时也是收入分配明显比较均衡的国家，这主要得益于其文化环境和长期的经济政策，该政策将平衡分配视为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工具。阿塞拜疆归于这个阵营也颇让人意外，这主要是其国内体系的支撑、文化结构以及自然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特殊组合的结果。这个有着后社会主义转型经济的后苏联共和国同时也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它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让我们来想想这些极端情况的内在含义。在阿塞拜疆，最富裕的10%人口获得整个国家收入的18%，最贫困的10%人口获得5.4%；在玻利维亚，最富裕的10%人口获得整个国家收入的47.2%，而处在社会和经济最底层的10%人口仅获得0.4%。也许有人会说，这两个极端说明的只是整个人口中不具代表性的一小部分人口，玻利维亚最贫困的10%人口仅为91万人。问题是，如果扩大到全球范围，这个几十万就会变成几百万、几千万。世界上约有13亿人口每天仅靠不到1美元维生。

智利一家名为"拉丁美洲晴雨表"（Latinobarometro）的民调组织定期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社会的忍耐限度正在显著缩小。从南美洲的整体情况来看，人们对失业和贫困的担忧程度远胜于对恐怖主义的担忧。最近，调查者中有71%的人认为，他们国家的管理者仅保障了一小部分强势阶层的利益，而不是广大人民的利益。出现这种结果，原因在于收入不均衡而不在于收入水平绝对低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拉丁美洲国家民主选举都投左翼政党和领袖的票，包括在最贫困的玻利维亚，也是左派的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当选总统。很多人惊讶于在这么长时间以后，收入不均衡的后果才得以体现，而在其他一些国家甚至还没有体现。

姑且不谈如此巨大的不均衡会造成什么政治和伦理的后果，这种不均毫无疑问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危害。贫穷不会造成如此明显的收入差距，而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则会造成贫穷。至于是否存在一个不公平的限度，高于这个限度经济增长会放缓（或反之，低于这个限度经济增长会加速），则没有一个简单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而且，经济的增长或放缓还取决于历史与文化的因素。有一些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35经济就开始放缓，但在另外一些国家这个系数达到0.45，经济才受到影响。没有一个必须遵守的界限，关键是看不均衡是否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凝聚力，因为只有这种凝聚力才是推动或阻碍发展趋势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在欧盟的发展战略中，凝聚力必不可少，而事实的确如此。

波兰的收入差距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属于基本能忍受的范围。十分位比率是8.8（五分位比率是5.6）。也就是说，最富有的10%人口获得总收入的27%，最贫困的10%获得3.1%。按五分位率的情况来说，这两个数据分别是42.2%和7.5%。如在2007年，波兰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14万亿兹罗提，它的27%就是4220亿。10%的波兰人口约有380万。这就是说最富有的10%波兰人每年挣得81,000兹罗提，或每月挣得6,750兹罗提。以一个四口之家为例，每月则挣得27,000兹罗提。同时，处在另一个极

端的380万波兰人，每人年收入仅为9,200兹罗提，每月仅为770兹罗提。

从世界范围看，波兰的收入差距处于中间水平。当然，与10年或20年前相比，不均衡程度有了很大增加。同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波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尽管在最近的十年里，这种重组或进化的程度稍显缓慢，规模也略有缩小，但这个过程仍然在继续。

* * *

现在，我们可以在全世界范围而不是某些国家内部来考察收入不平衡。这里会遇到许多方法论上的问题，我们应该仅选取其中最重要的几种方法。分析不均衡现象有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可以比较每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将此作为基尼系数的基础。而第二种，则是将全世界人口视为一个群体，即当成一个世界经济体的总人口，而不是许多国家经济体人口的总和，计算整个群体的基尼系数。显然，这两种方式得出的结果不会相同，而且，有时差别还很巨大。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些看似矛盾的结论，即有人说世界的人均收入差距缩小，有人又说是增大。

对此，我们应该有明确的解释说明。假设，世界不是由200多个而是两个国家组成：南国和北国，每个国家的人口数为2。于是，全球人口数为4。我们再来比较他们的收入差距，南国两个人的收入分别是3和7，北国两人分别是4和6。那么整个世界不均衡的程度怎样呢？如果用第一种方法，先计算两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如果两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均为10，那么两个国家的平均人均收入都是5。世界上国与国之间没有收入差距，两个国家之间只有绝对的平均。世界基尼系数为0。然而，两个国家内部确实存在收入差距。在南国，富有的那50%的人口人均收入与贫穷的50%相比为2.33（即7比3），北国仅为1.5（6比4）。现在，再来看一下全球人口的基尼系数，总的国内生产总值分解成3、4、6、7，于是基尼系数为0.175。因此，不均衡现象确实存在。这个世界的收入并非绝对公平。那么，这两个结果哪个正确呢？两个都正确。而依据现实世界的数据得出的结果也一样。

现在，假设这两个国家的收入差距都发生了变化，都朝着差距扩大的方向发展。在南国，收入分配是1和9，而北国则是2和8。如果比较这两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则仍然都是5，这样看来，世界上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但如果按照之前的方

式，将世界人口视为一个整体，总收入分配为1、2、8、9，那么基尼系数就会跃升到0.375。前一时期的分配不均衡现象到这个时期更加严重了。那么，哪种结果正确呢？同样，还是两个都正确。

因此，在考察统计数据时，不仅要知道该怎样使用它们，还需要知道我们所考察的是什么。拥有一种自己的理论很有必要。

按照每个国家平均收入水平的国与国之间的比较计算得出的世界基尼系数（根据可获得数据的156个国家计算，涉及96%的世界人口），2000年为0.549，2001年为0.5453。而按照第二种方法计算，即不仅仅考虑国与国之间而且还要考虑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2005年世界基尼系数为0.619（按照可获得的126个国家的数据计算，涉及93%的世界人口）。

上述两个指标中，后一个可以按照每十年一个阶段的划分进行比较。1980、1990、2000年世界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667、0.650和0.627。而2005年的数据证实了在刚过去的1/4个世纪中，收入差距有所下降。此外，最近10年以来的短期数据显示，收入差距在持续下降。这也证明了一个假设，即全球的收入差距更多地是源自各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2]。

显然，如果涵盖的人口越多，这两种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差别就会越大。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比较的不是各国的平均水平，而是国家内部的分配，包括它们中的极端情况。世界总人口中最上层的十分位包含的是最富裕的10%人口，而下层的十分位包含的是最贫穷的10%人口。按照这种方式计算的十分位比率超过61.4不足为奇，而如果按照各个国家的平均水平计算，这个数值仅为34.3。需要补充的是，你如果要把某个国家的水平与整个世界水平相比，应该使用第一个，即更高的数据。这意味着全世界的收入分配差距水平更接近于亚撒哈拉地区，而不是欧洲。

当使用比较国与国平均收入水平的方法时，我们可以看到，2005年，世界上较富裕的50%人口的收入是较贫穷的50%人口的4.97倍。也就是说，在我们周围，5个最富裕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5个最贫穷家庭平均收入的4.97倍。然而，如果将人类当成一个整体计算，得到的十分位比率是8.63（也就是我们周围最富裕的20个人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20个人平均收入的8.63倍）。

在使用五分位率的情况下，按照国与国平均收入的方法得到的数据是16.39，而

将人类当成一个整体得到的是29.95（即相当于我们周围最富裕的两个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两个家庭的16.39倍，而最富裕的8个人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8个人平均收入的29.95倍）。有人会说，那么最富裕的1%人口与最贫穷的1%人口的平均收入差距应该更大。如果比较国与国中那部分特定人口的平均收入，世界上最富裕的1%人口的收入是最贫穷的1%人口的60.6倍，而如果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这个数据将跃升到443倍。

这些枯燥的数字指标背后是活生生的人以及他们不同的命运。世界上222个国家和地区中，有61个国家的人民人均寿命低于65岁。在发达国家，这只是退休年龄，而那些达到退休年龄的人们，一般还会再活20多年。在这61个国家中，有些国家15岁以上的人口中，23%的妇女（7.6亿）和18%的男性（6亿）不会读书和写字。在尼日尔，在其首都之外的地区，有93%的妇女是文盲。在柬埔寨，80%的人喝不到自来水。在乌干达，只有5%的人能享受生活用电。这些地方的确充满辛酸。

近年来，物质和生活条件之间的差距又拓展到了另一个新领域，即所谓的“数字鸿沟”。这是国家、地区或社会群体之间是否拥有电脑硬件、软件以及是否有因特网覆盖的差别。数字鸿沟之深令人震惊，而且，它在某些方面与收入差距相呼应。2006年，超过10亿的人可以使用因特网。这与15年前，几乎没有人上网的情况相比，的确是文明的一个巨大飞跃。虽然北美有70%的人可以上网，但是在亚洲可上网的人仅有11%，而非洲则不到4%。

每年冬天，商界精英、政治家、学者和舆论制造者们都会在达沃斯聚会，这就是颇具影响力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它推出了一套“网络就绪指数”（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NRI），用于衡量一个国家利用信息和通讯技术所带来的机遇来推动经济发展及提高竞争力的可能性。“网络就绪指数”主要有三个方面，并可以扩充为六点：

——某个国家或地区（国家、省、区、州、镇、社区等）信息科技的总体宏观经济环境、监管和基础设施；

——（个人、家庭、企业、组织、地方和国家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对使用信息科技，并从中受益的准备就绪程度；

——（个人、家庭、企业、组织、地方和国家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实际使用最新信息科技的情况。

北欧和英语国家在这个指数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其中，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丹麦（5.71）、瑞典（5.66）、新加坡（5.6）、芬兰（5.59）、瑞士（5.58）、荷兰（5.54）、美国（5.54）、冰岛（5.50）、英国（5.45）和挪威（5.42）。波兰排名58位（3.69），次于约旦（3.74）而先于中国（3.68）。在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中，最先进的是爱沙尼亚，排名20位（5.02），最落后的是阿尔巴尼亚，排名107位（2.87）。

而在排名榜上靠后的大多是非洲国家，偶尔有一两个亚洲和南美洲国家。喀麦隆（2.74）排名117位，紧随其后的是巴拉圭（2.69）、莫桑比克（2.64）、莱索托（2.61）、津巴布韦（2.6）、孟加拉国（2.55）、埃塞俄比亚（2.55）、安哥拉（2.42）、布隆迪（2.40）和乍得（2.16）。

这么低的"网络就绪指数"意味着什么？我曾到过上述大部分国家，也知道在那些地方，你可以找到有网络覆盖的咖啡馆、有电话线连接且每天有几小时供电的地方，你也可以收发邮件，但仅此而已。在许多办公场所和大学里，很难方便地使用因特网，或者因为硬件不好、或者连接缓慢、或者带宽太窄。如果你恰好有一台在坦噶尼喀湖岸的布琼布拉买的笔记本电脑，那么它和在密歇根湖岸边看到的笔记本电脑绝对不一样。由于这些地方网络覆盖率很低，所以很少有电脑能上网，但它们仍然是电脑。图书馆缺少正规的笔记本电脑，但你仍然可以尝试着找到网络接口；这里没有铺好的人行横道，但是有无线电话；没有可以吃的东西，但有很多风景。这里呈现出一种发展的迹象。当那些发达国家处在如此低的发展水平时，还没有使用电脑，因为那时电脑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即使那些今天已经达到世界平均发展水平的国家，几年前它们的"网络就绪指数"甚至低于今天的乍得。国与国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的差距可以以世纪为单位来衡量，但对于"网络就绪指数"而言，只能以几年为单位来衡量。这对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长期以来，令政治家、专家、分析师和记者们一遍又一遍地为之感到悲哀的是世界上有1/5的人口每天靠不到1美元维生的事实，然而，这只是传统上划分赤贫的界限。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里有一半人口，即26亿人每天靠不到2美元为生，这被视为划分贫困的界限。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机构不断地通过数据和解析向我们灌输这个话题。2004年，按照这个过于简单的、媒体友好型的指标

来衡量时，生活在每天1美元线下的人口首次低于10亿，减少到9.86亿。为此，世界银行大肆宣传这个数据，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里，只有18.4%的人生活在这个指标线以下。

于是，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以及发展经济学家联盟都积极地表示，这是他们的帮助和建议被听进去了的结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应该把所有的感激都献给中国及其所遵循的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正是中国拒绝听从新自由主义的建议，创造了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纽约和日内瓦的专家们都刮目相看的成就。从1990年到2004年的15年间，中国每月靠不到30美元为生（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口数从3.74亿下降到了1.28亿，即从总人口的33%下降为9.9%。而且，这个数据还在持续下降。相反，在亚撒哈拉地区，这个数据仅从45.7%下降到41.1%，从绝对数量来说，从2.4亿人上升到了2.98亿人。1990年，中国赤贫人口是亚撒哈拉地区的1.5倍，现在则变成了它的1/3。

在一些豪华宾馆或度假胜地召开的会议上总能听到关于每天靠1美元生活会有多艰难的抱怨，类似的抱怨也能在一些花大价钱接受商业课程训练的人中听到，或出自那些政府、地区发展银行、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的顾问和专家口中。这些人常常筋疲力尽地从西方发达的大都会飞到贫穷国家。在这些地方，他们住在最奢侈的酒店，每天领着100到200美元的艰苦工作地点津贴，每天还能够收入500至1000美元，这是专家咨询费，但其中大部分会被挥霍或白白浪费。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政治峰会上、在有着空调的办公室或机关里，或者是学术会议上，有些人悲痛地扭绞着双手。我们常常一边阅读报纸上或电视里那些配有令人揪心画面的关于人们凄惨命运的评论，一边穿着舒适的拖鞋、坐在舒适的椅子上。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地为这些情形困扰。不仅很少有大众这样，就是那些高谈阔论的领导人或描写每天不到1美元的凄惨生活的专栏作家也很少为之烦恼。每天不到1美元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这取决于生活在哪里而不是过哪种生活。如果是生活在拉丁美洲、亚洲或非洲大城市里的贫民窟，那么这里到处都很嘈杂、肮脏、令人窒息和常常面临危险；如果是生活在农村，那么在这些靠天吃饭靠土地谋生的地方，区别非常大。贫民窟的居民大多一辈子生活在原地，偶尔有人能到市区找份临时的工作，挣点微薄的薪水。而在乡村或森林里，人们有时会捕捉到某种猎物，但这种情形不会经常发生。

广大的乡村地区很少有学校或医务人员，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污水，既没有电也没有什么电器。许多人挨饿、生病，这种情形比在贫民窟还要多，他们的生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和自然。尤其是在一些乡村地区，这两个因素常常比金钱还能决定人们的生存。那里很少有现金，因为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主要交易常常还以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

世界变得越来越拥挤，最贫穷的地区尤为如此。100年前，7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贫穷国家，大约有10亿人。今天，差不多数量的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下，而大约80%的世界人口（53亿人）生活在贫穷国家。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虽然目前世界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数量相等。生活在最糟糕环境中的，是那些生活在过度拥挤和肮脏的城市中的人们。那里没有必要的基础设施、环境污染严重，有着极高的失业率和犯罪率。大部分年轻人想从那些地方逃离或移民。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样的环境无法长期生存。然而，很少有人能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或许逃出去，或许就死在那里。

那些没有死去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生存下来。不同的方式包括从凄苦和贫困到中产阶级的生活再到相对富裕和极度富裕。一方面有人在生死线上挣扎，另一方面有人享受着非常富足的生活。不幸的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同样，每天也有人在想着怎样挥霍或投资他们的金钱。不幸的是，前者数量总是大大超过后者。还有少数一些人，他们每天的生活是从一个项目到另一个项目、或者一笔交易接着另一笔交易、或者从一个大型政治聚会到另一个社交盛会，而另外大部分人则过着普通的白天黑夜交替的生活。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每天的收入是一笔接着另一笔。

尼日尔的面积与德克萨斯州差不多，是波兰面积的4倍。它的领土一部分位于撒哈拉沙漠，一部分位于西非的荒漠草原，南部是相对肥沃的土地。尼日尔有1300万人口，其最贫穷的10%人口平均收入为10,700非洲法郎，按官方汇率计算，人均约为22美元，或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约为76美元。处于这个收入水平的100万人口中，有8名桑尼·巴尔（Sani Barre）家族的成员。他们一家一年的总收入和辛勤劳作，相当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600美元。他们谁都不会明白这个概念，弄明白又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这个数据只意味着86,000非洲法郎或每个家庭每天约235非洲法郎。但他们很少看见现金，因为这个村子主要以自然经济为主。然而，最近这里货物和

金钱的流动较为频繁了。全球化的浪潮已经抵达这里，远隔千里的需求也体现在这里。其他地方的人们需要他们的劳动力，因这里它能生产其他地方需要的产品。

桑尼今年35岁，他的妻子法蒂玛塔34岁，她生了7个孩子，有一个刚出生就死了，还有一个不到5岁夭折了。他们还要照顾法蒂玛塔生病的母亲，她今年50岁了，走路有些困难，她已经没几年活头了，因为这里没有人活得很长。她是这个家庭里唯一能稍微阅读点东西的人，但也没有什么可以阅读的。没有人会写字。但是，他们会画画，尤其是他们的几个孩子，甚至能画出一只老虎，虽然没有人亲眼见过。

这个村庄应该有很多儿童，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最好每家都多有几个孩子，因为总得有人在父母年老的时候照看他们，就像现在法蒂玛塔照看她的母亲一样。老年时代已经距离不远。

巴尔一家生活在艾尔山脉（Aïr Mountain）的奥科德克村庄（Okedeke）。艾尔山脉是一系列玄武岩山脉，他们生活的高原面积与瑞士相当。地平线上是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矗立在沙子上的一座石墙围绕着他们的家园，至少能挡住一部分将沙子吹进人眼的疾风。波兰有一句谚语，说风总把沙子吹向穷人的脸，大概也源于这里吧。

在院子的一角有一群鸡，大概8只；另一角落有3只山羊，在它们头顶是一个由一些棍子捆在一起搭成的简易屋檐。一只没什么特点的狗，很瘦但很愉快地在鸡群里玩耍。与人不同，狗总是可以很高兴，即使贫穷贯穿它们的一生。这里仅有的一间屋子位于院子的后部，靠右方。墙是石头做的，上面爬有沙漠上的植物，一些被太阳晒裂的粘土填在墙上的裂缝里。屋顶是用混凝土纤维板做的，但旁边有些屋子的屋顶则用大草原上的茅草覆盖着。

屋里除了一个破旧的塑料橱柜、一面有裂痕的镜子、一些上面挂着几个陶罐和几件衣服的挂钩之外，就没有任何家具了。其他地方人们所谓的现代生活的便捷用品，在这里全找不到，除非算上那张吊床和那盏味道刺鼻的煤油灯。墙上挂着一张发黄的法国航空的挂历，是2000年的，上面印着艾菲尔铁塔的照片。如果把附近三个村子里所有房屋垒叠在一起，它们的高度也不会超过艾菲尔铁塔。院子里有两张木板床，上面盖着毯子，毯子的年龄比这个家庭里任何人的年纪都大，床上没有床垫。火塘是露天的，摆在屋子前面。院子的第四个角落里，什么也没有。法蒂玛塔抱着倒数第二大的孩子，怀里的孩子徒劳地吮吸着她下垂的乳房。法蒂玛塔走到墙

边和刚从沙漠里劳作回来的一名妇女交谈，这名妇女背着一捆干柴。

村里半数以上的人小于15岁，没有人超过60岁。除了住房之外，这里没有其他的建筑，只有一个很小但建得很漂亮的清真寺，这个清真寺刚被翻修过，刷成了淡淡的新绿色，还有一个优雅的尖塔。清真寺只比村里的住房稍稍大一点。在几十公里外，有一个更大的清真寺，还有一所附属伊斯兰学校。这所学校意义重大，因为通过在写字板上抄写古兰经，孩子们学会了写字。这里的孩子们学习阿拉伯语，同时也学豪萨语，在这些地方，豪萨语比法语有用，因为如果会说豪萨语，就可以在当地市场上进行交流。清真寺和学校都是沙特阿拉伯援建的。

村子里还有商店。所谓的商店其实就是一间有一扇窗户朝着马路的屋子，里面挂着各种想象得到的商品，并且从黎明一直营业到深夜。商店里出售火柴、蜡烛、罐头装的大豆和沙丁鱼、还有花生和几捆干的红辣椒。一般情况下，都会有茶叶和食糖。还有一些装在塑料瓶里的各种颜色的甜饮料，也有可口可乐。所有东西都是常温放置。这里属于山区，所以温度也就85华氏度左右。这些商店里没有多少商品，但在8公里之外，每周四都会有一个集市，在那里人们可以买到所有需要的物品。有西红柿、豆荚、鸡肉和羊肉、日常用品和毛巾、塑料桶、锡制的茶壶、甜芒果和无花果、油和香皂、蜡笔盒和笔记本，甚至还有中国生产的手电筒。

我们拂晓就起床，起得和鸡一样早。天空仍然一片黑暗时，村子里的几只公鸡就开始打鸣。于是每个有力气起来的人也都起床了。没有人游手好闲，因为在这个纬度上一年四季白天都很短，白天从来不会比黑夜长过两小时。人们必须为了生存而奋斗。这是一种漫长的挣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方式，但都不带任何情绪。鸡群在村子里随意游荡。山羊也是，但最好把它们赶到某个有东西可啃的地方。西非的荒漠草原与高山草甸不同，山羊只能勉强维生，它们得自己照顾自己，逮到什么就吃什么。它们还会产出羊奶，当它们不能再产奶时，就会被端上餐桌，一头山羊可以让这里的人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每周都吃一次肉。山羊对孩子们显得更重要，当他们足够大了，不用总跟在妈妈裙子后面转时，就和这些山羊为伴。这里没有学校，所以直到黄昏之前，他们都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打发。到了晚上，就是睡觉，人们可以睡很长时间，因为没有灯光的傍晚很短暂，而且，劳作了一天，大家都已经累了，为什么不睡呢？

巴尔一家在拂晓时起床，没有早餐，但孩子们每人可以得到一片硬面饼，大家

再分吃一个西红柿。法蒂玛塔把她最小的女儿蕾拉特用一块围巾（从中国进口）包裹住，拴到背上。蕾拉特看起来非常虚弱。然后，法蒂玛塔把一个用羊皮做成的葡萄酒囊（当地的产品）和一个塑料杯（本国生产）放到头上，就出门去取水了。水井离得并不近，这就意味着她今天取水得走三公里，因为离得较近的那口井已经干涸了。其他妇女也已经上路了，大家说说笑笑着往前走，使得一切顿时变得热闹、有趣、快乐和活泼。她们就这样出发，两个小时后再返回到家里。那时已经是上午8点多了，天气还没有变得难以忍受的热。这时，妇女和孩子们就开始吃他们少得可怜的午饭。

其他一些妇女则开始到田里劳作。田地面积不大，更像是一些园地。她们得把田里的石头清理出去。这些石头还算有用，迟早可以用来加固逐渐矮下去的围墙和房屋，但只有比较重的才有用，而且她们只能用手把这些石头搬回去，因为附近没有足够的手推车。

这里的田地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田地一样。田地里既有妇女也有男人在劳作。桑尼在种洋葱。其他人有的种胡萝卜，有的种西红柿，但这里大部分人在种粟。没有其他的作物了，这里的人们离开了粟就不能生存。还有洋葱！村民们说外面的人需要洋葱，他们甚至开着汽车来这里教村民们怎样种洋葱和怎样为它们除草。其实，这里杂草不多，因为很少有植物可以存活。但是，这里出产洋葱，红色的洋葱，是世界上最好的洋葱。村民们几乎不给自己留下一点，这些都是用来出口的。他们一般会把一部分洋葱拿到市场上去卖，而这些卖到市场上的洋葱最后也用来出口。偶尔，村里会来几个拉着骡子的人，其中稍微有钱的几个拉着骆驼。他们把收购来的洋葱装进一个个大袋子里，然后把这些洋葱沿着马路运到一些收购站。在那里，更大一些的卡车把洋葱运到更远的地方。在我拜访的村子里，没有人知道“更远”意味着运到他们的首都尼亚美，然后再由飞机运往法国或更远的地方。人们知道这些洋葱有多么好，但是没有人知道洋葱到达的地方。他们知道洋葱被运到了沙漠之外，但是沙漠是这样一望无际。或许，他们曾听说过沙漠之外还有和沙漠一样面积广阔的大片水域，但是水又怎么可能会那么多呢？

村里只要没有遇上干旱或是暴风雨形成的水灾，日子就还勉强可以过下去。干燥的季节比下雨的季节好。下雨时，可以做的活少了，时间多了，他们又靠什么打发时间呢？而且，当外面瓢泼大雨时，他们甚至没有地方可去，每个人都躲进屋子

里，屋里变得拥挤不堪。最糟糕的是遭遇蝗灾，去年蝗虫把一切都吃了，就像山羊一样，但你可以把山羊赶走，却赶不走蝗虫。

然而，更糟糕的是当局部战争和边界冲突波及到这些地区的时候。那时，人口死亡率会超过出生率，一切都像噩梦一样。幸运的是，边界距离这里很远。在尼日尔，所有的边界都是危险区域。最危险的是和马里以及阿尔及利亚的交界处，与贝宁和利比亚的边界情况也一样糟糕。除了喀麦隆之外，尼日尔和它的所有邻国都有边界争端。与喀麦隆的边界是早年由法国和英国殖民者划定的。

田地里所有的工作都需手工劳作。这里没有农用机器，尽管有灌溉设备，但也用不上，因为他们没有钱来买柴油。农民们都使用锄头。当雨水填满了洞穴时，他们用手把水舀出来。这些水虽然不能饮用，但正好可以用来浇灌作物。他们把水倒进木头水槽里，水沿着这些自制的斜槽流向左边或是右边，流到一行行的作物旁，而一千年前人们就是这样浇灌作物的。

上午11点，法蒂玛塔来到田里。家里已经有了24小时的饮用水，大家都够用了，因为他们需要的并不多。这里没有人经常洗澡。人们只能偶尔洗一两次。法蒂玛塔已经给她的孩子们和她母亲喂了第一顿饭，现在，她给她的丈夫带去他的那份。塑料碗里装着由粟和水以及羊奶拌在一起的一种非洲常见的半流质食物，这相当于一种非洲麦片。里面加了糖，因为这样更健康，而且人们也需要补充能量。如果你没有吃过别的东西，这很容易下咽。你必须习惯吃这种东西。

桑尼留在地里种洋葱，一直要种到下午较晚的时候。法蒂玛塔返回家里。不久便到了下午2点，太阳开始变得毒辣起来。人们必须找个阴凉的地方坐下，但很少有这样的地方。幸运的是，这个时候，路边的一棵阿拉伯橡胶树向院子里投下了一小片阴凉。法蒂玛塔和她的一个朋友坐在阴凉里吃午饭，她们的午饭是一些花生和加糖的茶水。

接着到了清扫院子的时间。院子里养着鸡和羊，总会有些脏东西。法蒂玛塔总是把院子打扫得很干净，没有任何垃圾。屋子里没什么可打扫的，除了扫一下地面和稍微整理一下房间，还有帮助她的母亲去方便。这里没有厕所，其他人走到离村子很远的地方方便，但是老人没有力气走远路。他们需要帮助，或者把他们带到屋子外面，或者帮助他们打扫污物。

那些山羊和狗呆在院子里的其他地方，孩子们则到处乱跑。稍大一些的孩子

在地里干活。中间大的孩子就花几个小时在村子周围走来走去，拾一些树上落下来的树枝，这样做晚饭的柴火就有着落了。而且，总可以去那个窗口或者说商店里看看，他们或许新进了一批货物。有时，的确有新货，比如发夹、打火机、镜子和塑料容器等等。虽然似乎没有人买东西，但这个商店还是能继续经营下去。

天气变得有些凉了，因为天色已晚，开始有些黑了。在回家的路上，桑尼在清真寺门口停了一会儿，他低着头坐下，面向东方，朝着圣城麦加的方向。这是他今天的第四次祷告。他为蕾特拉、为他的家人、为整座村庄、为艾尔山脉和每个人祷告。明天就是星期五，到时这里会聚集更多的人。星期五是个圣日，到时他可以又一次为每个人祈祷。

村庄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农民们从田里回到家中。羊群和孩子们也回来了。虽然不清楚是谁领着谁回来的，但应该是孩子们带着羊群回来的，因为羊群已经饱了，而孩子们仍然饿着。在白天，他们回家吃了一顿羊奶拌的粟；现在需要吃更多的粟了——也就是蒸粗麦粉。法蒂玛塔把粟和胡萝卜放在一个罐里煮。为了增加一些味道，她加了一点红辣椒。有时，她会在里面加进一个鸡蛋，但不是今天。明天就是集市了，她要去卖一些鸡蛋。这样，手里就会有一点钱，她也就可以为家里那个中国生产的手电筒买两节电池，手电筒已经有好长时间停止工作了。而且，她还需要买一些糖、豌豆，或许再为孩子们买几件二手衣服。

现在是傍晚。人们聚在一起，聊着天互相开着玩笑。毕竟，他们有如此多的事情要聊！他们坐在火边的沙子上。没有人喝酒，很少有人抽烟。但是，所有的成年人都在喝一种很浓的甜茶，茶水乘在小玻璃杯里。男人们在谈论生意，他们谈的是洋葱。为什么那些拉着骡子的商人那么顽固，就是不肯多加一点钱？当他们谈到那些拉着骡子的商人打算和拉着骆驼的商人抬价时，你会看到这些男人眼里闪烁着光芒。

如果没有需求，他们就什么也卖不出去，或者不能卖个好价钱。外界对当地产品（自然资源和人力）的需求会激发供给。除非有足够的洋葱，否则那些拉着骡子和骆驼的商人不会过来。所以，当地货物和服务的供给也会刺激需求。难道不是这样吗？

那么，如果他们有一点钱，就该考虑是买一辆两轮手推车呢，还是买一辆独轮车？

傍晚的时光很短暂，天已经黑透了，他们必须节约柴火，因为柴很少。该是睡觉的时间了，可以睡在屋子外面的床上或者地上。屋子里睡着法蒂玛塔的老母亲，她睡在吊床上，两个孩子睡在屋里的地上。当最后一点火苗也熄灭时，你可以看到天空中无数闪烁的星星。只有在这里，在西非的荒漠草原上，你才能每天花不到1美元看到这样的星星。不仅村子里一片漆黑，方圆几公里之外也是一片漆黑、一片寂静。这就是那里的生活。

又一天过去了，平安地过去了。没有干旱，也没有潮水般的蝗虫涌来。不幸的是，像这样的日子很少。他们所有人都必须艰苦地劳作，为生存而挣扎，除了生育后代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期盼的。孩子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新鲜事物。也有一些糟糕的日子，人们无法过活。你可以总在同一个地平线周围活动，但是你无法靠一无所有生活。还有许多充满不幸和麻烦的日子：没有足够吃的东西，没有力气，或者生病的时候。但最重要的是，今天没有人生病，也没有人死去。蕾拉特星期天就要死去了。

那天，巴尔家创造和消费了1.60美元的总收入。他们甚至还节省下来了一点——用来换电池的两个鸡蛋。为了感谢他们诚挚的好客之情——他们的“非洲麦片”、蒸粗麦粉、庭院里的席子、允许帮助照看骆驼、家里燃起的火塘，一位来自一个遥远国度的客人给他们留下了10,000非洲法郎。对他而言，这只是60个波兰兹罗提，或者25美元，但对他们而言，这足够当天以及当月余下的那段时间的家用，足够他们买一盏新的煤油灯和可以用三个月的煤油了。

他们就是这样维持生活的，从一天到另一天，从一个市场到另一个市场，从雨季到旱季，再依次轮回。他们付出了很多。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几乎是100%，而他们的边际储蓄倾向约为0。他们什么也没有积累下来，吃光了所有东西。而如果没有投资，停滞就会出现。

他们未来还有许多这样的日子。生活只是为了避免死亡。在尼日尔，他们的平均寿命都不到44岁。

那么，那些每天人均收入超过2000美元的国家的人们又是怎样生活的呢？我们这里谈论的不是亿万富翁，而是成千上万的人们，他们每天总计花费30亿美元。他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果要一直按照这个数目花费下去，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储蓄。这些储蓄很快又会变成大笔钱财，于是，他们就得考虑投资。这样，他们就

会一直有压力。不管你花费多少，你总要设法得到更多。这难道正如那句古老的谚语所说：你买不到幸福？

瑞士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大的国家。它的山区面积不到新泽西的山区面积的两倍，是波兰山区面积的13%。瑞士拥有750万人口，人均收入为35,000美元。其中，约有75万人口的年人均收入为160,000瑞士法郎（约为133,000美元）。也就是说，每天的人均收入为440瑞士法郎（或365美元）。处于这一收入水平的一个约有5万人的次级群体，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为850,000瑞士法郎（或733,000美元），即每天收入超过2,400瑞士法郎（约2,000美元）。还有大概几千人，其人均年收入为8,500,000瑞士法郎（或7,300,000美元），也就是说每24小时24,000瑞士法郎（或20,000美元），这就意味着他们24小时不间断地有收入。

弗朗茨·兰德鲍姆（Franz Lendenbaum）和他的家人居住在苏黎世富人区塞费尔德区的一幢房子里，这幢房子有16间屋子，前面还有一块可爱的草坪。弗朗茨今年46岁，他的妻子露丝42岁，他们的两个孩子在当地最著名的私立中学就读。他们家雇有几个佣人。有一名英国女家庭教师，是牛津本地人，负责教他的两个女儿纯正的英式英语，并开车接送她们上学。有一名法国厨师，来自普罗旺斯。还有一名司机，这是因为他们家有一辆迈巴赫，司机来自德国。园丁是瑞士本地人，他们的两名保镖是意大利人，来自西西里岛。

弗朗茨每天6点起床，在自家游泳池里游100圈后，他开始吃早饭：瑞士果蔬麦片加脱脂牛奶（可以称为一种欧洲麦片糊，但不加糖，因为这样更健康）和土司。在餐桌上，他和妻子露丝加入了有趣的家庭交谈，露丝是一名成功的眼科医生，就职于一家私人诊所。学校怎样？“很有趣，”孩子们用英语回答。他们都喜欢问老师尖锐的问题。“诊所里有什么新鲜事吗？”“病人很多。”他们都想知道周围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到了去上班的时间。在车里，弗朗茨边听瑞士广播，边浏览《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当天的读报时间就算告一段落，因为读太多也会使头脑混乱，他有时会在家看看杂志。八点一刻他到达办公室。办公室装修得非常现代和优雅，视野非常好，可以看到美不胜收的风景。给秘书简要布置完任务后，弗朗茨开始给私人助理布置任务。他的秘书和助理都是纯正的瑞士人。他布置的任务里有很多技术性细节，而且都很重要。会议9点开始。他首先把市场分析师、部门经

理和财务主管请到办公室。弗朗茨是一家公司的总裁和大股东，这家公司使用高科技或者说最尖端的科技生产按客户需求定制的铀浓缩设备，或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公司经营得很好，它在铀矿石加工方面有很大优势，他们加工从尼日尔运来的铀矿石，在这个领域，即使从全球范围而言，他们也很少有对手。公司还提供高水平的咨询服务，这就需要飞到世界各地。弗朗茨不仅去过华盛顿、莫斯科、巴黎、维也纳和伦敦，也去过北京，甚至还去过中东地区和非洲。当然，他最常去的是尼日尔的尼亚美。

弗朗茨有时甚至会在尼亚美过周末，而且几天后他会再到那里过周末。他会从一家法国公司租一架直升飞机，至少飞到巍峨的艾尔山脉，这里与他每天都能看到的阿尔卑斯山脉有很大不同。租两天的直升飞机、住在尼日尔东部最大城市阿格德兹的酒店、租一辆吉普车、请一名向导、雇一群骆驼和拉骆驼的人，大约要花费4,500瑞士法郎，这么少的支出换来了这么多的快乐。可能因为电影的缘故阿格德兹有一种别样的氛围：在安东尼奥尼的影片《旅客》中，杰克·尼克尔森死在一家小旅馆，人们想知道为什么他会对谁在向柏柏尔的反抗组织出售军火感兴趣，因为毕竟这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弗朗茨毕业于著名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获得核物理博士学位。露丝毕业于巴塞尔的一所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她的年薪大约为50万瑞士法郎，但这只是她的薪金收入。她必须过几年就换一辆车，现在的座驾是捷豹XJ。这对于她而言，只是零花钱。在针对商界精英阶层的调查中，巴塞尔每次都位列最适宜居住城市的首位。这也是最贵的城市，至少从女性服装、首饰和化妆品这方面来说的确如此。相比之下，贝弗利山算是便宜的了。然而，即使在巴塞尔，人们也要去商场购物，不是因为便宜，而是因为这是一种遇到老朋友的方式。一名像露丝这样优雅的女士一天就可以花掉几千法郎，用来购买衣服和香水。幸运的是，她不是每天都去购物。

弗朗茨余下的上午都被电话、电子邮件和与合作伙伴的电话会议占满。在这个行业，重大的事情都必须面对面解决。这就需要出差，也需要接见客户。今天，弗朗茨就接见了三位客户。他们都来自其他国家，并且是非常重要的客户。如果有对这家公司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就需要有供给。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源源不断的供给意味着需求从来都不短缺？难道不是这样吗？

午饭时间到了。今天，弗朗茨和一位来自苏黎世理工学院的校友共进午餐。这位朋友一直从事与弗朗茨的领域相关的研究，并且不时地和他分享自己的见解。这位校友也是一名物理学家，只不过是理论物理学家。他在学术领域发展，所以也常常与实践领域的人们保持联系，并喜欢在这些商业人士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华。他们在顶级奢华的奥斯匝姆禄登酒店（Haus zum Rüden）用午餐。这里所有的侍者都是瑞士本地人。在这里，即使来自列支敦士登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外地人。他们的午餐很清淡，最好的选择是法式煎鹅肝，并配有味道鲜美的红洋葱圈。这些洋葱来自何处？主厨说刚从法国空运过来，而这正是法国从尼日尔进口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洋葱。

午饭由弗朗茨买单，也就是说公司是他的，他理应买单。午餐的红酒和洋葱一样贵。算上小费，这顿饭花了200瑞士法郎。若按照这些美味的洋葱的出产地的货币来计算，则相当于81,000非洲法郎。在这家餐厅里，一个被切好摆在盘子里的洋葱，所标的价钱相当于桑尼卖10袋洋葱的钱。那些从桑尼那里收购洋葱的人可以获得一小部分利润，而那些把洋葱出口到欧洲的人得到的回报却是他们所投入的3倍多。这有点像17世纪的东印度公司。毕竟，“贸易，而不是资助”是发展的基础。

弗朗茨一顿午餐的花费相当于巴尔一家一年的收入。现在，弗朗茨甚至不知道有巴尔一家的存在。如果他知道，会怎样呢？瑞士曾一度也是个穷国，它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正如弗朗茨为自己的公司和自己的薪水努力工作，归根到底依赖于合作、诚实、互惠和自由。他按时交税。在这些税收中，瑞士每年划出17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43%，用于国外援助。其中某些援助的形式就是资助像弗朗茨的公司一样的企业去帮助国外政府在和平的项目上利用核技术。

午饭后，弗朗茨和一个资助一项谨慎业务的财团代表开会。弗朗茨所从事的行业并不欢迎过多的媒体关注。你必须和媒体打交道，但最好不要让他们了解得太多。弗朗茨更愿意避开它们，因为轻率的评论一般会帮倒忙。然而，还是需要培育一些媒体关系，今天下午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有媒体把一个与他们有合作关系的国家放在了不恰当的位置。

在和公司其他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就某些复杂的技术问题进行交流后，到了下班时间。弗朗茨在网上和朋友交谈了几句后，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回去的路上顺道取了他的价值2300瑞士法郎的杰尼亚（Zegna）套装，并拜访了一个玛莎拉蒂

（Maserati）跑车的代理商，因为弗朗茨正在考虑买玛莎拉蒂，还是买兰博基尼。

总是热情洋溢的狗跑到门口来迎接主人的归来。这是一只杜宾犬。狗总是兴高采烈的，即使当它们富有的时候也如此。那么，学校里又有什么新鲜事呢？

晚餐在家里进行。这是周三，是传统上的会客日。这次，来的是露丝的一位来自柏林的朋友，一切不需要很正式，但必须照顾好客人，让她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晚餐摆放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在这里可以俯瞰苏黎世湖。大厅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架贝希斯坦钢琴（Bechstein），以备两个女儿中有人想成为下一个马尔塔·阿格里希（Martha Argerich），虽然她们都另有想法。墙上挂着一幅沃霍尔（Warhol）的真迹，还可以看到一些蒂芙尼玻璃（Tiffany glass）。在对面的角落里摆放着一套丹麦的顶级B&O（Bang & Olufsen）音响，里面播放着希腊音乐家范吉利斯（Vangelis）的《城市》（*The City*）。摆放在右边桌上的酒是最好的牌子——阿马尼亚克酒，这是英国达尔摩尔的单一麦芽威士忌。左边摆放着一套意大利尼克拉提（Nicoletti）椅子、沙发和桌子，桌上可以看到《国家地理》（*The National Geographic*）、《纽约客》（*The New Yooker*）、《美国科学家》（*The American Scientist*）、《经济学人》、勒卡瑞（John Le Carre）的《使命之歌》（*The Mission*）和霍金（Hawking）的《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

晚上，弗朗茨独自在书房的电脑前坐到很晚，他一直在思考，直到深夜。大部分时间里，他在思考他的公司、竞争、政治影响、风险、金融、技术进步和他的员工。他很少有时间给自己和家人。

睡觉前他还得再看一眼证券市场。纽约交易所关闭时，大阪交易所刚好开放。每个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知道苏黎世这边的情况。他把没有投入公司的那部分资金投到了股市。“放在证券市场，”他说。当然，他不是自己在做这个事情，有人帮他做，他关注这些，只是出于好奇。但是，就像那条原则所说的，他从来不投资自己所在行业的公司。于是，他得祈祷别的公司兴旺发达，利润上涨。让别人来祈祷这些吧。他为自己、家人、公司，为苏黎世和瑞士祈祷。不久就是圣日了，当所有人聚在一起为自己祈祷时，就会变成为每个人祈祷。

谁能算出他们一家每天的花销是多少？如果计算所有固定的和一次性的费用，那么大约是10,000瑞士法郎。也就是说，人均超过2,000美元。这只是普通的一天。这

一天中，兰德鲍姆一家创造了大约20,000美元的总收入。然而，人们计算这些都是按长期计算的，大约每年计算一次。

他们花费得不多，因为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仅为40%，而边际储蓄倾向为60%。他们积累了很多，投资了很多，只消费了其中很小一部分。只有投资才能发展。

他面前还有很多这样的日子。生活不只是为了生存。在瑞士，人们的平均寿命是81岁。

因此，一些人（为数众多）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自己总是觉得不快乐。其他一些人生活得非常富裕（一小部分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快乐。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在过去短短的几十年中，收入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数最多的是在各国情况都不一样的中产阶级。情况不一样是因为“中产阶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在尼日尔是一回事，在瑞士又是另一回事，而在波兰又不一样，这和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对应。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从全人类范围来看，现在的不均衡比25年前已经有所下降，而人均寿命比50年前有了显著提高。我出生时，全世界的人均寿命只有46岁，就像现在的尼日尔一样。我现在已经成功地超越了这个年龄，并且还很有希望活得更长。现在出生的人们可以活66年。按照平均水平计算，到了2075年，他们还会在世。有些人能活到22世纪，其中许多是现在出生在瑞士的人。

* * *

所有这些思考只是提供了一个更广阔、更透彻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国际社会。总产值是一个世界通用的衡量标准，也是使用最频繁的一个，因为它比较能说明问题而且相对便于计算。经济学喜欢使数据简化，统计学喜欢求数据的平均值。正如那个古老的笑话所说，统计数据就像美女身上的比基尼，露出的地方固然引人注意，不露的地方更重要。

作为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准，国内生产总值有许多不足之处。它只告诉我们宏观经济活动的一部分效果，而忽视了许多相关的成本。虽然这些因素有时被称为“外在原因”，但事实上却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除了考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我们还必须考虑一些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意义重大的因

素。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统计分析工具——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3]。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健康状态

——知识获得

——生活水平

这些都不是很容易衡量的指标，因此，和往常一样，我们可以先认可一些假设，从而使问题简单化。

我们可以假设健康状态指标是指人越健康寿命就越长。

知识指标是从教育以及读书认字的能力的角度来衡量。这样的衡量方式相对简单。其中，1/3权重是由总入学率决定，包括在小学、中学、大学登记入学的人数，另外2/3权重则是识字的成年人（15岁及以上）的数量。

生活水平指数则是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相比较得到的函数。它的衡量指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即用购买力平价美元表示的数值。

人类发展指数是在上述三个指标的基础上计算而得，三个指标又都分别用具体的公式计算，这些公式可得出某个国家人口发展水平同假设的“完全发展”状态的相对值。当达到下列条件时，国家的状态就是理想状态：

——人均寿命为85周岁

——儿童和年轻人的总入学率为100%，没有成年文盲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0,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在一个理想国度，人类发展指数的平均值应该是1，而且，这个指数由三个方面构成，每个方面的指标都相等，为0.333（或0.3）。在一个处于人类和社会最低点的国家，这个指数应该为一个个位数的百分比，毕竟，总有人会活几年，也总有人会有一点收入，不管是不是小得可以忽略的数目。理论上，没有要求必须有人入学，而且，每个人都是文盲也有可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是按国家划分，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上述情况存在。但不幸的是，如果就区域、地方和家庭而言，这样的例子就会确实存在。有一些地区的社区，人类发展指数为1，但也有一些极度贫困的地区，该指数为0.1。布基纳法索最贫困的那1/5人口的发展指数就约为0.140。

人类在这种最底层的境况中可能生存下来吗？回答是可能的。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使用的模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最低收入为100美元。我曾到过许多人均收入低于这个数字的地方。在马里与多哥的交界处，人类发展指数仅为百分之几。在莫桑比克与马拉维交界的区域，情况也是这样。在尼日尔奥科德克的巴尔一家的发展指数仅为0.061，除非他们能活得超过当地的平均寿命，否则这个数字就不会发生变化。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总是活得更短。冷冰冰的平均数只会使人产生误解。

假设兰德鲍姆一家四口人的寿命都会超过瑞士的人均寿命（81岁），那么他们一家的发展指数是0.978。鉴于他们舒适的生活环境，他们都可能比81岁还多活4岁，达到85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发展指数就会达到最大值。这一家的发展指数是1，而另外一家的只有0.061，这就是生活！

由平均寿命衡量的健康状态指标占人类发展指数1/3的权重。年纪小的人死得越多，人类发展指数降得就越剧烈。除了战争之外，在一些生育很多孩子但又无能力养育或得病人数很多的地方，人们往往死得比较早。同样，情况最糟糕的也是非洲，尽管还有一些地方的情况也很糟糕。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与各国政府合作，监控对生命构成威胁的疾病，并在危急情况下采取直接干预或间接行动。仅从2003年到2006年的三年时间内，世界卫生组织就在全世界确认了685次对人类健康的大规模威胁。其中，至少有288次在非洲，78次在欧洲，而南北美洲都仅有41次。东南亚（81次）和中东地区（89次）比欧洲情况稍差。

人类健康遇到的威胁与日俱增，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矛盾之一。如果我们不是从几世纪的角度看（因为人类再也不会像在过去的大瘟疫中一样大批死亡），而是从几十年的角度看，事实的确如此。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现在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糕，因为每年都会有新的疾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现，而且出现后就不会消亡。从20世纪70年代起，已经出现了39种新的疾病。

在提醒世界关注疫病风险的报告中，世界卫生组织坦率地说[4]，认为致命的HIV－AIDS或SARS病菌不会产生新的变异并带来新的疾病是极其幼稚的。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大范围的流感会袭击150万人口。

在每年有21亿人乘飞机旅行的情况下，病毒和其他病菌的传播非常容易、迅速，且范围广泛。这是当今世界与以往所不同的地方。现在，不仅科学和技术的进

步飞速传播，疾病和死亡也传播得非常迅速。这个航空旅行的数量表明，地球上的每个人每3年就会乘飞机旅行一次。然而，是那些经常乘飞机旅行的人使得总数这么庞大。我就是其中之一。有时，我一年乘飞机的次数超过100次，所以在这21亿中，我就被重复计算了100多次。大部分人至今仍然没能近距离地看过飞机，很多人甚至远距离也没有见到过。然而，每天24小时都在传播的疾病却非常显而易见，而且，飞禽也常常携带有一些闻所未闻的疾病，例如禽流感、埃博拉病毒等。我们不得不接触诸如马尔堡和尼帕这些新词汇，这些都不是新推出的汽车，而是致命的病毒，而且今后听到的次数还会更多。

不幸的是，有时旧的恶魔会醒过来，夺走新的生命。霍乱就已卷土重来，黄热病也开始发起攻势。从2002年至2006年这5年间，世界卫生组织记录了1,100次瘟疫，包括霍乱和脊髓灰质炎，这些显然都是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永远在西半球绝迹了的疾病。脑膜炎病毒引起的感染也正在流行。而由分枝杆菌引起的肺结核也随着携带者身上的抗体变得更加顽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肺结核曾经夺去许多年轻的生命，而现在，它又在一些地区成为瘟疫，尤其是非洲。每年，因肺结核死去的人数大约为200万，比这个疾病最流行时期死去的人都多。

人们生病、死去，生命被折磨，人均寿命也随之下降，于是一些统计指数跟着下降，有的是直接下降，如人类发展指数；有的是间接下降，如国内生产总值。疾病以及与疾病斗争都需要支出。2003年，当SARS爆发时，亚洲地区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损失了300亿美元。发达的国家以及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可以经受住这样的打击，但是类似的疾病却会使一些国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些疾病在那些地方引起动乱，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且使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降。

然而，远比这些厉害的是特殊利益阶层和政治。了解世界的最好方式是旅行，然而，在那些致命疾病蔓延的地区，你必须非常小心。这些原因使得旅行观察世界变得困难，但并非不可能。担当这种风险还是有价值的，因为旅行充满教育意义。阅读也很有必要，我们需要大量的阅读。阅读的内容不仅要包括联合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专业报告，还要包括一些从经济学到地理学再到心理学和医学的理论著作，而且，也要包括一些好的小说。例如，约翰·勒卡瑞的《不朽的园丁》（*The Constant Gardener*），这部小说描述了那些大型制药公司的冷酷、残忍、玩世不恭和贪婪，他们从制造药品中获取高额利润。为了改进药品性能以获取更大的利润，这

些制药公司在奈洛比的基贝拉贫民窟的居民身上进行药品实验。观看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并不足以了解那里的人们怎样生活和死亡。你必须亲自去看看。生活是艰难的，死亡随时可至。生命是廉价的，因为药品是昂贵的。

这是小说吗？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对于像勒卡瑞这样的作家而言，没有事实原型就不会有小说。这些贫民窟、药品和制药公司或许会与小说中的不同，但问题是一样的。那种争取获得更多廉价药品从而减轻艾滋病带来的痛苦的挣扎，仍然存在于穷人和被鼓励使用药物抗击艾滋病的人们中间，尤其是在这种病比世界其他地方更严峻的非洲地区。而那些大型的制药企业和他们的支持者，到处都有，既存在于这些制药公司设立工厂的国家的政府里，甚至也存在于一些所谓的国家“援助”组织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那些贫穷的国家没有能力花钱请艾滋疫苗生产商为其生产疫苗，尤其是那些还在试验阶段的疫苗。一种药品从开始研发到上市，以市场可以接受的价格出售至少需要15至20年的时间。于是，每年都有300万人，其中一半是儿童，死于一些完全可以用疫苗预防的疾病。这些人死亡不是因为疫苗不存在，而是因为这些疫苗太昂贵，因为大量的边际成本被加到利润之中。制药业是世界上利润最丰厚的行业之一。

印度尼西亚拒绝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引发禽流感的H5N1病毒的样本，因为它担心这些样本会被转交给制药公司，这些制药公司会生产出高效的疫苗，到时它不得不以高价买入。直到2007年夏天，中国才移交了第一例病毒样本。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角度看，这些都不是正常现象。它反映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而问题不仅在于医学和药学领域。只有国家的、跨国的和全球的政治家们致力于调和商业与医疗服务之间的矛盾，才能得出一种复杂的解决方式。在现代世界，在面对流行疾病的威胁时，越来越需要一种全球协作的治疗和预防政策。

175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地区）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名中，挪威以0.965的指数连续数年排名第一。世界的平均值是0.741。前20个国家的指数差别不大，几乎可忽略不计，它们的人类发展指数都大于或等于0.936。市场经济国家的排名情况也非常不错。仅次于挪威的10个国家是冰岛（0.960）、澳大利亚（0.957）、爱尔兰（0.957）、瑞典（0.951）、加拿大（0.950）、日本（0.949）、美国（0.948）、瑞士（0.947）、荷兰（0.947）和芬兰（0.947）。

后社会主义小国斯洛文尼亚（0.910）排在27位，介于韩国（0.912）和葡萄牙（0.904）之间。这是唯一一个欧盟新成员超过其老成员的例子。捷克共和国的排名稍低于塞浦路斯，而匈牙利则非常接近马耳他。其他处于后社会主义转型的国家也有着非常不俗的成绩。所有这些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都高于其国内生产总值排名。这是社会主义体系的一种积极遗产，它通过引进全面初级教育体系，并扩大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覆盖面，彻底消灭了文盲现象。旧体制中的高增长率也发挥了作用。中东欧地区28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的平均人类发展指数为0.802，而有着更高生产水平的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指数则为0.923（当然，经合组织包括5个后社会主义国家——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但是这些国家并未显著降低经合组织的平均产出水平）。

古巴的情况尤为特殊。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000美元，世界排名123位，但是其0.826的人类发展指数使得其处于世界前列，排名50位。这反映了该国对教育、医疗以及人类生活状况的关注，这些都源自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它与其他国家性质不同却有着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有趣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与古巴接近的两个国家——叙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其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名却远落后于古巴，分别排在107位和108位（叙利亚人类发展指数为0.716，印度尼西亚为0.711）。

这种差别值得重视。它反映了社会资本、教育、科学、文化、大众体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投资对于经济发展战略和生活水平的重要性。最关键的是，它凸显了引导国家的价值体系的重要意义。这些显得琐碎，并且听起来像是某种应该予以避免的道德说教，被事实证明非常有用，而科学的真理应予以公告，尤其是当一些小的谎言堆积起来交织成网时。毕竟，虽然事实证明以财政方式体现的社会政策会转向帮助弱势群体，从而获得更高的发展水平，但是当人们仍然对此加以否定时，这就不仅仅是犯错的问题了。

事实是，将收入差距控制在某种限度内，并且随之进行预算的重新分配，主要是通过对高收入者多征税，同时加大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公共投资，会迅速出现明显改变。这个道理适用于那些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富裕国家，也适用于中度发达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对于那些不太发达的国家而言，更为公平的社会分配也会加强社会资本，同时提升人们对社会和工作的满意度。

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最低的10个国家都在亚撒哈拉地区（2004年）：莫桑比克

（0.390）、布隆迪（0.384）、埃塞俄比亚（0.371）、乍得（0.368）、中非共和国（0.353）、几内亚比绍（0.349）、布基纳法索（0.342）、马里（0.338）、塞拉利昂（0.335）以及排在最后面的尼日尔（0.311）。如果按生活水平和人力资源质量排名的话，这些国家的排名比按国内生产总值排名更低。这些国家的情况比亚洲和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最穷国家的情况还糟糕。在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最低的31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海地和也门，不是非洲国家。这难道就是所谓的“非洲天堂”？

这些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国家和那些发展指数较高的国家一样，国民收入分配更公平也许不会使国内生产总值立刻上升，但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人民的生活。为了避免再以古巴为例（我不想惹怒某些人），可以看看萨摩亚群岛的情况，这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国家。虽然它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仅为2,100美元，排名世界168位）——这里要记住的是我们已经说了不再以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社会发展水平——但是，它的人民却有较高的社会满意度，且人力资源水平也较高。萨摩亚群岛的人类发展指数是0.778，世界排名75位。更好的人力资源不仅是发展的目的，也是条件。还有一些例子则可以证明相反的情况。安哥拉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400美元，比古巴高10%，是萨摩亚群岛的近两倍，但是安哥拉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439，是古巴的一半多一点。

这些指数的高低都取决于价值观和发展的优先次序，取决于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此外，与以往一样，这些指数也取决于该国是处于战争状态还是和平状态。甚至直接由国外援助的很小部分的人力资源投资，也可以使情况发生改观。10美元就足以使莫桑比克的一个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用上蚊帐，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免受疟疾的侵袭。1万美元可以为布隆迪一个村庄的孩子们建一所崭新的学校，其效果相当于战后中欧地区将公共教育引入农村地区。1000万美元足以使几内亚比绍海港的基础设施全部重新翻修，而这将刺激生产、贸易和旅游业的发展。更低的死亡率、更少的文盲率以及更多的工作机会，加起来就是更好的生活，如果反映在人类发展指数上就是上升几个点。价值观和政策具有决定作用，它们能释放动力，这反过来又会决定人们想做什么和不想做什么。

人类发展指数比国内生产总值包含的信息更多，但并未把收入差距计算在内。收入分配差距与接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程度肯定有某种关联。比较人类发展指数和基尼系数能更全面地说明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国家，这两个指数可以同时

比较高。这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例如，在南非和纳米比亚，非常高的基尼系数是坏消息，但好消息是这两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也都相对较高，分别是0.653和0.626。另一方面，虽然阿塞拜疆的基尼系数很低，但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为0.736，是后社会主义国家中最低的一个。好消息与坏消息，相反的影响，都是非洲和中亚国家面临的现实。

与以往一样，是否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来计算，这些指数会大不相同。前文收入分配的比较结果显示，按每个国家的平均水平计算与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得出的结论不一样。与此类似，我们在计算人类发展指数时，也可以通过各国的平均水平来计算，也可以通过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计算这个整体中不同群体的平均值，得出的结果十分有趣。

如果把尼加拉瓜最富裕和最贫穷的各1/5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数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指数的排名相差87位。对于南非共和国而言，这个差距是101位。印度尼西亚与捷克共和国两国最富裕的1/5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数相同（0.885），而印度尼西亚最贫穷的1/5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数与哥伦比亚的相当（0.583）。最富裕的1/5的美国人或芬兰人的人类发展指数无可匹敌，都已接近1，而美国最贫穷的1/5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世界第50位，与古巴相当。这就意味着，有1/5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与古巴的平均水平相似，而古巴近50年来一直处于被联合抵制和歧视的地位。

长期被贫穷所困扰的玻利维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100美元。其最富裕的1/5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数与波兰的平均水平相当，而波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4,200美元。波兰最贫穷的1/5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数与巴基斯坦的平均水平相当，巴基斯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2,600美元。玻利维亚最富裕的1/5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数与波兰最富裕的1/5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排名中相差97位，波兰为37位，而玻利维亚为134位。

为了从人类发展指数分布的角度考察世界水平，我们必须先把世界地图用各种颜色标出来。这种标注会相对简单。我们只需要红绿灯所用的三种颜色的蜡笔：绿色是人类发展指数高于0.8的国家（发达国家），黄色是人类发展指数介于0.501和0.799之间的国家（发展中国家），红色是人类发展指数低于0.5的国家（最不发达国家）。这样画出的地图并不像拼缝起来的一个整体。欧洲、北美、日本、澳大利亚

和大洋洲是绿色，绿色区域还包括拉丁美洲南部的阿根廷和智利（与以0.862的人类发展指数世界排名37位的波兰差不多）、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亚洲的马来西亚和韩国。亚洲和南美洲其他国家是黄色，还包括北非的其他阿拉伯国家以及南非和非洲大陆南部的纳米比亚。所有其他非洲国家均为红色。绿色区域国家的平均人类发展指数是0.923，黄色区域国家的平均值是0.710，红色区域国家的平均值是0.427。

什么样的世界是最好的呢？是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较低但人类发展指数相对较高的，还是只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水平高才算？当然，我们要记住，国内生产总值在人类发展指数中占了1/3的权重，但也只是1/3而已。因此，没有一种简单的答案。最好的方式是去问人们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但即使知道了他们的答案，还是不能轻易地得出结论。我们知道，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这取决于人们是从价值的角度还是从战略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不考虑文化因素，如果我们问一个印度尼西亚人，他是否想搬到古巴，古巴的人类发展指数相对较高而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较低，我们也许会希望他从价值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然后回答说愿意。但是，如果我们说“那就走吧”，不出所料，他会回答说“你去吧，我留在这里”。他这样回答或许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之一是，尽管人类发展指数涵盖的向度很广，但是仍然没有考虑到一些重要的方面。

* * *

一种比较宽泛的解读（不是过于宽泛的），也许会得出人类发展指数暗含民主发展水平的信息这样的结论。一些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发展水平之间有着很高的关联度。换言之，有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家民主程度也很高，反之亦然。考虑到其他一些条件，以及出于将问题简化的考虑，一般情况下确实如此，尤其是长期看来更是如此。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可以发现一些国家收入水平很高，但民主程度很低（白俄罗斯、伊朗），而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但民主程度却相对较高（如贝宁、苏里南）。

在计算人类发展指数时，最好能把民主因素算进去，但这却很难实现。在与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一次交谈中，我提出了

这个问题。在评论了衡量发展水平的传统指标的局限，并批判了基尼系数的缺点之后，森提出了另外一个更全面的衡量指标。森对于人类发展指数的创立功不可没，这个指数直到1990年才投入使用，该指数也应该以森的名字命名，尽管目前还没有这样做。相比之下，基尼就比较幸运了。森非常重视民主对发展的作用，他最新的一部著作就命名为《自由式发展》[5]。尽管如此，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民主无法成为发展计算公式中的一个要素。

一方面，与教育和人均寿命对生产总量的影响相比，民主因素的影响更为复杂。自由的报刊和独立的司法怎样纳入工农业产值的计算中？另一方面，人类发展指数是一种半官方的信息，由作为国际组织的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编纂。因此，要这个指数很官方地指出，哪些地方更为民主，而哪些地方不民主，就会被认为政治上不正确。而那些非政府组织，则非常热衷于为民主发展程度排名，虽然有时它们排名的透明度和公正度都值得商榷。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做出的排名引起很多关注。这两个组织都设在华盛顿，因为它们受美国政府的资助，这和许多其他非政府组织没什么区别。

每年，自由之家都按照国家自由和民主的程度对各国进行排名。它聘请了大量的观察家和专家来监测各国的政治情况、代表组织、言论和选举的自由度以及媒体和司法的独立程度。这样排名的结果引起了许多批评，因为这些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排名者的主观评价以及专家的概括，而这些人本身就带有偏见，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所有国家都被按从1到7的分数打分。介于1至2.5之间的国家是“自由国家”，3至5.5的是“部分自由国家”，而介于6至7之间的是“不自由国家”。

名单上的193个国家中，90个国家被评为民主国家[6]。这种情况不算糟糕，而且与25年前相比，已有显著进步。其中61个国家得到1的评价，其他29个国家为2.5或更好。这些国家包括：

——所有欧盟国家（以及安道尔共和国、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和加入了欧盟的圣马力诺）以及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

——除土耳其之外的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

——位于加勒比地区和三大洋（主要是太平洋）的15个岛国，这些国家大多面临一种文化和自然条件混合的特殊情况（他们大多是强大的部落和区域公社，有着直接民主的传统，以及团结起来抵御恶劣自然环境的需要），同时他们也面临外部

的政治压力（包括以民主的政治制度作为获得援助的条件）；

——除经合组织成员国墨西哥之外的一些拉丁美洲和中美洲国家，如阿根廷、伯利兹、巴西、智利、圭亚那、哥斯达黎加、巴拿马、萨尔瓦多、苏里南和乌拉圭；

——非洲的贝宁、博茨瓦纳、加纳、莱索托、马里、纳米比亚、南非和塞内加尔；

——除经合组织成员国日本、韩国外，亚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蒙古和台湾地区（在自由之家的名单中，台湾被当成了一个国家）。

第二组国家，即“部分自由”的国家，包括从富裕的新加坡到贫穷的海地等58个国家。名单中还包括了45个在自由之家看来“不自由”的国家，其中得到了最差分数7分的国家分别是：沙特阿拉伯、缅甸、古巴、利比亚、朝鲜、苏丹、叙利亚和土库曼斯坦。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被自由之家视为“独裁”的沙特阿拉伯（7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3,600美元，而完全民主的图瓦卢（1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600美元。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4,000美元的国家中，有至少12个被视为民主国家，其中10个是岛国。不论是从这些国家在如此贫穷的情况下还能如此成功地维持民主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他们的民主程度如此之高而发展程度却如此之低的角度来看，这个结论都令人感到惊讶。为了更进一步揭示这种矛盾的结果，我们必须更加仔细地考量这里的反馈机制，因为这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整个问题必须被恰当地放置到造成这种结果的背景中。

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最近一些年来，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好，这当然也体现在政治和民主方面。尽管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自由之家的分析还是抓住了这些进步的方面。1995年，有76个国家被列为自由国家，2000年增加了10个国家。2005年，又增加了13个国家，2007年又有4个国家被列入其中，使总数变成93个国家。这已经包含了世界上近一半的国家，虽然只包含了1/4的世界人口。人类民主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些评论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民主有点像健康，正如谚语所说，只有失去才懂得珍惜。对于那些富有的国家，民主如此显而易见，就仿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

西，而不是漫长的历史成果。当我们拥有它时，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别人拥有的是如此之少。而那些很少享受民主的人更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

在富裕的国家，民主是一种遗产，代代相传。只有民主受到限制时，例如在与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民主会受到一定的约束，这时他们才会停下来思考，他们到底失去了多少。而在那些新近享受到民主的地方，人们仍将民主当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事物，他们只是惊讶怎么在如此长的等待之后才有了民主。而在那些没有民主的地方，人们很少去思考那些知识、政治精英们失败了的方面。许多贫穷国家的人很少能欣赏民主，因为他们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他们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一点在输出民主时应该充分注意，就像当时在输出革命时需要注意的事情一样。否则，民主就不会行得通。

民主应该是一个渐进的、由下而上的过程，而不是某种外围的、由上而下强加的东西。贫穷国家的民主并不依赖于向选民发放T恤，然后让他们在富裕国家代表的监控下进行的自由选举中正确投票。事实证明，这种形式不起作用。最重要的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过程的兼容应该通过实践而不是教条的方式实现。现代社会，尤其是在那些“较贫穷国家”中，这两个重要过程必须互相兼容。如果这些过程不能带来经济增长，那么贫穷的人们就会对以民主为代表的真正的自由失去兴趣。自由是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不应该局限于选择选票上的名字。

另外一个被经常引用的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同样也是设在华盛顿——否则还会在哪里？和自由之家一样，它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除了私人利益之外，没有什么比意识形态更不客观的了。传统基金会着力推广自由企业、有限的政府作用、个人自由以及其他被称为“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东西。

问题是，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其中很多与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中国和印度的传统价值观比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有着更为深厚的文化根基，这两个国家也很愿意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在世界各地的中国餐馆和印度商店里都能找到种种迹象。俄罗斯则没有这样的情结，因为它对自己根基深厚的传统价值观有一种认识，那就是很少有传统的俄罗斯价值观适合输出；但是，处于平衡考虑，俄罗斯也并不倾向于引进价值观。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人们所拥有的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价值观，与生活在落基山脉的人们在美国文化大熔炉中发展起来的新价值观肯

定有明显区别。甚至在巴塔哥尼亚的彭巴斯草原上形成的价值观，与在北美西部大草原上形成的价值观也不相同。

传统基金会在为其所称道的经济自由度排名时，使用了10个标准。他们着重关注一些领域的规则，这些规则影响着经济的运行和竞争力以及经济增长水平。这10种“自由”涉及如下方面：

——财产自由权

——商业自由

——贸易自由

——财政自由

——政府规模

——货币自由

——投资自由

——金融自由

——免受腐败的自由

——劳动力自由

上述每一类别都按从1到100打分，然后再编辑成一个全面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尽管有诸多不足之处，这个指数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它反映的是什么呢？

首先，它反映的是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富裕的国家。前10位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了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前20位的国家（除一些小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在“经济选美大赛”中名列前茅的国家和地区，按分数排名分别是：香港（89.3）、新加坡（85.7）、澳大利亚（85.7）、美国（82.0）、新西兰（81.6）、英国（81.6）、爱尔兰（81.3）、卢森堡（79.3）、瑞士（79.1）、加拿大（78.7）。其中，新加坡的劳动力自由度最高（99.3），而金融自由度最低（50.0）。有趣的是，传统基金会的兄弟组织——自由之家给新加坡的民主自由度评分为普通的4.5分（缺乏自由度），将其放到了与尼泊尔和乌干达等国家差不多的位置。

其次，在思考经济自由以及各国经济在这方面的差别时，我们必须记住，传统基金会的排名结果是取了10个不同指标的平均值。相同的结果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

内部的情况完全相同。英国和另外一个英联邦国家新西兰的得分都是81.6，但这两个国家内部的差别包括免受腐败的自由（分别是96和76）以及投资自由（90和70）。

第三，那些将政治限制和官僚控制强加于商业领域的国家则排在名单的最后面。10个得分最低的国家包括：几内亚比绍（45.7）、安哥拉（43.5）、伊朗（43.1）、刚果民主共和国（43）、土库曼斯坦（42.5）、缅甸（40.1）、津巴布韦（35.8）、利比亚（34.5）、古巴（29.7）和朝鲜（3.0）[7]。

第四，经济活动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介于1万美元和2万美元之间的国家，大多处于排名的中间位置。

在一些情况下，我们会感觉到对某些国家的分析被歪曲了。出现这种情况有诸多原因，但很少是出于单纯的形式上的原因。

排名涉及157个国家。我们怎么解释意大利排名67位，得分仅63.4，介于乌干达和尼加拉瓜之间，排在阿曼（63.9）、伯利兹（63.7）和科威特（63.7）之后呢？有人也许不怎么喜欢意大利人，但至于到了这种程度吗？法国的经济自由度和牙买加相同吗？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得分都是66.1。为什么波兰得分为58.8，位列94，排在塞内加尔和沙特阿拉伯之后，稍比巴基斯坦和佛得角群岛靠前？把中国和俄罗斯排在126和127位，得分均为54，在莱索托后面，也门前面，这又怎能让人信服？为什么乌克兰的得分为53.5，只稍多于尼日尔（53.3）？越南，这个在过去30年中经济获得巨大发展的国家，只得到50.0分，几乎与经济停滞不前的中非共和国（50.3）相同。还有伊朗，排名倒数第八，这个国家也不受某些人待见。

保持一定的平衡性和严肃态度很有必要。对所有由这些各式各样的组织、协会和论坛（包括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作出的排名，我们都应该保持一种恰当的距离并抱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尽管有些排名是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善意。要知道，除了无可争议的发现真相的渴望外，这些结果背后还有谎言。什么样的想法、价值观和利益驱使人们得出这样的评价，并由其他人公布这些结论？使这些结论公之于众并不困难，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媒体愿意相信的，也是它们喜欢报道的。

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的排名，而应该对其进行批判地分析。它们塑造舆论、影响经济实体的期望，并且促使紧张的政治家和官员将实际的经济项目付诸实施。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受这些排名以及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的恐吓。利益集团利用这些排名左右政策和民意，一些说客有时利用民主度的排名来推

动一些与民主关系不大的议程也不鲜见。

总体的结论是什么呢？有三个。这都是仔细研究由不同颜色标出的反映世界正在进行的时空变化的地图得出的结果。人们一定会感到惊奇，除了我们在学校里看到的物理的、政治的、气候的和地理的地图之外，还有这么多的地图（当然，首先要假设我们都有学可上）。

第一个结论是，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衡量指标，发展水平与经济自由度和政治自由度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这是通过一种反馈机制而不是因果关系体现的。当然，也有例外情况。

第二个结论是，生产增长率，更明显的是人力资本发展的改善程度，却没有这样一个简单的相关关系。这种情况有所不同，因为有时一些更为重要的因素决定了这两个参数的发展，即国内生产总值和人类发展指数的发展。这里同样有例外情况。

第三个结论是，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不平衡不是发展水平影响的结果，而是受长期主流价值观选择的影响，同时，也受基于这些价值观所作出的社会经济政策选择、以及为执行这些政策服务的系统规则的影响。当然，这里还会有例外情况。

例外证明了规律的存在。

如果这里有一个总的声明：你不能被定式思维、合意性真理或传统智慧迷惑，认为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经济自由，或者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这只需要比较阿根廷和墨西哥的情况。再或者，认为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就不可能富强，而当拥有自然资源就会变富强，这只需比较德国和尼日利亚的情况。再或者，更公平的分配会抑制经济增长，更不公平的分配会促进经济增长，这只需比较日本和哥伦比亚的情况。

与人们出于便利的角度考虑而得出的结论相比，现实要复杂的多。从学术的角度看，这些观点只能被视为智力捷径或简化的结果，带有误导性。有时，这些观点充满倾向性，或者只是某种对现实误读的结果，或者只是将现实硬塞进某种符合特殊利益的理论之中的结果。这样的观点是有害的。我们很难说，这样的观点更普遍地存在于关于经济的争论中还是存在于关于环境的辩论中。在这些问题上专家之间意见的差别如此巨大，以至于媒体和政治家可以发挥的空间都变得很小。出现这种情况，更主要的是因为有很多人故意误导公众。他们没有错，只是在撒谎。这的确

存在，至少在政治化了的科学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可以以两个新自由主义智囊机构——卡托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和美国企业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在2001年发表了《多疑的环境保护论者》（*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8]后颇为有趣的表现为例。这本书对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提出的质疑充满了偏见。该书被某些特殊利益集团，主要是燃料和能源部门以及相关政治领域的利益集团利用。这两个智囊机构的科学家们被安排到这些争吵之中，跟风的媒体则火上浇油。媒体中的一些专家是受人雇佣的，另一些则是不负责任地随声附和。

如果恐龙灭绝的时代就已经有科学家，并且他们对造成灭绝的原因都得出了一些最终的结论，同时，假设还有媒体来报道这些事件，那么不论媒体采取怎样倾斜的角度，这些观点都会盛行。会出现许多种不同的观点，如果恰巧其中一个观点是正确的，它也不一定有机会显露出来。如果当时还有机会拯救这些恐龙，也已经被错失了。不是因为知识准备不足或是科学论证的薄弱，而是因为过多的政治和过于强大的媒体使这种机会流失了。那么，这与当今的现实世界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对于自然环境的状况，尽管有科学的辩论、政治因素和媒体的参与，但是很多物种还是不可避免地灭绝，而不可再生资源也在不断地被浪费。

至于自然环境的状况，难道大家都没有看到是怎么回事吗？大家几乎都知道，这也使问题变得复杂化。在经济层面，大家都认为事情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在生态层面，包括环境和自然资源，很多事情正在变得更加糟糕。这种不协调的状况会对全球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后果，也会给人们对事情的看法造成不好的影响。

2007年发布的一个对豚类栖息环境的调查结果表明，在中国的长江流域，动物学家们没能发现一头被称为白鳍豚的淡水豚。10年前，他们找到了13头。此后，这些白鳍豚就永远地消失了。

现在，一些淡水豚类仍然生活在老挝湄公河沿岸的、风景如画的四千美岛湿地区域，当地人将它们称为帕卡（*pakha*）。在看到这些令人难忘的生灵之后，我问一位来自世界上最著名的河岸地区之一的专家，他是否见过像这样美丽的动物。他没有回答，而是反问我，它们看起来与海豚有什么区别吗？如果没有，那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显然，几十年前地球上第一种大型哺乳动物消失时，有些人并没有为此感

到烦恼。1950年左右，袋狼（“塔斯马尼亚虎”或“狼”，与袋鼠很相近的一种有袋动物，但有着犬科动物的外表）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现在，人类的数量是当时的2.5倍，而这些动物却不再存在。希望我们不要失去理智。

那些警告说人类的自然环境正在以一种触目惊心的速度恶化的人并没有失去理智。将目前的情况与那些从化石和发掘物中了解到的时代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生物体，包括植物和动物，都正在以比当时快成百上千倍的速度消亡。由于人类对地球有机和非有机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很多植物和动物灭绝了。地球上的生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稀少，尽管我们人类（这些会思考，但并不总能理性思考的物种）的数量前所未有地增加了。

联合国曾经赞助了一项对自然环境状况和空前规模的开采情况的比较研究，即《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 the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该项目的结论是，生态系统在过去的50年中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动荡。世界上超过半数（从20%到50%不等）的植物被改造成适合人类使用的品种。变化最迅速的是热带和亚热带的丛林，这些区域正在缩小。35%的红树林消失了。那些想看红树林的人，应该赶快到还有这些树木生长的地方去看，如塞内加尔南部和佛罗里达的湿地。约有20%的珊瑚礁消失了。那些想在这些拥有童话般美景的地方潜水的人，应该尽快赶到还有珊瑚礁的地方，如马尔代夫或大堡礁。

1/3的两栖动物、1/5的哺乳动物以及1/8的鸟类正濒临灭绝。据估计，自从捕鱼业实现产业化以来，已有约90%的大型掠食性鱼类从海洋中消失了。上述都是脊椎动物，其他种类的生物数量也在下降。

在外人看来也许会相对安全的一些地区，野生动物正以一种灾难性的规模消亡。一个世纪前，约有10万只老虎在印度的山林里徘徊。而现在，仅剩下1,500只。2002年，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地球上还有3,642只这种美丽的动物。最近20年中，肯尼亚野生动物的数量减少了近1/3，南非的情况也是如此。那些希望到动物数量仍然超过人类数量的区域进行远征的人们得抓紧时间到埃托夏国家公园和尼库鲁国家公园，因为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和克鲁格国家公园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

如果我们看到世界上最后一株植物，感觉会怎样？如果站在世界上最后几只动物面前，感觉又会怎样？一定很糟糕，就仿佛我们正在失去自身的一个部分。

在赞比西河岸的赞比亚一侧，我见到了赞比亚最后的两只犀牛。它们甚至比几

个世纪以来在学校里展示的丢勒雕版画中的犀牛还要美丽。不久之前，还有5只。偷猎者杀死了一只，因为在那些遥远的国度，人们对这种大型动物的角有着很大的需求。另外一只掉进维多利亚瀑布前面的水潭淹死了。第三只属于正常死亡。如果世界都依赖于这两只仅存的犀牛，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那么我们就不会存在了。幸运的是，事情不是这样，世界也比这片生物的天堂大。黑犀牛仍然存在于这些区域，因此，这个物种，尽管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但仍然会存活下来。

赞比西河往西1万多公里的地方，在太平洋平静的海域中，刚好位于赤道的位置上，是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archipelago）。这里生活着“孤独的乔治”，一只约90岁的海龟。它的名字源于它是1971年以来唯一一只也是最后一只品他岛海龟的代表性亚种。所有想使它与较近种类海龟配对的努力都失败了。当乔治死时，就不会再有它的亚种。而1831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时，约有25万只加拉帕戈斯象龟，不久这些象龟被分成15个亚种。现在，仅有不到1.5万只和11个亚种，不久就会变成10个亚种。

再向南几千公里便是地球上最与世隔绝的有人类居住的地方了。1994年的电影《帕拉奴伊》（*Rapa Nui*）（这个后来被殖民者们称为复活岛的地方，当地语言称为帕拉奴伊）描绘了几百年前的可怖景象。严格来讲，这里的最后一棵树已经被砍倒。这确实是在欧洲人，准确地说是在荷兰人到来之前就发生了，荷兰人直到1722年才来到这里。今天能看到的树，大多是新近栽种的桉树。当穿行在林立的怪异的毛爱人雕像中，徜徉在这些由一个逝去的文明留下的火山岩像中时，思绪不禁穿越到地球上这个最神秘的长满棕榈和蕨类植物的时代。这里的居民使自然承受了超出其负荷的压力，毁坏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自然很快报复了他们，夺走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生物条件。

向西航行穿过太平洋和几乎整个印度洋，就到达了毛里求斯。在这里，我们也不禁惊呼：多么平静的大海！在这里，不是在电影中，生长着世界上最后一棵，也是整个宇宙中的最后一棵树。在这个岛中央的小镇库里皮普（Curepipe），有一颗10米高的酒瓶椰子，周围围着矮墙。这种棕榈树已濒临灭绝。现在，这棵树已经50岁了，再过几年它会最终死去。它不能繁殖，因为它的雄花和雌花开放的时节不同。人们试图将其嫁接或克隆的努力都失败了。尽管现在这棵树还在开花发芽，而一旦移植它就会死去。这就是灭绝。

高棉文明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建筑遗产之一：吴哥城。高棉文化在公元4世纪至9世纪时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建造了不同样式的庙宇。现在，这些庙宇的废墟依然绚烂夺目。古代高棉人在方圆3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建造了至少74座各式各样的庙宇。其中，有40座被不同程度地保留下来。不幸的是，有些已经变成废墟；幸运的是，有一些保留了下来，包括世界上最壮丽的建筑吴哥窟，保留得还比较完整。世界其他地方还没有像这样的建筑，即使是在古代或前工业文明时期的欧洲，或是在中国、日本，或是在阿拉伯半岛、阿兹特克地区。只有在这里，大约在1000年前，文化和环境条件的恰当交汇创造了如此的辉煌。当时，在这里，在这片肥沃且有着先进灌溉系统的土地上生活着大约50万人。到了某个时期，显而易见地，这片土地无法承载这么多的人口了。人口过剩、农田的过度开采、土壤侵蚀以及森林采伐等促使环境不断恶化。树木的砍伐毁坏了文明的根基。这个灿烂的文明以比其兴起的更快的速度灭亡了。一个有着50万人口的伟大社会消失了。灌木在当时的气候环境中存活了下来，并逐渐包围这些庙宇，使它们看起来更加与世隔绝。那个时代的人们留下的只有他们的庙宇，在几个世纪中，甚至这些庙宇也被遗忘了。

位于今天的危地马拉的卡蒂尔（Tikal）是玛雅文化的中心，这个城邦的面积是吴哥古城的20甚至30倍。玛雅文明几乎与高棉文明同时期在地球的另一边繁荣起来。但玛雅文明的衰落来得更早，这也是由于生态灾害。那些美丽的金字塔、碑石以及雕刻遗留了下来，但人却消失了。

这三个地方在地球上相隔遥远，甚至地理学家也无法更恰当地安置这三个伟大古文明遗迹。而同样原因造成的三场大灾难也使这些文明遭受到灭顶之灾，这个原因就是人与其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

环境的毁坏导致了文明的消逝。那么，当有着更多的人口、更少的资源时，我们的命运又会怎样？我们会犯同样的错误吗？不会，但我们很可能会犯更加严重的错误。虽然古代的这三场大灾难非常严重，但它们都属于区域性灾难，只在地球的小范围内以及相对较少的人口中造成了影响。目前的危险不是我们会扰乱平衡，因为我们已经这样做了，目前的危险是我们会完全失去控制。

有害气体的排放加重了这种威胁。这些气体不仅污染了空气，也使大气温度升高。更糟糕的是，这种情况在以更快的速度发生着。在1850年以来最温暖的12年中，至少有11年是出现在1995和2006年之间。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是，即使不是在北

美，至少在欧盟（多亏了德国、英国、荷兰和芬兰的努力），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开始下降。与往年相比，2005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了0.7%，未来几年，这个下降的趋势将继续。现在的期望是，在这片大陆上维持这种下降的趋势，同时使别的地方情况不要变糟。至少在目前，这是可喜的进步。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份报告显示，20世纪90年代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平均每年1.1%的速度增长，而到了21世纪的头10年，这个增长速率会达到3%。报告强调，这甚至比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此之前作出的最悲观的预测还要糟糕（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由阿尔·戈尔（Al Gore）领导，他于2007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是为了减少气候问题讨论的政治性，为了对气候状况和气候改变做出一种独立的、权威的评价而形成的组织。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立刻看到左右数据何其容易。这些数据刚一公布，就有人宣称情况正在好转，因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速度小于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但事实上，这些气体的排放却以平均每年3.8%的速度增长。另外一些人将这些数据视为情况恶化的标志，因为一旦世界经济的增长将人口增长计算在内，它的增长速度就会小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速度。在同样的5年中，每年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才刚刚超过2%。按照这样的解读，世界不仅耗费了更多的能源，而且污染更加严重。鉴于大部分人不知道如何分析这类信息，更不用说将其进行比较和解读，因此，他们主要依赖于自己所读到、看到和听到的信息，任凭意见操纵者们去引领他们。当大量信息集中于某个话题时，就会出现许多不同的世界图景。

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仍在继续。对于没有生命的世界，这种破坏同样存在，主要是通过对矿产的采掘和加工进行，包括一些经过燃烧生成能量的方式。问题是，这些不仅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成为阻碍人类未来发展的障碍。那些不能站在全球角度思考，或没有为资源消耗担忧的人，应该好好看看他们的周围。那些曾经是草地牧场的地方，现在建起了房子。那些人们曾经在里面捕鱼的水变成了污水。那些即使没有雨也有蘑菇长出来的地方，现在寸草不生。那些曾经是森林的地方，荒草丛生。

中欧的景象和南美的景象不尽相同，但都反映出了相似的令人沮丧的潜在现实。一些人抱怨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到乡村度假，另一些人则已经没有可以种植作

物的土地。土壤侵蚀、森林砍伐、土地沙化、河流被污染、湖泊干涸，不仅意味着人们失去了那些曾经可以度假的地方，还意味着人类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根基。在这些遭到毁坏的土地上，自然灾害更加频繁地光顾。于是，就仿佛他们还没有遭够罪似的，那些贫穷的人们和贫穷的国家，受到的打击更加严重。即使在富裕国家的大城市，生活的质量也明显下降。压力和疾病使人们感觉更糟糕，同时也使他们的工作能力下降，长此以往，这也会产生影响。自然世界与人类命运之间存在一种反馈机制。生态系统本来对人类是有利的，但是过度的开采破坏了这个系统。生活在农村的人们尤其依赖于自然，生态的恶化使这些地区的人口迅速下降。

有些趋势虽然显而易见，但仍然有许多未知事物以及无休止的争论。地球气候的地图必须重绘。夏季极地冰盖正以每10年7%的速度消融。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西风的强度大大增加。70年来，干旱变得更加严峻，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强降雨和涝灾也更为常见。北欧和南北美洲变得更加潮湿，而地中海区域和非洲变得更加干燥。

所有历史已经快要真正的结束了吗？还没有，不仅因为这些消息还没有那么糟糕，还因为人类已经开始采取一些重要的行动。

至于好消息，总是在坏消息中出现，尤其是当它能抵消或补偿一下坏消息带来的后果时。有人发现一窝刺猬在他们华沙郊区的院子里安家时，会高兴地欢呼。他们高兴，不仅因为刺猬很可爱，还因为自己很明智地选择了一个周围污染很少的地方生活。而在地球的另一边，有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热带丛林里偶然看到了另一种多刺的动物，也兴奋不已，这是曾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的针鼹。

更令有些人兴奋的是，又有人在2007年春天的一次探险中，在方圆1平方公里的丛林里发现了6种之前没有见过的动物。大概是一种蝙蝠、一种老鼠、两种地鼠，尽管这些都是哺乳动物，也不能因此补偿长江里的白鳍豚，但是发现它们仍然算得上是一个大事件。此外，还新发现了两种蛙类。

这里需要作一个评论：世界上的变化是多方向的，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也各不相同。白鳍豚在中国消失了，但是又在刚果发现了四种小的哺乳动物。当然，它们早就在那里生存，只是我们之前没有发现。一年前，在婆罗洲的丛林里，发现了一种有袋的像老鼠的动物，但是一部分快乐却因为塔斯马尼亚岛上一种像狗一样的更大的有袋动物的消失而抵消了。

好消息的规模有时很大，甚至让我们感到惊讶。有一则大新闻是，大概有5000

至11,000只云豹生活在婆罗洲人类目前无法进入的丛林里。这是数目很大的云豹群，而在苏门答腊群岛大概还有3000至7000只。

还有一些令人大为惊讶的消息，同样促使我们思考。情况真的像评论员们所说的那么糟糕吗（因为这正是他们所看到的）？如果我们了解了更多的信息，是否觉得情况会更糟糕呢？令我们感到惊喜的是，作为专业组织的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在报告中说，在一些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约130万只的羚羊、瞪羚、大象和其他大型动物。这些都不是新的物种，而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例如80万只体型中等、有着白色耳朵的优雅的羚羊。2007年世界野生动物学会的发现，是25年来在苏丹南部边界进行空中调查的结果，这片区域因为当地战争而被关闭。虽然这里长期与外界隔绝，但却没有与不断征战的当地部族隔绝，也没有与大群动物隔绝（或者这正是野生动物学会报告的意图）。正如谚语所说，每朵乌云都有银边，祸兮福之所倚。当然，如果说这些动物得以在广阔的塞伦盖蒂大草原上漫游多亏了战争，这很难让人感到欣慰。人们虽然在忙着减少人口的数量，却没有要减少动物的数量。

另外一些好消息则要归功于人类的智慧，尤其是当国家的发展政策将生态平衡考虑在内时。最近几年，自2002年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当选巴西总统以来，巴西亚马逊热带雨林的破坏速度已经降低了25%。这表明，不论是在一些艰难的情况下，还是在贫穷国家或是富裕国家，一些不好的趋势是可以被减缓，甚至是可以被扭转的，只要付诸更多的努力以及在生态政策上进行更良好的国际合作。这样看来，我们的未来将会充满挑战，也将非常有趣。有挑战的事情从来不会令人厌烦。

* * *

除了多层次的差别之外，现代社会的第二个特点是不同事件和进程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这体现在许多方面。以自然环境为例，自然环境的状态、进化与经济发展中发生的事情有一种反馈关系。事情以与自然环境相关的某种方式发生，是因为同时有很多事情发生，不仅是发生在自然环境中，也发生在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交融之处。

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在国际金融领域尤为突出，而金融又与贸易、资本流动息息相关。从国际金融角度看，世界的平衡出现了明显倾斜，并难以改变。那么，各国间贸易和金融不平衡的程度怎样？这会形成什么机会、造成什么威胁呢？确实，机遇与威胁并存，因为不平衡的状态对于一些人而言是严重的威胁，而对于另一些人则是赚大钱的好机会，而且还为未来提供了机会。这也正是不平衡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不平衡中获利的人们希望维持不平衡，从而有利可图。通常，那些获利最多的人也往往是那些大声宣扬所谓有必要消除不平衡的人。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债务国的财政部长无意中发现了一种消除预算赤字的迅速且彻底的途径，但对于投机资本而言，对预算赤字以及相应的公共债务进行融资是绝好的赚钱机会，于是，在这位财政部长成功地减少他们的获利来源之前，这些投机者会找借口千方百计避开他，无论是在民主还是非民主社会，这样的借口都很好找。买卖债券是他们的资本。

一种不对称的世界图景正在出现。一些国家累积起了大量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另外一些国家则出现严重赤字。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现象出现在经济发达国家，也出现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是对外贸易顺差的一种简单积累，是出口收入大于进口支出的一种剩余。至于赤字，则是相反的形式。然而，除了与国外的商品交换外，还有其他形式的交换，包括不同形式的金融转移，例如存款利息和贷款利息、股息、利润、货币的转移，对外贸易引起的金融转移，以及资本转移等。

总体的金融平衡包括所有的交易，既有政府间的也有私人部门的交易。大致上，经常项目赤字与资本项目盈余相等，反之亦然，即经常项目盈余等于资本项目赤字。在数学层面，这两者一般数值相等，所带的正负号相反，两者相加数值应该为零。在等号的一边，是出口价值、国外转移的收入流和现金流以及外国资本流；而在等号另一边，是进口价值、国外支付以及向外的资本流。这两边的平衡通过外汇储备的变化来调整。一方面，对外资产余额和外债的净值，即所谓的国际投资头寸（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净值是贸易支付差额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有经常项目盈余（或资本项目赤字），那它就是资本的净出口者，这种资本也是其他国家筹集资金的来源。与此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有经常项目赤字（即资本项目盈余），那么这时它就是资本的净进口者，资金来自其他国家。

这两种情况下，外汇储备都既可以上升也可以下降，因为它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尤其是汇率和银行利率的变化。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债券市场的情况，政府债券（包括国家公债和国库券）在债券市场进行交易。如果与其他通胀率差不多的国家相比，一国的央行采取将银行利率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水平的货币政策，会吸引国外投机资本来赚取快钱。为了购买另一个国家的债权，外国投资者会先购买那个国家的货币。由于对货币的需求增加，货币价格就升高。因此，即使该国经济变得疲软，它的货币也会变得坚挺。一旦外国货币进入市场，央行就购入这些货币并将其放置在自己管理的储备中。于是，国库中就有更多用于花费的资金，而债券给外国投资者带来收入。国库则以纳税人的钱支付给外国投资者利息。于是，政府（以及公众）就有更多的外债，而央行有更多的储备。

需要补充的是，一旦一个国家掌握了外汇储备，无论是否通过正当途径掌握，这些外汇储备就会成为其他国家银行和投资基金的便捷、丰厚的收入来源，同时这些外汇储备也为富裕国家的预算赤字筹集了资金。这些外汇储备并不是以现金的方式存储在央行里（除了黄金储备，现在它只起到一种边缘的作用），而是以其他国家发行的低利率、比较安全的债券（如美国、德国或日本的债券），或者以储蓄的形式存放在声望很高的西方国家银行里。

如果一家银行，一方面接纳某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为存款，假设这是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它为这笔储蓄支付0.3%的年利息；另一方面，这家银行又购买同一个国家的债券，而这个国家反过来向它支付0.5%的利率。是的，这家银行就是用这笔外汇储备存款来购买债券的。是的，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它每年就能获得20万美元的净利润。是的，这笔利润是由发行债券的国家的公民以纳税的方式支付的。当外汇储备与债券都是50亿美元，金融家们就会说净债务为零，但是外国金融中介机构的利润（以及对它们本地股东的补偿）却远不是零。他们可是拿走了几十万美元的利润。而以本国货币形式征缴的税收额度也会因此增加。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央行一般都将外汇储备的管理视为一种秘密进行的活动，而政府则来面对不断涌来的预算收据，同时还要接受公众的批评以及民主选举出来的议会的监督。当国际金融家及其在媒体中的代言人极力鼓吹他们所说的央行的独立性时，这个因素就与避免印制更多钞票引起通胀的理性见解一样重要。

现在的央行在管理外汇储备时犯的错误比管理货币供应量时更多。这就是为什

么关于一些不是很重要的问题有如此多无休止的争论，包括按照百分之多少来调控利息等等。虽然利息变化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过分夸大。这些争论淹没了少量对外汇储备政策理性化的呼吁，而后者能更好地服务公众利益并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外汇储备管理制度上的解决方案将会使根本性的改革成为必要。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如果有贸易逆差（贸易顺差），同时也就有经常项目顺差（逆差）。然而，也不能阻止一个国家在有贸易逆差的同时有经常项目顺差，反之亦然。很多年来，英国的进口一直超过出口，因此形成一种贸易逆差，而与此相补偿的是资本转移的盈余，主要来自大量的国外资本运营，最主要的包括来自投资证券组合的收入（以有价证券的形式）以及直接投资（以实际资本的形式）。捷克共和国的情况则相反，它拥有2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其经常项目逆差却为53亿美元，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1%。

一些贫穷的国家进口价值常常远大于其所能出口的价值，但同时这些国家有大量在国外工作的劳动力，他们寄回国内的款项基本能使该国保持进出口的大致平衡。以摩尔多瓦为例，其出口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7%，其为进口所支付的价值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3.3%（2006年数据），而在国外工作的人们寄回本国的汇款则高达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0%。尽管如此，这个国家仍然有超过12%的经常项目逆差。这个差距因为援助（直接捐赠或外国援助）、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融资而被填补了。

就其本身而言，贸易逆差没有好坏之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经常项目逆差。这种逆差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主要取决于怎样来为这种逆差融资，因为融资有很多种方式。风险最大的是依靠短期投机资本来进行融资。每天，人们都会听到或者读到关于投资者控制某种投机资本的新闻，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支持该国经济的平衡和发展使事情有所改善。有时，这些投资或许确实有些帮助，但有时它们也会造成伤害。

为这些逆差融资的最好方式是外国直接投资。这种方式不仅风险小，而且还能发出一种积极的信号，因为这表明外国投资者对该国经济有信心。这些投资者只有在有充分理由时才会对这个国家表现出信心。这会告诉其他投资者，他们可以对未来抱有积极的期望，从而改善商业气候。外国直接投资形成的新生产和服务一般具有高科技和管理先进的特点。这反过来也会为经济的增长做出贡献，一般是通过外

国投资刺激的出口型生产扩大来实现。正是出于这些原因，现代社会各国与各地区之间都存在相互竞争，以吸引这种类型的外国资本，它使得没有积蓄的投资成为可能，而这是每个人都欢迎的。

直接投资的另一个优点是其物质成果，通过新的工厂、公司建筑、宾馆和购物中心等形式呈现，这些东西不可能消失。这些实体的所有者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这些生产和服务的实体，还会带来诸如就业率和收入等好处。即使投资者想撤回资本，他们也必须先将这些以实体形式呈现的建筑、机器和基础设施出售给他人。他们可以把自己的钱撤离这个国家，同时也包括投资组合中的现金，只是在这种投资组合中，只有货币的形式参与其中。但是，他们无法把一座钢铁厂带走，因为这包含的不只是货币。投资者也许可以逃跑，但是其不动产会长期留下来，这些就不能称为短期投机资本。

在一些国家，赤字会危及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另一些国家所拥有的盈余从经济合理性角度看甚至已经有些荒谬。超级富裕的挪威及其约占国内生产总值14.4%的盈余不属于这种情况，这不仅因为这部分盈余大多来自该国的石油出口，还因为挪威人使用这些盈余的方式。他们将这些累积的盈余放到一个特殊的国家基金里，这个基金是为未来即当石油储备开采完时使用的。相反，瑞士占其国内生产总值16.1%的盈余则与此不同。显然，瑞士并不是很清楚怎样来明智地将这笔钱投资于其经济中，这可以从2007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5,000美元，落后于挪威的48,000美元看出。同样，芬兰有7.7%的盈余。而新加坡则拥有结构上属于嵌入型的巨额盈余，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6%，同时，它还经营着约等于其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公债。

中东石油输出国家有许多非合理的盈余，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它的盈余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8%，这个盈余应该被看成目前经常项目贸易趋势的结果，只要石油价格有利于这个单一经济结构的国家，这种盈余就会一直存在。虽然这些国家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但它们仍然不知道该怎样使用它们的盈余资本。于是，它们开始到处投资。最近，一名此前曾任沙特阿拉伯驻美国大使的沙特王子，正发愁找不到合适的买主，来出手其在科罗拉多州价值1.35亿美元的府邸，这是他先前的一个投资。这个数字相当于拥有1200万人口的津巴布韦的外汇储备总额。超过30%的沙特妇女是文盲，1.35亿美元能让多少孩子学会读书和写字呢？相比之下，沙特周边的一些国家

则更加明智：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在尽力使自己的经济结构多元化，并且将其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与挪威类似的基金中，以顾及未来几代人的发展。

俄罗斯的经常项目顺差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8%，这又是一个有着不合理外汇储备数目的例子。一方面，这个国家有许多亟待发展的领域，而这需要对先进技术和社会资本进行大规模投资。另一方面，俄罗斯拥有高达4000亿美元的过剩的、没有收益的外汇储备，其中一部分外汇放在一个平准基金里，以防石油价格下跌。单纯从谨慎的角度考虑，无法解释如此大量的外汇储备。直到最近，在普金总统的第二个任期里，俄罗斯才将一小部分外汇储备用于发展的投资，同时，也明智地偿还了很大一部分外债，包括一些还没有到期的外债。

显然，这些举措会遭到其国内和国外许多新自由主义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应该维持这些赤字，一个国家可以在聚集大量外汇储备的同时背负债务。毕竟，这些对投资有好处。关键是，要把握好平衡的度，如果完全失去平衡就对投资不利了。从叶利钦任总统上台一直到1998年夏天的金融危机之前，俄罗斯都是一个不错的投资目的地。但在普京当政时期，俄罗斯就不再是被看好的投资对象了，因为它开始通过预算制度和政府的部分配合来改进金融政策，这种改革同时受其央行货币政策的支持。

中国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其巨额的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这个数目还不包括香港的1400亿美元、澳门的110亿美元和台湾2700亿美元，从长期来看，这些地区的外汇储备也应计入其中。中国连续几年保持非常高的贸易顺差和常规项目顺差，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每年，几十亿美元组成的更广泛的资金流源源不断地流入其1.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这个数额相当于日本和欧元区外汇储备的总额。2008年，中国持有世界1/4的外汇储备，如果加上香港、澳门和台湾，这个数字会达到30%。

中国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已经将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国内经济投资的中国，也将把这些巨额盈余投向国外。它不会像中东的那些“投资者”那样随便投资，虽然富有的中国人在美国或其他地方拥有豪华府邸的时刻也一定会到来。此外，中国的人民币也将成为世界主要的存储货币之一。现在开始储备“人民币”也许不算太早。不久，不仅中国会将其外汇储备投资于其他国家，其他国家也会将部分外汇储备转移到中国。

在大多数国家中，赤字还没有达到过于失衡的状态，尽管各国情况不尽相同。占国内生产总值2－3%的赤字会对经济的平衡以及宏观经济再生产过程的流动性造成

威胁。负债较多的意大利有2.3%的赤字，内部冲突不断的哥伦比亚有3.2%的赤字，这两个国家就面临类似情况。然而，财政赤字分别从5%到0的经济体，都有可能实现比较平稳地发展，例如财政赤字为5.4%的澳大利亚和为8.8%的西班牙。但是，对于匈牙利而言，由于其6.5%的预算赤字和其政治的不稳定性，5.2%的赤字就显得过高了。同样，希腊8.5%的赤字也过高，因为它的公债曾一度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5%，而按马斯特里赫特标准（Maastricht criteria），这个数值不能超过60%。当某种意料之外的消极因素出现时（如2007年希腊的森林大火），国家经济的不稳定性就会加重，情况会变得非常危险。

尽管不同国家的情况差别巨大，但整个欧元区的情况非常平衡。预算赤字（将欧元区所有国家的赤字计算在内）仅为该区域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0.7%，并且经常项目顺差也相对较小，为0.1%。与此相对应，美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是1.2%，赤字是5.8%[9]。这是在比较大西洋两岸经济情况时应该记住的。

最近10年，波兰的经常项目赤字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安全水平，即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3%，只有2004年相对较高（4.4%），2005年较低（1.7%）。重要的是，这些赤字的平衡是通过外国资本对国内的直接投资来实现的。而且，2005年以来，由于欧盟的融资和外部汇款增多，赤字水平已相对较小。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当时经济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直接投资。1997年的赤字是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的3.2%，但这个赤字的93%已被外国直接投资平衡了。经济开始繁荣，但不幸的是，这种繁荣在1998年至2001年间中断了，当时不理智的经济政策导致了明显的经济低迷。情况最糟糕的是2000年，赤字剧增到7.4%，而且融资主要是通过一些代价非常高的途径，即投机资本和不断增长的国外债务。外汇储备随之急剧上升，因为这两者总是相互关联的。

过度积累外汇储备会使社会和经济付出高昂的代价。波兰的外汇储备（2007年年中时为550亿美元）是西班牙的3倍，而西班牙的人口和通胀率（2.5%）都与波兰差不多。但是，西班牙的进口是波兰的2.5倍（二者分别是2650亿欧元和1000亿欧元）。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西班牙巨大的进口平衡了其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波兰的外汇储备相当于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总和。

外汇储备是资本盈余投资效率最低的方式，这一点需要谨记。这对于外汇储备拥有者、这个国家和社会，都是最没有效率的方式，但却是经营外汇的金融中介机

构的最佳盈利方式。所有对这种不理智政策进行的建设性批评，都会引来关于强调“独立的央行”的重要性的还击，以及新自由主义政治家及其所操纵的媒体的猛烈攻击。这就是经济，尤其是被称为国际金融的经济变得非常政治化的地方。

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中最能体现出的世界上唯一的、真正封闭的市场，就是这个整个世界的大市场。每种全球增长模型和世界经济模型都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一个地方有盈余就意味着另一个地方出现赤字，一个国家出现亏空就意味着另一个国家有富余，一个国家的债务会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存款。如果一个人拥有的太多，那么另外一个地方的某个人就会一无所有。将全球视为一个整体，就不存在赤字和盈余，而且会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直到我们开始进行星际间的借贷活动，这在我们这一代是不可能实现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每年推出的《世界各国概况》[10]的确提供了很多非常有用的信息。该书认为，全世界的总债务是44.6万亿美元（接近于按汇率平价计算的世界总产值46.8万亿美元）。不过，即使是中央情报局，有时也会出错。世界的债务并不是这个数，这只是各国债务的简单累加，而这些债务，准确地说，与各国存款的累加相等。或者，我们按照中情局的思路接着往下想，就会得出世界欠自己钱的结论。尽管这样看来我们盈亏平衡，但这里仍然隐藏着一个重大的问题：不论世界如何一体化，它还远不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钱放到一个公共的账户里，而且，不止一个家庭因为这些钱的问题撕破脸皮。

现代社会对未来的亏欠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消耗的一部分资产，无论是有形资产还是金融资产，将会使未来几代人背负重担。这个问题不仅对于那些贫穷国家而言关系重大，对于那些倚重于外债的富裕国家也同样重要。现在最大的矛盾是贫穷的国家贷款给富裕国家。有时，它们不仅发放贷款，而且还通过外汇机制真正地资助这些富国。孟加拉国或巴西的外汇储备货币并不是埃及或尼日利亚的货币。像许多国家一样，它们把自己的外汇储备储存在最富有的国家的银行里，因为这些银行是最强大也是可信度最高的。富裕国家的政府债券是最可靠的，难道不是吗？的确如此，至少在目前是这样。

世界上基本没有零负债的国家。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欠债，它们首先欠的是自己的国内社会，多年来正是这些国内社会支持着用于抵消预算赤字的债券，以及发行债券的花费。国家还向国内外的银行借款。资金流动的网络，以及

现金流、有价证券流、债务流、资产流、负债流和存款流的相互交叉非常复杂。将这两个网络添加在世界地图上，将会是一片难以辨认的混乱，与我们现在的地图也不会有什么相似之处。

这张地图上最清晰的部分应该是散落在海洋上的一些小点。除没有任何债务的列支敦士登之外，世界上20个债务较少的国家都是一些小的岛国。这不是因为它们不想借钱，而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借钱给它们。这些国家是如此小，以至于与其借给它们钱还不如直接给它们，因为这样就不用再担心能否要得回来。向这些地方提供援助不用花很多钱，而且还会得到政治上的利益。这些国家中最大的是马耳他，有40.2万人口和1.9亿美元的外债。最小的是太平洋上的帕劳群岛，人口为2.1万，外债为零。不过，这些国家都只是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点。

大的斑点在其他地方。在一张黑白地图上，深灰和黑色将成为主导。最富裕的国家颜色也最深。在绝对意义上，美国是最大的债务国，其债务为10万亿美元，这几乎是世界所有国家债务总和的1/4。紧随其后的四个国家都是七国集团里的富裕国家：英国（8.3万亿美元）、德国（3.9万亿美元）、法国（3.5万亿美元）、意大利（2万亿美元）。七国集团的另外两个成员国，日本和加拿大也没有落后多少，分别是1.5万亿美元和7000亿美元，排名第8位和第12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债务国还包括：荷兰，排名第六，为1.8万亿美元；西班牙第七，为1.6万亿美元；爱尔兰排名第九，为1.4万亿美元。

中国和俄罗斯也都有非常可观的债务，分别是3060亿美元和287亿美元。对于中国而言，其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其债务显得不是那么突出。拥有大量债务的拉丁美洲国家包括墨西哥（1780亿美元）、巴西（1770亿美元）、阿根廷（1090亿美元）。土耳其的债务是194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是1300亿美元。所有这些债务都代表着非常重大的问题。非洲绝对债务最大的国家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南非（560亿美元）和苏丹（300亿美元）。波兰是世界第28大债务国，接近1500亿美元，其排名介于巴西和印度之间，印度的债务为1350亿美元。

应该相对地来看待这些数据。我们还通常将债务资源与出口做比较，还与更为普遍的衡量标准——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比较。为了方便，我们一般还会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比较。按照这种比较方式，这些数据就包含了更多的信息，并且被用于评估不同经济体的状况和前景。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波兰的人均债务为3,860美

元，比俄罗斯2,030美元的人均债务多。然而，如果将债务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的形式表示，这两个国家的债务水平差不多，分别是43.6%和39.1%。如果将债务与出口价值相比，这两个数据将变为133%和90%。俄罗斯的状况稍好，因为它向其他国家、包括波兰出口的是更加昂贵的石油和天然气。在以上的这些计算中，我们使用的都是 汇率，因为债务正是按照这样的汇率产生和偿还。

美 债巨大，但是它的国外资产更大。这个国家不仅居民和政府都处于负 私人部门也背负着非常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个世界军事、政治和经 只外债（没有计算其外汇储备）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6%，即人均债 是德国人均债务47,300美元的2/3稍多，是俄罗斯人均债务的16倍。 年出口价值的1016%，这个数据也许让某些人感到很震惊，但这是 年出口的价值是其总外债的1/3稍多，美国的出口价值则是其外债的 都停止进口，那么俄罗斯能在大约10个月的时间内清偿其全部外债， 10年。因此，美国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私人企业以及政府本身， 注它们海外债务人的状况以及偿付能力。一旦这些债务人的支付出现问 就会在美国国内引发更重大的问题。因此，对于美国而言，密切关注这些债务人非常必要。

拉丁美洲国家的全面改革，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各国以及俄罗斯和土耳其金融危机直接后果的逐渐消除，欧洲后社会主义国家坚实的经济增长（包括波兰将其外债减少了一半），以及取消世界上一些最贫穷国家的外债，使得减小日益迫近的世界债务危机成为可能。虽然免除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对于世界金融体系而言并非至关重要，但却是一种空前的人道主义行为，这些债务永远也不可能被偿还。在连续10年的公众压力下，七国集团（以及其他债权国）和世界银行最终于2006年同意免除这些国家的债务。

43个从中受益的重债穷国（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中，有35个是非洲国家，4个是南美和中美洲国家。它们分别是安哥拉、贝宁、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缅甸、布隆迪、喀麦隆、乍得、刚果（布拉扎维）、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洪都拉斯、象牙海岸、肯尼亚、老挝、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南非、苏丹、坦

桑尼亚、多哥、乌干达、越南、也门和赞比亚。一些国家支付债务利息的资金甚至多于其用于教育和医疗的资金，这个免债计划给了它们走出结构性停滞的机会。

然而，如果经济上稍弱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巴西、波兰、埃及或土耳其发现自己无法维持足够高的出口以拉动经济增长时，问题就会再次出现，甚至变得更加危险。这种情况既不是一种结构平衡，但也不是摇摇欲坠。不幸的是，它更接近后者而非前者。

这样的背景使得世界资本的流向变得更加复杂。需要强调的是，不仅是外行，就是那些水平很高的专业人士，也无法对这个话题做出肯定的推断。甚至外行比专家还更能作出推断。新的、令人惊讶的条件，其中有些是一次性的，有些是长期性的，不断涌现。一旦尘埃落定，专家，主要是银行分析师，就能精确地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然而，当他们作预测时，却尽可能地含糊，就像天气预报尽量避免明确地告诉我们是否会下雨一样。

发展中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尤其是那些使用政府债券作为预算融资的国家之间总有庞大的资金转移，同时也存在贫穷国家偿还其富有的债务人，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的资金转移。2003 – 2006年四年间，贫穷国家偿还的资金额比其得到的多了1850亿美元，它们必须偿还债务和利息。然而，越来越重要的私人资本流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抵消了这些支付。在同样的四年中，流入贫穷国家的私人资本为1.9万亿美元，盈余从2002年的1690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6470亿美元。这个差别就是来自发达国家的私人金融家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投资和所得之间的差别。这种外来的刺激对推动发展本国储蓄和资本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大部分外来资本采取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形式。其次是购买政府债券（债务融资），并最终用于投资金融市场（包括证券交易）。

最大的资本流动是在最富裕的国家之间进行的，其形式大多是直接投资以及公司的合并和收购。虽然这样的资本流动在短期内并不能增加资本总量，但是可以通过将资本派往能为股东获取更高利润的地方而使其分配更加优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资本总量在长期看来是增加的。仅2006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在其国外的直接投资就达到1.1万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了29%。1997 – 2006年的10年间，这些国家的国外直接投资总量超过8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的投资额为1.6万亿美元。有趣的是，比利时和卢森堡两国的投资总额加在一起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为1.2万亿美元。这不是因为

这两个国家的公民有大量可以用于投资的闲余资本，而是因为这些国家有许多各种从事专业投资操作的私有财产组织和公司，而且这些公司往往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投资额排名第三的是英国，刚刚超过1万亿美元，接着是法国，0.9万亿美元。

正统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达国家过剩的储蓄应该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但有时相反的情况也同样存在。这条“规律”最极端的例外便是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中国将其巨额贸易盈余和经常项目盈余投向比其富裕的美国经济中，而美国则陷于结构性的双逆差中（即贸易和预算逆差）。

较低的汇率刺激出口，而出口则是生产、就业和政府收入增长的引擎。当单位外币（例如美元）可以购买更多单位的本国货币时，就意味着汇率下降。当本国汇率较低时，本国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包括最富裕国家的市场及美国市场）就处于有利地位。因为与本国货币更为坚挺时（即汇率更高时）相比，从出口中获得的每个美元都可以兑换更多的本国货币。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越坚挺，就越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波兰所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

当出口收入未被完全利用时，就出现资本盈余，这些盈余将被投资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富裕国家发行的政府债券。这些盈余资本也可以用于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这种情况正越来越普遍。而且，这也是可行的，因为一些较贫穷国家由于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较为落后，都拥有大量的储蓄（超过了非常高的投资水平的储蓄）。因此，它们必须将自己的资本盈余“推到”世界其他经济体中，而它们更愿意把这些资本放到有贸易和预算赤字的富裕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东南亚国家之所以有非常高的国内储蓄率，是因为其公民没有足够的保证在未来遇到资金困难时一定能借到钱，这就使得储蓄很有必要。既然国内“没什么可以投资的”，他们就把钱投向国外。不考虑对新生产形式和服务形式的直接投资，在中国、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或台湾地区，以及石油出口国（包括俄罗斯），将资金投入“硬资产”（例如新建的高楼或其他类型的房地产），要比将其投向或多或少有些复杂的国内证券市场容易得多。或许国内证券量不够大，不足以到处流动，或许人们对这些证券还没有足够的信任。将资本投向国外则更为安全，这样存款会比在国内受到更好的保护。

如果是由于这些原因造成世界经济的不平衡，那么这种情况的改变不可能很快实现。这不仅因为美国结束其双逆差、以及其他高度发达国家的预算赤字得到限制

需要很长时间，还因为要使有资本盈余的这些国家的金融系统成熟起来需要花费比其完善实体经济更长的时间。尽管有些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系统还很落后，但是他们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与富裕国家相当。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购买产自韩国和台湾地区的mp3播放器或等离子电视，但是如果涉及到购买金融衍生产品或股票，我们就会购买美国或英国的。而且，像韩国和台湾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其“议会”偶尔还会出现某些小的冲突，但是像在英国或美国，这样的情况一般只会出现在善编故事的导游口中，这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独特地位是其有利条件之一。从国外涌入的资金流抬高了美国资产的市场价格，也使得美国能够将其利息控制在较低水平。利息是资本的价格，因为资本很充裕，所以没有必要提高利息。这两个因素使得美国为其国内支出融资变得更为简单。从外部而言，美国的国外资产大于其债务，这些资产的收益也远大于支付债务所需的利息。

美国谨慎的货币政策所支持的疲软的美元，是该国重要的买卖。下面我们就来展示这个机制是如何工作的。外国投资者通过在美国投资所赚取的收入主要是美元，而美国在国外市场的直接投资和分红主要是外国货币。最近几年美元汇率的下降意味着，就美元而言美国的外国资产增加了。与此类似，就美元而言，美国欠国外投资者的净债务（总债务减去国外资产）减少了。于是，到2005年年底，美国的国外资产收入大于美国向那些拥有美国资产的国外投资者的支出。

以下就是一个例子。当兹罗提兑美元的汇率为4:1时，华尔街的组合投资者们购买下10亿美元波兰的国债。出于交易考虑，他们把这10亿美元兑换成兹罗提，因为他们必须用波兰的货币进行购买。最终，这10亿美元被存入波兰央行——波兰国家银行，成为波兰的外汇储备，并且价值为40亿兹罗提。波兰国家银行用这笔钱购买美国的公债。假设美国和波兰公债的利息都是每年5%（实际上波兰公债的利息更高）。接着，美元开始持续变疲软，而兹罗提开始变得坚挺。这时，美国人的海外账户中仍然有40亿兹罗提，只是现在兹罗提与美元的汇率变成2.5:1。于是，波兰国家银行就损失了15亿兹罗提的纳税人的钱。到支付股息时，两个国家都开始计算支出和收入的贸易支付差额。就美国一方而言，应向波兰年支付5000万美元，波兰的年收入也是5000万美元，但以目前的汇率计算这些美元只值1.25亿兹罗提。同时，美国将因其对波兰国债的10亿美元的投资获得2亿兹罗提的利息收入，这个支付利息

以目前的汇率计算价值8000万美元，这项款额属于美国贸易支付差额中收入的那一项。由于汇率的变化，美国获得了3000万美元（至少占其最初投资的3%），这就是他们所支付和所得收益之间的差额。这一切都是因为汇率的变化，即美元变疲软兹罗提变坚挺，使得美国获利颇丰而波兰付出沉重代价。即使完全不计利息，美国人通过将波兰货币借给波兰（他们可以买到波兰货币），就拿到这笔钱60%的收益。他们最初只买了10亿美元，现在所持有的是16亿美元。波兰则损失了这笔钱的37.5%，它最初有40亿兹罗提，现在只剩下25亿兹罗提。在世界各地，许多数十亿美元的交易正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着。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现实。它展示了通过操纵汇率可以很容易地影响经常项目收支，并形成对本国纳税人和国家经济有利的贸易支付差额。需要补充的是，如果按本国货币计算，汇率下降将使国家的出口所得增加。美国在波兰销售价值250兹罗提的商品就可以收入100美元；而之前当美元更为坚挺的时候，出口同样价值250兹罗提的商品收入仅为62.5美元，比前者少了37.5%。美元相对疲软有利于美国出口的增长，于是，其国内生产总值、就业率和国家预算收入也就会相应增加，反之亦然。美元贬值（以及兹罗提的相应升值）改善了美国的商业气候，但同时牵制了波兰经济的扩张。相对疲软的美元改善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而相对坚挺的兹罗提则对波兰的国际收支平衡造成压力。对美国的工人、消费者和纳税人而言，美元相对疲软是好消息，但对波兰的工人、消费者和纳税人来说，兹罗提的相对坚挺就是坏消息。

除了在国外度假变得便宜之外，较坚挺的兹罗提的唯一好处是，按本国货币支付外债时成本变低，因为现在每1美元外债还本付息时只需2.5兹罗提。此外，相对于升值了的波兰本国货币，进口的货物价格也相对较便宜。现在，进口100美元的商品需要花费250兹罗提（汇率是2.5:1），而当过去汇率是4:1时，则需要花费400兹罗提。兹罗提较坚挺时，通货膨胀水平也相对较低，但这是相对于假设兹罗提始终维持在比较疲软的情况而言的。事实上，其他的因素也会推高价格引起通货膨胀。反之亦然，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价值有所降低（不是“贬值”，贬值是指官方汇率的单次改变），于是，进口商品更加昂贵，因为购买与以往外币价值相同的商品时，需要花费更多的本国货币。在美国，在兹罗提兑美元汇率为2.5:1的情况下，购买价值100兹罗提的商品需要40美元，而当兹罗提兑美元汇率为4:1，则只需花费25美元。美国的通胀水平相

对较高，对于美国人来说，到国外度假也更加昂贵。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几年美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不再那么频繁光顾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他们担心恐怖主义。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正因为这样的情形比较频繁，也正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中可以获利很多，因此，美国坚持一种有意使美元维持在相对疲软状态的谨慎货币政策。而美国给其他国家的建议却恰恰相反，这也是美国货币政策的一部分。美国一贯奉行的格言是“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有趣的是，有太多的国家落入美国这个圈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

其他国家应该怎样捍卫自己的利益呢？理论上说，最好既不要有赤字，也不要有外债，以避免暴露于这种投机的债务博弈中。然而，正如我们所知，世界上没有外债的只有列支敦士登和帕劳群岛。出于不同的原因考虑，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决定要经营债务。那么，最明智的解决办法就是降低外债的规模，同时也减少外汇储备。这正是美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正在做的事，至少是正在部分这样做。这种方法需要政府和中央银行之间的相互配合。尽管该方法的合理性不言而喻，但是很多国家发现很难实现，因为它们面对的是比较独立的央行。

最近，波兰的外债稍稍超过外汇储备水平。2006年，波兰的外债是589亿美元，2007年上升为600亿美元，占波兰所有债务的40%，其他债务是私人部门和个人的债务。2008年年初，波兰的外汇储备是1450亿兹罗提（按当年3月初的汇率计算是626亿美元），稍稍超过1420亿兹罗提（613亿美元）的外债[11]。在这种情况下，波兰完全可以拿出一半的外汇储备，来偿还一半的外债，且不会对国家的金融安全造成任何损害，同时还可以不用为一半的政府公债支付利息，减轻了预算和纳税人的负担。由于外债的平均利息为5.3%，外汇储备的平均利息为3.2%，上述做法将净节约16亿兹罗提（按市场汇率计算，减少的300亿美元外债乘以2.1%的利息差所得）。这笔节省下来的钱可以用到国家预算中。一方面，因为外汇储备的减少，政府从央行那里得到的利润将下降。这些利润的95%一般都归政府所有（2006年的利润为26亿兹罗提，其中95.38%，即24.8亿兹罗提作为政府年收入）；另一方面，节约下来的16亿兹罗提体现了这两组数据之间的差别，这显然是一种增益。

此外，有外债的国家也可以限制资本的投资活动，从而缓解货币的升值压力。可以使用一些特殊的财政工具来阻止投机交易。早在20世纪70年代，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就已经提出类似的工具。他建议，在世

界现货外汇交易中，引进一种全球统一的交易税，税率为0.1－2.5%，被称为“托宾税”。这样小的交易税足以减少纯粹的投机性交易，而目前这种由少量现金参与的投机性交易非常频繁。这种投机交易想要持续下去，那么每次外汇交易的所得就必须高于税收额。假如在兹罗提兑欧元的汇率为4.3:1时（与后来较坚挺的兹罗提相比，这个汇率对经济更有利），波兰引进了税率为0.25%的交易税，那么在每兹罗提的通胀少于0.01075的情况下，投机交易就显得没有意义了。当几十亿兹罗提在甚至比这个通胀额更小的通胀下交易时，也会产生几百万兹罗提的收益。了解事情如何发生以及谁受益谁付账很重要。

尽管20世纪90年代时，智利实施了类似的财政政策，并在一段时期内获得了成功，但是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对“托宾税”的建议始终保持沉默。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又重新使这个话题受到关注。1998年，当我在耶鲁大学授课时，我和托宾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他非常清楚，引进这样一个合理的工具受阻主要原因不是各种实质性的争论，而是由于华尔街、金融家及其在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和枪手们的私人利益。有关这个主题的论著反映了这些讨论和经济政策中某些积极的举措[12]。

一些国家通过积极的汇率政策使得泛滥的投机交易得到遏制。目前，波兰国家银行的政策就遏制了这种投机。然而，这种政策成为必要，更主要是因为其他因素使得货币过度升值以致无法通过调整利率来吸引短期投资。在波兰和欧盟的其他新成员国中，很少有国家的利率高于欧洲中央银行设定的利率。但是，利率因素的作用相对较小。另一方面，资本从国外流入主要是出于利润回报和风险评估的考虑，目前，风险越来越小，货币的升值使得利润变得非常可观。因此，通胀既是资本流入的结果，也是其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中央银行积极地参与一个国家汇率的形成，引导汇率机制并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抑制通胀。如果不能成功做到这一点，就会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甚至减缓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且在货币政策中出现本质性的错误。

其他国家或地区设立了一个所谓的货币发行局，并将本国汇率变化严格地与某几种外币挂钩。香港就是把港币与美元挂钩，爱沙尼亚、立陶宛和保加利亚则将其货币与欧元挂钩，有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与英镑挂钩。另外一些国家则不止采取一种方法，还包括使用行政手段和央行的干预，如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很多非洲和加勒比国家。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则保持一种稳定的名义汇率。由于通胀，稳定

的名义汇率导致由通胀引起的实际货币的贬值，这反过来又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这是一种双重收益：既阻止了外国投机资本赚取本国纳税人的钱，又使本国出口部门的企业和员工处于有利地位。

从长期看，美国经济和金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恢复到健康状态。但是，现在还没有必要对美国经济的前景表示怀疑，它严重的不平衡状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13]。不过，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因为这一切都必须结束。其中，一定会结束的是贫穷国家借钱给富裕国家的荒谬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长期预测显示，如果汇率市场不发生任何改变，那么经常项目严重的收支不平衡将会持续下去，这里指的是人民币和日元。目前状况的持续将导致中国和日本持有的资产规模空前膨胀，而美国的负债也会发展到一种难以想象的地步。这将导致美国的外债大幅上升，从目前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6%上升为2011年的51%。

这种预测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外国投资者将美国投资视为安全的情况还会持续多久？显然，它们已经不安全了。美国面临的情况也许就像以前许多穷国陷入债务陷阱之中的情况一样。为了吸引外国资本来为其双逆差融资，美国必须采取措施使其市场更具吸引力。这将使它损失惨重，因为要达到这种效果就必须提高利率。现在要把美国在国外投资的资本收回来已经为时太晚，因为这些资本在国外比在国内更加利润丰厚。到了该强制节约的时候了，美国自己现在也应该使用这些年来它督促别人使用的策略了。

对于所有关注这些问题的人而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随之出现的世界金融危机或许是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没有其他更有创造性或更明智的方法来摆脱如此严重的失衡状态了。这包括预算的大幅削减（对于美国来说尤其是军事预算的削减）以及更高的税收。生态税或许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征税将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经济增长速度必须放缓，甚至还需要限制绝对收入；这也意味着要限制消费，尤其是富裕阶层的消费。但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到来之前，似乎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因此，我们应该促使危机发生，以便促成危机过后的一些必要改变。

这虽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但这是事实。世界经济中不存在一种自发的机制来使金融不平衡的状态复原。干涉是必要的，而且不再局限于国家层面，而是世界层面。人们的警惕性已经丧失了，因为过去十几年的经验表明，经常项目上出现的收支不平衡可以远远超出过去人们所认可的水平。对此，往好的或坏的方向的利用都存在。新的

金融工具出现了。所有这一切会使得管理金融出现风险、资本市场出现风险，甚至还会引发更大的风险。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利用不要偏离得太远。

那么，地球上的状况发生改变了吗？人类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全球经济是在朝着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变化？世界已经转变成一个不同的世界。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世界的模样。但是，每个人所看到的又都不一样。因此，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更好地了解世界，并弄清世界的本来面目。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自己能理解的世界。

注释：

1. 要了解丢勒对艺术的巨大贡献，可以参看保罗·约翰逊的《创造者们》，纽约：哈珀科林斯出版公司，2006。

2.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世界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论和数据计算，可参看鲍勃·萨特克里夫的《世界不均衡以及全球化的后记》，《牛津经济政策评论》，2004年春季刊，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

3. 要了解用于构造人类发展指数的方法以及每个国家人类发展指数的数据和组成部分，可参见《世界发展指标》（华盛顿：世界银行，2007年）以及《发展与下一代：世界发展报告》（华盛顿：世界银行，2007年）等。

4. 见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报告（2007年）《构建更安全的未来：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www.who.int。

5. 阿玛蒂亚·森：《自由式发展》，纽约：阿尔弗莱德·A·科诺夫出版公司，2000年。

6. 自由之家在其网站上提供了计算方法和详细的数据，参见 www.freedomhouse.org。

7. 更多关于传统基金会的排名信息可以参考它的网站，www.heritage.org。

8. 比尤恩·隆伯格：《多疑的环境保护论者：衡量世界的真实情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

9. 这些数据来源于《经济学人》信息部2007年8月发布的2007年赤字预报。

10. www.cia.gov。

11. 2008年1月底，官方储备资产是462亿欧元，相当于686亿美元或1678亿波兰兹罗提。

12. 帕里克什·K·巴素：《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经济的可持续性》，《全球经济季刊》，2002年第3期，145－162页；迪帕克·达斯古普塔、马克·乌赞和多米尼克·威尔森：《没有危机的资本流动？资本运动和经济稳定性之间的妥协》，伦敦和纽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1年。

13. 本·S·伯尔耐克：《全球经济一体化：哪些是新事物，哪些不是？》；杰克逊·豪尔在美联储银行在堪萨斯州举办的三十周年经济峰会上的演讲，2006年8月25日，www.federalreserve.gov。

第六章　新自由主义的没落及其空洞的遗产

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曾经风靡一时、祸害半个世界，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对待新自由主义

即使在经济繁荣的年代，无价值的思想也不会产生什么有价值的结果。

如果上一代人没有受到新自由主义浪潮的猛烈侵袭，我们现在的世界将会更美好、更进步、更平等；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未来将更加灿烂。像新自由主义这样以牺牲大部分人利益来满足少数人利益需求的政治经济理论为何被人们如此推崇并获得如此大的话语权呢？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学领域虽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关于概念、现象和过程方面的混淆和失误仍然存在，因此，这个学科至今还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比如，术语混用，用不同术语来指代同一个范畴，或者同一个术语被用来解释各种现象和过程。用词严谨是论证和达意的关键，但有时候由于概念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很难做到严谨。

很多学者提到“社会市场经济”（Solial market economy）这个词，它究竟指什么？还有一些学者错误地将“新自由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等同起来，那么“新自由主义”又指什么？如果“新自由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真的可以等同起来，将很难就以下观点达成共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毫无疑问

是正确的理论，因为在历史上，特别是刚刚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根据这个理论制定的经济政策在实践中印证了其理论假设的正确性[1]。从方法论和科学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偏离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必须对这二者加以区分。这样就得到一个很清晰的结论，即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没有在实践中取得成效，因为遵循这个理论并没有实现金融、社会、生态各方面的长期平衡增长以及经济的发展。因此，新自由主义是错误的理论。

上个世纪的70年代，高度通货膨胀几乎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尤其是1973－1974年间价格的大幅波动，在随后的80年代，几乎没有国家能够幸免。在当今的这20年间（特别是中间的几年）通货膨胀的恶劣程度让我们难以置信：在几个最发达的国家，消费品价格的年增长率一度达到两位数。情况最糟糕的是1980年，英国和美国在这一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达到了18%和13.5%。在一些发达程度稍低的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通货膨胀也开始肆虐起来。与此同时，其他各种需求限制也相对遏制了经济的增长，从而结束了长达25年的战后经济繁荣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经济“滞胀”（stagflation）[2] 的历史阶段。这段时期通胀率很高，失业率居高不下且持续上升，产出率水平较低且不断下降。在最严峻的时期，甚至出现经济衰退和生产停滞的情形，所以称之为“滞胀”。这一时期的另一个术语，“萧条膨胀（slumpflation）”包含通货膨胀和产出下降两层意思，也就是经济衰退。

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采纳价格调控机制，虽然避免了经济滞胀大浪潮的袭击，但仍然感受到供给日益不足的压力。这些国家的体制存在固有的缺陷，也缺乏强有力的资本分配机制，同时因为软预算约束而长期面临供求失衡。所以，当它们受到外部价格冲击的影响之后，后果更加严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体制决定了货币供给必须与需求相适应，而不是像资本主义体制那样，货币需求必须与供给相适应。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免遭1973－1974年的价格冲击，但它们奉行的中央计划经济却逐渐瓦解，即便对市场进行各种改革也无济于事。计划经济溃败的原因在于缺少科技竞争力以及对新思想、新人才、新事物缺乏足够的开放。政府的价格调控机制只是暂时抑制了通货膨胀，延迟其爆发的时间，但并没有真正阻止通货膨胀的爆发。

价格上涨引起的公开的通货膨胀（Open inflation）虽然有净化市场的作用，却严重打击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受到结构性供应短缺

的侵蚀，这其实是通货膨胀被抑制后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根据自己对这一现象的观察，创立了一套全新的短缺经济学理论[3]。科尔奈认为，短缺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消除的现象，其根源在于生产方式的国有化以及对经济过程的官僚控制。此前在就市场改革方向和方法以及抑制经济领域中不平等现象的讨论中，我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短胀"（shortageflation）[4]。这个词虽然在经济学文献中能找到，却不如"滞胀"受欢迎。

短胀综合症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选择复苏途径上存在根本分歧。社会主义经济面临的困境是到底选择更高（价）的、公开的通货膨胀和轻度短缺（通货膨胀被抑制后随之而来的症状），还是选择更低（价）的通货膨胀和高度短缺。而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的选择曾一度像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描述的那样：是高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还是低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5]。埃德蒙德·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6]就相关问题做了30年的理论研究，并获得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上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涌现的经济学新理论必须获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才能让费尔普斯这样的经济学家得到认可，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不幸的是，经济理论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可能被曲解而不符合理论学家自身的观点，特别是受政治权力干预的时候，这种事情时有发生。

劳动者和投资者（这些人工作非常努力）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没有人喜欢通货膨胀，甚至连政治家也不喜欢。通货膨胀打击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价格变动向生产方和投资者传达的是错误信息，而他们对信息极为依赖，如此一来，经济的总体效率也就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局面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凯恩斯主义关于操控总需求以刺激经济环境的理论也无法力挽狂澜。虽然通货膨胀通常是因供给方面出现问题（生产成本增加，尤其是原材料成本增加）而起，但如果不惜造成财政赤字、通过财政手段来额外地加大需求则只会恶化通货膨胀，从而导致价格螺旋式上升。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发生的，因此需另辟蹊径。于是，当供应经济学和货币主义新鲜出炉，便如之前的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一样深受青睐。从美国罗斯福"新政"开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两个流派在经济学领域活跃了三四十年。

新流派将通货膨胀作为纯粹的货币现象来研究，认为制止通货膨胀需要采取约束性的货币政策，还需要削减公众消费来降低需求，它很快得到大众包括政府的拥

护和支持。1979年，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上台执政。不久，美国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入主白宫。撒切尔夫人高呼“我们别无选择”，这口号喊得令人困惑却足够响亮。这些政府首脑发表豪言壮语，表现得信誓旦旦，深深感染了那些希望时局稳定、经济正常发展的民众。这不仅是资本家、金融界和商界的共同愿望，同时也是工人阶层的心声，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工人们这时候也意识到形势危如累卵，他们组织工会运动，虽一次次被平息，但仍以弱势群体的身份据理力争，仿佛自己真的别无选择。

当然，他们还是有选择的。但选择的不是中国的经济模式，因为这时还没有人谈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也不是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模式，因为苏联和东欧的神话已经开始逐渐幻灭。相反，发达国家的市场资本主义需要的是现实的经济发展道路。从冷战开始，发展中国家曾就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一直争论不休。西方国家则杜绝一切社会主义的东西，甚至连西欧和北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也一概不予考虑。同时，西方也很难采用日本的经济模式，原因在于文化差异和日本经济结构自身的危机——此时日本的经济“奇迹”已慢慢走向终结。经济滞胀和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滋生的土壤，使得新自由主义能够强势出击，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蔓延，其势力一直扩展到发达程度较低的国家。这些国家在目睹社会主义崩溃的现实之后对新自由主义的热情与日俱增。

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流派，新自由主义宣扬自由市场和私有企业具有至高地位的观点，排斥国家、社会的干预，同时主张制定新自由主义政策，限制国家对经济的影响。从美国和英国开始，再到新西兰、澳大利亚，期间还有加拿大和冰岛，在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关于新自由主义流派的理论和实践并驾齐驱，相辅相成。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在恢复国民经济方面都获得巨大成功。他们将先前属于意识和理性范畴的流行思潮成功地转化为政治上的主流思想。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洞察的一样：“他们巩固了一批新自由主义力量，成功领导了大部分民众，这些已经成为让后面一代代政府首脑难以抹杀的遗产。也许克林顿总统和布莱尔（Tony Blair）首相是他们成功的最佳见证人，因为这两位后来的国家领导人都面临同样的处境，就是自己很难有所作为，只得违背自己的直觉而去沿袭前人的所作所为，继续着恢复统治阶级权利的进程。”[7]

新自由主义因困境而生，并附送给我们一个礼物。困境是拉美国家的经济结构

危机，礼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

中美和南美国家此时面临着赤字和通货膨胀螺旋式恶化的局面，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开始衰退。政府公债、国外公债日益加重，政治动乱也随之而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事实上，富强的大国不会为拉美国家的老百姓忧心，他们更关心政治风险，尤其关心自己从这些国家购买的债券能不能兑现。智利社会主义政权的首脑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曾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烦恼不堪。作为民主党派人士，阿连德于1970年当选为智利总统，三年后即被皮诺切特（Pinochet）的军政权用武力残忍地推翻，而皮诺切特背后则有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扶植。拉美国家的政府没有必要针对企业进行彻底、迅速的私有化，也可以开始国有化，没有人希望重蹈智利的覆辙。但后来“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诞生使世界发生了改变。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共识从来没有存在过，甚至从1989年里根政权末期开始到老布什执政初期这段时间，连在华盛顿都没达成共识。1981年推出的里根经济政策（Reaganomics）广受欢迎，与此同时，争议声也此起彼伏。然而，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一致认同“华盛顿共识”，认为应该实施这个共识的相关政策，以确保拉美国家的经济产出有足够的剩余来偿还国债。一方面，经济需要增长，另一方面，战利品也要合理地瓜分。债权国的企业和资本应该通过更好的途径进入债务国的市场。债务国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其他国家，他们需要“兴”起来，这样市场才能被更好地渗透。这就是“新兴市场”这个新词语的来源，这个词在过去一二十年间非常流行。

与“华盛顿共识”相关的文献非常丰富，评判的观点基本上是毁誉参半[8]，但近年来，支持“华盛顿共识”的人越来越少。“华盛顿共识”成为当时经济领域最晦涩的专业词汇之一，原因是这个词的概念解释起来可以很灵活，外延广到甚至被用来表述关联性极小的现象，这其实违背了“华盛顿共识”创立者的初衷[9]。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过渡时期，由于受货币主义观点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派全面推行了一项新经济政策，并大受欢迎。新政策主张实行快速、彻底的私有化，推行价格、贸易以及资本转移的自由化，同时针对政府预算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实施严厉的财政管理。这项新政策的本质缺陷在于，没有重视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和社会因素，同时忽略了针对文化差异进行适应性调整的必要性。

新经济政策的理念影响深远：大到美国政府的主要部门，小到各个研究中心、咨询公司以及华盛顿的媒体，新经济政策很快成了形势分析和方针制定的首要理论依据，左右着民众的观点和意识，影响甚至波及到国际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些实际由美国操纵的大型国际金融组织。结果，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标准和政策，并推销给其他国家，甚至强迫一些国家的政府去贯彻落实，而这些国家不是在经济上依赖美国就是向国际组织申请过资助。有传闻说，美国和其他富国故意放债给穷国，以便控制穷国、垄断其经济命脉，从而达到赚取私利的目的[10]。这种传闻还是有一些证据支撑的，不能一概否认。如今虽已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却应另当别论。

拉美国家自身无法摆脱的债务危机与当时美国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交汇，才导致了“华盛顿共识”的诞生。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访问专家，我有幸得以更仔细地研究新自由主义鼎盛一时的原因，为何它对地球上另外一块区域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就在90年代初，美国政府收到了它的礼物：社会主义制度崩溃，苏联解体。如果有例外的话，可能是古巴和朝鲜。然而，让世人震惊的是中国，中国“没有被摧毁”，在这片土地上涌现出大量寻求治国良策、奋力致富的中国人，整个世界经济都因此受到了长远的影响。

随后，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由最初的几个、十几个最终发展到30多个。西方国家对此毫无准备，它们只经历过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而这并不完全符合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还有就是“华盛顿共识”，一套为完全不同的形势制定的经济政策。然而，新自由主义学派感觉这是他们人生中遇到的最佳时机，不能错过。新自由主义学派包括与“华盛顿共识”类似的流派可乘此机会掌控世界上绝大部分区域。事实上，这个时机得到了充分利用，新自由主义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了顶峰。

中东欧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为新自由主义思潮提供了蔓延的土壤，其肥沃程度较拉美国家更甚，尽管拉美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在一些经济转型的亚洲国家，新自由主义曾一度占主导地位。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瓦解之前始终固步自封，对外界的改革浪潮一无所知，例如老挝和蒙古。美国曾将老挝和蒙古分别“交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处理。但真正的战争不是在湄公谷或蒙古大草原爆发的，最终决定性的一战即冷战是在波兰爆发的。

对西方国家来说，先前中东欧国家的市场要么远在遥不可及的大草原，要么

完全被“铁幕”（Iron Curtain）屏蔽。社会主义瓦解之后，这些市场逐渐开放，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这让西方国家分外惊喜。富国的商品和资本（包括直接投资和短期的投机性组合投资）能否进入穷国市场取决于这些市场允许外界渗入的速度和范围。新自由主义具有系统的理念、强大的说服力及煽动力，因此当仁不让地成为富国向中东欧推销的法宝，以加快并加大穷国市场的开放进程和范围。

美国和英国尤其积极。美英两国有很多相似点，都有大量的闲置资金，都在他国寻找有利的投资机会。此时，日本已经面临持久的经济危机，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非洲又丝毫没有诱惑力，拉丁美洲刚刚破产。因此，只有中东欧地区才是英美两国的兴趣点所在，他们只需帮助这里的市场“兴起来”，慢慢向外开放。但这并非“芝麻开门”那么简单，因为中东欧市场的大门闭得紧紧的。

从政治意义上来说，美国进一步削弱苏联是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和全球霸权的野心，这点不难理解。英国作为美国的同盟国，同样别有私心。

苏联解体的消息一出，举世震惊。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当时的形势，苏联本可以再支撑下去。如今，我们可以假设出很多种让苏联延续的方案。我曾问过弗朗西斯·福山，苏联有没有出现其他结局的可能，他回答说当然有。他认为如果保守党领袖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1984年去世）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1985年去世）其中的任何一位当时还在世的话，情形就会有所不同。我觉得福山的观点很有趣，因为我自己曾做过反方向的猜想：假如戈尔巴乔夫早点上台执政，比如早十年上台，那么苏联可能不会解体。戈尔巴乔夫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为世界做出过巨大贡献。上世纪90年代末，我问过戈尔巴乔夫本人是否也认为如果叶利钦在90年代初期就从他手中接过政权的话，苏联就不会解体，他毫不犹豫地说是的。也许这种假设真的成立，因为最后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是只有解散苏共联盟才能掌握俄罗斯的政权。叶利钦起初只是决心统治俄罗斯，到后来才开始考虑怎么才能统治俄罗斯。

其他世界强国也参与到新自由主义的游戏中，只是有的三心二意，有的则心不在焉，至于为何如此，原因各种各样：日本依然危机缠身，即使没有危机，日本也会排除中东欧而将东南亚国家视为其经济渗透的首要目标；德国虽然与中东欧近在咫尺，但却一心忙于消耗巨资以便尽早完成自身的统一大业，因而无暇顾及其他。而北欧所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加起来还不及波兰，在经济上根本没什么用

途，毕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是在华盛顿和纽约的华尔街，而不是哥本哈根或斯德哥尔摩。芬兰本身是苏联解体的受害者，但同时也因为苏联解体得到一些经济实惠。法国和意大利也有自己的问题要处理：意大利面临的主要是国内问题；而法国面临的是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前非洲殖民地的问题。于是，美国和英国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最佳试验场，新自由主义在美英两国一时风光无限。随后，新自由主义作为解决中东欧国家一连串问题的良方被推广是完全正常的。英美两国希望能向中东欧市场注入商品和资金，而通常提建议比直接给钱更容易。而这次，美英两国向外推销的不光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还有资本和商品，等于是买一送一。

中东欧国家也需要英美国家的资本。波兰是第一个提出需求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在戒严法保护下，波兰实施了一系列体制改革方案，80年代末波兰的经济改革进入了所谓的第二阶段，迫切希望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同样欢迎市场经济的中东欧国家还有匈牙利。社会主义制度瓦解后，波兰寻找另一种制度来替代社会主义的愿望日渐强烈。苏联深陷于自身的矛盾，显然无力干涉波兰。德国也被自己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从而无心向这位东边的邻国介绍自己那套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之后，波兰团结工会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共反政府思潮，很多政治家都希望在本国效仿并实施国外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他们甚至提出了一个具有本土意味的天真口号，即“休克疗法”，并且跃跃欲试。

新自由主义否定国家的作用，意在为少数群体谋求利益而牺牲大众利益。因此，在波兰，提倡新自由主义就等于违反传统宏观经济的一切理论，并且也是与1989年波兰“圆桌会议”上所达成的所有协议公然唱反调，更重要的是与大众意愿背道而驰。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Berlin Wall）终于被推倒，这种矛盾更加激化。

宣传新自由主义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加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切皆有可能”等诸如此类的口号满天飞。那是一个形势突转的秋季，当时的波兰总理马佐维其（Tadeusz Mazowiecki）在其就任演说里就建设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民主工程作了简要声明（在之后的宪法中也有纯形式上的体现）。由于受到来自各国尤其是美英两国的经济顾问施加的压力，新自由主义突然以更极端的形式在波兰被推行。这些经济顾问的专业素质并不高，他们充当了雇主的工具，并为其追逐更多利益，不过他们自己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然，会有很多来自本国的权力机构以各种方式为他们提供活动经费。

让人不解的是，马佐维其总理至今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当时的决策彻底地改变了波兰的经济体制。2007年夏天，我和他谈到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他不认为波兰的经济体制经历过什么转折点，他当时只是准备就经济结构改革制定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他看来，他所做的仅仅是让“圆桌会议”上达成的协议更快地被摒弃，而这个意图在他被提名为组阁成员时就已经公开表明了。新政府成员一致认为政府不应该涉足企业的经营而应该完全放手，他认为这才是转折点。站在这种新立场，政府重新审视了经济结构的现状，并选择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除非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际上是社会市场经济），从而取代了之前“圆桌会议”上团结工会提倡的国有－私有并存的经济制度。我认为这其实是马佐维其总理个人的意愿，其他人显然不希望这样。

我曾是波兰部长会议经济委员会（Economics Council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的一名委员，这个机构不大，1989年至1991年期间曾由维特尔德·特塞西亚考斯基（Witold Trzeciakowski）教授领导。在此期间，我们进行了多次的专业话题讨论，只是很少受到关注。我还担任该部长会议金融研究院的院长，该研究院负责发表经济评论，就政府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有些成员提出的建议受到了政府的采纳。部长会议里有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背后都有七国集团的扶持。有趣的是，这些平时都非常积极的专家也认为当时的经济自由化、稳定化政策太过激进，主张缓进，但事实未能如他们所愿。

教条主义思想一时间占了上风。一些经济顾问似乎心急如焚，渴望在这个活生生的国家验证他们的设想。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切既知的私有化方法，包括一些完全新定的方案，都投入试用，几乎所有可能性的汇率机制都被尝试。五花八门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统统被试用，然后再按照自由化的两个极端作相应调整。于是，波兰出现了华沙版本的“华盛顿共识”，根据这个版本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工程浩大，为之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也为波兰社会带来更多的灾难。

如此不辨是非地搞新自由主义，其实不符合当时波兰的国情。不幸的是，“休克疗法”跟新自由主义一样也受到了青睐。当时掌控波兰政府经济政策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赞成实行“休克疗法”（要是放在先前，他也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政府对实施“休克疗法”的后果并不完全了解，只是迫于时局的压力，同时受到某些

观点的牵制，才不得已而为之。而事实上，“休克疗法”带来了大量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如货币过度贬值、商业信贷背负巨额利率），而疗效却微乎其微。一方面，经济自由化的概念与市场经济相混淆，没有被正确理解。另一方面，在稳定经济的过程中，很多涉及财政、货币方面的措施都没有得到正确实施，从而无法达到既定目标；同时，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建设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社会因素的重要性也被忽略了。

“休克疗法”有些措施是正确的，如针对价格不断进行彻底的自由化以及引进国内货币自由兑换政策。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大错已铸就的事实，因为整套措施自身就有缺陷，执行起来也不够熟练[11]。事实上，有人曾敲响过警钟，但对即将出现的困境，政府却浑然不觉。政府对制定这套政策的一小群人太过信任，结果，这群人的盲目乐观如同咒语一样使一切化为泡影。从国家高层官员，到经济学家、经济顾问，以及一些趋时附势的媒体，他们依然在民间大肆游说，散播那套“别无选择”的言辞，并就经济发展的新气象夸夸其谈，蛊惑民众，而真正有见识的经济学家早就看出了破绽[12]。从波兰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国民大众的利益来看，“休克疗法”的经济言论毫无意义。但由于当时国内的政治氛围和国外的压力，波兰政府竟然真的选择去实施“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这个提法并不高明，只是“休克”和“疗法”两个概念关系紧密，因此会让人误以为前者必然会导致后者。照此逻辑，“休克失败”（ shock failure ）和“渐进疗法”（ gradual therapy ）也说得过去。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波兰政府接受了“休克疗法”，而它的失败给各个群体和地区的波兰人带来的负面影响一直延续到20年后的今天。

* * *

“休克疗法”就是这样在中东欧地区最大的后社会主义国家——波兰首次实施了，从而为其他国家的经济转型拉开了序幕。几年后，由于波兰政府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政策上作了重要调整，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快速增长。有人便开始声称这是之前新自由主义实验产生的正面效应，只是比预想的时间来的要晚，这种观点显然出于心理和政治层面的动机。事实上，这段时间波兰经济确实出现了相对增长。

1994－1997年间，波兰经济增长趋势明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28%，波兰也在此期间加入了经合组织。但是这些成就不是“休克疗法”带来的，相反，我们应该说波兰经济终于摆脱了“休克疗法”的阴影。将后来的经济增长归功于之前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特别是1989－1991年这三年）的人都犯了因果谬误。“休克疗法”以失败告终，虽然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却带来更多其他不必要的麻烦。总的算来，根据“休克疗法”制定的政策所消耗的代价不仅比预想的要高，而且也远远高于实际需要的消耗；同时，收到的效益不仅比期望的少，也远远少于应该取得的效益。还有比这更好的证据来证明这套新自由主义政策没有意义且不合理吗？

从1989年年中开始一直到1992年年中，波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0%，可以说是“休克失败”时期。随后又进入了一段“渐进疗法”时期，经济又有一定的增长。1998年到2001年期间，由于政策不当，经济增长速度由7%降为零增长。其间，新自由主义举措过多，同时与右派平民主义完全排斥，使得后期情形出现恶化，否则，今天波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89年可能会高出170%，而不只是70%。这并非空谈：在上世纪90年代，波兰如果进行更透彻的体制改革，不过分求新也不过分强调稳定经济，同时在90年代中期，没有对经济发展有所懈怠，继续实施切实可行的政策去推进经济结构改革并大力发展社会、经济，那么，如今的波兰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1997年9月波兰议会选举前夕，主张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联盟（Freedom Union）领袖向人民承诺要在十年之内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番。最终，在右派平民主义派同盟——团结选举行动党（Solidarity Electoral Action）的支持下，自由联盟在选举中获胜。自由联盟的领袖们也许主观上真的相信自己能说到做到，而从当时的国情来看，他们也的确有可能做到。凭着对经济领域的知识和执政能力，他们信心十足。但不幸的是，他们没能兑现诺言。也许他们做那样的承诺只是为了追求一时的宣传效果，以便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由此，我们得出更苛刻的结论：他们要么主观上错了，要么故意误导民众。在自由联盟作出承诺之前，波兰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前25年内从未有过的快速增长。1994－200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是6.4%，这个增长率在新自由主义派经济学家看来仍然过慢。1997年升至6.8%，议会选举结束前的冬季达到7.5%，这些事实更加证实了上面的结论。

要在十年内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需要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达到7.2%。

用简单的复利运算就能得出一个结论，即继续实施先前正确有效的经济政策，维持之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经济在十年翻番的目标。其实不需要做什么，只需承认新自由主义以外的经济理论和策略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并继续沿用，就完全有可能实现目标。正确的政策应建立在正确的理论之上；错误的理论虽然有可能带来一些好的结果，但必然导致实际应用中出现失误。不幸的是，由于政治倾向不同以及思想意识混乱等外部原因，在自由联盟执政期间，并没有采取能满足大众利益需求的经济措施。虽然政府承认新自由主义失败了、接受别的理论即可挽回一切，但从政治意义上讲，这几乎是天方夜谭。

新政府领导沿袭了之前的执政思想，而这种思想对经济发展毫无意义。他们的首要行动就是不计后果地改变现状，结果，形势变得更加糟糕。国内生产总值停止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并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财政上限制过度，工商业相关政策被废除，至2001年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降为0.2%。官方声称，1998－2001年，波兰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2%，而实际上只有3.5%。而在此期间波兰国内生产总值本可以实现高达17%的年平均增长率，但政府却错失良机，甚至在短短四年中就酿成如此迅速的经济滑坡。

波兰百姓的生活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虽然媒体不遗余力地释放安全信号，失业率还是一路飙升。如此恶劣的时局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此前，工作岗位已经持续减少，尤其是1994－1997年，就业岗位减少了100多万。波兰新自由主义派媒体却依然天真地鼓吹："政府会在未来的几年创造三四百万个新工作岗位，将人口膨胀作为优势加以利用，并消除农村人口失业的隐患。政府会尽一切努力防止社会混乱，避免波兰经济转型时期所取得的成绩毁于一旦。"政府对经济形势的冷静态度反而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前，减少的工作岗位数目约180万，而新自由主义盛行之后，到2001年，竟有320万个工作岗位不复存在。

在这个时期，波兰也出现了一些好的现象：支持市场经济的改革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私有企业蓬勃发展，外部环境基本没有恶化。然而，新政府之前的承诺并没有得到有力的印证，因此，同样的疑问依然存在：他们是因无知而无心说错了话，还是故意欺骗民众感情？这个问题既关乎政治能力，更关乎道德，因为酿成的负面结果几乎殃及全国人民。只有一小部分人平安地度过了难关甚至发了财，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曾经的好时光一去不复返，失去工作也就等于失去了希望。

公众并未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关于“政府是犯了错还是撒了谎”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原因之一就在于媒体。政府向媒体提供充足的运营资金，使得媒体存在的唯一职能就是在需要的情况下混淆是非，掩盖政府需为错误行为和谎言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标榜为人民谋福利的宗旨，抹杀其为特殊利益群体服务的本质。媒体的这些恶行应当被谨记，因为历史还会重演。

相关的公开讨论有很多，有的甚至打着学术的幌子，但是政府官员谈到相关话题时都遮遮掩掩，含糊其辞。他们要么表达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观点，要么拒绝就自己之前的言辞发表任何看法。如果他们下定决心死不认错，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呢？这些人的作风是，如果之前犯了错，现在也绝不承认。所以，他们在造成损失之后，就开始大谈制度和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实施有效公共政策的重要性，而此前不久，他们还在极力向民众表明自己绝不玩弄权术的决心。事实摆在眼前，说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弥补经济发展漏洞的有效方法严重违背了现实，这种说法只会让新自由主义的缺陷欲盖弥彰。

政府甚至歪曲事实，反复强调某些经济机制的重要性，而实际上这些机制从未被使用过。政府官员还告诉人民，先前的政策尚未被全部施行，比如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鼓励企业竞争。这其实与他们之前的陈述自相矛盾，可能是他们下意识里的一种自我安慰，因为他们没有勇气承认对手是正确的；抑或是一种手段，将自己从身陷信奉错误教条的泥沼中解救出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试图将一切积极影响（总会有一些积极的影响产生）归功于各种因素，而实际上，他们不仅没有重视过这些因素，还阻碍其发挥作用。

1989－2008年，波兰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3.0%。如果是5.5%的话，200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会是1989年的270%。有些国家显然比波兰更擅长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利，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5%。1994－1997年，波兰实施欧盟战略，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比5.5%高出近一个百分点。2002年年中，波兰启动改善财政项目，在加入欧盟前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降低了近一个百分点。所以说，在波兰经济转型时期的近一半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只可惜中途新自由主义横插一杠。

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使波兰错过了增长（missed growth）。在波兰式新自由主义盛行期间，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本该增长却没有增长，经济和社会因此受到严重影

响，政府和人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代价之一便是让与波兰合作的其他国家占了便宜，它们在全球化经济中获得了额外利益。这些国家趁机将有竞争力的波兰公司从市场中挤兑出去，这就意味着许多就业机会也就此流失。波兰面临结构性贸易逆差，外国进行投机性投资和产品制造赚得利润后，纷纷将投资对象从波兰转移。一些潜在的商业利润也成了泡影，这才是更为沉重的代价。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经济转型时期，波兰国家银行所颁布的货币政策也同样是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制定的。波兰政府曾出台了一项关于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合理政策，意在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维持社会稳定，引进鼓励商品制造和交易的微观经济政策。可惜的是，国家银行的政策似乎并不受欢迎，又或是它对此无能为力，总之它没有协助这些政策的执行。波兰国家银行弃国内的经济发展需求于不顾，却更愿意被国际金融市场操控。在全球各个金融市场，新自由主义被当成经典一样传颂，人们奉行新自由主义的一切教条，自然会对其相关政策照单全收。

经济转型和发展并行的经济政策在波兰间歇性地失败，说明新自由主义在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验彻底告败。新自由主义者拒绝承认失败也并不奇怪，他们会一直拒绝承认。

随着失败经历的积累，为新自由主义辩护的人会越来越少。这是因为无论是在富国还是在穷国，新自由主义实验都失败了。富国的典型代表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地——美国。关于美国当时的情势，我们需要考虑以下七个方面：

——为促进经济发展投入大量资金，结果造成公债累累，财政失衡

——工作时间和收入水平之间的选择

——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

——关于新自由主义以外的经济发展道路的推测

——世界政治领导地位的失去

——全球的反美情绪日渐强烈

——对美国不满和失望情绪日渐高涨

第一，美国是各国外币储备通用货币美元的发行国，其经济扩张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特殊身份。但情势在变化，美国在财政、贸易上的地位也在时刻发生改变，先前的优势有朝一日也许会丧失。美国目前的经常项目逆差约为8000亿美元，是

排在它之后的20个国家经常项目逆差总和的两倍。欧盟依靠目前的现金收入基本能自保，美国所谓的双赤字产生的亏空相当于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因此只能靠借贷度日。借贷理所当然要还贷。30年前，美国的生产总值增长得比西欧快，而30年后的未来，西欧应该会比美国快。因此，我们关注的时间范围应该延长到前后60年。

第二，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喜欢将美国与发达程度稍低的欧盟国家作比较，通常认为，欧盟国家比美国落后20年。比较方法是直接对比双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根据2007年欧盟的项目进展报告，欧洲该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30,000美元，等于美国20年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现在，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又增长了50%，达到近45,000美元。美国比欧盟确实更有经济优势，但这种优势只体现在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和增长速度上。我们应该考虑更多的因素来加以权衡，比如欧美不同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因为这决定生产力发展之后如何分配其效益的问题。结果是，美国选择提高国民收入水平，而欧洲则选择给劳动者提供更多的空闲时间。

实际上，美国近几年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原因不在于其经济体制更加自由化（在新自由主义派看来，自由化的体制等于更有效的体制），我们可以观察到大西洋两岸的所有国家，经济几乎都呈现同等速度的增长[13]。真正的原因在于美国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几乎没有减少，还是与先前一样长，而欧洲的欧盟成员国和非成员国都调整了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减少工时是劳动者本身的意愿，真正的自由主义意味着真正的自由选择，选择的目的不光是为了利润，也为了劳动者本身，而且应该首先为了劳动者本身。如果劳动者选择工作得少一点，挣得少一点（这也意味着他们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去消费），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

据经合组织估算，1970年以来，美国的从业人员平均每年的工作时间从1900小时降低到1800小时，减少了5.3%。德国由于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在同样的时间段由1960小时降到1440小时，减少26.5%。法国跟德国差不多，英国减少了13.4%（1940小时降低到到1680小时），意大利减少了15%（从1870小时降低到1590小时）。换句话说，如果法国和德国采取跟美国一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提高的生产力转化成收入（即国内生产总值），那么现在法国和德国的收入水平就完全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然而，法国和德国选择给劳动者更多的空闲时间，让他们可以早一点退休。这里说的空闲时间不是无业人士碌碌无为的闲暇，而是可以被从业人士有效利用，在工作之余尽情享受生活的时间。

第三，从美国经济发展中获益的只有少数一群人，这点非常明显。根据新自由主义流派思想制定的政策限制了收入分配和社会干预的权限，这样方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分得大部分经济产值，这里的少数人指的是上层阶级和中上层阶级。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他们这几十年的收入并没有提高，严格意义上说，甚至还有所下降。虽然整体上经济繁荣，但最低工资水平十年内都没有变化；只在2007年，民主党强行将最低工资水平提高了0.7美元/小时，达到5.85美元/小时，美国每月最低工资水平由此达到1400美元，而这个水平严格意义上讲比波兰的平均工资远远要低，而波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1/3（2007年年中，波兰的实际人均收入水平为2870兹罗提，合1020美元，但如果按1.64的购买力平价指数来算的话，相当于1670美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上几个头号富国今天的国民收入比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要少。这并非因为劳动者生产力有所下降，相反，因为专业素质的提高和生产机构的优化，现在的劳动者工作能力更强，工作效率更高。但由于收入的分配机制，他们被剥夺了享有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所以收入才比过去少了。而没有这种权利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本身存在供给弹性，新自由主义者希望欧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劳动力供给也有弹性。很少有人去关心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但如果分配不公严重到一定程度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14]，这才是大家关注的问题。美国已经显现出分配不公的负面影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2007－2008年，美国和欧盟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几乎相同，都在2.2－2.3%之间，原因之一便是收入公平问题。

美国总人口的1%为富裕人口，1980－2004年期间，他们的收入翻了一番，拥有的财富从占全民收入的8%提高到16%。而占美国总人口1‰的高收入人群收入翻了两番，掌握的财富从占全民收入的2%升至7%。还有占总人口0.1‰的特高收入人群，人数约14,000，在同一时期，他们的收入从占全民收入的0.64%上升至2.87%，翻了三番。也就是说，0.1‰的美国人享有四十分之一的全民财富。难怪在流动资产（不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全球富人名单中，美国人最多。据美林集团（Merrill Lynch）统计，全世界总共有870万人拥有100万美元以上的流动资产（共计33.3万亿美元），其中290万是美国人。虽然欧洲总人口是美国的两倍，但被统计在内的只有280万人，还有240万是亚洲人。

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有36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超过了加拿大

的总人口数。2002－2006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3%的年平均增长率，于此同时，贫困人口数量却仍以每年150万的速度增长。现在，美国贫困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3%，非裔美国人口有25%属于贫困人口。换句话说，1/8的美国人、1/4的非裔美国人都属于贫困人口。

2004年，普通的美国家庭年均收入为15,600美元，目前这个水平基本没有什么提高。这就意味着1969年以来的40年内，年平均收入下跌了12%。IT行业人员收入也没有增加，新自由主义派声称这是由于“IT人才不想工作”。40年来，美国一个全职工以上的贫困家庭由12%增加到了30%。

美国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以来一直上升，反映了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里根总统上台时基尼指数“只有”0.403。十年之后，达到0.428。到2000年，升到0.462。2005年，基尼系数再创历史新高，达到0.469，与菲律宾和马达加斯加的基尼系数相近。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派和欧洲的新自由主义派可能要说：“那又怎样？这一切都是自然规律，符合市场需求，市场对资本和劳动力两个生产要素进行支配并按照应得的份额给予合理的回报。”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纳税、选举制度等经济、政治手段的实施使美国经济出现一定增长，却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陷入贫困。

如果财富是由创新和生产力创造的，自然值得称道，但事实是，财富源自贪婪和不合理的再分配，更糟糕的是这还引起了所谓的结构性不平等。要消除这种不平等，只有调整根本的经济制度，即彻底摒弃新自由主义教条，允许国家干预经济，按照自由市场的规律进行收入分配。

真理何在？造成这一切结果的原因有哪些？众所周知，要想摆脱经济停滞的局面、实现文明发展，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的质量，而人力资本的质量会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只要未来的学生更聪明，就可以实现。每位教师、教授都明白这个道理，包括越来越多的学生。我们当然可以遵守自然规律以及那只“看不见的手”，但是我们同样可以采取更为认真的态度。经过这么多年的辩论，心理学家得出一个结论：智商不仅取决于基因，也同样取决于环境。因此，政府的合理政策会对影响年轻一代智力发展的因素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有助于他们提高智商。而要做到这点，政府官员自身必须具备高智商。政府向有能力纳税的群体征税，然后应合理使用财政收入，以发展文教事业。

关于社会市场经济在英语国家与在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冰岛等北欧国家的不同情况很值得做个对比。我们发现，关于收入的社会流动性会因教育的不同发展而有不同表现。某研究小组[15]曾就社会流动性给不同国家做了一个刻度划分：1代表完全没有流动性，0代表最理想的流动性。换句话说，1表示子女与父母的收入完全一样，0表示子女和父母的收入没有任何相关性。结果显示，北欧国家的系数为0.2，英国和美国分别为0.36和0.54。这说明，英美与北欧相比，子女的收入水平与父母更加接近。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和英国，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子女（确切地说是男孩）有一半在40岁之后成功脱贫。而在同样的时间段，北欧国家有75%的贫苦家庭子女在40岁后脱贫。通常，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和相关经济政策，赋税会更重一些，但在北欧，子女收入较父母那一代仍然有明显上升。美国没有做到，因为美国实行的是极端彻底的市场经济和新保守主义政策。英国的情况比美国好，但因出现严重的结构性不平等，"机会"的神话破灭了。

尽管后来美国生产力有了发展，工作岗位有了增加，还差点减少了工作时间，但还是没能避免这一切发生，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是弹性的，社会转型的各项措施都有所减少。新自由主义派虽然有值得自豪的地方，但更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第四，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年美国经济发展的真正速度。1980年以来，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虽然历史不会被改写，但设想当初美国走的是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一种新的制度化的经济模式），发展的是社会市场经济而不是毫无节制的资本主义经济，那么这一切会不会有所不同呢？会不会出现"美国式天堂"呢？在这种假想的情况下，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会比实际的更高，美国人、波兰人（这种情况下波兰人可能更想移民到美国）会有更多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和个人发展需要。财产、收入分配问题可能也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少数群体占据多数财富的现象也会有所改善，全球反美情绪也自然会有所缓和，美国也将很容易地保持住其世界头号经济、政治大国的地位，并且在建设全球制度化经济中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一些美国民主党派人士意识到了这一点，可惜为时已晚。

第五，虽然有人深信新自由主义为巩固美国的经济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2008年，美国占世界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5），但美国的全球政治地位明显在迅速地削弱，而固守新自由主义模式只会雪上加霜，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欧盟没有

搞新自由主义，经济虽然没有美国发展得快，但是世界地位却有所提高；欧盟通用货币欧元的地位越来越高，给美元带来强大的冲击；中国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国内生产总值大国指日可待；在许多国家，美国人和他们宣扬的美国式发展模式渐渐受冷落，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也在逐渐下降。

第六，美国不断将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对各国的本土价值观和文化差异视而不见，因此，全球反美情绪不断高涨，且愈演愈烈，尤其是那些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失败教训却又没能设计出更为有效可行的发展模式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反美情绪不如中东、北非和拉美国家强烈。在过去的5年中，穆斯林国家的反美思绪都有不同程度的显著加强。沙特阿拉伯一直与美国友好往来，然而在2001－2002年以及2005－2006年这两个时期，持反美态度的沙特民众仍然由占总人口数的64%上升到79%。土耳其与美国是北约同盟国，反美人数却由33%上升至62%。摩洛哥与美国在政治上是友好邦国，反美人数也由41%上升到49%。有趣的是，唯一一个没有跟随反美潮流的穆斯林国家是被小布什称为“邪恶轴心国”的伊朗，在此期间，伊朗的反美人数由63%下降到52%[16]。

由此可见，政府和媒体可以轻而易举地左右民意，恣意毁坏他国形象，比如称伊朗为“邪恶的国度”。不幸的是，连像《经济学人》这样颇具影响力的权威杂志也不例外。2007年7月19日该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伊朗之谜”的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以色列前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inyamin Netanyahu）称‘伊朗的当权派大部分是天启救世主的崇拜者’，如果他说的是对的，世界将濒临危机。”[17]拉美国家的人民对美国印象也不好：64%的阿根廷人、57%的巴西人、53%的墨西哥人以及51%的智利人对这个北方邻国都“基本持否定态度”[18]。

第七，形势的演变也让美国国内的不满情绪日渐强烈。美国的内政外交、经济等层面的新保守主义极端作风导致民怨沸腾。在一些资深评论家看来，曾经繁荣富强的美国已经走到了危险的十字路口[19]。新保守主义虽然日渐消退却仍然起作用，正是由于一味地执行新保守主义片面性的极端政策才招致各方人士的批判。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不光是指美国在内的英语国家以及几个欧洲强国，还包括日本。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高度繁荣，并由此进入世界强国之列，随后因为经济结构出现问题，日本的经济一度停滞不前。但是，新自由主义自始至终没有在日本成大气候。日本一直对新自由主义充耳不闻，而是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坚持并真正发挥了

国家干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有日本独特的文化：如传统的家庭观、对小型企业的依靠、工作的稳定性（日本实行著名的sh ū shin koyô，即“终身雇佣制”）、雇员对雇主高度忠诚（这种忠诚在别的国家极为罕见）等。

1990年以后，日本渐渐意识到曾经的“经济奇迹”即将终结。与此同时，来自国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敦促日本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来度过危机。对于新自由主义，日本人持怀疑态度，他们坚持自己的经济路线。日本人认为，既然新自由主义在其他国家没有成功，那么在日本这样有着独特文化传统和经济现状的国度也应该没有用武之地。日本的经济改革增加了企业的自由空间，使经济整体上更为自由，但却不是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日本向世人证明了没有必要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只要坚持自身的国家特征和价值观，革新旧有的制度，就能让经济走出逆境。结果，因为有比美国弹性更大的劳动力市场，日本经济很快得以恢复，并保持了日本企业的竞争优势。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丰田收购了通用汽车，进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品牌。从此，人们更喜欢开着丰田兰德酷路泽（Land Cruiser）牌汽车去旅行或上下班，而不是通用吉普车。2006－2008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3%，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水平相当。

穷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些国家的处境很尴尬：一方面，遵循苏联模式已经不现实；另一方面，受新自由主义推崇、用来抵制凯恩斯主义和干预主义的资本主义越来越显得陈腐不堪。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希望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都统统失败。在后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失败的证据比比皆是；事实也证明，为拉美国家量身定做的“华盛顿共识”其实并不合身。资本主义模式只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过正面效应，之后，经济便再没有显著、稳定的增长，于是这些国家开始债台高筑。唯一可以给新自由主义加分的是通货膨胀得到了一定控制，但是通过经济结构改革同样可以控制通货膨胀，而且既省力又省钱。采取非正统的经济政策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马来西亚就曾经通过一套反自由主义改革方案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

拉美国家开始逐渐觉悟，只是这种觉悟经过了很长时间。直到2000年以后，拉美国家才开始相继摒弃新自由主义，努力寻求其他方法以摆脱停滞不前的局面，加速经济发展。很多拉美国家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都转向了左派，这让美国很不

安，也很恼火，因为这与美国希望看到的结果相反。拉美国家实行民主政权，以民主选举的方式设立议会、选举总统，毫不忌讳地谈论拉美式社会主义，当时最活跃的要数委内瑞拉总统雨果·查韦斯（Hugo Chavez），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的政府首脑随后加入其中。阿根廷选择对“华盛顿共识”敬而远之，巴西、乌拉圭和智利也纷纷步其后尘。面临严峻的挑战，新自由主义派束手无策，因为大势已去。美国要求其他国家遵守新自由主义规则，以适应全球化经济和新兴市场的经济新秩序，但是，它自己却无法适应不断变幻的形势。这种悲惨的结局如同恐龙的命运：不适应，即灭亡。

* * *

新自由主义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来自一个出乎意料的国家。由于人口众多，就绝对值而言，中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市场汇率计算高出英国7%，毛泽东曾经的预言终于变成现实。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拥有10万亿国内生产总值的中国是拥有1.9万亿国内生产总值的英国的5倍以上[20]，这更能说明问题。

以市场汇率计算，再过20年中国便会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而按购买力平价来算，这只需等到2011年。届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八国集团内除美国之外的其他6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国、日本、加拿大、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中国崛起已势不可挡，除非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但那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方向发生剧变，采取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模式，或者采取波兰“休克疗法”初期以及90年代末经济“冷却”时期的经济政策，那么中国的强国之梦也会破灭。然而，以上这些假设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比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还要小。

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连续三次做出了正确选择，而其他任何后社会主义国家或正在兴起的国家都没能做到：

第一，1977年，邓小平决定沿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实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第二，1989年，中国政府避免了一次政治体制演变；

第三，经过多年的斡旋以及成功改革，中国于2001年成功加入了世贸组织。

尽管外界一再敦促，中国始终没有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中国从来没有把那些新自由主义派经济学家当回事，因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家和经济学专家们对他们自己的制度和文化最了解。同时，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他们对知识分子腐败也更抵触。

中国选择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结果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有其自身的特征，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中国能成功摆脱两难境地：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的复杂遗产，这两项制度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同时也造成了同样多的新问题；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这可以说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综合症。中国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第三世界国家。而没有哪个第三世界的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决心以自己的方式向第一世界挺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社科学者开始发表一些晦涩复杂的言论，主要观点是将中国经济的转型解读为新自由主义的一种。这样一说，好像政府支持、引导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经政府调控的市场改革与新自由主义哲学思想有什么共同点。实际上，国家有意识、有节制地将市场作为社会经济改革手段，这种经济行为与不切实际的新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中国的经济政策中，国家发挥的积极作用与新自由主义理念完全相反，那些持相反观点的经济分析专家们不过是想抓根救命稻草罢了。

中国很快成为周边国家的榜样。这些国家也决定先放弃中央计划，然后再实行市场经济。抛开小经济体柬埔寨和老挝不算，越南确实是个成功的例子。越南有8000万人口，尽管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不好，但越南的经济却能以每年7.8%的速度增长，而且国内生产总值每十年就会翻一番，如今其国内生产总值已是四年前刚进行市场改革时的4倍。这些成就是在国家指导与调控的条件下取得的，并且受中国取得的成就的启发和借鉴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俄罗斯思想。越南改革始于1986年，其口号是“doi moi”，意思是“重建”。

中国式道路具有以下特征：

——这条道路与苏联道路不同。面对全球化的日益升温，苏联却接二连三地犯错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开放性政策”和“改革”起的作用太小，也来得太晚。

——这条道路与中东欧国家的改革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一些中东欧国家，如南斯拉夫、波兰和匈牙利，很早就已经开始探索市场改革并有条件地向外国开放。其

他中东欧国家，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1989年以前没有一点改革的迹象，但后来都曾一度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道路。

——这条道路也与拉丁美洲失败的改革不同。拉美国家走的是共识的路线，最后却未能实现预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反而导致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复苏。然而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潮即非俄国式的也非中国式的，而是南美式的。

——这条道路与非洲灾难式的道路也不一样。20世纪90年代，撒哈拉以南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没有任何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却增长了176%。1990－2007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仅为0.9%，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口增长率高达2.5%。在最穷的非洲国家，如尼日尔，一个女人平均要生7.46个孩子，在马里一个女人平均生7.42个孩子。中国女性也许不会生7个孩子，但如果要她们选择的话，她们也可能会生尽可能多的孩子。那样的话，平均4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活不到5岁[21]，而存活下来的大多数孩子生活也会极度贫困。

我曾经与基辛格有过几次会谈。基辛格十分支持开明的政治经济自由主义。这点与他作为美国政治家和学者的身份相符。然而他却完全认同下述观点，即中国如果在1989年的时候选择了彻底的政治自由化道路，也就是采取了西欧或后苏联时代（而非拉丁美洲）的模式的话，那么永远也实现不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后来，我曾有机会与中国的温家宝总理谈过一次话。不出所料，他的观点与基辛格的十分相似。如果中国走了后共产主义新自由主义道路的话，中国的形势会比俄罗斯更糟糕。由于流于形式的民主改革试验，俄罗斯自1992年以来国民收入减少了60%。毕竟，“文化大革命”留给中国的沉重影响远远大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崩溃带给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影响。

俄罗斯经济就是反面教材。20世纪60年代，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做出过承诺：苏联经济将在2000年超过美国。然而，俄罗斯的产值直到2007年才恢复到1989年时的水平。1989年时，中国的产值与苏联持平。后来，中国的国民总收入增加了6.2%。目前，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14%、中国的17.2%。

中国的成功在于吸取了别国的精华，同时摒弃了其糟粕。中国吸取了自由主义的精华，实行了自由经济；保留了原有制度中最重要的社会因素。这就避免了自由经济对政权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制度改革（转型）同政策发展相结合方面，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做得好。从实用主义角度讲，中国创造性地把制度改革同政策发展结合起来，从而取得了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国的做法没有损害任何一方，同时也避免了教条。当代中国的改革没有错过全球化的列车，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利用全球化为国民经济、中国企业和公民谋取了福利。中国坦然地面对参与世界经济活动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风险，也愿意承担相关代价。正因如此，中国才能最大程度地从全球化中获取利益。面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需求，中国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外国需要中国的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本以及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国完美地吸引别国的资金为其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恰好是技术进步的媒介。同时，中国也积累了强大的资金储备。中国采取了鼓励制造业投资的政策，而不是不加鉴别地让外国资本控制其国内零售市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开始运用其积累的资金储备来部分收购世界上最富裕的一些国家的零售和金融产业，包括美国的相关产业。将来，不仅在中国有西方银行的分支机构，同时中国的银行也会在西方开设分支机构。将来，最好的跑鞋不再是由美国品牌在中国设立的工厂生产，而是由中国品牌在美国开设的工厂生产。中国目前已经为这样的机会储备了1万亿美元，而不是幻想着天上掉馅饼。只有那些天真地信任新自由主义的人，才会幻想天上掉馅饼。中国有着明智的发展策略，而且已经思考了40年，而非4年。

是的，事情以其特有的方式发生是因为很多事情同时发生。

首先，是全球化。全球化不是中国发明的，但是中国很清楚怎样去适应并利用全球化。

第二，是市场改革。中国进行了循序渐进并且彻底的市场改革，这场改革尺度适中，改革过程中没有发生不必要的令人震惊的事件。

第三，中国制定了长期发展策略而非盲目相信自由市场的魔力，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撒手不管。

第四，中国政府是开明的。这种开明建立在中国自己的文化基础之上。这种文化基础包括儒家学说、道家学说和社会主义对集体主义的尊重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责任感。

中国人是幸运的。说中国人幸运并不是因为他们人口众多，而是因为他们赶上

了恰当的时代，并且处于恰当的位置。恰当的时代指全球化的年代，恰当的位置指的是亚洲，更精确点，指的是中国。这种机遇前所未有。中国人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们的国家，客观经济过程主导发展进程的程度越来越深。中国政府很精明，会对那些在国外没什么名气但可靠的理论假设持信任态度。每年从外语翻译成中文的书籍数量要比从中文翻译成外语的书籍数量多得多。这些从国外引进的政策为人类活动和集体企业构建了最广泛的制度和社会框架。如今市场越来越坚实，反过来又为这个框架提供了本质内容。市场教会中国人怎样生产、生产什么、提供什么服务、为谁提供服务、投资什么、在哪儿投资。

中国的这次试验不仅伟大，而且成功。众所周知，中国在17世纪时曾发展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经济体。现在，中国再度发展起来。中国发展的原因看上去与新自由主义被摒弃一样简单。新自由主义曾经在别的国家占据上风，但是却损害了那些奉它为圭臬的国家和地区的利益。

除中国这个最成功的例子外，印度也不容忽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增长率高达6.4%。印度也成功抵制了来自“华盛顿共识”拥护者的压力，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然而，那些“华盛顿共识”的拥护者却坚持认为印度经济的加速发展得益于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措施。事实上，在实行贸易自由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印度经济就已经开始增长了。印度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政府采取的强有力的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可以说，印度经济取得成功的秘诀也是抵制住了新自由主义的诱惑。尽管印度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4.3万亿美元，是英国的两倍。印度的总产值为亚洲第二，位于中国之后日本之前。

目前，大约有2/5的世界总产值是由中国和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换句话说，2008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3.3万亿美元，其中超过1.3万亿美元的增长来自中国和印度。有人自我安慰地指出，中国和印度都没否认曾在某些方面从波兰吸取经验教训。经验包括做什么和怎么做，教训包括避免什么和为什么避免。就我而言，我查阅了大量的期刊，其中包括一些中文期刊。我还做过多次访问，并作为直接顾问提供过尽可能多的有效建议。尤其是中国，需要对其发展策略给予最大程度的肯定。尤其是与其他国家作对比的时候，才能发现中国负责经济问题的政治家提的问题是多么敏锐和及时。同时我也很惊讶地注意到，与其他政治家不同，中国领导人非常擅长听取意见并能得出正确结论。

今天，中国和印度正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印两国在世界总产值方面所占的比例正在快速增加，对世界平均水平有着极大的影响。2008年两国所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为20%，与美国和欧盟的总产值几乎差不多。中印两国的人口数量也对统计数据有极大影响。中国和印度人口加起来有24亿，几乎占了世界人口的37%。因此，有关中国、印度、美国和欧盟的统计数据会对世界平均水平产生明显的影响。

***

除了中国和印度，俄罗斯也是一个地域广大的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有过新自由主义的惨痛教训。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产值下降了60%。这不是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而是错误政策的后果。在和平年代，这样大幅度的产值下降颇为罕见。但令人惊讶的是，不管东方还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都声称新自由主义是一项成就。这种观点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那就是因为许多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经济学家、分析家、顾问和政治家都拼命地想挽回颜面。我们将事情放在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讨论还有两个原因。

首先，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一种有着明确议程的经济纲领。在其自由、民主和进取精神口号的掩饰下，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项高效的工具，而且也是重新分配精英阶层利益的工具。这些都是以损害大众利益为代价的。其次，新自由主义是进行大规模掠夺的工具。像俄罗斯那样耗尽国家财富的例子在历史上十分罕见。当然，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说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掠夺与盗窃的工具。然而，经济制度的缺陷却使新自由主义有可能成为掠夺与盗窃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实行了新自由主义而中国没有。

对一些人而言，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是一桩大买卖。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就持类似的观点，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卡特总统的顾问。在其文章中，他在许多关键词上都加了引号。他认为，一大群西方“顾问”，其中大多数人是美国人，与所谓的俄罗斯“改革者”一起策划“私有化”，并从“私有化”的产业中，尤其是从能源行业中，捞了一大笔钱[22]。我知道，华盛顿政治圈的高层人物对这样的警告早有耳闻，但是却将其忽略了。在各种

分析和专项研究中，都曾提到这种“盗窃”式的私有化、合作伙伴美国在其中起的作用，以及美国当局表现出的包容性。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宣传和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淹没了这些警告[23]。美国高层官员（包括白宫的官员）都曾发出警告，认为这种病态的美俄式新自由主义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1999年夏天，在詹姆士城基金会大会（Jamestown Foundation conference）上，我碰到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弗利兹·M·厄尔曼斯（Fritz M. Earmath），他告诉我，有一份类似的紧急报告呈上去后，副总统只在上面批注了一个词“胡说八道”。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杨·诺瓦克·捷兹瓦朗斯基（Jan Nowak-Jezioranski）当时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对美国集团内部一些人与俄罗斯的腐败政治官员彼此之间形成的“默契”进行了批评。

为什么上述情况在俄罗斯会大规模地出现，而其他国家比如波兰却没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波兰的结构改革政策实施得远比俄罗斯好，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然而，更主要还是因为过去俄罗斯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掠夺控制，现在依然如此。而新自由主义趋势和俄罗斯混乱的局势，更加促成了上述状况的出现。独一无二的美俄“公私合作”模式就是其中一条。1999年秋季，厄尔曼斯（Earmath）在给我的信中提到：“可以在俄罗斯创造，并带走的财富十分巨大，这些财富就像地心引力一样，吸引了大量西方投资者。波兰的幸运之处不仅在于其早期的经济形势和政策，更在于其可掠夺的资源没这么多。”关于俄罗斯转型的事实，美国方面应该知情的人当时都知道，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厄尔曼斯从未对此表示怀疑。他又怎能怀疑呢？他指出：“我们政府顶层人物一直都对俄罗斯的真实情况了如指掌。他们知道，至少在1997年底以后肯定知道，当时俄罗斯官员和投机者都把俄罗斯短期卢布国债（GKO）市场作为工具，以掠夺俄罗斯预算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你以为1998年7月塔尔博特（Talbott）、萨默斯（Summers）、利普顿（Lipton）、丘拜斯（Chubais）以及别列佐夫斯基（Berezovsky）几个人聚到一起时谈论的还能是什么？”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对待新自由主义的迟钝等同于犯罪，这是组织性良好的犯罪！厄尔曼斯最后提到：“我了解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另一面，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愚蠢更是犯罪。根据俄罗斯许多可靠的消息来源，现在很清楚短期债务在1997年到1998年期间吸收了大量公款。然而，吸收了大量公款的政府短期国债并不

是一种把资金纳入预算的极度不负责的高风险方式，而是包括俄罗斯和西方在内的政府官员、中央银行的人员和投机者蓄意掠夺国家预算的方式。”

厄尔曼斯补充到：“讨论未来政策时，你将会有更大的发言权。也许还可以坐观其变，看一下该话题是否会引起讨论，然后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都要发表新的看法，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其他选择。也许我们还可以就这个话题召开国会听证会。…… 最重要的是，你和其他有智慧的人可以参与讨论，并告诉政客们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这些都体现在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转型例子，即波兰身上。……你既可以称其为机遇，也可以称其为神秘方式。我们有责任去利用这个机遇。…… 必须用波兰的例子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在俄罗斯的愚蠢行为反复提醒人们。”[24]

8年之后，也就是2007年秋天，我正在写这本书时向厄尔曼斯征求意见，询问是否能节选我们来往信件中的一部分。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因为他十分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他补充道：“一开始，美国的政治商业利益都跟俄罗斯的腐败与掠夺扯上了关系。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俄罗斯走的仍然是其在上世纪90年代大多数时间走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但在2001 – 2007年期间，经济却发展得很不错。

最近十年里，俄罗斯正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把制度改革与发展政策结合起来，同时，尽量避免国家财富和自然资源迅速或廉价地流失。俄罗斯想全力以赴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并从全球化中得利，而不是被他人利用。俄罗斯拒绝成为另一个“新兴市场”，因为那将意味着放弃经济主权并屈从于来自跨国资本的压力。现在，在西方还能经常听到这样傲慢的发问：“谁弄丢了俄罗斯？”当俄罗斯开始明确地走自己的道路时，人们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了。俄罗斯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如今，它不愿意再次陷入新自由主义的泥潭。事实上，一些国家的确丢失了以低廉的价格获取大量自然资源的机会；但是，没有人丢失俄罗斯，因为没有人曾经拥有过俄罗斯。俄罗斯正在逐步探索其将来在世界上的地位，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顺便说一下，如《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刊物，打着民主的幌子支持违法行为，这种现象令人尴尬。他们反复宣称，任何寡头政治统治者都不是圣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的很多事情需要得到惩罚。然而，他们同时也呼吁暂且别动寡头政治家的财产，因为这样可以收取类似财政收

入的"暴利税"。尽管这种做法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走出灰色地带并走入正轨，但是却增加了包庇寡头政治家经济犯罪的风险。当然，这也维护了那些"亲西方"的公司的利益。总有一些人不把民主当成一种价值观，而是当成维护私人利益的有效工具。难道"亲西方"的能源公司就可以被自动贴上"自由"和"民主"的标签，而其他公司就是"专制"的？

合法收入和通过正当渠道获得的资本收益都要纳税。少数情况下，即使资产拥有者自己什么都不做，资产受有利的环境影响本身也会大幅升值，这种情况同样要归到税收的范畴。不久前，英国政府就向一些能源公司征收了类似的税。然而，对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欺骗国家和公民的欺诈性交易得来的财富，这种税却并不适用。税收不是打击犯罪的方式，而是以经济社会平等名义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方式。打击犯罪是检察官和法官的责任，而不是税务机构的工作。俄罗斯的寡头政治家们的非法交易得到了《经济学人》的强烈维护[25]，但这种非法交易在美国应该被判90年的徒刑而不是9年，并且没人会怀疑法官有什么政治企图。

当畸形变成正常时，情况尤其糟糕。然而究竟什么是正常，什么是畸形？谁来评判？历史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等待历史的裁决，因为有一些事情必须马上解决，而不是在遥远的将来当一切争论都平息了的时候再来讨论。争论有的来自情感的堆积或处心积虑，有的来自不同的价值观或棘手的利益冲突，更多的争论仅仅来自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同的解释。

以下是欧盟前贸易委员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在苏联解体15年后得出的结论。他在访问莫斯科后意识到，俄罗斯对引进西方式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持怀疑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制度转型期间受到了上述模式的负面影响。西方看来正常的东西在俄罗斯看来并不正常，反过来也一样。最重要的是，俄罗斯总是用冷漠、一针见血的话评价这一事实，正如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报道所说："鉴于20世纪90年代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的不愉快经历。"[26] 对于俄罗斯公众和政治精英们来说，这点表现得尤其明显。许多经济学家也是如此，他们在批评上世纪90年代受误导的选择时不遗余力。很明显，在他们眼里，这些选择是不正常的。"俄罗斯式"的民主化与自由市场远远不是西方认为的正常的民主与正常的市场。

新自由主义的信徒仍然认为俄罗斯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制度也不民主。对于中国，他们的态度要好得多，因为中国已经学会了如何与他们打交道。但是，正如一

句古老的波兰谚语所说："笑到最后的才是真正的赢家。"

我们还不知道谁会笑到最后，因为历史是变化的，规则也会经常改变，但笑到最后的肯定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既不可能是西方一本正经的新自由主义者，也不会是东方那些幼稚地认为新自由主义道路是他们全面西化最好方式的人们。"2006年，全球总产值增加了5%。而全球总产值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10.5%）、印度（8.5%）和俄罗斯（6.6%）的增长幅度。"[27]以上报道的来源不是中国或俄罗斯的政府官方文件，也不是新德里的英文报纸，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网上报告。这三个伟大的国家没有走"华盛顿共识"的路线，这只是因为他们不屈从于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和相关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上三个经济体的人口数量占全世界总人口的40%，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1/4。这三个国家充满了活力，并且拥有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本。第一个登上火星的人将来自这三个国家中的一个。笑到最后的才是真正的赢家。

林毅夫是一名来自中国北京大学的杰出经济学家，他曾经担任过TIGER智囊团学术委员会委员（我是该委员会的主席）[28]，后来他又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俗话说："一燕不成夏。"我们并不抱有幻想，认为他的任命会带来多大的改变。但是林毅夫的任职至少喻示着这样一种机会：那就是新自由主义再也不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更加平衡的发展策略将会取代新自由主义的地位。

因此，我们可能会期待更多的经济体崛起于新殖民主义、中央集权主义、社会主义和孤立主义之中，它们将寻求自身发展的道路。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他们将会徘徊于前所未有的中国成功经验和拉丁美洲反自由主义道路之间，摇摆于印度的成功范例和受华盛顿新保守主义影响很深而不太成功的墨西哥经验之间，也间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社会民主取得的成就和一些东欧国家的成功经验之间。反过来，相对发达的国家应该向日本学习如何重新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也需要重视北欧国家社会市场经济取得的令人鼓舞的成就。

在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理念和实践中有许多合理的东西值得借鉴，这点毋庸置疑。新自由主义的大多数理念都说得通。关键的是如何抓住合理因素的要点，同时摒弃那些形成停滞、造成平衡、带来纠纷以及鼓励因虚假信息导致的错误的部分。应该摒弃那些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使另一部分人

获利的理念和阻碍文明进程的思想。即使现在宣告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还为时过早，新自由主义存在的时间也不会太久了。

我们需要的是经济自由和一个强大的政府，这点在功能性和公共经济效用方面体现尤为明显。如果一个国家制度很糟糕，就像许多非洲国家那样；或者说一个国家的制度被教条主义和缺乏远见的政治削弱，就像处于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欧洲国家那样，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会比一般情况糟糕得多。非洲巨人尼日利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津巴布韦也属于这种情况，以前经济发展得不错，最近却衰退了。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也属于上述情况。乌克兰到现在还这样。不幸的是，最近波兰也变成了这样一个国家，政府机构部门（包括那些保密机构）的设置十分不稳定。在上述这些和其他一些这样的国家中，国家效率低下比市场效率低下对其赶上相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阻碍更大。这点是另一个证明市场需要政府的证据。

当某种发明（如炸药）、某种产品（如飞机）或某种理念（如自由）威胁到他人的利益时，就需要规则来制约它们。这时就会有人问："如果国家不制定规则的话，那么谁来制定规则？"新自由主义，尤其是幼稚形态的新自由主义，肯定不是该问题的答案。政府必须拥有足够强大、效率足够高的机构，这样才能建设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在反应社会偏好和制定发展目标方面，政府的作用不可取代。政府在促进形成社会共识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为社会共识正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府也是知识形成的重要因素。但是，政府也常常对那些具有开拓精神和创造力的人课以重税。重新分配预算并不总能促进发展，有时也会浪费公款。最后，政府的官僚主义也会干预市场机制。

只要政府作为一个干预市场机制的机构，那么就会有关于政府"大小"的争论。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的职责是重新分配。这种干预在我们看来，意味着一直、至少是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都有人插手市场。通过预算制度，政府从源头（没人愿意这样做）增收工资税并用到需要开支的地方（需要开支的地方永远都不够）。问题就在于：十分需要还是比较需要还是有点需要？也许根本就不需要？这个问题的分歧永远都不会得到解决，最多只会变得没这么激烈。这是因为，在20世纪，用于分配的国民收入几乎都在一直增加。在一些国家，包括非常富裕的国家，用于分配的国民收入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0%。因此，政府到底应该有多"大"？也许，新自由主义者是对的，他们认为政府越小越好。

事实并非如此。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错误的断言，因为它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问题本身就是错的，答案当然也是错误的。提到政府的“大小”和其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尤其是干预收入分配的范围，必须把政府职能与政府机构的强度及效率这两方面区分开来。

今天，一部分政府职能需要加以限制而另外一部分职能需要加强。需要限制的职能包括研发职能等。在很大程度上，以盈利为目标的商业部门已经成功地完成了研发职能。需要加强的职能包括环境保护，因为盈利机构无法处理好环境问题。在最富裕的国家，政府可以相对减少医疗开支，因为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已经购买了私人保险，很多医疗开支都可以通过私人保险报销。同时，国际恐怖主义十分猖獗，这就要求政府在保护公民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领域的改变是多向的，改变程度也大相径庭。在某些领域，我们需要“少点”政府干预，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则需要“更多的”政府干预。

呼吁“小国家”或“小政府”与呼吁“大政府”都是与社会政治现实脱离关系的。这些人没抓住重点。政府不是应该“大”或者应该“小”，而是应该相当“高效”。波兰的政治口号是承诺建设“廉价”的政府，这种思想同样幼稚。政府职责是为公民提供必需的质量保证的公共产品，只有提供了这些产品国家才能正常运转和发展。提供公共产品需要花钱，就跟买一辆好车一样。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人都愿意花钱买好车，但是谈及政府的时候，他们宁愿被教条主义口号所迷惑，相信廉价的政府也能履行好职责。质量是需要价格作保证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索马里的政府够“小”也够“廉价”，但同时也没有发展。

政府职能发展过快对竞争性和长期发展能力会造成不利影响，这点在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和管理制度很差的社会市场国家尤为明显。新自由主义肯定有可取之处，有些关于政府的理念是不可抛弃的，包括应该不断施加压力以遏制官僚主义和减少公款浪费现象，重点是要严厉打击腐败，但是接下来就会变成人人都在反对腐败。

新自由主义者通过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政府施加压力，这些强国又使那些欠发达的国家依赖于他们本国的政府遏制腐败的滋生。一些国际政府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地区发展银行十分看重反腐斗争。大集团十分慷慨地投资建立了“自由之家”之类的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举办“丑陋的比赛”以羞辱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总是那些相对“大”的政府。

媒体也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有时很抽象有时又很具体。这种来自多方的压力能够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这种腐败会扭曲资本分配并降低总体经济效益。这时压力是有益的，此时担心的是大资本而不是道德层面的东西。即使仅仅从伦理角度看，腐败也应该被谴责。但是，新自由主义打击腐败纯粹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最重要。

首先，腐败导致保护主义。腐败引起保护主义并使之恶化。商业团体贿赂当权者，目的是为了在竞争中受到保护，获得特权地位，让政府容忍其扭曲市场信息的行为。换句话说，行贿人在“购买”一种以保护伞形式存在的服务。保护主义是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所有形式的自由主义的头号敌人。这仅仅是商业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伦理道德的问题。

第二，打击犯罪使资本能够渗透到国家机构中。打击犯罪的活动使新自由主义者能够通过监视监管过程、立法和政治决策来检查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工作。现在的形式与以前相反，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政府及其相关机构联合起来搜集关于资本结构和组织形式的信息，他们能够破译各种意图和交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众利益，防止强者对弱者发号施令。今天，大企业搜集关于政府的信息，目的是为了确保其利益高于公众利益。不管是国内企业还是跨国公司，他们监视预算过程的难度远远低于政府检查他们账本的难度。在公共讨论和媒体报道中，企业搜集信息的行为被看作是对公共利益的关心，然而政府搜集信息的行为却被认为是插手私营企业的官僚主义行为。制度平衡被打破了。尽管制度不平衡也能支持资本的私人利益部分，但却总是阻碍发展进程。

需要补充的是，大多数社会效率高并且经济发达的国家都不是那些拥有“小政府”的国家。也就是说，都不是那种再分配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相对较低的国家。在社会效率和经济方面，北欧国家处在领先地位，这些国家，用于再分配的预算和用于公共开支的税收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这个比例比任何后社会主义国家都高。

有种观点认为，“小”而“廉价”的政府比“大”而“昂贵”的政府更优越。要想解释这种观点很容易。最富有的“小政府”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日本、瑞士和美国，这些国家用于公共开支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其总量的30%。“大政府”国家包括荷兰、意大利和北欧国家，这些国家用于再分配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了总量的

50%。从一整套重要措施的角度看，两组国家和经济制度产生的结果几乎相同。注意，我说的是“几乎”。这套措施包括长期产量增长率、工资水平、教育水平、婴儿夭折率、平均寿命、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所以，什么才是争议的核心呢？“小政府”和“大政府”之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差别。那就是“小政府”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比“大政府”国家严重得多。“小政府”国家中，收入排名前1/4的群体与收入排名后1/4的群体的平均收入比为8.3:1，而在“大政府”国家中这个比例仅为5:1。根据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前5年对“小政府”国家的观察，8.3:1[29]这个比例一直很稳定。接下来的几年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差距的增大并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社会分层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容置疑的是，加强社会公正性（除非你对社会公正性持保留态度）与减少收入不平等现象和高经济效率息息相关。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神话破灭了。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些人希望政府作为最基本的机构而有人却不希望。每个人都需要政府，就如每个人头上都应有个屋顶。但是，每个人都想要能让自己过得舒服的政府。企业主对舒适的理解与工会组织者的理解不尽相同。对于拥有自己事业的投资家和职业管理精英们来说，员工成分的复杂性使其需求大相径庭。然而，不管是投资家还是职业管理精英，都觉得政府挡了他们的路，至少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阴影。只要政府的政策不直接针对他们，他们就充耳不闻。但是，如果你仔细聆听各行各业游说者提出的策略，你就会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多么地需要政府。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在新兴市场，政府援助更侧重于商业利益而不是雇员（包括白领和蓝领）的利益。报纸电视是不会这么报道的，但是敏锐的政治观察员会觉察到真相。

不管政府职能的范围是宽还是窄（无论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真正起作用的是公共机构的优势和活力。人们经常说好机构不嫌多，事实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什么都要适度。适度原则也适用于市场原则和经济学结构框架。而政府作为一个超级机构，也应该维护市场原则和经济学结构框架。

没有任何政府的机构是完美的，总是需要改进，这在所难免。美国一些超级大公司如安然公司的骇人丑闻说明，在号称自由企业故乡的美国，股东的利益并没像课本中所讲的那样受到保护。目前，中国的许多机构力量还不够强大，尤其是在保证房地产交易透明性方面做得还不够。在巴西，负责教育和农业用地分配的机构正

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波兰，地方政府比以前运转得好多了。在俄罗斯，灰色经济得到了控制。

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对政府机构仍旧充满了期待。旧的机构已经被摧毁或者数量正在减少，同时新的机构还在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在那些已加入欧盟的国家，市场机构已经发展起来。对抗政府的幼稚的斗争会导致误入歧途，后社会主义国家便是典型的例子。斗争削弱了政府。不管动机是基于意识形态还是出于集团利益，他们都会削弱总体竞争力并损害公共利益。这是短期的战略性的损失，因为政府软弱意味着总体经济增长前景会更加黯淡。关键不是增加或减少政府的职能范围，而是要确保政府机构职能行使得更好。

另外，政府究竟应该有多大这个问题，必须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讨论。今天认为的“大政府”也许在过去就不大，在将来也不一定就是大的。和平时代和战争年代关于政府最佳大小的标准并不一样。当“婴儿潮”一代处于壮年时期，能够自力更生的时候，当时政府的大小可能是合适的；但是，当这代人还在上学或已经退休时，这个大小就不合适了。

政府的作用必须与其职能紧密相连。一些职能如防御和外交不能被削弱。其他职能如文化和研究，则有选择性，取决于价值观和社会凝聚力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在实现高效经济和高效平衡增长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但是政府的作用必须与市场保持一致。对怎样才算一致的不断探求是把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把政治作为一种实践的原因之一。

反过来，市场不仅包括活力与平衡，也存在混乱与不可预测的事情。市场必须纠正控制政府的过分行为，反过来也一样。曾经有这样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思想：那就是，幼稚地将强大的经济与虚弱的政府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的背景居然是21世纪早期，而不是19世纪的自由放任政策时代。在城市扩张、冲突、战争、破产激增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思想更加难以置信。所以我们又问：“这到底是意见的不同还是利益的冲突？”很少有人会傻到认为政府不应该插手经济，政府只是不该插手管一切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波兰在1950－1955年期间却插手这些小事。当时，六年计划不仅规定了要产多少吨钢铁、制造多少艘轮船，也规定了应该有多少泡菜“上市”，他们似乎担心喝伏尔加的时候会没有东西可嚼。

不管是在国家政治中还是在区域政治中，政府与各种永久、临时条约一起，是政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当私营企业和市场的不可预测性不足以使人们开始工作、不足以投资人力资本、也不足以创造商业活动的文化基础时，它们的作用更不可小觑。毕竟，世界上有些地区缺少从阿姆斯特丹订购伦勃朗作品的资本主义私人赞助商，也缺乏当代美国为美术馆运行提供资金的基金会，这并不是因为缺乏人才。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然而它们拍的电影甚至比一些位居世界上最富有国家行列中的国家好，比如挪威和瑞士。这个例子再一次说明了单靠金钱和人才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挪威和瑞士既不缺钱也不缺人才。是需求量的原因吗？富裕国家的公民去电影院的次数远比贫穷国家的人多。在马里和布基纳法索，许多人从来没看过电影，甚至没在电视上看过电影，因为在大部分萨赫勒地区，根本就没有电视机也没有电。那么，什么是决定因素呢？政治。如果说市场有只无形的手，那么政治就有个有形的头。

需要指出的是，具体的巧合决定了这些问题的出现，因为许多事情同时发生。单靠政府政策是不够的。人才需要从别的地方引进。如果能够意识到引进人才年龄越小越好，那么对国家发展就更好了，因为年龄小的人才还可以继续教育培训。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宗主国法国和苏联，曾经与非洲一些国家一起试验非洲式社会主义。法国和苏联的优秀电影学校培养出了最优秀的非洲人才。挪威和瑞士却没这么幸运，它们不是法国前殖民地也不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因此，以上两国电影制作人的数量还没有非洲多。

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的结合将会继续改变世界。具体来说，就是政府与市场的结合、政治与不可预测性的结合、意识与自发性的结合、安全与危险的结合。如果结合恰当的话，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应不应该因为新自由主义已经灭亡而放过机会？那样的话又会犯另一个历史错误。不幸的是，尽管我们迄今为止已经学会不少东西，犯这种错误的几率还是不小。这点值得思考。

关键问题在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在时空上并存。迄今为止，众所周知全球化主要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将来也是。全球化的活力不是由政治决定的，更不是由策略计划决定的，而是由不可预测因素决定的。作为解决经济生活问题的药方，新自由主义很适合目前混乱的全球化形势——管理干预越少越好。然而，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谁会获益？每个人吗？显然不是。大多数人吗？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如

美国，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更不用说在全世界。一部分人获益吗？答案是肯定的。管理干预越少，对那些在世界经济博弈中获益最多的人来说也就越好。

大资本是绝对的赢家，它已经摆脱了民族国家的监督，已经实现了无国界。大资本不受人管制，可以任意游走。大资本有越来越多的投资地点以及如何取得成效的机会。政府和公众都接受大资本的这种行为，因为他们的选择面实在是很窄甚至没有选择。资本运行十分理智并使功能目标最佳化，功能目标最佳化的目的是使投资收益率达到最大化。另外一些资本运行却十分不理智，因为它们没有充分的信息。更严重的是，它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有效服务于自身利益。这种资本在国有资本、地方资本和个人资本中都存在。

结果，全球化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变得不是那么理智，或者说彻头彻尾地不理智。当每个国家处于全球政治经济博弈中，要想让它们变得理智很困难。其中一些国家，特别是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十分强大的力量。他们能做超越自身范围的事，如果他们遵循了游戏规则，就会获取更多利益。中国表现得很理智，它制定了一条适合全球化的完美道路。中国是全球化的赢家，因为中国把监管与自由化结合了起来，把微观经济的企业精神与宏观经济调控策略结合了起来，并且比任何国家都结合得更好。中国把各方面因素统一起来，而不是把各种因素对立起来。总体来讲，东欧国家在走新自由主义道路过程中，就曾幼稚地把这些因素分割开来。这在俄罗斯和波兰表现得尤其明显。

特别是在西方，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仍然占统治地位。西方国家经常问中国成功的原因是什么。答案其实十分简单。探索中国成功的原因需要打破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桎梏。中国的成功并不是孤儿，它是有父母的。它的母亲是市场，而父亲则是政府。只有把市场活力及其不可预见性同政府政策行为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如果把一切推给市场和私营部门，中国就不可能把全球化带来的成本耗费减少到最小，也不可能把利益扩大到最大。一方面，中国能够利用世界经济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加速自身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与投资。

许多经济学家，包括那些工作在几乎从不关心中国成功经验的国际机构中的经济学家，都受益于中国的理性发展方式。虽然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可能与他们提出的建议背道而驰，但表面上似乎这些建议很好。于是，这些经济学家就可以邀功，一些组织和政府也可以邀功。世界经济的平均发展数据体现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水平，而来自中国的数据总能提升平均值。毕竟，中国占据了世界进口总量的1/10（包括香港在内）和出口总量的1/7，以及世界总产值的1/6（不包括香港）和世界人口的1/5（香港人口相对于中国总人口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换句话说，首先还得感谢中国的非常规理念与政策。是这些理念、政策使全球化相对来说没这么不理智。中国的理念与政策拒绝了新自由主义。

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包容性全球化并不现实。那些认为全球化能使绝大多数人受益的人是在做白日梦。新自由主义思想宣扬的理想世界是不真实的也不可行的，尤其是其关于政治任务的表述。新自由主义的表述包括政府认可的表述，也包括由国际经济金融机构提供给政府的表述。反过来，这些表述服务于一些政府而不是另一些政府。还有一点几乎不需要补充，那就是这些机构都服务于资本利益。

我们现在要讨论另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无论从方法论还是实质性的角度，我们都已经作好了准备。是谁错了，还天真地做着这个白日梦？又是谁在故意宣扬这种理想世界，但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有时，我们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观点：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最后的乌托邦。看一下新自由主义教条的拥护者和不理智的辩护者，我们便能明白这种说法的原因。这些教条主义的拥护者和空想家与他们在媒体的喉舌一起，为一小群受益者的一些显而易见的利益服务。从这个角度看，新自由主义不是乌托邦，而是以牺牲一部分群体利益为代价来保护另一部分群体利益的有效方法。因此，意识形态上的乌托邦变成了一种实用主义策略。为了有效地实现这种实用主义策略，新自由主义必须把虚假的东西和谎言作为操纵公众意见的工具。不过我们还必须承认，与20世纪其他被称为“乌托邦”的流派相比，新自由主义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

在我们等待这种乌托邦到来的日子里，生活得照过，生意也得照做。天真的人愿意被人牵着鼻子走，他们不仅相信事情的外表总与其内在是一致的，有时甚至还为给他们带来伤害的事情辩护。我还记得一天黄昏在曼哈顿慢跑时见到的一幕：在临近街角的地铁口旁边的角落里，一个刚睡醒的无家可归的人正在仔细阅读《金融时报》的市场报告。

政治营销和媒体的职责就是愚弄大众。是它们使大众热衷于股市行情，让人觉得仿佛持续上下浮动的股票价格能对自己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股市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不再关心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股市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这些人最后

集体成为投机活动中的棋子。人们十分在意兑换率的上下浮动，即使当这些浮动几乎觉察不出来时，他们也很敏感。许多人都知道道琼斯平均指数是多少，每天变化多少。而只有少数政客清楚，将人类发展指数这种东西和其他幸福指数纳入他们的策略中是值得的。

在今天的世界里，新自由主义和资本的结合几乎毫无限制，并且比政府、国际组织及其他任何潜在的合作伙伴更能施加影响力。然而，就是这样的联合导致了竞次（race to the bottom）。打着“小政府”幌子减少税收和削弱国家力量的做法就属于竞次范畴。国家力量削弱了，就经受不起资本力量的考验。税收减少的影响会波及到社会转移支付方面，波及到为穷人、被社会排斥人群构建的安全网。限制管制并不能增进自由市场机构的职能；相反，它只能减少自由市场机构的职能。

那些温和派经济学家、分析师、媒体评论员、智囊团和信奉教条主义或腐败政客的言论伴随着这个过程。这些人探讨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和成本竞争性，讨论怎样清除使人们变得懒惰的剩余预算转移款项，怎样使税收制度简单化，以及怎样排除官僚主义障碍。

在其自身的参照系内，资本表现得很合理。不得不承认在这个范围内，资本已经取得的成就相当可观。这点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国家尤其容易被灌输新自由主义思想，同时也容易被压力集团所左右。这就使得社会市场经济体既不能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也不能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中成长起来。社会市场经济体是指这样的经济体：既保证个人创业自由和自由市场竞争，同时国家也要起到监管的作用，处理好经济增长红利与社会平衡发展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特殊背景下，后社会主义国家把各方面情况结合了起来。这点我们已经分析过。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尽管有许多缺点，新自由主义还是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在其他新兴国家，政府机构的力量通常比较弱小，公共基金也很短缺。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争给发展潜力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社会市场经济体需要强大的政府和持久的政治共识。这些东西都是后社会主义国家和以前的第三世界国家所没有的。事实上，世界还是以前的世界，只是现在换了种说法而已。

社会市场经济需要把政治、文化和经济情况结合在一起。而只有这三者的结合在过去就已出现，并且能够长期存在，今天才可能有社会市场经济。需要补充的

是，运行良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许多社会福利价值观与文化吸引力一起，构成了这样一种条件。宣传，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公共关系，也能造成影响。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西方，时不时会出现一些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倾向。要想遏制这种倾向，必须扩张“福利国家”，并关心劳动人民的命运。除此之外，文化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肯尼迪政府时期，博物馆与美术馆蓬勃发展，目的是跟苏联欣欣向荣的文化景象对着干。许多美国人都把冷战时期看作是艺术和奖学金的黄金时代。当时政府在花钱方面比现在大方得多。在那个超级大国争霸、两种制度对立的时代，政府把大量的钱花在制造虚假景象方面。由于受冷战时期、惯性力和传统的影响，今天的美国仍然拥有大量优秀的博物馆、400多个职业交响乐团和1500个业余交响乐团。一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受益于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中借鉴来的思想。东方国家从来没想过要在西方形成社会市场经济，但社会市场经济确实诞生了。历史总是充满了矛盾。社会市场经济的诞生便是其中一个有益的方面。

今天，社会市场经济的遗产还存在，只是比以前少了。社会市场经济的范围被大幅缩减，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也不例外。缩减这些措施并不仅仅是因为老龄化社会需要巨大的开支，也是因为来自全球市场和国际资本的压力。即使是在社会市场经济的中流砥柱加拿大和北欧国家，国家和社会福利措施也被削弱了，市场积极性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同时社会排斥现象变得更严重。然而，北欧国家，包括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和冰岛，社会市场经济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些国家领先的方面不仅包括一些具体的领域，如竞争力、制度成熟度、人力资本质量、环境条件、公共安全和互联网普及率等，也包括最普通的衡量指标，如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标准。不幸的是，即使是在北欧国家，新自由主义和肆无忌惮的全球化的消极方面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竞次”现象终有一天会结束。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盼望那一天的到来，尤其是那些在“竞次”过程中获益的人。“竞次”比赛最好在国家变得混乱、机构变得难以容忍前结束。每次危机，包括“竞次”比赛带来的危机，都是使人类重新思考问题并做出改变的机会。不幸的是，这种机会只有在危机发生后才会表现出来。在危机发生前，我们根本不能采取必要的理性措施，因为采取这样措施的成本太高。由于对新自由主义抱着幻想，那些在混乱的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人甚至不能从容面对眼前的危机。这样的结果就是使整个全球经济都变得不理智。

贪婪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机制。但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和社会角度看，由贪婪导致的行为通常都不理智，这点在世界经济中比在国民经济上体现得更明显。贪婪可以迷惑人的意志。虽然新自由主义的没落值得欣慰，但它留下的微薄“遗产”仍不得不让世人（当然不是所有人）忧虑。

聪明人做的蠢事，以及这些蠢事对其自身的伤害，真令人惊讶！

注释：

1. 持此观点的还有200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请参阅普雷斯科特的诺贝尔获奖演说《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和研究》（《政治经济学》，总第114期，2006年第2期，203－235页）。

2. 英国财政部长伊恩·麦克劳德（保守党）早在1965年就提出这个政治经济学概念，但直到70年代才得到广泛使用，经济滞胀过程分析成为美国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哈伯勒经济理论的基础。请参阅哈伯勒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关于经济变迁和政策的分析》，（洛杉矶：纳什出版社，1974年）和《关于滞胀问题：反思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微观基础》（华盛顿：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1985年）。

3. 雅诺什·科尔奈：《短缺经济学》，阿姆斯特丹：诺斯·霍兰出版社，1980年。

4.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和瓦特·麦克马洪：《滞胀和短胀的对比研究》，Kylos，总第40期，1987年第2期，176－197页。

5. 菲利普斯曲线是史上最著名的经济学曲线之一，说明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该曲线是由新西兰出生的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于1958年在一家英国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中首次提出来的。请参阅《1861－1957年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经济学》，25，282－299页）。

6. 埃德蒙德·费尔普斯：《通货膨胀政策和失业理论》，纽约：诺顿出版社，1972年。费尔普斯曾获得诺贝尔奖，说明他为进一步了解短期与长期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作了重要贡献。费尔普斯在该书中还谈到优化国民收入分配（全球经济生产总值）和资本积累（所谓的积累的黄金规则）。

7.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62－63页。

8.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在《后共产主义转型和后华盛顿共识：政策改革的教训》一文中对“华盛顿共识”的支持和反对意见分别作了回顾。该文被收录在马里奥·布莱赫尔和马可·斯克勒博合编的《经济转型：第一个十年》（剑桥、马萨诸塞、伦敦：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1年，45－83页）。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让全球化起作用》（纽约、伦敦：诺顿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对“华盛顿共识”作了详细的批判。

9. 约翰·威廉姆森在20世纪80年代末造出了这个新词“华盛顿共识”。关于这个词的理论基础、其在经济政策领域的解读以及威廉姆森本人对这些解读的再解读，请参阅《杰出讲座系列17》中的《“华盛顿共识”的不同解读》（华沙：科依敏斯基管理学院，2005年）一文，www.tiger.edu.pl。

10. 约翰 · 珀金斯根据自己的经验创作了《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旧金山：伯雷特 · 克里尔出版社，2004年)一书，揭露了富国如何处心积虑地将穷国逼进债务陷阱并不得不采取富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11. 关于这点，相关文献很多，包括奥利维尔 · 布兰查德的《后共产主义经济的转型经济学》(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玛丽 · 拉维涅的《转型经济学：从社会主义经济到市场经济》(查普曼，肯特：麦克米伦出版社，1995年)；卡兹米尔斯 · 波兹南斯基的《波兰经济的漫长转型：制度转变与经济增长》(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弗拉基米尔 · 波波夫的《休克疗法和渐近式改革的再思考：转轨经济15年来的经验总结》(《TIGER工作论文系列82》，华沙：科依敏斯基管理学院，2006年)，www.tiger.edu.pl。

12. 维也纳经济大学(WIIW)的卡兹米尔兹 · 拉斯基教授曾撰写《波兰的经济稳定计划》(*Wirtschaftspolitische Blatter*, 1990年第5期，444－458页)一文对"休克疗法"提出严厉批判。他在该文中预言1990年工业生产总额将下降25%，进而导致大规模失业。不幸的是，这被他言中。

13. 有着丰富从商经验的荷兰研究学者唐纳德 · 卡尔夫反对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模式有实质性优势的说法，并由此提出对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启示。参见卡尔夫：《非美国式企业：欧洲企业新模式的兴起》(伦敦：科根 · 佩奇出版社，2005年)。

14. 关于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请参见维托 · 坦齐、朱克勇和桑吉夫 · 古普塔合编的《经济政策与分配不公》(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年)一书。

15. 伯恩特 · 布拉特斯伯格等：《异辈之间收入流动性的非线性特征》，伦敦：皇家经济学会，2006年；《新视角下的美国例外论》，波恩：劳动力研究院出版社，2006年。

16. 关于这项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见2007年3月10日《经济学人》第63页刊登的文章《对穆斯林人民意见的测验：我来说两句》。

17. 关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我写了一篇题为《引发下一场伊朗革命》的文章，分两部分先后刊登在2007年3月14日和15日的《全球主义者》杂志上，www.theglobalist.com。

18. BBC曾进行过一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调查，关于该调查结果，见2007年3月3日《经济学人》第49页刊登的文章《拉美和美国的解冻时期》。

19. 弗朗西斯 · 福山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权力和新保守主义的遗产》(纽黑文、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中就这个话题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观点。关于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不同政权的对比分析，可参见兹比格纽 · 布热津斯基的《第二次机会：三届总统和美国超级大国的危机》(纽约：基础书局出版社，2007年)一书。

20. 2007年末，世界银行重新核对了之前的数据，并宣布中国的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比之前公布的数据要低40%以上，新数据让许多人惊诧不已。根据新数据，中国的GDP在6万亿左右，而不是10万亿。印度的GDP数据被"下调"的幅度更大，印度的GDP原先超过日本，但新数据却只有日本的一半。彻底改写数据并没有让那些统计人员显得更严谨。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失误呢？我们又怎么能相信这次的数据不会再错呢？当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最多只能接近真实的GDP。考虑到这些

计算方法的缺陷，我还是决定采用原始数据，似乎原始数据更能准确地反映事实。

21. 在这些极度贫困的国家，人口出生率高得惊人（尼日尔和马里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1000美元和1200美元，根据2007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在尼日尔，婴儿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249/1000，在马里则为219/1000。相比之下，中国的婴儿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31/1000。而在最发达的国家——芬兰、日本和瑞典，婴儿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仅为4/1000。波兰的婴儿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8/1000。请参见《发展与下一代》（华盛顿：世界银行，2006年，292－293页）一书。

22. 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同注释19，64页。

23. 戴维·萨特：《俄罗斯犯罪国家的兴起》，《棱镜》，1998年9月4日；雅尼娜·威德尔：《碰撞与共谋：西方对东欧援助的奇怪案例（1989－1998）》，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8年；《哈佛男孩对俄罗斯做了什么》，《国家》，1998年6月1日，11－16页。

24. 我当时就这个问题在很多期刊上发表过文章。包括《俄罗斯应该"以人为本"》（《纽约时报》，1998年7月7日），《不要放弃俄罗斯》（《经济学人》，1999年2月27日），《十年后社会主义转型：政策改革的教训》（世界银行新的研究系列报告，政策研究工作文件2095，1999年4月），还可参见拙著《从震惊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型的政治经济》（牛津、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不过，厄尔曼斯的请求与这个问题是相关的，因为真相还没大白（前提是有一天真相会公之于众）。

25. 见《经济学人》2004年12月11日刊登的《挑战者》一文。

26. 彼得·曼德尔森引自BBC新闻网上的一篇文章《处于低潮的俄罗斯欧盟关系》，2007年4月20日，news.bbc.co.uk。

27. 比较2007年的《CIA世界概况》（华盛顿：中央情报局），www.cia.gov。

28. 林毅夫于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他同时也是TIGER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他曾经访问过该委员会，并发表演讲。见《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教训》（《杰出讲座系列16》，华沙：科依敏斯基管理学院）一文，该文也可从以下网址获得：www.tiger.edu.pl。

29. 参见维托·坦齐与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的《政府增长与工业国家的国家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报告，1995/130，1995年）一文。

第七章　发展是什么，发展依靠什么

社会经济的发展依靠什么，又如何使人感到幸福

新自由主义留下的有些东西并不令人引以为傲，应对这些问题的最佳办法就是逃避，将目光转向未来。

改变经济发展的轨道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之所以不容易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此应该做些什么，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缺乏利用这种知识，做出正确转变的政治决心。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怎样才能引发正确的变革，这就意味着要回答“增长和发展是什么，增长和发展依靠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其艰巨程度前所未有。一方面，我们的知识比过去丰富，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及其附带结果使再生产过程，或者说，现有生产重复循环的过程，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复杂多变，这种复杂性尤其体现在彼此依赖的资本积累和资本分配过程以及生产与分配过程都被放置在跨越国界的背景下。

知识使得我们可以通过现有资本进行生产和补偿，将用于支持发展的储蓄和刺激商品及服务市场的需求从未来转移到现在。然而，没有人能够把以经验为基础的知识和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理论概括从未来迁移到现在。我们唯一掌握的知识来自于以往的经历，因此我们必须依赖它们来塑造种种经济过程，其中也包括影响未

来的供给流和需求流。前文提到过的卓越的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曾经警告我们，一次又一次犯同样的错误很危险，未来不同于过去。当今世界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和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更是证明了这句话的正确性。因此，提建议时一定要万分谨慎，因为在各种条件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过去决定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素不一定能够继续左右未来社会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我们不仅有必要对过去的发展机制有深入的理论认识，而且也有必要认真地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超级经济等层面对未来做跨学科研究。

意识到情况不妙就意味着要变革。实现大多数人渴望的进步需要变革。没有重大变革，人类甚至无法保持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的相对平衡。所有这些变革必然要求经济增长，即便这种增长不如近几年经济规模扩大时那么有活力，即便增长的方式不同于以往，但经济增长是必须的。

简单地、不加批判地根据过去的发展走势去推断未来，或者认为经济一定会越来越好，这样的想法很危险，而带着这些想法去规划未来就更加危险。从过去经验中得来的法则中只有一部分能够继续适用于解释生产、分配、消费的社会过程。同样道理，贫穷国家在将来未必能赶上目前最富裕的国家，在过去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时候没抓住机遇，将来有可能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好机会。将来，有悖于常规的发展实例肯定会很多。

显然，没有资本就不可能有增长和发展，这一说法早就成为老生常谈，同样老生常谈的论断还有，要发展只有资本是不够的。历史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国家都不乏除资本以外的他因素导致生产陷入停滞的例子，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于人们缺乏常识。除了充足的资本外，其他因素（现象和过程）也必须同时具备才能够调动好资本，实现更高的产量达到更好的生活水平。发展就是要向好的方向变革。因此，从本质上讲，发展永远不可能给每一个人都带来好处，但至少必须能使大多数人生活得更好。

我曾经任职于国家主要经济政策决策机构。一次，我和某国一位富豪争论一个问题，他的国家是个大国，当时正处于后社会主义改革转型时期。他竭力劝说我不要从国家财政拨款10亿兹罗提（简单来讲，这笔钱来自于商业盈利上缴的税收）用于提高将近1000万退休职工和残疾人的养老金支付标准。此款项一旦下拨将使每个领取养老金的人平均每个月多领8.50兹罗提。尽管当时政府已经多次削减企业家所得

税，那位富豪仍主张削减，把钱留在企业家的口袋里。他认为，少数有钱人可以用这笔钱投资以后的生产，而穷人只是用这笔钱多买“两公升的牛奶”，相比之下前者比后者更划算。我反问道，如果把这10亿兹罗提全都拨给最富有的投资者岂不是更好。他回答说，是呀，当然再好不过了。在他看来，允许超级富豪增值现有财富（当然会造福其他人）显然比把钱浪费在“为不再工作的退休职工多买一杯牛奶”上面强多了。由上面这段对话推导出的逻辑结论可以写整整一本书，然而本书还有许多问题要讲，只能在此做简要讨论，篇幅限制在一页之内。

首先，我们必须要弄清楚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困境。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些人能每天多喝一杯牛奶（尽管这一点也很重要）或者多一点钱来支付日常开销，而在于这两种不同的政策选择对未来的经济活动过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会如何分配收入。我们必须搞清楚这是个什么问题，是划分已创造出来的可支配收入的问题，还是要增加未来收入的问题。在这个案例中，存在实际的预算赤字，所以我们要同时考虑公共债务的增长，由于我们对收入分配讲的比较少，这样一来情况就更复杂了。

因此，我们面临的困境是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给消费还是分配给积累。二者存在天然本质的对立，即划归消费领域里的东西不能同时再划归到积累（投资）领域，反之亦然。另外，由于本案例中消费的主体是处于后生产年龄阶段的一代人，因此消费行为对劳动者生产率不产生直接影响。它可能会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现在工作的人未来会退休，他们可能会将现行养老金上涨视为国家收入政策良好的积极信号，因此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他们还可能还注意到，现在每月增加的退休金将来会加到他们的退休金上。

用短期还是长期视角来看这个困境，情况截然不同。在经济学中，短期是指在一段时间内决定生产的各种要素（包括相关技术）是固定不变的。各种生产要素可利用的程度有所不同，如果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程度马上就能增加产量（反之亦然）。所产生的实时效果可能是一次性的，也可能是经常性的，但都是在经济环境周期性的框架内上下波动。增长规模受现有储备规模的限制，所谓现有储备是指没有用在上一个生产周期的生产能力。

在经济学中，长期是指生产要素因资本积累和已完成的投资而不断扩大，进而使产量增长的整个过程也处于动态。新建的工厂常常使用最新技术来生产新产品，新建的公司提供新的服务，更多质量更好（更有价值）的商品被生产出来。结果导

致收入的上升，无论是收入中负担当前消费增长的那一部分，还是留出来用于直接投资或借助银行和资本市场等金融中介机构投资的那一部分都在上升。因此，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扩大再生产的问题，即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越来越多的东西被生产出来的问题。

显然，每个月多领8.50兹罗提的老人们并没有为增加新的生产能力而投资，进行投资的是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的企业家们。但是这10亿兹罗提的新增收入放在消费者手中将会增加有效需求，从商业机会角度看，有可能增加销售量，这一点显而易见。简而言之，把这笔钱划归到消费领域也有利于商业发展。如果社会有闲置生产能力，那么这10亿兹罗提也会使产量增加。如果社会没有闲置生产能力，则要么从国外进口相应数量的商品导致进口国产量增加，要么出现最坏的结果，通过价格上涨清除多余的市场需求。后一种情况对生产增长没有积极影响，而且可能出现更加糟糕的局面，由于价格扭曲，新增的通货膨胀可能减缓经济增长。

我们也可以从理论上假设退休职工和残疾人从他们新增的养老金中拿出一部分存入银行，共计100万兹罗提，那么这笔钱将会以存款和贷款的形式进入资本市场，并最终用于投资。撇开投资结构不谈，其结果将类似于一小群企业主把相同数额的钱用于投资所产生的效果。但考虑到退休职工和残疾人的实际收入水平，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微薄的新增收入没有存起来，而是全部用于支付消费增长（我们也可对其他社会群体，如教师、护士做同样的思考）。经济学家将这称之为边际消费倾向。

如果不是给1000万人每人每年多发100兹罗提，而是免除100位企业家每人每年1000万兹罗提的税，那么这100位企业家总计多了10亿兹罗提的额外收入。他们可能会把这10亿兹罗提用来投资，如果他们把这10亿都用作了投资，那么他们的边际储蓄倾向将是百分之百。但是，我们生活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笔钱也可能会投资到国外，如果是那样，这笔钱将会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10亿兹罗提还可能会不投向任何地方，而是用在奢侈品消费上。以我们对奢侈品的了解，可以设想这些奢侈品可能正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生产，将来进口到国内，再高价卖出，它们也许是雅库特矿的钻石、巴伐利亚装配线上的宝马汽车，也许是加拿大停机棚里的庞巴迪商用飞机，或是丹麦船厂里的游艇。

因此，再生产过程的供应方和需求方都存在许多变化。促进产量提高的是新增需求吗？如果是，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成立？是不是当它以供应形式出现的时候就会

产生正面影响，当它以通货膨胀形式出现的时候就会产生负面影响？（只有苏格兰人能利用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尼斯湖水怪来创造不间断的需求。）由新增投资所创造的生产能力是否不仅能提高潜在产量，还会自动提高产量？而这是否会直接导致销售额上升，抑或导致库存增加？当高额利润没有引导人们把钱花在投资融资领域，而是花在了消费领域，这样是否也有助于提高产量？提高产量的条件是什么？当今世界全球化处于高端水平，我们应如何看待增产潜力与实际增产潜力，是立足于国内（国家）还是立足于世界？最后，从社会满意度和消费者满意度的角度来看，到底是给少数人很多钱好，还是给很多人少量钱好？

以上只是对看似简单的困境及其引出的问题所做的简要回答，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环扣一环因果相连的整体，时期长短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往深挖掘，想要一个经济过程按计划运行至少要汇集几种具体的经济情境，本案例涉及的是长期经济增长，而不仅仅是一次性的需求拉动或供给推动。在现实中，经济运行过程所需要的情境超出了纯经济的范畴。

好奇、细心的读者可能会问，你是如何解决“给一个人10亿还是给许多人100”这个难题的？因为现实中的确有这种事情，类似的情况也总发生。首先，最重要的是，由于国民收入的问题总是与如何分配的问题纠缠不清，我们要降低双方（大众消费者和商界精英）的预期，回到现实中来，根据预算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然后透彻分析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在现实增长机制中的安排情况和能力，一方面要注意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创造性地找出折中方案。最后，大部分资金作为新增家庭消费需求流入市场，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反过来促进对现有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提高。受益于消费品产量上升，这笔钱会一次性推动产量上升。一小部分资金流入投资品市场，扩大生产能力，而这反过来又产生了长期增长的效应。毫无疑问，还有一部分资金用来增加消费品进口，但是这只占总量的一小部分。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产量增长的过程有多么复杂，相比之下经济社会发展就更加复杂了。只占一页篇幅的简要讨论还告诉我们，要加倍小心那些引人入胜的论断，盲目信以为真往往会导致看问题过于简单化，会害了我们。毕竟，产量增长同样（并同时）取决于供给与需求因素、资本及其在社会上转移的规模与结构、商业性支出与国家预算、消费者和投资者预期类型、国内需求与外部需求、社会上各种职业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与边际储蓄倾向以及其他许多纯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

素，这些因素甚至在上面这个明显带有象征性的例子中都没有表现出来。

商界和政府必须尽力维持生产或资本（包括人力资源资本）再生产的条件的长期存在。二者的基本区别是，商界的时间视角比政府的短，社会视野比政府的窄。二者专注于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融资偏好，做不同的金融决策。例如，企业不会给孩子们支付工资，尽管他们知道如果没有孩子企业迟早会无人可雇，关门歇业。而政府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付钱给孩子们。如果执掌国家政权的精英们更靠近工商界，那么政府的时间视角就会缩短，其社会视野也会变得狭隘。如果当政者更靠近劳动者，就会扩大社会视野，延长时间视角。

如果产量上升了，而与此同时大众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改善，很难说经济是否得到发展。20世纪晚期，在美国就出现了这种模式的某些征兆，当时新自由主义为经济增长开出的药方正大行其道。这首先导致了非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非工资性收入的主要形式是利润、各种各样的租金和由所有权或资本使用权带来的收益；而另一方面，尽管生产力提高了，但劳动者的收入却没有增加。有的作者反对把这种宏观经济扩大再生产叫作发展，这样太极端了，毕竟，美国经济不仅增长了，而且发展得还很快，这一点反映在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进步和结构性变化上。一大部分社会成员没有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意味着这样的发展是有缺陷的，但是也不能就此否认发展的存在。

近年来，俄罗斯也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类似现象在许多欠发达经济体中也能看到，尽管他们的经济基础水平可能有所不同（更低），生产结构可能会不同（比较传统）。从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字看，这些国家的经济的确有量的增长，但是以我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解，它们恐怕称不上发展。虽然统计数据显示生产总量和平均消费量都在增长，可是对于绝大多数人口来说收入可能很多年都没有增长。少数人设法摆脱了欠发达的状态，过着在富裕国家里也算得上中产阶级的生活，而其他大多数人仍然陷于贫困的泥潭中。

年复一年，我们在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看到了很多典型的只增长不发展的弊端。人们形容当年教条主义统治下片面注重重工业的情形是“为生产而生产”。当不平衡在受国家管制的准消费品市场上愈演愈烈的时候，价格改革被迫施行，有人开玩笑讽刺说，火腿价格上去了，火车头价格却下来了。如果当初至少改善一下客运服务质量的话，我们兴许就能谈谈发展了，可惜这样的改善也不

常有。在优先生产生产资料的时候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部门的再生产，这是导致现有资金资源潜力巨大，而产量增长速度和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相对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消费领域被视为生产的合法输出渠道和生产的动力时，劳动生产率将和整体产量一同上升、发展。

然而，当增长来自于武器生产的扩大或者增长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超出了新增产量的数量时，发展也会错失良机。这种情况的确存在，虽然有些商品对社会有害、降低生活质量，却广受欢迎，例如汽车造成拥挤、使城市陷于瘫痪却仍缺其不可。我们没有必要在毒品、酒精、烟草产品的生产是否也代表着发展这个问题上纠缠过多。

考虑到技术进步的性质和由此引起的创新，产出结构的变化有时也意味着发展，虽然创新并不一定带来数量的增长，但也不排除这个可能。如果一个新产品和原来的旧产品有相同的利用价值，而新产品更节能、消耗原材料更少，或者更容易回收，那么我们就已经有了谈论发展的合理理由：数量相同、质量更好，这是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论及社会经济规模，情况就更复杂了。社会经济规模远远超出我们居住的特定地方和特定地区。人活着就要消费，消费不仅限于某一国家或特定地址，消费的范围可以是整个世界。这个世界非常大而且变化多样。因此，我们必须取平均水平做一般性的归纳，这就意味着要简化事物。这种方法也适用于从理论上解释产量、消费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长过程。客观地讲，增长理论模型似乎把事情越搞越复杂，因为所有人都清楚，当人们工作量加大（或者统治者治理得好）时，产量自然就上升。事实上，即使是最艰深复杂的数学增长模型也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事物进行简化。

简单来说，经济增长就是产出品价值随时间的推移而呈现的增长，即商品和服务价值增长的总和。这里讲的是产量总体水平的增长，因为某些产品的产量一直持续上升，而另一些产品的产量总是持续下降。笼统地讲，当就业人数增加或雇员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时，产量就会增加。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产量增长，是假设从长远来看就业人数与人口同步增长，而不是与人均产量同步的增长。但这仅是增长，不是发展。这种粗放型的增长不能改善生活水平。要改善生活水平，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集约型增长。没有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没有发展或文明进步。这就是为什么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扭转局面的关键。

经济增长依靠什么来实现呢？首先，我们必须设法使就业人口的增长率至少与人口增长率相持平。满足了这一点（但在有些国家和地方这一点无法实现），剩下的就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问题了。

我们也可以从其他角度——资金利用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资金，尤其需要资本生产率的增长。不投资的人无法实现发展，投资失策的人也无法实现发展。然而，资本生产率的增长必须始终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来反映，这是问题的核心。既然产量增长率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依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么长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依赖什么？

* * *

有时，我们会在发展前面加上“社会经济的”这个形容词，这是为了强调其过程的复杂性。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向上的运动，它通过量的变化和质的变化体现出来，发展不仅存在于生产、分配、投资、消费等领域，还与以下几个方面相关：

——技能、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

——管理方法

——施行的经济政策

——制度的性质和质量，或限定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

——文化偏好和信奉的价值观

——与再生产过程相连的社会关系

——自然环境

就其本质而言，发展比增长要复杂得多，问题不仅在于如何衡量发展，也在于如何实现发展、如何制订理想的发展战略、如何执行推动发展的政策等方面。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或用由它衍生出来的其他标准（如国民生产净值、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增长被普遍认为是有根据、可接受的，有时甚至还会使用其他限定尺度（如工业销售产值或出口量）。但是，在估算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推动这个过程的动力上，人们还没有达成共识。

即使不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发展的主要标准（也不应该这样衡量），而是引入衡量社会资本的人力资本发展指数，我们仍然面临选择的困境。社会、政治评判至关重要，并且可以影响全局。以波兰为例，这个国家立志要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社会，它现在有一个机会，只用一代人一生的时间就能成就这个梦想。这样的事情确实可能发生，但也不一定，一切都要视情况而定。

即使发展不局限于由人力资本发展指数反映出来的产出、教育和健康水平等方面，但这三个类别的标准也能间接地反映出其他重要的方面。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展人力资本发展指数，并把它作为衡量发展活动的核心。因此，为了给波兰制订未来十几年或更久的长远策略，波兰的百姓和政府决策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以何种速度、以怎样的顺序使哪些方面有所增长，毕竟不可能一次就把事情做得面面俱到。显然，还有一个如何筹集资金的问题。

一开始，波兰的人力资本发展指数为0.862。这是根据公认的方法并基于硬性统计事实得出的结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波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3,000美元（此为2005年数据，2008年已上升至16,000美元），教育入学率为86%（这一项占人力资本发展指数教育部分的1/3），非文盲率99%（这一项占人力资本发展指数教育部分的2/3），人均预期寿命为74.6岁。在人力资本发展指数0.862中GDP占 0.272、教育占0.315、卫生占0.275。

现在，假设我们想要使标志发展水平的人力资本发展指数上升到0.902，达到塞浦路斯、葡萄牙公民今天享有的生活水准，这就意味着人力资本发展指数要增加0.040。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下面我们将分别对三个假设方案进行考察：

——方案一：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3,000美元增长到26,000美元，同时保持教育、卫生水平不变；

——方案二：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56%，上升至20,300美元（这将要求人力资本发展指数上升0.024，把青少年教育入学率从目前的86%提高到100%，即确保每个人都能从中学毕业），这将使人力资本发展指数上升0.016，同时保持目前民众的健康水平不变；

——方案三：在公众健康方面实现飞跃，把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1.6岁（这将使人力资本发展指数上升0.040），同时将收入、教育稳定在目前水平。

我们该怎样抉择呢？有人可能会说："最大限度地增加产量，因为国内生产总值高意味着创造出了更多日后可用于改善教育和健康的财富。"还有人会说："应该最大限度地增加学校、教育支出，因为这样日后会有更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来创造更多的国内生产总值，然后可以把钱用在医疗保健上。"更有人建议："健康处于绝对优先的地位，因为只有身体健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国内生产总值自然会增长，日后也就会有钱为更好的教育水准买单。"显而易见，最好的抉择莫过于既有蛋糕可吃同时还可以减肥。

现实的社会、经济进程中并不存在如此极端的选择方案，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考虑。这个例子所给出的选项是不真实的，改善教育需要更多的资金（因此必须有产量的上升），而更高水平的教育也会提高产量，医疗也是同样道理。这些都需要拨出资金来改善，改善后反过来又会产生出更多的资金。不仅各种因素的相关性不断变化，而且它们之间的连锁反应机制也非常强大。从短期来看，资金显然可以在不同的应用领域之间相互转移，预算赤字也可用于资助有利于发展的公共服务，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不是进步之道。

在现实中解决问题总是采取一种折衷方案，不存在其他可能性。可供选择的折衷方案多得足以覆盖整个棋盘。我们可以走中间路线，提出一个平衡社会发展的战略，在假定的时限内使人力资本发展指数上升0.040，该方案以如下三个因素的提升为基础：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8,300美元提高到21,300美元，指数相应提升0.013；

——教育入学率提升12个基点至98%；

——在健康方面也有类似的提升，实现提高人均预期寿命2.4岁，至77岁。

这样的一种解决方案给实际中的政治、法律、经济、财政、组织等方面都带来巨大影响。必须为之立法并出台税收预算政策，还有很多有关技术、操作层面的决策也要确定下来。总之，一方面我们必须有一套综合的、全面的、以坚实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方法；另一方面，全社会对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发展目标也要达成共识。这些事情能在国家议会中辩论吗？有多少国会议员能够恰当地理解我们所处的困境——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指的是实际的政策困境？换句话说，他们能否摆脱换届选举的困扰，理智地在方案中做出抉择？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公共问题，必然要使用公

共资金。优化配置公共资金对发展至关重要。这是议会应该讨论的事情，但是有多少议员会不考虑自己的政治利益来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呢？发展要在社会与生态、经济与财政中实现均衡，这个期限远比选举周期要长得多。

现实比上面这个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的复杂例子还要错综复杂。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衡量经济发展优劣的方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甚至可能永远都没有定论。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经济体是否"美好"，但美好的判断标准难以确定。我们能感觉出一件事物美好或不美好，但被问及原因时却说不出为什么。是否应该用数量的多少来衡量财富的多少呢（确切地讲，如何衡量财富数量）？又是否该用一个怎样的标准来衡量发展和贫穷呢？长寿很重要么？应该改用社会满意度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吗？应该如何衡量生活质量或者人的幸福？这些问题超越了经济学范畴，但是值得研究，因为一门学科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是其与其他学科发生联系的地方。

有趣的是，最初对发展的本质和目标提出质疑的人不是来自高度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客，它的贡献者是前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k）。他在位时还很年轻但十分有远见。从地图上看，不丹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400美元，这是一个美丽但极端贫穷的国家。《金融时报》批评不丹的发展速度毫不起眼、社会刻板传统、同西方世界隔离，并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GHZ）予以驳斥。

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出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向侧面迈出了一步。它强调保持一个社会中的人过得安乐满足的重要因素不仅包括产出，还包括文化传统（佛教传统在这里十分突出）和自然环境条件。经典的增长模型只注重经济扩张的量，而国民幸福指数强调的则是发展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协同作用，以及所产生的积极的、相互促进的机制。国民幸福指数概念的四大支柱是：

——公平的、可持续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从传统意义上讲）

——关注保护文化价值

——保护自然环境

——妥善治理经济事务和公共事务

对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研究显示，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世界上第一张幸福地图绘制于英国莱斯特大学，它是在一系列比较数据的基础上绘制而成的。这些数据不仅包括财富水平（收入和资产净值）、包括健康和受教育的机会，还包括178个国家的约80,000人对幸福的主观感受和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调查，最后汇集这些数据编制出一个主观幸福感综合指数。按照这个指数标准世界上的国家在100－300分的范围内被划分排序[1]。

不丹的居民主观幸福感为253分，相当于爱尔兰、加拿大、卢森堡的水平，这个分数令人惊讶地排名第八位。排位高于它的都是最繁荣富裕的国家。瑞士和丹麦并列第一，得分为273；其次是奥地利和冰岛（得分260），然后是芬兰、瑞典、巴哈马（得分257）。不丹的邻国中国和印度分别以210分和180分排在第82位和第125位。美国以247分排在第22位，而俄罗斯只得了143分排在第167位。波兰以197分排在第98位。不幸垫底的国家是刚果、津巴布韦、布隆迪民主共和国，都只得了100分。比它们稍稍靠前的是摩尔多瓦（117）和乌克兰（120）等后社会主义国家。排名最高的后社会主义国家是蒙古国（以223分名列第59位），吉尔吉斯斯坦、斯洛文尼亚和其他8个国家以220分并列第61位。

令人不解的是，不丹的人力资本发展指数得分为0.538，排在135位的低位上。两项排名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力资本发展指数把教育、卫生和国内生产总值放在一起考虑，而国民幸福指数则基于国内生产总值、文化和环境。两个指数都不计算收入分配。今后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将人类发展（人力资本发展指数）、国民幸福指数和基尼系数整合在一起的指数。

把几个指数综合在一起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在确定不同因素的权重上达成共识。我们不妨尝试一下自己列出一个公式，再将各种非求和类别计算在一起，就知道有多复杂了。这些非求和类别包括个人收入、教育、健康、寿命、业余时间（工作之外的空闲时间），以及种种主观感受（如对他人是富裕还是贫穷的认识、周围的自然和文化环境条件、对政府和民主机构的运作程度是否满意等等）。

我认为可以把公式中的各种评价因素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产量，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二部分是主观感受，这与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对目前生活阶段的满意度紧密相连，是对寿命、教育程度以及市民生活（政府和民主）质量的现实评估；第三部分是人们对自然环境现状（即自然环境对主观感受、健康、居住和工作

条件的影响）和国家状态的认识；第四部分是对业余时间和填充业余时间的文化价值的评估。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是关键，因为它是生活的物质基础，我认为它应该占到比重的2/5，其他三组则分别占到1/5。如果这四部分加起来的总指数为100，那么其中国内生产总值为40，其他三个都是20。鉴于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今天这样的水平，我认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0,000美元可得满分40分，500美元为下限（即零分）。其他三部分的子类别权重就留给政治学家、生态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律师、医生以及越来越有帮助的跨学科专家去决定了。等他们决定好了，我们就会有一个综合幸福指数和另外一张有待填色的幸福地图了。

“成功”这个词比“产量”或“发展（水平）”恰当，也比“繁荣”、“幸福”好。从广义来说，成功的范畴比幸福的要广泛，因为它也包含了计划内经济活动产生的效应，抓住了我们在发展中力求实现的目标的本质，即各方面的平衡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波兰语的政治或商业语境下，人们在表达对他人祝福的时候，从不说“祝你好运”，而是说“祝你成功”。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语义学的问题，“成功”这个词听起来更积极，而“运气”则表示了较为被动的态度。显然，“发展”表明的应该是尽量实现在金融、经济、生态、社会、制度和政治各方面的平衡发展。

说“尽量”是因为不可能完全达到完美的平衡发展，完美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期待中。成功和运气都包含文化和精神方面，与思想状态、情感、对自我的主观感受有关。这些多不属于传统经济学的范围，但这也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超出习俗传统来思考问题才能在思想领域中大有收获。

从波兰语到英语到宗卡语（不丹的官方语言），几乎每一种语言中，“幸福”、“好运”和“成功”这几个词的用法都有相互重叠之处，且语义范畴模糊。

回到不丹那个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例子中，我们必须注意，自从国王提出了幸福问题，那里的情况就改善了，基尼系数下降到0.365可能与之有关。

顺便提一句，人类发展指数和幸福指数均根植于东方文化，这一点有多重要呢？一位印度经济学家和一位巴基斯坦经济学家与阿马蒂亚·森一起研究出了人类发展指数，不丹国王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他们都受到东方文化和东方宗教的强烈影响。旺楚克国王17岁的时候曾就读于一所全英文教学的寄宿学校，1972年他加冕为国王。提出人类发展指数的经济学家都有过在著名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英国大

学、伦敦经济学院求学和毕业后留校授课的经历。他们的想法来源于一次讨论东西方价值观的会议。最有趣的思想产生于学科与学科的接触，也产生于文化与文化的碰撞。多元文化主义有着广阔的未来。

深层统计分析表明，各国的幸福水平与健康（统计相关性为0.62）、富裕（统计相关性为0.52）、教育（统计相关性为0.53）[2]联系最紧密。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广播公司在其国内的一项调查结果令传统的经济学家感到意外：不低于8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花更大力气让百姓生活得更快乐，而不是让百姓更富有。这实现与否取决于一个国家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但是总体来讲，在努力使人民幸福快乐这件事上，政府还是置身事外为好，因为如果那样做就显得政府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然而，政府应该留意幸福指数，看看自己的国家在这方面发展得如何，并得出相应结论。金钱（本身）买不到幸福。健康、智慧、个人魅力更有价值——但是众所周知得到这些是要花钱的，政府也要投入公共资金。

从一些文章和偶尔的会议中可以看出，国民幸福指数已经在国际知识界和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反响，尽管如此，国民幸福指数产生的影响仍然不大。人类发展指数和它的不足被频繁地用于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中，它的主要不足是简单地把产量、卫生、教育三方面的信息结合在了一起。然而即使这样，它也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人类发展指数没有反映收入平等或对业余时间、对社会幸福的影响，从而扭曲了社会幸福的实际关系，这可以从大西洋两岸的国家中看出来。

大西洋北岸情况相对要好，富足的地方多、贫穷的地方少；而大西洋南岸的国家和全球其他许多贫困地区一样，国家的政策重点放在了其他事情上面，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数额巨大的发展赤字上。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在人类进入新千年之际宣布了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来回应贫穷国家带来的压力、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越来越有影响的游说（理应如此）和日益增多的积极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富裕国家都赞同这项计划。有些国家，像挪威、瑞典、芬兰、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加拿大极为热衷；其他一些国家，像英语国家、日本、意大利则不那么热衷。

千年发展目标为满足社会基本需求制定了标准，并预计在2015年实现。这不仅是个发展目标，也是未来继续发展的条件。千年发展目标主要是为贫穷的南方国家而制定，它们同样也适用于那些不幸处于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

纪90年代经历了痛苦转型期的经济衰退，大部分地区人民生活条件显著恶化。

千年发展目标结构松散，由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和指标构成，这样是为了在论及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必要性的时候避免泛泛而谈，或避免说“不能再这样下去”（因为事实恰好相反）的语句。目标确定了8个应在15年内取得明显改善的领域，要实现这些目标主要靠抱负远大的发展政策的部分协调和联合国主持下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这8个主要领域是：

（1）消灭极端贫困和饥饿

（2）实现小学教育的普及

（3）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

（4）降低儿童死亡率

（5）提高妇女生育保健

（6）防治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

（7）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

（8）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该项目标的监测系统已经投入使用，并按照实际运行情况在联合国专门网页上更新（http://mdgs.un.org/unsd/mdg/Default.aspx）。每一个目标又被分解成更为具体的18项任务，为了定量监测每一个具体目标的进展情况又设定了相应指标。

例如，第一个目标“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依赖于两个具体目标的实现：

——从1990年到2015年，使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比例降低一半

——从1990年到2015年，使遭受饥饿的人口比例降低一半

其中第一个具体目标（使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减半）的进展状况又由三个指标来衡量：

——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比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贫困差距比率。用来衡量贫困程度的复杂统计度量方法，该比率表示为收入的百分之多少与贫困线相等，计算方法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的百分比 × 贫困线之间的差异 × 低于贫困线以下人群的平均收入（很不幸，没有更简便的解释方法了）[3]

——总人口总消费量中最低五分位比率人口的百分比份额（五分位比率人口即人口总数的1/5）

第二个具体目标（使遭受饥饿的人口比例减半）的进展状况由两个指标来衡量：

——5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的普遍程度

——低于最低膳食能量消耗的人口比重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时间已经过去一半，结果喜忧参半。适用性指标每年都会更新，并可以在线访问[4]。即使粗略地浏览一遍也能看出，很多具体目标将无法实现，极端情况下形势甚至会变得更糟。部分原因是因为具体目标的设立没有立足于现实，而是带有任意性（例如，遭受饥饿的人口可以恰好下降一半吗），更严重的是缺乏合适的发展战略。最后必须再次强调的是，中国取得的进步和近年来印度取得的进步对提高各项目标的平均值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虽然千年发展目标是在2000年制定的，但是对这些目标的界定可以追溯到1990年。我们只能对前半段时间内（1990－2002年）的任何项目做有意义的比较。头两个千年目标肯定是最重要的具体目标，下面就让我们考察一下以上列出的五项监测进度指标中的四项。毕竟，在2008年，当全世界平均人均收入已超过10,000美元的时候我们还在与大规模的贫穷和饥饿作斗争，世界上1/6的人口必须依靠低于世界平均人均收入水平1/30的收入过日子。

我们来看几个极端的例子吧。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数减少一半这个目标，最有成就的是东亚地区，比例从1990年的33%下降到2002年的14.1%；最糟糕的要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那里异常高的比例只从44.6%降低到44.0%，几乎察觉不出什么变化；在后社会主义的东中欧，这个比例不降反升，从0.4%上升到1.8%；在苏联解体后的原独联体国家，从0.4%陡增至2.5%。总体而言，在联合国定义的发展中地区，这个比例从27.9%下降到19.4%，因此距离减少一半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贫困差距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仅仅下降了一点，从19.5%下降到18.7%；在东亚则从8.9%大幅下降到3.1%。在上面提到的两类后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一数字分别从0.3%上升到0.5%，从0.2%上升到0.6%。

第三个指标是体重长期偏低儿童的比例，从发展中地区总人口的33%下降到

28%。其中东亚地区从19%下降到8%，南亚地区从53%下降到47%，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32%下降到30%。

第四个指标是有关热量摄入低于营养学必需水平的。1990－2002年间，这个指标整体从20%下降到17%。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情况最糟糕，营养不良仍然影响几乎一半的人口，比例从33%下降到31%。情况改善最好的地区是东亚，从16%下降到12%；在南亚从18%下降到12%。

毫无疑问，在2015年，上述这些目标和其他远大的发展目标不可能实现，人类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即便到2015年我们真的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人类也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将苦难降低到某个限度以内，而是要完全消灭它们。遗憾的是要消灭它们在长期看来也不可能，不过大幅度提高人类生活水平倒是有可能的，我们甚至可以完成比2000年制定的目标更宏伟的目标。经济的增长速度越高，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当今局势使增长和发展的条件、机制、观点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主要是因为出现了新的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我们经常听到产量增长时代即将结束的警告，因为我们越来越不可能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这是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在两个世纪前说过的话，他认为人口增长呈指数增长，食品生产只能以线性速度增长。另一个阻碍产量增长的原因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正在枯竭，这一点正是自1970年以来罗马俱乐部报告中所一直极力警告我们的。

事实证明，上面的第一个警告至少在过去的200年内是言过其实了，但是第二个警告正在逐渐变成现实。但我们也不能不加思考地完全否定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Population Law）。从世界整体来看，农业上的技术进步和“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使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失效；然而在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食品生产确实无法跟上人口增长，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似乎不幸地应验了。这导致那些地区的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并最终抑制了人口增长。

至于第二个警告——对再生产过程、生活方式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即将枯竭——可一点都不夸张。现实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障碍。我们只需要自我提醒一下就清楚了：如果北美的产量和消费量水平推广到整个世界，那么即将发生的资源短缺需要三倍于现在的地球全部资源才能填满，我们又到哪里

去找另外两个地球呢？我们找不到，这就是为什么扩大产量的方案永远行不通。即使人类人口数量保持在目前65亿的水平，世界也永远不可能达到目前美国的产量水平，未来世界也不能且也不会像北美或西欧一样。这些经济体可以作为一种典范、一种参考，供智利、波兰或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效仿，但是要整个世界都这样做则行不通。

现实中客观资源的障碍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尽管技术进步在不断地降低生产对资源、能源的依赖程度，但我们仍能不时地听到放缓增长或干脆“零增长”的呼声。这是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报告提出的建议。30多年已经过去了，世界产量又增长了1倍，其中部分增长是以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的，放缓增长速度的呼声继续淹没在加快增长速度的呼声中。如何才能解决这个矛盾？世界经济增长过快还是过慢？东欧国家要赶超西欧国家的出口水平是有道理的呢，还是仅仅是另一种幻想？非洲经过这么多年的停滞终于走出低谷是好事还是坏事？面对东南亚产量猛增我们应该欢呼还是应该担心？

退一步看，我们是否有可能让产量继续以与过去20年同等的规模和比例增长呢，或者这样的做法是否可取？答案是既不可能也不可取。这个论断本身意义深远，鉴于过去20年内的产量增长速度很少被人们视为过高，相反往往被视为不足，这个论断的意义就更为深远。事实上，产量增长速度不足不是针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言的，它是针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而言，即使是最富有的国家也会认为它是不足的。这不是需求的问题，只要消费欲望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实际能满足消费的生产潜力，这种需求就会比过去经济萧条时期更难以满足。

今天，我们必须把产量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作为世界格局中的一部分来看。不幸的是，大多数理论概念和模式都做不到这一点，它们仍以国家思维为主，更不用说实际发展战略政策了，常见的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从开放的、经济发达、体制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及其附带的价值体系出发；第二种从最不发达国家（尽管有时这些国家没有发展，也经常被称为“发展中国家”）出发，这些国家的特点是贫困、结构不健全、体制脆弱。

这种把国家简化成两种不同类型的方法表明，我们要继续寻找的答案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可以了，那就是如何在一国经济体框架内增加产量和消费，也就是如何最大程度地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从这个词的定义就能看出它适用于单个国家的国

内经济。由于这两类国家的国情不同，有时甚至相差万里，那么医治的处方自然不可能相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何迅速提高生产的问题必然得到两个不同的答案。

但是，这个问题也有疑问之处。当今世界已不像从前那样由各种各样相互竞争的、发达或欠发达国家或国家经济体组成，它是由相互依存的地区和国家组成的。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开放、都相互融合。继续把世界划分成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一方面反映出敏锐的经济判断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无理性的政治压力或有限的统计能力。完全从经济逻辑的角度看，你会发现政治与文化民族主义对人民为改变自我命运而付出辛勤努力有多么强大的削弱性。在有效增加产量方面，跨国公司早已从现实中得出了正确结论，它们是在全球范围内而不是在一国范围内追求目标的最大化。国家、社会和政府掌握好类似的技能还需要时间，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无论在最贫穷的国家还是最富裕的国家都能时常发现持这种观点的人，人们也意识到了它对思考未来的重要性，但引诱我们回到贸易保护主义、民族国家至上老路上的因素也同时存在。重商主义者选择回归国界、把经济活动限制在国内资源许可的范围内，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当今世界产量增长的速度并不取决于占有属于自己的自然资源，而是取决于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又反过来依赖其他一些政治和经济因素，特别是财政储备。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事实，它已经很明显地在地缘政治上投下了阴影。

资源因素曾经在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基础性作用，现在将再次受到重视。资源供给越受到需求的限制，资源就越重要——无论是在市场价格方面，还是在警惕控制资源的国家这一点上都是如此。历史的车轮在不停地前行，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相对变小了，但是在未来几百年内它的重要性将会越来越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水资源。有人甚至预计，未来爆发战争不是为了争夺能源，而是为了争夺水资源。这样的争夺其实已经或大或小地发生了，达尔富尔的局势已毫无希望，还有发生在苏丹和乍得边境的冲突。显然，地下水储备的发现为走出这个噩梦寻找到了一条出路。

用不着再等几个世纪后来看人类是为黄金、生存空间还是能源而互相残杀了，因为我们将会为了水资源互相残杀。未来几十年内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但是，在这段时间内，不是自然资源，而是其他的重要因素将使增长率产生差异，这其中人力资源将是最最重要的。

就世界产量和决定产量增长的因素而言（在当代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条件下），最明智的一种增长方式（即最理想的、最合理的总体社会和经济的增长方式）是：一方面具备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总体平衡的特点；另一方面具备产量增长速度高于穷国低于富国、且所有发展过程关系和谐的特点。

该增长方式的第一个方面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均衡增长：

——自然环境

——储蓄、投资和资本流动

——生产能力和利用生产能力的需要

——货物和服务的需求和供应

——收入和增长分配的社会层面因素

这样归结的目的是使增长相对平衡，因为在必要经济模式作用以外的地方永远无法实现完全的平衡。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在知识允许的范围内努力保持平衡，在政治条件下运作时更应该努力保持平衡。我抬起头，看到日历上的日期是2007年7月7日，真有趣，即便我没有恰好住在街道地址为77号的房子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可以从悉尼经东京、里约热内卢到华盛顿举办一系列的音乐会来纪念“活力地球”（Live Earth），呼唤人类实现生态平衡增长，而美国现任总统（2000年美国大选戈尔的竞争对手，戈尔获票多，却仍输了选举）则巧妙地阻止一系列旨在谋求生态平衡增长的举措。

第二个案例中情况也很复杂，理论上看似非常容易，实际上非常复杂。政治原因有时候会使根据理论或模型最容易完成的事情变得极其困难甚至完全没有可能。有意放慢富裕国家平均增长速度，并且在同一时间加快贫穷国家增长速度要考虑到这种情况。要达成这个目标只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目前的积累分配，具体来讲就是从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转移一部分储蓄和投资，仅此而已！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运用包括财政工具和预算工具在内的适当手段。现阶段的全球化环境中还没有产生这样的手段，而且我们不应该幻想私人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会使问题自行解决（尽管新古典主义的正统学说和新自由主义确实抱有这样的幻想）。

更确切地说这是调整增长指标的问题。增长指标应该调整成为使决定大多数人类生存状况的经济体形势有明显好转，而富裕国家人民生活只有小幅提高。在这一

点上值得一提的是，在最富裕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升1/100意味着每个人从绝对意义上多出400美元，而在最贫穷的国家，多出的这400美元就相当于收入增加了50%。同样道理，如果把美国本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转移到非洲，那就意味着非洲大陆的每一位居民多出300美元，换算成比例就是收入增加10%。可是目前我们还没有促成这种转移的机制。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看待世界的未来，并认为全球社会平衡发展是十分必要的，那么就有必要为这种收入增长转变而努力。这是下一个世纪我们要面临的挑战。

我们都清楚富裕国家也存在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而且愈演愈烈，那么这些国家的穷人收入增长也应该比富人收入增长更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后寻求增长要走一条这样的路，既要降低国家内部人民收入过度分化（现在情况就是如此），也要降低世界经济体系内部和全人类收入的过度分化。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那么我们可以说，单从国际视野的角度来看这正是人类应该走的路。在过去30年里，贫穷的中国产量增长率已明显快于富裕的美国；这段时间里，两个国家民众富裕阶层的收入增长越来越快于贫穷阶层收入增长。前者是积极的，而后者则要复杂得多。撇开“公平分配”的问题不谈，在收入和财富过度分化的背景下，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社会关系紧张和增长放缓的征兆。然而，重要的是，现实世界比我们假设的这个由两个国家组成的体系要复杂得多。

这种模式为整个世界经济复杂、平衡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同时还把缓和发展水平中的不平等产量增长与实际使用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资源联系起来。现在的问题是，实现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有多大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当我们要说明合理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条件和可能性时，特别是当我们考虑适度的增长率时，必须尝试同时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产量应该以怎样的速度增长？

——第二，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应该怎样分配在世界各个地区？

2007年，世界总产量增长了5%。按价值计算，这5% 接近3.3万亿美元（便于比较，约等于巴西和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那么：

——地球和人类能够继续以这个速度长期增长吗？

——从保持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能力来看，把增长产生的影响分配到世界上各个地区的最佳途径是什么？

寻找以上问题的答案不能依据常规。世界范围内产量增长已经过快，这样的速度无法持久。然而对于占人类总数的2/3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增长速度就太慢了。因此，世界总体增长速度必须放缓，而世界上2/3的国家的增长速度必须加快。计算一下就知道了，这意味着富裕国家必须放慢增长速度，这个结论会带来极为深刻的政治后果。我们必须让富裕国家接受这个观点——而且越快越好。

有必要引导世界和地区实现有差别的增长，即减缓一些地方的增长速度，加快另一些地方的增长速度。虽然经济增长动力问题和刺激手段问题已经提出几百年了，但是这个论断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中还是很有新意的。人们在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涉及增长的各种因素给予不同程度的重视，因为各种因素的重要性随着发展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各种因素有不同的诠释。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研究也许是经济学各个分支中最丰富的。简单来说，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式重点强调以下几点：

——以原材料为基础的发展

——重工业发展战略

——迅速工业化

——进口替代（“反进口”的生产）

——支持出口的产量扩大

——行业和发展平衡的分支机构（生产资料和消费，工业和农业）

——知识型经济和信息社会

今天，这些增长模式首先适用于高度发达的国家。是到了掀开经济学研究新篇章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努力寻找如何合理地减缓发达国家产量增长的答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是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在欠发达国家中时常能看到这些理论和模式的变体。几十年前，有人曾建议，如果欠发达国家拥有自然资源，就应该以原材料为发展基础。其他时期，有人建议欠发达国家应该发展重工业。近几年来，又有一种理论盛行起来，建议欠发达国家扩大生产以利于出口产品的同时，维持行业和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尤其要以农业和轻工业为基础。

有人梦想用这样的模式发展，但是这样的模式并不存在；不过有种观点认为，

更多的妇女参与到职业生活中可以加快经济增长和实现发展。这种观点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狂热的女权主义者注意到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不是美国，而是女性市场，美国的女性市场比整个日本市场还要大。头脑冷静的经济学家指出，妇女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经济、社会、政治活动与整体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整体来看，全世界25%的家庭中妇女是唯一担负家庭生计的人，还有25%的家庭里妇女是家庭生计的主要来源。

劳动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在所有国家中，女性同男性承担一样的工作领取的工资却低于男性。越是欠发达的国家中男女工资差异越大，男女工资差异越大的地方发展水平就越低。除了明显的性别歧视，通过雇佣妇女来实现不等价交换确实提高了资本积累的潜力，但它也降低了家庭购买力，同时也剥夺了一部分潜在需求。

然而，如果要使雇佣妇女不伤害到男人的利益，就需要为妇女就业创造适当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工作条件。创造就业条件需要钱，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如何增加就业和资金来源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问题上来。到头来，新增妇女就业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力与提高就业总体水平原来是同一个问题。谋求性别平等就是值得尝试的措施。实现性别平等要做大量的工作，而且发展水平越低，工作量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妇女就业没有被当作一个经济增长的手段，而是被当做谋求平等权利的主要手段。妇女就业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女性与男性在看待许多问题上有着不同的价值体系。即使没有心理学、社会学，看一看周围世界也会明白。人与人的喜好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女性对社会生活方面的事情十分敏感。她们更注意工作场所的安全状况和条件，倡导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方式，更关注在诸如购买货物、客户服务中消费者的利益，更加重视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在公司以外的公共生活中，她们关注社会平等、社区和自然环境。她们比男人更重视教育，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也是为了别人的孩子。政治舞台上那些妄谈“家庭价值观”的虚伪男人加在一块也比不上女人更关心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

即使通过粗略的比较分析，也能表明女性在经济、政治生活参与程度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中有着惊人的联系，参与程度越高，我们就越接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瑞典，45%的政府高级职务由女性担任，在美国这个数字是14%，在沙特阿拉伯是零。这有力地说明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与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距离。

说几句题外话：我出任副首相兼财政部长的时候，将十几位女性引入政府经济团队，并任命七位担任关键的副部长级职位。其中有两人后来在政府中升至内阁级别，一人成为欧盟委员会委员。当然，她们都是专业技能出众的职业女性，有博士学位或其他学历证书。不过任命她们的主要原因是，我一直认为，女性在某些非常有政治价值的事情上表现得比男人更出色。她们更加耐心、务实，很少要阴谋、哗众取宠。在社会事务上她们比男性更敏感，不容易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也许是因为她们除了参与政治还要管理自己的家庭，并且对事物有用与否判断得更准确。关于这些女性的工作对成功实施结构改革、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3的增长做出了多大贡献，我们就留给计量经济学家们去衡量吧。

那么，经济增长依赖什么呢？首先，在能预见到的、能想象的未来，经济的增长依赖什么呢？预见和想象不一样，因此必须强调发展因素的演变。200年前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同于50年前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有些因素现在看来还是根本性的，但是50年或100年后经济增长的引擎必会发生变化。我们无法真的看那么远，但是我们可以也应该为下一代即将发生的事寻找答案。将来产量增长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自然资源和财富吗？还是取决于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宏观参数的适当调整？政府的经济政策？公司的管理质量？文化因素？外部援助？地理位置？气候和当地的天气？各种情况的组合？

只要把问题列出来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问题的答案来自于不同层面——有现实领域和监管领域方面、有现实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格方面，还有国家内部和国家外部、经典经济因素和非经济文化条件、自然条件和世界地理位置等。在各个领域都有涉及也不足为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梳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探讨增长的各种“流派”和经济理论。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对经济增长将来还会有新的诠释，例如现在有人提出知识经济也是增长和发展因素的概念。

多年来，经济学家的本能愿望就是把握研究过程的本质，理解抽象得出的规则和结论，然后把它们转化成客观规律。然而，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意味着抽象得出的结论也必须变化。这就好比一间房子的地板、天花板、墙壁移动了，房子里的人就不可能还待在原地不动。经济增长理论也是遵循这一点，经济理论本身是不断发展的。过去曾经出现过很多经济增长理论，每一个理论都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作出了贡献，有些理论现在或多或少还有一定价值，它们让人更容易理解我们身边正在

发生什么事，哪些东西在将来还会继续存在。

经济学已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创造出许多增长模式和发展模式。经济学史描述的是在历史进程中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社会、经济的现象与过程，这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科。同样引人注目的学科还有经济思想史，它描述了人类解答“什么因素决定发展”这个问题的过程。寻找答案就像发展本身一样永无止境。对发展的研究是个历史的过程。曾一度被认为能够解释发展的条件和模式已渐渐过时，如今受人尊敬的经典著作总有一天只能陈列在经济思想博物馆里。

从长远角度切入的经济模式特别有趣。产量增长和发展从本质上来讲就不是短期过程。凯恩斯主义模式、新凯恩斯主义模式强调自主需求的增长，尤其是投资需求的增长很重要。还有古典或新古典主义模式的传统，从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时代开始，人们就认为生产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个变量存在函数关系。土地资源丰富的时代已经结束，土地这个变量包含的范围也在扩大，包括了非可再生自然资源和其他一些因素。与土地主要用于饲养牲畜、种植农作物、开发煤炭的时代比起来，它的非可再生自然资源更加重要。

这些最简单的模式是单变量模式，因变量表现为单一自变量的函数。这类模式能告诉我们的东西最少。产量（或一国的产品）的增长是单一具有解释性变量的函数，变量通常是劳动力或资本。而增长的过程最好用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因素的模式来解释，函数可能涉及劳动力和资本两个变量，甚至更多变量，比如技术。多变量模式更接近现实生活，但是对每个因素进一步分解也使函数更加复杂。例如，资本可以进一步分为陈旧资本、循环再利用资本或储蓄和积累创造的新生资本。劳动力可以细分为性质不同的各个类别。因此公式中自变量的数目也会相应增加。

经济增长模式可以是外部生发型，也可以是内部生发型。令人感到吃惊的是，直到近些年来[5]，人们才把技术进步极其简化地看作外部生发型因素，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有目的人类活动带来的结果。外部生发型模式特别重视劳动技术装备和科学技术知识储备的作用。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E·卢卡斯（Robert E. Lucas）进一步用简单的资本决定产量增长的模式来研究，只是他把资本划分成现实资本和人力资本，另外他还简单假设了技术的积极影响力和劳动力供应一样是个恒量[6]。

建立经济增长过程模式一方面需要做大量假设和简化才能把握因果关系及更复

杂的连锁反应机制，另一方面需要严格定义、准确思考。只有严格限定统计标准和证伪条件才能对其进行科学的验证。一般来说，经济模式，包括探讨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都以数学或计量公式的形式出现。

计量经济模式估算出的具体参数看起来似乎令人怀疑，因为计量经济模式具有概率论的性质，所谓概率就是指我们要分析的现象与过程是任意的、随机的。而数学模式则恰好与计量经济模式相反，它估算出的具体参数似乎过于倾向决定论，它假定经济增长是因果关系问题，所以现象和过程呈现出的外部形态是由以前发生的现象和过程决定的。这个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宏观经济再生产过程具有非线性性质，事物因随机而产生的巧合性以及那些被模式完全忽略掉的情况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这个决定论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

两种理论方法对经济增长的来源问题都只做了片面的回答，回答都不完整、不详尽。于是就产生了那么多不同的解释和那么多的误解。其中有些是纯知识方面的，还有一些掺杂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因此我们将继续寻找一种把许多现存理论的合理性因素最好地整合起来的理论。

几乎所有的理论方法，不论其准确程度是高是低，都会适当考虑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数百年来，技术进步已成为经济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引擎，未来情况仍会如此。长远来看，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经济体和文明就无法向前推进。因此，今天我们强调科学作为直接生产力的重要性，重视包括研究和实施在内的知识型技术的基础作用。它们是发明和创新的源泉，而发明和创新又会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数量与质量。缺乏创造力的国家用模仿的办法学会发明和创新本领。

日本曾经向我们展示了模仿给国家带来的成就，今日的中国也正在向我们展示这一点。曾经对西欧和北美起作用的方法如今在东亚也同样有效，将来某一天是否会在拉丁美洲和中东有效呢？我们不能早早地排除这种可能性。回顾过去，经济领导地位已经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由此我们就更不能认为这不可能了。巴西不是民用喷气式飞机的发明者，但是现在巴西却生产飞机，并且在高度竞争的世界市场上销售飞机，几十年前很少有人能预见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今天，人们很难想象除南非以外的任何一个非洲国家也能做出类似于巴西的成就。没有人知道从模仿到创新甚至到发明的这条路将来会带我们走向何方。不过在技术进步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为什么技术进步会发生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很久以前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后来在西欧，再后来在继承了西欧文化的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

——为什么技术进步会发生在某些时代？如头两个千年之交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波斯），中国最初的1400年里。

——为什么技术进步从来没有在地球某些地方（尤其是在非洲）发生过？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得再一次提及前文所述的一个原则，即某些过程以其特定的形式展开是因为多种不同条件同时交汇。文化原因和政治原因在这里尤为重要，虽然它们的意义在历史上各不相同。欧洲文明，尤其是西欧文明一直是流动的、带有空间膨胀性的，而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一个千年中叶因为文化和政治原因（中央集权的保守主义）被剥夺了这些特点。当时非洲根本不值一提。

以阿兹台克人、玛雅人、印加人为代表的美洲文化在许多方面灿烂辉煌，这样的文化使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完全丧失了主动性、自主性、个人独立性。结果它们就像纸牌做成的房子一样因无法承受自身的缺陷而倒塌，更不用说当它们遇到不请自来的欧洲人的时候受到怎样的冲击。多半出于贪婪和占有欲（这也属于文化特点），新来的欧洲人用侵略的手段迅速消灭了这些文明。而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由于发展障碍的制度化又陷入倦怠沉睡，原因有三：

——第一，缺少类似的自由市场或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

——第二，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容易导致停滞，尤其是对个人权利和文化的压制减少了个人行动的机会，直到今天仍阻碍着伊斯兰文化的发展；

——第三，不合理的中央集中控制造成技术停滞。

时间越接近现当代，文化因素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就越大。未来这种关系将会更加明显，发展中的“软”因素、“知道”型的文化因素将会使“占有”型的文化因素黯然失色。这一点不仅能在开发过程本身看到，而且在经济学的思想演变中也能看到。经济科学追踪这一进程，并且影响这一进程[7]。

发展来自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仅涉及产量价值数量上的增加，还会改变生产和消费产品服务的方式。经济增长引起的知识更新和创新发明是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是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经济永远处于变化之中，适当引导经济是社会和

经济发展的本质。经济变化取决于价值观、制度和政治。

价值观应该被理解为各种经济活动，无论是实物商品还是非物质服务中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人们必须经常判断，从而决定谁需要什么、谁能买得起什么；必须对目前的情况和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勾画出生产和占有商品服务的个人、团体和整个社会的优先级别。

撇开组织学意义上的制度，仅从行为学上看，制度是经济游戏规则。历史上，经济游戏规则发生过重大变化，有时候会发生戏剧性的转变，有时候则会向相反方向转变。当游戏规则的变化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经济进步时，经济就会增长和发展。同样道理，保守的游戏规则阻碍了经济规模的扩大。制度是受法律或习俗约束的程序和规则，是功能性的法律法规，采用制度是为了保护市场参与者；制度是组织、管理部门和为市场参与个体需求服务的政治结构，这就是今天我们对制度的认识。历史上人们并不总是这样看待制度的。奴隶制、封建制、火刑、驱逐与自由贸易、银行业、公共对话、文化宽容一样都是制度，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阻碍发展，后者刺激发展。

政策是指确定目标和实现目标。政策制定发展目标，设计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和具体手段。它需要表述清楚利益冲突，在确定相互冲突的利益方以后寻找一个实用的妥协方案并围绕它建立政治共识。建立政治共识可能需要使用强制手段或者在民主制度下需要公众共识和社会支持来实现这些目标。具备了这个条件，实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分配就成为关键因素。可以间接地通过市场力量或直接通过公共财政框架内的再分配做到这一点，之后就只剩下监测战略、执行战略和检查战略了。这个过程与其他过程一样，目的都是快速总结过去错误，为未来指明方向。

如果你受到的威胁是全新的，那么过去犯下的错误便没有一丝借鉴的价值。

注释：

1. 参见尼克·马克斯、萨玛·阿卜杜拉、安德鲁·西姆斯、萨姆·汤普森：《快乐星球指数》，伦敦：新经济基金会，2006年。理查德·莱亚德从经济学角度看幸福类别，著有《幸福：来自新科学的教训》，伦敦：企鹅出版社，2006年。

2. 新闻稿：《莱斯特大学绘制产生了首个世界幸福地图：幸福就是健康、富足、睿智》，www2.le.ac.uk；阿德里安·怀特：《世界幸福地图》，《心理学谈话》，2007年3月。

3. 在《监测千年发展目标指标：定义，原理，概念和来源》（纽约：联合国，2003年），研究中可以找到计算人类贫困差距程度的数学公式，第9页；mdgs.un.org。

4. 《2007年发展目标报告：统计附件》（纽约：联合国，2007年）有关资料可在mdgs.un.org上查询到。

5. 为了质疑关于资本收益递减的假设，保罗·罗默特别建立了一个经济增长的内部发生型模式。参见他在《政治经济杂志》发表的《报酬递增和长期增长》，总第94期，1986年第5期，1002－1037页。

6. 参见罗伯特·E·卢卡斯：《经济发展力学》，《货币经济学杂志》，总第22期，1988年第1期，3－42页。

7. 参见乔治·玛芙罗塔斯和安东尼·舍洛克斯主编的《推进发展：全球经济学的核心主题》（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7年），这本大部头著作（803页）论述了与当代发展经济学有关的各种主题，其中第28章有我撰写的文章《体制、政策、经济发展》，531－554页。

第八章　停滞与发展：制度、政策以及文化

经济游戏规则、消极和积极的政策及文化对于发展所起的作用

善学者能很快取得进步甚至可为他人师。

当代资本主义使得快速学习成为必要。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往往令人生畏，因为它迫使人卖命地干活，尽管如此，较其他经济体制而言，它更具有合理性。当然它还可以变得更加合理。

较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发展进程中的某些时期而言，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可能不够理性。的确，在各生产要素发展的某个阶段，例如当劳动者与技术也被当成生产要素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比之前的封建经济体制，或是分散孤立的自然经济，要显得更为理性。自然经济下生产出的产品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而没有成为商品，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当中流通。同与之相对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相比较，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时而合理，时而不合理。它的这种理性当然不能达到人类行为范畴内的纯粹的理性。不论是那些通常会叫消费者瞠目结舌的砸在广告上的巨额投入，还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对于其拥有的生产能力未能加以积极利用以及与之相应的结构性失业，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这些问题上缺乏理性的探讨。就纯理性范畴而言，资本主义从未理性过，从长远来看，它对于过度开发自然环境所引起

的种种问题更是束手无策。

从经济角度分析，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非理性尤其体现在它几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卖掉一切东西（甚至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卖不掉从而出口转内销的少数商品都被认为质量更好，并且热销国内市场），但消费者要购买所需的产品却极其困难。而在真正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有足够的钱就能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如何将东西卖出却是个棘手的问题。有些人的确买不起他们渴望的基本产品及服务，而还有一些人则受雇于一些公司的市场部，他们通常都在思考如何在永久性的社会消费性需求不足（和供应过度）的情况下对产品进行市场定位。这种市场上消费品的过度供应如果是为了服务至高无上的顾客，让其依据各自的喜好来选择商品倒也没什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供应过度意味着结构性的过度生产所带来的巨大浪费，正如企业在产品促销、广告以及市场推广上的花销已达天文数字，这时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正如前文所述，当前全球化的进程已经使资本主义变得不合理。它的不合理性尤其体现在自身缺乏一个赖以生存的全球性的自我规范机制。如果没有一个建立在世界范围内对经济政策予以调整的恰当的机制，那么危险将一直存在。而要减少资本主义的这种不合理性，则需要一个有效运作的系统来化解利益间的冲突，并达成一致的发展目标。至关重要的是要制定出符合常识的开明政策。这一切都有赖于正确的制度框架。正是这些在具体的、不断演变发展的各种价值观下形成的制度，对于政策的制定以及发展目标的达成与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扭转经济局面，需要的不仅仅是观念的改变或是持有这些观念的人的更替。更有必要对政策进行调整，而且先要对制度做调整。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同真正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两个相对概念正在被人们逐渐地忘却（仅是资本主义就有教科书上和现实生活中的两个版本），它们滋生出的症结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结构性需求过剩以及市场供给不足的问题，而资本主义的难题则是过度生产和产品滞销。我们常常开这样的玩笑：“让我们来交换各自的经济学家吧——都是他们惹的祸！”但是即便这样做也起不了作用。我们需要对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

我们将制度视为最根本的东西。它们是经济游戏的法则，是与之相关的政治互动的前提，制度尤其是指

——依照法律或是风俗的程序和规定；

——为保护市场参与者而拟定的功能性法律法规；

——服务于市场中的个体参与者的各种组织、管理机构和政府部门。

对那些不熟悉政治或社会一般制度的人而言，将制度与道路交通规则相比，则更易于抓住其实质。前文已从全球角度对道路规则的作用有所描述。现在让我们从最基本的角度出发，即从我们经常行驶的道路看交通规则的作用。当交通规则确立并明确成文，所有的道路使用者就会去学习这些规则——或者说他们也都应当去学习这些，这恰是公共意义之所在。大家都可以是道路的使用者，都有权在道路上行走或驾驶。当越来越多的人开车上路时，道路规则也就成了约定俗成的交通行为习惯。

道路的使用者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即使他们主观上并不认同这么做。法规对车速和停车的限制很难受欢迎，但从所有人的安全考虑，这种限制确实有必要，于是我们做出了调整——不仅是理所当然地考虑到我们自身的利益，也是出于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权利的认可。我们有相应的做法及措施来迫使那些不遵守法规的人遵守。最初，在获取驾照之前每个人都必须通过基本道路规则的考核。各条公路上都设有道路指示牌，有交警来指挥交通并给违反交通规则的人开罚单。而当车辆行驶在居住区的时候，驾驶员们同样会注意到道路上的减速标志，并提醒自己这里不是高速公路。

人们遵守交通规则有些是出于对这些规则的理解、认同和推崇，有些则是迫于无奈。在一个社会制度广受民众拥护的文明国度里，即使有人凌晨三点驱车驾驶在一条无人的街道上，他也会将车停下等待指示灯变绿。相反在一个尚未开化的国度，人们并没有养成遵守道路规则的习惯，路面上没有人时司机们就会闯红灯，甚至他们看到前面有行人时也不会将车停下，相反他们会按喇叭警告行人快点躲开。如果是这样，他人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孟加拉国和英国有着相同的道路交通规则，但它们的路面交通状况却大相径庭，道路的实际情况、道路使用安全及使用效率都不同，由此产生的噪音和空气污染、市内交通堵塞等负面问题也不一样。后者充斥着混乱、冲突和骚动不安，前者却显示出秩序、纪律和安全畅通。

经济生活跟交通活动有很多相通之处，只不过商业活动更加频繁复杂，很难对其加以有效的引导。有效引导意味着在眼前的情形下尽早达成目标，这个目标就是

以实现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来满足人类的发展需求。就交通活动而言，我们有道路指示牌、交通指挥灯、各种对道路使用和车速的限制以及规范路人和汽车驾驶者的法律规定。在经济生活当中，我们有法定的规则和程序、组织性的体系结构和对企业家、官员、制造商及消费者的各种文化风俗的约束力量。集商流、人流、物流、服务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流于一体的经济行为要远比交通行为更加活跃，也更加复杂多变。它一天24小时从未间断，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仍继续进行。正因为此，不论是对于生产和分配、成功和竞争，对于提高效率和生产力，还是为了谋得发展与进步，制度都显得尤为关键。

当然制度也有良性与劣性之分。劣性制度会导致发展停滞，在规避风险的同时也丧失了机遇，使得企业难以维生。相反，良性的制度能推动发展。首先，它们能够保证交易的安全性并且鼓励技术和社会的进步。一些国家在确保制度稳定的前提下，引入弹性策略以便能够持续应对不断变化的外在及文化因素，这类国家往往能取得进步。遗憾的是，这样的国家是少数。如果每种复杂的增长理论，尤其是每种实际应用中的发展理论都重视交易的安全性和技术进步，那么类似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多。

有些制度有着良性的一面同时也有其劣性的一面。这同样取决于周围环境，要看人们进行贸易活动时所倚赖的背景。背景中包含文化和历史的因素。决斗是当时制度的产物，如果时至今日它仍然存在，不知会有多少人丧命。对于那些在决斗中存活下来的人而非丧命者来说，制度并没有那么糟糕。古典经济学的例子亦是如此。中世纪时期萌生出的工会是个进步的事物，它提高了其成员的生产水平，确保生产出的产品质量，使得产出不断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保守起来，以至于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性障碍。工会渐渐开始阻碍竞争，遏制科技进步，并且不利于技术的传播。

依然从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所说的商标及专利其实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们保护崭新的设想与设计，鼓励发明家、设计师和建筑师们去创造。但是，当好的想法同设计有可能转变成商业成果时，这种转变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是消费也受到了抑制。我们也时常好奇为什么相同的东西却存在差别。比如，若是将河内郊区某个工厂缝制的带有古奇商标的包同这家工厂生产出的另一种包作比较，我们会发现带有商标的包是依照许可标准缝制的而另一个却不是。就连设计师也未

必能说出其中的差异，但这两只包的确不一样。某些时候，商标及专利的法律规定抑制了生产。没人指望巴黎世家会提前发布其为奥斯卡颁奖典礼缝制的礼服设计，当然它也不会给其他提名者缝制出相同的礼服。

不管怎样，当某些专利抑制了用以减少空气污染的过滤器的生产，或是阻挠了某种病毒疫苗的生产而它本可以救活贫穷国家里成千上万的儿童，这些专利就会显得十分可笑。如果非要强迫史前农业文明发源地米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农民去购买基因改良种子，那这种做法实在叫人惭愧。确实有报道提到前驻伊联盟临时管理局（CPA）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曾命令伊拉克农民这么做，并美其名曰“金色麦浪行动”（这无疑是军事行动的一个最华丽的代号）的一部分。农民们被迫前去购买美国公司生产出来的种子，尽管他们的国家在叙利亚的阿雷柏（Aleppo, Syria）有着充足的种子储备。根据约翰·斯布鲁克（John Seabrook）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的记载，驻伊联盟临时管理局颁布的法令第81条规定“禁止伊拉克农民使用自己的农作物种子，强迫他们每年从美国的公司购买许可证并使用新品种种子”[1]。这便是所谓的“知识产权造福于人类”的一个例子。

在这里有必要对世人予以警醒。经济学理论以及在其指导下产生的经济政策往往沦为时尚的牺牲品。时尚影响时装裙的长短无可厚非，但学术理论和经济决策与时装裙完全是两码事。如果缺乏对时尚在经济中所起作用的理性认识，势必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它曾不止一次地把经济界名流弄得晕头转向，更别提那些跟风逐潮的平凡之辈了。赶时髦的做法不一定能证实经济理论的正确性。

目前来看，唯有把目光转向过去常常被忽略的制度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其他一些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总在肆无忌惮地滥用这个新制度经济学的武器，他们有些人拿它去研究后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生的经济体，却没能弄明白这些概念的本质及其精髓。“制度”这一概念于是变成了把万能钥匙，人们期望它能打开任何一把难以打开的锁，不少经济学家（更别提社会学家和政治学者了）甚至把它当做一层毯子用以掩盖那些在其他地方难以容纳的杂七杂八的事物。同所有其他概念一样，“制度”的概念不能被滥用，不能用它来解释任何与之毫不相干的问题。

简言之，我们可以把制度分为以下几种不同的类别：

——解释性的制度

——监测性的制度

——赔偿性的制度
——激励性的制度
——调节性的制度

在一个有效运行的社会经济体系当中，解释性的制度向市场参与者阐述其签订的契约中的条条框框以及执行这些条条框框的原则（例如各种贸易法和《欧盟宪法条约》）。

监测性的制度对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进行持续不断的跟踪监测，并在他们的行为有悖于或是偏离实施的规则时将情况反馈给交易的各方以及公众（例如金融监管机构和法院）。

赔偿性的制度主要是确保各类资源价值流的无误，纠正不合理的资金流和商品流，因而形成一种内在的平衡机制，避免市场失衡（这样的制度包括反垄断法、该法律的执行机构以及调整货币汇率的机制）。

激励性的制度是为了实现资本的有效积累和最优配置，它拓展经济活动并且有利于提升商品及服务的附加值（例如针对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监管的法律规定）。

调节性的制度用来规范市场各方主体的行为，使其行为符合长远的利益（包括各种仲裁机构以及WTO这种鼓励和促进其成员间贸易便利化的国际组织）。

前文曾提及，我们不仅需要维护金融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流动性平衡、需要维护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平衡以及生态系统的平衡，也需要维护制度的均衡。为什么呢？因为制度上的平衡就意味着系统运作下经济游戏的参与者将受到保护，无需去面对过度供给或是超额需求，不用为失去均衡的市场买单。制度的均衡确保市场集中且规范有序，确保它能够自行有效地运转，而不是摇摇欲坠、陷入坍塌不复之困境。制度和谐追求动态的平衡，它使系统集中完整。系统一旦失去平衡，就需要建立制度的安全机制加以纠正。如果鼓励自由竞争的制度取得了进步，那么保护消费者的制度也应相应建立起来。促进资本自由流动的制度一旦建立，促进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制度也应随之建立。

从长远来看，唯有遵循市场中正确的制度才能取得经济上的进步。这就需要对制度进行调整，在调整之前则需对制度进行深入地剖析。我们不仅建立了这些制度，并且要使其更加规范。这就如同我们对待自己的生活，我们总是从错误中汲取

教训调整言行，也如同在大学里聆听教授的讲课，他们也总是在分析别人错误结论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见解。制度本身不会犯错，它只是给我们一个思考如何操作并做判断的框架。执行者们倒是会犯错，资产和企业的专业化管理人才的需求也因此总在不断扩大。政治家们也会犯错，而且不在少数。

政治是当前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化解这些利益冲突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若是化解不当则会为日后的发展留下隐患。怎样才能避免让这些潜在的矛盾逐渐凸显为激烈的社会冲突呢？政治学正是对这一问题所做的持之以恒的探索。潜在的矛盾总是普遍存在的，如何将矛盾转化为发展的助推剂才是能真正体现政治艺术的高超之处。

政治学还是一门实现“可能”和“必需”的艺术，但让人头疼的是“必需”的事物不具备实现的“可能”——这并不是在玩文字游戏。现实情况往往是侧重于政治上的考虑，经济角度看来可取的做法却难以实施。这时，我们只能尽最大努力等待时机的到来，而不能逞一时之气。现实生活中我们唯有想尽办法让“必需”变得可行，或是设法尽快创造出“必需”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于是我们会想到进行一些根本的改变措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称之为变革，并会用“激进”、“彻底”、“深刻”一类的词来形容它（即便我们没有改变经济的运作模式，他们也有理由这么说）。这些措施难以改变经济的整体运作，更多地只会对经济的某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运作方式产生影响。

政治举措的成功实施需要开创性，需要智慧以及运气。有人感慨政治学其实是一门艺术而不是技艺。光有技术还不够——还得有一定的天赋。

很多重大深刻的经济变革方案在当时的政治时局中并非是呼之欲出的，它们总是显得遥遥无期。当实现经济变革所依赖的政治条件形成时，经济系统早已不能有效地运行，经济的增速已明显放缓或趋于停滞。有一句古老的波兰谚语说道，波兰人总是习惯在马跑了之后才关厩门。

来自民间的谚语折射出一个民族在日积月累的实践中总结的生活方式、对人生的看法和生活的哲理。譬如在欧洲东部的斯拉夫民族有这样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上帝自会奖赏起得早的人。言下之意就是那些早起的人总会有所获。对于欧洲大陆西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他们相信“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因此必须要劳动。如果你去问一个生意兴隆的波兰商人他的生意如何，他会告诉你他正一筹莫

展；同样的问题你若是去问一个企业刚刚宣告破产的西方老总，得到的回答则是没有什么大不了。在这两种文化背景下商人身上的那种经济学家称之为商业自信的东西所折射的差异由来已久，对此我们也不难理解。

我们说过，一些当时迫切需要的经济变革方案总是迟迟未能出台，甚至于在一些制度极为完善且政治趋于成熟的西方国家，当他们着手进行彻底改革时，也已经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他们未能尽早地采取这些符合经济逻辑的措施来避免危机。政治逻辑似乎显得更为重要，但它却往往没有逻辑性可言。英国在1979年身处危机之时才引入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荷兰同爱尔兰分别在1982年和1987年间开始实施变革，而丹麦、芬兰以及瑞典的变革则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德国法国从未进行激烈的变革，意大利更不必说。这些国家总是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时至今日它们的经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糟糕的市场制度也导致了部分国家经济的恶化，更令人忧心的是，有些国家不止制度糟糕，它们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都存在问题，或者它们本身就缺少一个能促进经济整体发展的战略。很多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如此，特别是在非洲和中东地区。但即使是这些地区，也有像乌干达、塞内加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等一些国家正在努力推动变革，以实现经济形式的多样化从而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不过这些积极的例子并不多见。这个地区还有不少国家正面临一场更为严重的危机的到来，它们需要近一步的刺激，因为时下的种种难题还不足以引发巨大的结构调整。而在历经了长久等待之后，那些国家便会发觉它们已经没有什么好指望的了，因为在等待的同时它们早就偏离了原先的发展轨迹。

面对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我们需要深刻反思。应当有人站出来一针见血地指出：首先，如果我们确实需要这些“结构性的变革”，并且这种变革会如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期望的那样将改善形势，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它呢？为何变革对这些人有益却招来他们的抵触情绪？他们反对的立场异常坚定，甚至于成为了变革难以跨越的阻碍力量。

对此最简单直接的回答，也是那些自称为变革者的经济学家们的惯常作答，就是人们根本没弄明白变革的意义所在。事实也许是这样，但事实上这些变革举措也的确不能给抗议者带来任何好处。尽管就整体而言或是平均来看，变革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问题也恰恰就在于这种影响是整体上的或是平均的。关闭一些亏损企业所

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久便显现出来，经营者挽回了更多不必要的损失，政府也无需再补贴亏损。苏格兰同波兰政府一直以来分别在对它们国家的造船厂和煤矿厂进行亏损补贴。当然关掉这些企业会使那里的工人的处境立即变得糟糕起来，这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来说有时也会是个永久性的打击。具备变革前瞻性的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家认为变革会促使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因此对它满怀憧憬。而企业关闭的受害者和局部地区小范围利益的维护者很明显并不这么想。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做法才最为明智？毫无疑问，仍是变革。我们要用个体、局部利益的牺牲来换取全局的胜利，但也不能不顾及这些人的现实利益。

然而在某些时候，特别是在这些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盛行时，变革者所鼓吹的“进步主义改革”毫无意义，它只不过是掩饰把一部分人增加的收入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或是对现有的收入进行再分配）的伎俩。这种再分配的机制极为复杂，那些遭受损失的群体有时未能发觉分配过程中存在着的不合理因素。公众对先前“开明改革”的幻灭使得他们对政府的任何举措都失去了信心，也因此助长了国内保守主义倾向：请停止一切变革的措施，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将起到怎样的作用。这种影响是最糟糕的。

公众对政策丧失了信心是要付出不菲代价的，由此造成的损失往往更加惨重。对于那些眼下正进行着的未能促成整体面貌改观的变革他们始终带有抵触情绪，也因此反对长远看能使他们受益的种种变革举措。这种情况在微观经济基础的国家和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并且最近有在多个国家出现蔓延的迹象，这与全球化不无关系。

追根究底其根源在于永无休止的政治纷争。在野党总是反对执政党提出来的开明的经济变革举措，它当然试图推出自己的一系列变革措施。政治上来看，这自然无可厚非：对执政党的政策给予支持能够使得局面得到改善，也很有可能因此让当权者得以连任。这样看来“更为糟糕的事情在某些人眼里反而更有利”。如此一来，政治活动更多是关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所作所为，以及这部分人为此需要拉拢何人并且付出何种代价，而不是围绕它本该实现的目标：即出台公共举措，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开明的、建设性的经济政策是社会中纷杂难解的经济和金融问题的有效解决手段。不幸的是，在政治纠纷无休无止的现实生活里，这样的解决手段被限制到最

少。政治选举的周期循环以及媒体每日的歪曲报道共同维系着公共生活，造就了目前的现实。

事实上，情况或许更为复杂，因为我们珍视民主。民主制度有着它自身的优越性。不过仍有些人对它不怀好感，他们身处的社会还没有发展成熟到可以在各种民主制度基础之上对其国家进行治理。有时这也只是官方的表态。很明显，公众希望国家得到有效的治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

但有时情况也确实如此。譬如当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试图解释并让我相信在他美丽而贫穷的国家进行自由选举的后果只能是种族冲突时，我很难不同意他的观点。在非洲国家，我们总是不断看到这种既定的事实，尽管它会产生许许多多的不良影响。在乌干达，在穆塞韦尼（这位通过发动军事政变掌权的总统）带领下实施的发展战略看上去初见成效，但这仅仅是建立在民族与社会的统一基础之上的。自由选举可能引发的种族冲突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动摇政治的稳定，摧毁发展的宏图。

而以这样的借口来抛弃民主通常也很难叫人信服。我们都明白，关键问题在于，一个国家推行民主必须结合自身的历史与文化实际。任何国家的民主进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只有当一位公民达到法定年龄时，他才能够享有选举权。一个社会或民族想要在某方面达到成熟同样也需要漫长的过程——可谁又有权力决定这个时刻将在何时到来？是其他那些在这方面趋于成熟的社会或民族吗？

这种逻辑也欠妥当。但一味地追求政治上的正确或是因循守旧则更加糟糕。选择靠拢政治得势者总好过被指控为这样或那样的原教旨主义者。在事实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有的国家被治理得很好，有的却是一塌糊涂。在选择民主体制还是威权体制的问题上，有的国家从未有过争论，有的则对此争辩不休。选择仓促民主还是开明威权的争论尤为激烈，在20世纪末一些快速发展的东南亚国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最糟的情况莫过于当威权行不通时，推行民主也无济于事，非洲诸多国家都曾遇到这种情况。这种糟糕的境遇，既有几分属于后殖民时期的遗产，又有几分与其深层次的文化状况相关。这个问题有待我们近一步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殖民主义决不可能孕育出民主国家来，它们在根本上是对立的。

今天，有一座钟塔仍然矗立在德属东非坦桑尼亚的阿鲁沙中央广场上，这座

钟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殖民者所建造，它向当地居民们灌输时间和按时守纪的观念。正因为钟塔这种建筑的存在，这些国家的人民渐渐养成了时间和准时的观念。但民主的精神却不会因此培育出来。

这里需顺带提及的是，哲学家同政治科学家可以发挥其才智去研究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为什么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那么十来年）成为民主选举坚定的维护者——至少要搞清楚民主选举为何会产生那么大的差异以至于冷战后这些国家一片热忱地要在海地、巴拉圭、利比里亚这种未开化的国家强制推行民主制度，它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所作所为更是不用说。叫人纳闷的是，它们现在甚至通过各种手段干预别的国家实施民主，而之前对此却没有多大兴趣。这只能说道德伪善是普遍存在着的。

“正确的制度是适用于自己国家而非大多数国家的制度”这条原则无需多做说明，只需默默地遵循。那些国家都这么在做，这种做法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俄国著名哲学家作家、“亲西方政策”的支持者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1812－1870）曾经说过：那些不了解人民的人只知道如何去征服和残害他们，却不能给他们以自由。

实力雄厚的大国和一些国家惊喜地发现，不用派出炮舰和海军战队，只需要提供财政物资援助，它们便能够拟定“民主程序下的正确的规章制度”。这些“正确的规章制度”是符合强国政治经济利益的战略考虑。因此，输出“软实力”，即外交大臣、经济顾问、记者以及来自许多非政府组织的专家们是个好方法，他们这些人能够从政府部门或大的财团获得资助，政府或是财团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操控。只有在“软实力”输出不起作用的时候才需要“硬实力”——军队登场。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那些国家把自己的利益看得至高无上而无视一切。尽管人们一再提倡“政治的现代化”和“社会的多元化”，但至少有77%的约旦居民承认自己出于害怕受到惩罚不敢去批评政府，仅有16%的人表示值得做出尝试[2]。民主意味着许多东西，而军事同经济战略利益则代表着更多。能源利益更是重中之重，它代表着一切。

更重要的是，有些国家之所以选择民主制，是因为事实上它是平息反抗的有效途径。即使人们不愿意也只能接受，因为在民主国家情况就是如此。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抱怨自己收入低的护士可以去进行示威抗议。人们对于政府导弹防御计划的实

施或是海军基地的建造感到不满，并表示反对，但他们反对的决定是由民主的政府提出来的，他们对此又能怎样表态呢？

民主让一些人缴械投降，却成为另一些人手中崭新的武器。民主给人们装上了翅膀，在平复人们的情绪方面，它却比任何警察都更加有效。民主能够激起人们的热情，但也能毫不留情的将其扼杀。你可能赢得了斗争，却输了选举，这个道理并不是只有丘吉尔明白。对民主制度提出异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你试图在投票的时候否决它。这种方式是非常有效的，可偶尔的失手也在所难免，如像来自阿根廷、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白俄罗斯或者伊朗的有选举资格的选民所做出的不明智决定那样。

在波兰总统选举的第二轮以及决定性的最后一轮展开之前，我问新上任的美国大使，这次选举的结果对他的国家会产生什么样的重要影响。他回答道：几乎没有。因为这两位候选人都会照顾到美国的利益，至于其他的，就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了。这位大使的三位前辈也从未想过要掩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已经完完全全成为了美国投资人以及美国军事工业集团的代言人，而不是美国人民的代表。事情就是这样。事实上，这更加关系到个人的自身利益，而不是其他人的。于是你不得不小心自己所说的话，因为正如我们所知，言多必失。这句话并不仅仅适用于外交领域。

这种通过外力强加的民主，不论是借助软实力还是硬实力，真的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吗？从短期来看，答案似乎值得推敲。不管怎么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资金的增加极大地增强了交易的安全性，促进了贸易的繁荣。所有这一切只可能发生在单纯的时间框架中，并辅以相关机构的支持以及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在很多情况下，那些新进的、年轻的民主人士没有用一种合理的、理性的方式开展他们关于经济的辩论，最后不但没有简化决策程序使之更加有效，反而使其变得更加复杂和冗长。

我们固然可以满足于通过简单的推导得出的结论——从长远来看，没有任何东西能像民主一样有助于发展。但是“长远”是由很多个“短期”组成的，就像跑马拉松一样。我对这一切了如指掌。近一步来说，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许多国家的民主都只是流于表面，徒有形式而已。它们也会举行选举，可选民没有选择的余地。社会舆论无法在民众中发挥其导向性作用，它只是一个统治阶层精心策划的、代表少数集团利益的工具。尽管这些利益集团都是国内的利益集团，但是他们的利

益往往和那些“外人”的利益刚好一致，而这些“外人”通常也都是些厉害角色。

那些我们现在所谓的发达国家也都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包括对经济是什么、规范经济发展的原则是什么的认识。我这么说并不是吹毛求疵。在这些国家，针对像妇女的权力这样基本的民主问题进行投票表决也是近期才出现的事情。大多数国家直至进入20世纪才承认这一点，因举行过多次全民公决而号称直接民主制（direct democracy）基地的瑞士，也不过到1971年才做到这一点。这些代表着所谓的西方文化的国家，在它们当年处于像今天非洲国家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时候，根本没有选举权，一个都没有。如果在几百年前，当欧洲国家还处在一个低输出水平（low level of output）、高文盲率（同时不重视经济发展）的时期——像我们当下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一样，就引进全面的民主制度，那将会发生什么呢？这个问题同样十分有趣。这可能意味着自由的、普遍的选举活动在中世纪的欧洲就会出现。可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它到底会带来什么，因为历史已经发生，永远不可能改写。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开明的专制主义（enlightened absolutism）的引导下，国家发展会以一个合理的速度前进。有愚昧无知存在的地方，选举就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现在，质疑公民民主制度（the institutions of civic democracy），尤其是质疑普遍选举权（universal elections）这项一旦缺乏就毫无民主可言但其本身又无法构成民主的制度，将被视为一种完全缺乏政治正确性的行为。但是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由于与经济发展、运行相关的问题的技术复杂性（technical complexity），社会往往做出错误的选择。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这些社会并不能理解争议的实质或哪些情况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做出不好的选择，导致一些错误的人上了台，这些人所实施的政策不仅不会服务于选民，而且有害于社会。我们对此又能做什么呢？

你可以等，等到人民认识到这一点，最后选出正确的代表（不过这只会在他们的部分发展潜力被浪费之后才出现）。不幸的是，这可能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以至于一些国家在破浪前行，而另一些国家则错过了这班船。大众的智慧从不应该被忽视，政客们看起来还不如人民大众对“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认识的深刻。那些号称懂得“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含义的波兰人也知道，有些东西是要失去了才会知道珍惜。

如果不是从短期，而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经济政策，有些事情似乎会变得更

加糟糕。愚昧的政策可能会被看作是明智之举，在形形色色的伪学者、无知者、各种思想流派、政党、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包括有势力的宗教组织和教会等的大力推行下，这些政策会在很多年里大行其道。俄罗斯伟大的诗人、作家和新闻记者艾亚·艾伦堡（Ilya Ehrenburg，1891－1967）曾经说过，愚蠢的行为在任何体制下都可能出现。他谈到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无法根除那些在其所取代的制度下出现的愚蠢行为，就很好地验证了这种行为的普遍性。不论是紧随其后的反共产主义制度的改革，还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也都无法根除这些愚蠢行为。这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不是仅由社会政治体制所决定。一个合理的、完全没有任何弊端的体制是天方夜谭，它在以后也不会出现。所以我们还不如寄希望于对普遍快乐的美好境界的追求，这也许会更有价值。

既然事情往往以这种方式发生，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它事后是否会产生一些实际的作用呢？非洲热带地区的殖民者，抑或阿拉伯国家的后殖民主义政权（post-colonial regimes）、中亚国家苏维埃政权统治下（Soviet Central Asia）的决策者、东南亚地区的国际货币基金会（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 South-East Asia）、欧洲中部的新自由主义基础分析派（the neoliberal fundamentalists）是多么的愚不可及。这个事实对将来的发展会带来影响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那些政策的影响是长远的。尽管让时间倒转就如同让潮水倒流一样，是不可能的。但是采用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对已经发生的事情重新进行社会性的解读，影响大众对现在以及将来问题的思考方式，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在那些不是为了自己和他们的朋友，而是为了整个社会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有能力这么做的人登上权位之前，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段等待的时间。其中一个可以善加利用的就是经济教育（economic education）。为什么说语言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是思想的媒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为心灵和思想而战。最棒的事情莫过于大部分的人都能领悟到发展的实质。不过希望每个人都成为经济学家的想法未免过于幼稚。社会上碌碌无为而终其一生的人不计其数，远比这个世界能承受的要多得多。但是尽可能地追求经济语言（economic language）存在的最佳状态还是现实且务实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认识的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写了一本关于俄罗斯市场经济诞生的书。他说市场经济确实在俄罗斯出现了，可人们却懵然不知[3]。我对此提出异议，依据是如果人们对此一无所知，那么它就不能被看作是真的市场经济，而只

不过是一个缺少知识阶层和文化阶层的短命实体，而这两个阶层恰恰是使市场有效运作以及迅速发展所必须的。而且，让人们对这样一个体制拍手称好也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支持一个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体制呢？

因此让尽可能多的人最大限度地了解经济事务是一件很值得去做的事。好的政策需要的不仅仅是好的理论，还需要具备一定教育背景的民众。如果这一点缺失了，那么以下三样事物是必须明确的：

——科学性的真理

——真正的民主

——有效的政策

那些经济骗子、蛊惑民心的政客以及为数众多的政治黑客依然有出路：当经济政策的基础不再是知识，而是

——意识形态的呼吁

——愚蠢的行为

——目光短浅

——贪得无厌

——其他社会的、而不是自己社会的利益

要想克服这些问题并非易事，因为就是存在这样一些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来迷惑民众、左右他们的想法，以达到影响意识形态的目的，然后欺骗他们在选举中做出错误的选择。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那就是坚持正确的事情——这是需要人们一直去做的事情，尤其是为了其他人。对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了。

学术和经济学无一例外地都是持续的、有原则的追求真理的过程。政策则是一项在原则性和灵活性之间协调的充满挑战的艺术。有效的政策意味着给予人民他们所需要的；无效的政策则是给予人民他们想要的；不切实际的政策是把人民想要的和需要的一起统统给予他们。奇迹确实会发生，尽管这种事情少之又少。奇迹一旦发生，停滞不前的状况就会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的发展。

如果查阅经济发展和停滞的历史，就会发现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文化是起

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4]领悟到了这一点，整个20世纪的发展表明他的观点是对的。从22世纪开始，以后的好几个世纪都将证明这个观点是毋庸置疑的。

经济学家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因为文化不仅仅是一个无法精确定义的软概念（soft concept），而且是一个可能将一切都包含在内的宽泛概念。更糟糕的是，它意味着过度的决定主义。可以确定的是，文化是长期的、是永远都没有定论的。如果文化改变了经济的发展，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吗？我们可做的并不多。从以前的时代继承下来的紧身衣依然禁锢着我们，我们在宗教、种族、民族以及情感信仰的影响下思考和行动。再者，这些问题都很棘手，讨论起来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特别是那些已经被蒙蔽的人还总是全副武装、小心翼翼地盯着。

经济学是一门变化的科学。即使最激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热衷于操纵变化。这种操纵，就短期而言，是一些短期的经济参数，如利息、税收和汇率变化等；就长期而言，是通过制度的改革使发展向期望的方向进行，同时阻止不期望的过程发生。文化很难像历史构筑物一样被操控，因为它的进化非常缓慢，只能以世代来衡量，并且它不会随着背景的改变而改变。

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多于我们对它的利用。一些人类学家认为，某些文化特点总体上来说是无法改变的；另一些人则指出了一些我们从母亲的乳汁中汲取的（当然是非文字性的），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文化特点。这里体现了更多的延续性，而不是变化。如果这些特点是正面的、积极的，那很好；但如果它们是负面的、消极的，那就不妙了。

既然文化的条件性驱动着我们，那我们又该如何影响经济的发展呢？也许发展只是在简单地沿着文化铺好的道路前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也或许正是深深根植于历史和传统的文化为经济发展指明了道路，并将发展框架强加于国家之上，使其很难摆脱。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如果拿性格在个体成长中的作用作比，就很容易理解文化在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了。凯恩的性格与阿贝尔的截然不同，杰基尔博士又与海德先生大相径庭。日耳曼民族的社会市场经济（a Nordic social market economy）与新自由主义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经济（a neoliberal Anglo-Saxon capitalist one）表现出不同的性格（或者文化）。这同样适用于相应的社会以及其中坚分子。

我们对国家和社会的探讨与对人民的探讨一样多。人与人是不同的。一些人喜欢花大把的时间坐在电视前，或者无意识地把报纸翻来翻去，还有一些人喜欢花时间缝纫或者做园艺；一些人习惯晚睡，也有人工作到很晚；一些人喜欢在工作台周围闲荡，一些人喜欢坐下来扯八卦。上面所有这些行为都体现出文化的条件性（cultural conditioning）及其经济后果。这不一定反应在国家的收入数据中，但是会影响到消费的真正水平以及生活满意度。实用主义和创造性是问题的关键。你有钱的时候，可以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如果你有的全部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那么你不会变得有钱。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不同的民族。他们同样可以选择，比如参加夜校或者喝伏特加。我们把这些特点归因于社会，就像归因于人一样。我们说，一些人努力勤奋而且谨小慎微，而另一些人懒惰闲散、粗鲁轻率。我们认为一些人很精明理智，另一些人则邋邋遢遢。我们欣赏一些人的井然有序，对另一些人总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却束手无策，无论这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事。一些人热情好客，而另一些人能够好多年都不邀请任何人来家里做客。一些国家和民族组织以好战出名，另一些则一直崇尚和平与安宁。我们把苏格兰人跟勤俭节约联系在一起，而认为格鲁吉亚人挥霍无度。我们眼中的德国人有很强的纪律性并且缺乏幽默感，波兰人则完全不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能取得傲人的成绩，另一些则永远都能够讲出最好笑的笑话。很明显，这里存在着很多人们固有的想法，特别是在邻国之间。两个相邻的国家总是喜欢拿一些自己也存在的缺点或不足去指责对方，这种事情屡见不鲜。

从人类历史发端时起，人们就置身于跨文化的关系中。离开我们自家的后院就是一种跨文化行为，因为我们很可能会遇到其他人。跨文化既包含微观层面也包含宏观层面。微观层面以我们自己的地界线（property line）为起点，宏观层面则是建立在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层面上。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性格，不管是人的、社会组织的、或是国家的，这就像跨文化关系一样。

性格总是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积极的和消极的特性，有一些属于先天遗传，有一些则是后天习得。我们知道苹果掉落的地方总是离树不远，也明白三岁看老的道理。我们大约有一半的特性都是与生俱来的，并且世代相传（如同那个掉落的苹果）。另外一半是在人生过程中形成的，特别是在人生的早期（即三岁看老）。

我们在家庭中成长，游走于街区、学校、大学、专业领域、政治圈以及社交

圈。我们养成了促进变革和个性成熟的习惯，可不幸的是，这些习惯也毁掉了这些性格元素。本世纪后半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现在就坐在学校和幼儿园里，这里还坐着那些不知道自己今后将会成为经济学家的孩子。他们中还有一些以后可能会变成犯罪分子，甚至是那些现在看来的模范生和循规蹈矩的孩子。最好的教育或许会让一个将来可能成为罪犯的孩子变成诺贝尔奖获得者，它可以让人们知识更加渊博、更加诚实可靠，而不是愚不可及、一无是处。教育和社会的互动——大多是通过媒体和因特网进行的，真的能够影响性格。这也是家庭、老师、宗教、媒体和各种各样的组织正在努力尝试做的事情，结果也不尽相同。

经济学的情况与此类似，同样也有各种不同的“性格”，以及“先天遗传的”和“后天获得的”特点，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两者的比例。与先天遗传的特性相比，后天获得的包含了更多的不同，尽管这种不同存在着社会差异性。社会的确与人一样：一些人接受事物很快，另一些人则需要多花点时间。一些人不断探索，另一些人倾向于按自己的方式成长。更有一些社会的前进轨迹如此反常，以至于在整个时代甚至整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旁人都无法做出任何指导。

我们可以列出很多这样相对应的国家。比如智利和中国，比较两个国家25年前的状况，差别显而易见。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两者的相似点以及共同的特征，因为它们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学会了如何理性地发展。阿根廷和匈牙利的情况也是一样，两国到拥有诸多相似之处只花了一代人的时间。这个时间是长了还是短了？1/4个世纪以前，它们拥有截然不同的体制和经济文化；今天我们可以在它们身上找到不少社会结构和制度上的共同点。这两个国家有着相似的街道和田地，阿兰·帕克（Alan Parker）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潘帕斯大草原和布达佩斯的普施塔平原拍摄电影《贝隆夫人》（*Evita*）[5]时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这两个国家内部也有相似点，包括那些用来解释经济运行和发展道路的理论。

与生俱来的特征，如文化传统力量的发挥、制度惰性机制、以及坏习惯或依赖性，都具有一贯性。有时，它们存在得太久了以致产生不利影响；但有时，它们会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业精神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对于一个“新的贝隆夫人”的渴望远比匈牙利对一个新国王的渴望要强烈得多。正是这种强烈的渴望让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在2007年总统大选的第一轮就轻松获胜。社会跟人一样，有自己的感伤和怨恨。驱赶这些情

绪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纵使它们显然不利于发展。这有点像暴饮暴食：你应该停下不能再吃了，但是很多人做不到，或者根本就不想停下来。

在建构新的机制、实施积极的发展策略和政策的过程中，你会通过学习获得新的特征。这里存在着巨大的潜力。正如我们可以不但在人们身上培养出适应社会的特征，同时还能塑造他们的个性一样，你也可以培养经济的一些正面特性，并使其有利于发展。如果先天遗传的特征阻碍了我们的发展，那么你将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育上，而不是抱怨时运不济或者埋怨父母。如果经济扩张时期留下的文化遗产帮不上什么忙，那么你就要用更多的精力促进经济迅速发展，而不是抓着历史的负担或者经济顾问团以往的管理方式不放。

如果你走运的话，这用不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如果你不走运，就需要这么久。改善经济"性格"的机会稍纵即逝，原本可以用在经济发展上的时间也很容易被浪费掉。看看那一对对的邻国：智利和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波兰和乌克兰、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卡塔尔和巴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萨摩亚群岛和斐济，这些国家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相似，但是在过去1/4个世纪中，每一组前面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后面一个，这其中必定是有原因的。

文化如同性格，是与灵感和动机紧密相连的。俄罗斯有一句谚语说：同样一块木头，你可以做成图章，也可以做成棍子。同样的材料，你会有不同的灵感和动机。这就是决定你工作最终成果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前提。当然每个人都同样有资格去刻一个图章或者削一个棍子，可情况并非如此。人们具备各种各样的才能，社会也有这个钱去生产图章或者棍子，或者以不同的比例两个都生产。那么结果可能就是，那些有资格去生产棍子的人爬上权位（不一定是用了他们的大棍，自由选举这个方法也很不错），并且镇压了那些会生产图章的人。于是市场上就有大量的棍子，而图章的数量则少之又少。经济学家称之为市场失衡，它会迅速引起社会和政治失衡。这三方面的不平衡对经济的增长十分不利。

动机的作用至关重要。除非你想做，否则你什么事也做不成，比如发明、设计、组织、管理、生产、分配、运输、储存、销售或者消费等等。出于自愿的行为比迫于外部压力而做出的行为更加积极。有一个所谓的经济义务（economic compulsion），但是它存在局限性。值得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不是新自由主义分

支）的自由经济原则在构建经济游戏的规则方面，比其他任何理论都更为有效，因为它符合人的天性和心理激励机制。它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机制。自由市场下的资本主义充分利用人的天性，包括一些劣根性，像自我为中心、占有欲、敌对情绪、贪得无厌和目光短浅等等，当然也包括这样一些必要的特征：首创精神、诚实待人、足智多谋、高瞻远瞩、小心谨慎和团结一致等。

从公司、整体发展策略以及国家层面来说，微观经济管理中取得的最为显著的成就，或者说最为成功之处，并不是来自古典经济思想。哈里·福特（Henry Ford）开创了大规模汽车生产的先河，给工业生产带来了改革；马来西亚领导人穆罕默德·马哈迪（Mohamad Mahathir）的所为也不是迫于竞争压力。他们的动机都来自于他们自己的个性以及所处的社会文化。当然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动机作用其中的话，这一切都是远远不够的。

没有了动机，就没有了创业精神，也就没有了理智的行为。除了经济领域以外，这个道理在其他地方也同样适用。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动机可以体现在一个主观的价值观上或者在对美和真理的追求中。但是在经济生活中，动机应该和理性以及人类行为学的原则联系在一起。仅有文化远远不够。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优化的制度和政策对于摆脱经济萧条、促进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或至少是防止经济发展缓慢都十分必要。最近我们在东南亚以及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中看到了这一点。同时它还在苏联解体后的中亚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得到了小范围的体现。表现得最不明显的地方就是中东地区、非洲和大洋洲。

撇开个人意向，创业精神是科学、技术和政策的相互作用。政策因素在唤起人们的创业精神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对创业精神的培养不利，甚至压制其发展，会使我们进入发展停滞期；另一方面，仅靠科学和技术自身可能无法冲破生产领域的界限。要想推动创业精神的发展，没有比借助经济政策这个工具以间接的方式作用于动机更好的方法了。当它们以一种合理的方式被建立的时候，一个特定的行为将会让我们获益。

创业精神不仅仅是人类的一个特征，还是一项能力，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生而有之。与生俱来的天赋总是很有帮助，但是能力可以通过传授和学习获得。这在一定程度上同样适用于创业精神。创业精神是一项具体的能力，一个人即使是就读于最好的商业学校也无法保证一定就能够习得这项技能。它必须通过做事、通过实际

经验才能学到。

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机构和政治的互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多种文化共存的国家，像马来西亚，各种不同的国籍和宗教在这里同时存在。这种情况除了马来西亚以外，还有中国、印度以及一些欧洲国家。除了伊斯兰教文化，还有基督教、道教和佛教。后两种宗教的教义特别有利于发展。但是，在印度尼西亚的艾斯省，一种类似的融合并不十分成功。文化的融合非但没有推动经济发展，还引起了无休止的争斗，因为在那里缺少具备积极的批判精神的民众，特别是缺少能让实现长久的和平和政治领导力成为美好的期望。而其他一些地方却幸运地拥有了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抛开利益之争不谈，一种文化可以让人民坠入经济停滞不前的深渊，特别是当教义上阐述的一些内容阻碍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的建立，使其无法实施有效的政策。这个问题值得深究，但是并不能让我们卸下继续寻找到一个发展理论的责任，这个理论要能帮助我们治愈无助的病症，从实用角度来说，就是帮助我们脱离经济萧条的深渊。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文化是一个价值体系，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文化本身虽然无法决定经济发展的命运，但是在一个具体的自然、社会和技术环境下，经济发展有时会反过来作用于文化。这一点在社会和技术领域中表现得比在自然领域更为明显。它们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与很多其他的因素一起出现在一个具体的文化融合的环境中：要么推动发展，要么导致经济萧条。而从长远来看，正是文化决定了谁胜谁败：哪个变得腰缠万贯，哪个变得一贫如洗；哪个的经济欣欣向荣，哪个的经济萧条惨淡；哪个国家兴旺发达，哪个国家碌碌无为——这些都是因为所有对人类事业和生产力起到重要作用的事物都在文化这个大框架中得到融合。文化有时起到支持作用，有时也会产生小小的阻碍，因为文化本身包括很多层面，有的可能会与许多其他附加因素相抵触。

当我们思考未来、思考如何用一种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方式塑造未来的时候，必须记住文化这个条件。同时，我们也应该重点关注那些更加具体的关键因素。事情总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发生，决定也总是在具体的物质和经济条件下做出，理论模式也必须用一种具体的方式加以考虑。但是，除了强调无止尽的学习，以及提供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很多步骤以外，现行的增长和发展理论没有一个能让人满

意，它们没有解释经济萧条和发展的各个方面。我们不断遇到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或者发现现实与理论不符，有时甚至是相抵触。[6]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一方是对的，那么另一方就应该是错的；从理论上说，一些东西应该从富裕的国家流向贫穷的国家，可现实的情况却是相反的；从理论上说，这时危机就会出现了，但实际上却没有。否则以其发生的频率，我们早就该习以为常、不再感到惊讶了，可事实并非如此。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现在要探索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在对这个过程进行的理论阐释中，我们将会找到答案。现在是时候抛开以前对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理论所做的杂乱无章的记录了，是时候提出一个新的范例了。我们需要一个发展巧合理论，这个理论与经济学的描述层面有关。我们同样需要基于这个理论的新的实用主义观点，而且要照顾到规范性层面。这个理论涉及早期的方法论，它将从描述的层面为我们解释事情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机制控制着经济过程的展开，它还将从规范性层面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完美。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把自己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因为它与愚昧无知一样，会阻碍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有时候甚至是更胜一筹。我要再一次重复：教条主义在宗教中是有利的，但是在科学中是不可取的。变革的精神、不断前行的动力、以及改造和改革的想法，与传统和保守主义格格不入，这是问题的核心。

你不能使文化为己所用，但文化却可以创造出超越自身价值的价值。

注释：

1. 约翰·斯布鲁克：《播种民主》，《纽约客》，2007年8月27日。

2. 引用的数据出自《身陷困境，不出所料》，《经济学家》，2005年11月12日，49页。

3. 参见安德斯·阿斯伦德：《俄国如何建立起市场经济》，华盛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1995年。

4. 参见麦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彼得·巴哈尔、戈尔登·C. 威尔斯共同编辑、作序并翻译，纽约：企鹅出版社，2002年。

5. 这部1996年的电影比研究经济民粹主义的专家们更好地把握住了它的本质，它所呈现的不仅仅是民粹主义被拉美化之后的庇隆主义。

6. 埃尔赫南·赫尔普曼在其《经济增长的秘密》（牛津、纽约：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中描述了经济的缓慢增长以及繁杂的现实状况，这本书饱含趣味，可读性很强。

第九章 发展的偶然性理论和新实用主义

产量增长和经济发展依赖于什么，怎样促进其增长

知识之于发展，犹如幸福生活的处方，永远不会嫌多。

有人认为，一些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教条非常不受欢迎，当它们的提出者故去后，往往紧接着会出现经济进步。在过去，凯恩斯主义就是最好的例证。现在，经济学家们总挂在嘴边的货币主义（monetarism）也可作为例证。不论是在势力强大的出版公司里，还是在对文章的出版和研究基金授予上有话语权的评委会里，货币主义都有大批的追随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关于人类终结的书中写道：“只要这些人还处在这古老等级制度的上层，或在学术刊物的评委会中占主导，亦或对基金会中董事成员的任期和组成有决定权，那么要推翻某种范式一般是不可能的。”[1] 即使不是不可能，要将其推翻也一定非常困难，新自由主义便是例证。我们可以看到，跟风似的引用使得教条主义泛滥，处于同一学术圈子或社会圈子里的人经常相互引用，有时甚至不管所引用的是否相关。理论变成学说，学说又变成教条。这些教条在理论上存在严重缺陷，因为现在与相关理论形成时期相比，早已事易时移，当时所用的数据也已过时。

我们不应迎合意识形态和政治。这绝非易事，尤其是当我们讨论发展问题、面

对价值评价时。在有价值的地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就会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不同，发展模式既不应该偏左，也不应该偏右；它既不是民粹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它既与基督教无关，也与伊斯兰教无关；它既不偏向保守党，也不偏向工党；它既与民主无关，也与共和无关。最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必须是可行的、必须关注社会经济的现实，并不带有意识形态倾向。

每种经济行为都会产生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困难在于一系列的复杂问题又会引发另一系列问题出现，但这恰恰也是理论领域引人入胜的地方。就像历史一样，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过程。你没有任何修整的机会，因为你一旦歇下来，新的问题就会像雪崩一样横扫过来。因此，与其陷在无用的政治争吵和意识形态对抗之中，还不如准确地判断问题所在并给出解决方案。邓小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常引用的一句中国谚语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虽然我们仍然不知道邓的猫是什么颜色，但我们都见识了它的本领。

此外，我们还应该抛弃关于经济增长的极端整体观点和普适理论，同时，不应幻想一个公式就能解释一切。如果真有适用于每种情况的理论存在，那么这种理论一定是过于抽象和宽泛，以至于无法描述和塑造经济现实。如果一个模型所体现的是产量增长决定于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么这个模型虽然普遍适用，却过于宽泛。因为实际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就业率（前提是有可以雇佣的人），以及最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对于某个过程或事件我们都有自己的理解。例如，对于凯恩斯主义者，可以认为凯恩斯主义体现了投资可以提高生产能力和产出水平；对于货币主义而言，也可以认为它精确地展示了金钱供给和通胀率变化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上述两种观点，其中一些看似独立的自变量事实上取决于其他一系列参数。虽然上述的理解都正确，我们也没有必要只加入其中某个学派，关键是要知道如何利用这两种理论。

于是，博采各种理论之长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在本书中多次出现的观点，它强调引发某种现象或启动某个过程的各种条件的巧合性。各种条件的巧合形成了这些条件和过程的临界点。这些条件和状况的差别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他的理论往往非常自然地将条件简单化或同化。于是，这些理论很可能就会忽略某些特殊的文化因素，以及其他许多独特的条件和以往的因素。

最近，一些作者特别强调，应该抛弃过于简单化的同质经济增长模型。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用比喻的手法写道，应该让上千种增长模型宛若茂盛花园里的花朵，百花齐放[2]。我们有必要找出那些能提高生产增长、改进生活水平、战胜贫困和巩固繁荣的模型，并给予其支持。这是每个人都应该赞成的一种哲学。

在经过如此多的讨论之后，读者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我之前所说的“事情以其特有方式发生是因为很多事情同时发生”，这句话也可以以其他的方式来解读。在现实的经济体制中，很少有结果是由单个因素引起的。即使我们能找到这样一个因素，它也肯定是在特殊的环境中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因此，必定还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只是我们认为它们没有起到特殊的作用罢了。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合力而不是某单一因素，才会使事情以这样的方式发生。

我们的困难在于如何充分地界定这种合力，并且明了其各个组成部分。同时，还有必要领会每个合力各组成部分的本质，因为这种本质很可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用“可能”是因为这些组成部分既可以共同发生，也可以自发地、独立地发生。

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衡量出这些合力的组成部分，并将之量化。这个过程需要运用数学模型。毫无疑问，这样的模型需要进行构建、确定其变量、评估其参数、并进行加权。这还需要其他一些过程共同来完成。一定会有人热切地承担起这种挑战，对于这点，我从不怀疑。

* * *

偶然性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与新经济史和新制度主义类似，它与其他学科的联系非常紧密，并使用这些学科的分析方式和综合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观察视角，并为分析、综合、描述和规范经济学引入新的价值。的确，这种方法会使一些研习不精的人更加感到混淆，但它使那些专心研究的人不仅了解得更多，也看得更清楚。如果没有历史分析，就无法领会文化因素对发展的作用；如果没有心理分析，就无法知晓参与经济活动各方对变化的预期；如果没有管理学研究这个刚从经济学分离出来的年轻学科，就不可能对资本和劳动力生产率的国际差别进行研究；如果没有创新的前瞻性研究，就不可能将经济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到塑造未来的过程中。

比较经济学是发展的偶然性理论中最基本的一种方法论。如果不进行比较，我们就很可能认为不同经济体或企业，不同现象或过程，以及不同范畴和体制都没有各自的特点。只有通过对比和比较，并充分考虑不同背景，我们才能将事情真正理解。不会比较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事物。比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工具，它能帮助我们准确找出关键因素——在众多决定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条件之中，这些因素对于某种现象和过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使用比较的方法，我们往往会发现，只要找到实际问题中的那个对各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整个问题就会解决。

比较的方法与偶然性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密切相关，即在多重特定空间中的定位能力。这些多重空间包括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体制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具体的现实。我们已经描述过，文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化本身就常常不止一个层面。这就是为什么在多重空间中，对每个问题都必须恰当地辨认、识别和定位在某个具体点。这样做，我们就不会犯过于简单化的错误，例如不会简单地认为克服通胀只需减少货币供应（根据一维的货币理论，通胀现象只与货币供给相关），也不会简单地认为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方法是将它们尽快私有化，其余交给市场就行（根据新古典主义正统思想，不考虑具体制度特征也能达到目的）。

最后这一点，虽然也很重要，但如果不是其他理论将其混淆，都无需在此特别提出。那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中（尤其是后者），需要对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手段进行明确区分。这种区分在涉及增长和发展时，相对简单。但是，如果涉及广义上的经济政策，就会出现将目的和手段相混淆或者两者彼此交融的情况。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即在没有考虑社会成本的情况下，将预算收支平衡（或至少是最低的预算赤字）和低通胀率视为经济政策的目的，但其实这些只是经济政策的工具。还有一个类似的错误，即某些民粹主义者将预算转移的扩大视为一种目的，而实际上它只是一种政策手段。历史上不同经济体制中曾出现过无数类似的错误。需要记住的是，即便是古典资本主义，也是将利润最大化视为生产的目的，但这只是微观经济的目的，它无法充分保证和谐的发展——而这才是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

通过以上描述可知，区分目的和手段绝非易事。一些发展理论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目的和手段不可区分。价值理论以及价值本身就各不相同，因此，从这些理论引申出的目的也各不相同。这一点适用于指导发展政策的目的。如果我们假

设最终目的是获得幸福，那么广泛、平衡的社会经济发展只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如果我们把发展本身当成目标或目的，那么毫无疑问，生产的增长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根本方法；如果我们把增长本身视为一种目的，那么生产力的提高又变成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因此，方法与目的都是相对而言。某个时期看起来是方法的东西，在另一个时间框架下又会变成目的。因此，多维度选择解决问题的实用方法，不仅仅是对发展参数进行科学分析的合理结果，也是社会参数选择的衍生物，它只能形成于有条理的公共话语中。认为中央集权的政府能给出这些经济问题的正确答案，不过是一种幻想；而认为市场上的经济行为、信号能为这些问题提供正确答案，也只是一种幻想。

发展的偶然性理论的显著特点是非正统性。甚至可以说它是反正统的，因为与正统经济学中的单一思维相反，它强调不同因素对增长的作用。在影响增长的因素橱柜里，有许多不同的抽屉：从自然条件（气候和资源）到文化和体制、社会和政治、技术和科技，再到严格意义上的金融和经济等。

偶然性理论将这些条件放在时空维度进行考察，即放在不同的物理和历史坐标上。相同的因素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这种方法便于我们找出该经济问题在类似情况下的表现。我们必须在此时此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解决问题的灵感可以源自它时它处。这与新自由主义的“一体通用”途径有显著差别。他们的途径不可能通用，我们的方法却可以——只要将经济政策及解读与问题正确地联系起来。

综上所述，发展的偶然性理论的八个主要组成特点为：

（1）拒绝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像思想的紧身衣一样，严重束缚了我们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

（2）拒绝对任何意识形态或政治路线的盲从，要寻找客观真理而不遵从传统智慧或共识；

（3）反对建立一种普遍通适的经济增长理论，提倡在宏观经济再生产的框架下注重现象和过程的具体特点；

（4）采用跨学科的方法，用从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未来学、地理、法律、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和网络科学等得到的解决方案丰富经济思想；

（5）广泛运用经济分析中的比较方法；

（6）将问题放在多维空间中思考，多维空间由历史、地理、文化、体制、政治、社会和其他具体现实构成；

（7）区分方法与目的；

（8）在多个维度寻找某个具体、特殊情形的解决方法时，保持方法论上的开放态度。

上述特点中的最后一点需要加以说明。首先，实用主义途径是发展的偶然性理论的最重要特点。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所需的途径不仅是跨学科的——这一点大家都已经清楚（但清楚并不意味着理解和能够加以利用），还必须综合多种不同理论。只要由这些理论得出的各种解释或解决方案不互相矛盾（例如，不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既建议提高利率又建议降低利率，或者既建议贸易自由化又建议贸易保护主义），那么就应该将这些理论综合起来，虽然这种做法会遭到这些理论忠实追随者的反对。我们完全可以将供应经济学的一些要素拿出来，与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 school）供给理论中的要素相结合。值得注意的是，在波兰，我们曾经可以这样做，并同时实施自己的经济战略（在货币主义框架下使经济冷却的那几年除外）。其他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则做得更好，因为他们可以长久进行，中国、马来西亚、智利和最近的巴西便是例证。

我想补充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我在寻找最适合后社会主义波兰现实的发展策略时，很自然地借鉴了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些普遍适用观点。同时，我也深受一些遥远国家的实践经验的启发，从时间角度而言这些经验离我们非常近。一方面，拉丁美洲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实施结构改革的失败教训值得我们思考；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迅速发展的东南亚经济体中学习经验，尤其是政府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形成工业、贸易政策方面的作用。

实用主义很重要。意识形态的东西越少越好，实用主义精神则多多益善。我甚至可以大胆地将这种实用主义定义为“新实用主义”，因为它使用的方法是从上述分析和理论方法中演变出来的一种新方法。它的新还在于，它将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新的、变化的经济条件综合起来进行考虑。发展的偶然性理论与解决实际发展问题的途径结合起来，就能在实践中为具体问题的解决创造出一个平衡点。因此，新实用主义是其理论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它是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一种根本途径。

对于国家干预的新需要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另一必然结果。国家干预不可能在生产过程中体现，但各种生产条件一经确定，国家干预就会体现在对生产条件的控制上。因此，在上述八个特点中，我没有将新干预主义单独列出，它与上述八个特点相互交叉、相互依赖。

仅关注宏观经济的平衡、相对平衡的预算、低通胀率和稳定的货币已经不够；而仅关注社会资本以及基础设施状态（包括自然环境）也是不够的。为了缓和各种经济实体间的冲突，政府必须参与到对其行为的微观调控之中，最好是创建能阻止这种冲突的体制性框架。因此，与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之后形成的凯恩斯干涉主义相比，新实用主义需要一种新的干涉主义。

新实用主义不会过多关注意识形态的禁忌，也不畏惧政治上的错误。当一种政策过多在意这些禁忌，中央集权和民粹主义就会干涉微观经济的理性私有化。当政策过多注意新自由主义，一些社会资本就会受到限制，这将影响平衡发展政策所必需的社会资本的质量。当政策屈从于民族主义者“经济爱国主义”的号召时，反增长的保护主义大门就会被打开。

今天，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不可胜数。经济学家想要争吵很容易，因为问题实在太多，他们总觉得自己国家面临的问题最多。一种普遍的现象是，人们往往低估自己国家已取得的成就，而过高估计所面临的困难；相反，对其他国家的成就评价很高，却低估了它们所面临的困难。毕竟，各个国家面临的困难都大不相同，例如，乍得和挪威、加拿大和埃及、厄立特里亚和葡萄牙，每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匈牙利和格鲁吉亚面对的发展障碍不一样，横在法国面前的发展障碍也与美国的完全不同。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专家的意见就会被错误地提供给不相关的国家。如果邮局把这么多的信件投错地址，必定会引起公愤。

引导政治家和商人行为的都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某种理论，理论专家往往被派往其他国家。有些利益是处在组织金融和组织犯罪的交界线上。20世纪90年代早期，一些西方的顾问虽然非常清楚布达佩斯或拉脱维亚与立陶宛的区别，但他们更清楚自己的利益在哪边。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些人在故意模糊一些概念，如巴尔干半岛和波罗的海，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印度、中国和印度支那。

言归正传，我们应该注重实效、关注具体问题。以上各个角度的论述只是为了将更多的东西剔除，在后面只留下一个明智的建议。通过简化的方式不可能理解发

展偶然性理论，我们必须用不同的工具分析不同的情况。当我们回过头看某种似乎没有改变的事物时，有时会从中发现一些不同的东西。即使我们用原来的尺度去考量这个事物，甚至也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在进行私有化时，高度国有化的捷克斯洛伐克和高度发展的英国需要完全不同的途径；保加利亚的一个完全国有的银行私有化与秘鲁混合制经济中银行的私有化大不相同；毛利塔尼亚和尼加拉瓜的工业化进程也因为两国的文化和自然条件不同而不同。

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增加科技投资是一回事，而将这些赤字国债用于进口武器装备又是另一回事。干旱导致农作物减产、粮食供给短缺，从而引起通胀率上升，这种情形与因工资水平较生产力上升得快引起的物价上涨不一样。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运行良好的先进的证券交易制度，出于体制原因，并不适用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市场上，当你的商业伙伴开放市场时，你也应该放开国内市场的准入，但是当一些国家开始偏向贸易保护主义时，你不一定要跟着这么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注意到，除了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曾在印度尼西亚采取过一些措施，印尼政府的预算总体是平衡的，因此，它的贸易支付差额紧张应该不是由政府支出引起的。有时，某个因素的被忽视足以使整个建议方案失效。有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正确的，只是药方给错病人了。与教条主义者相比，实用主义者犯类似小错误的几率较少。

经济政策工具的使用应该有所选择、有所区别。这一点适用于不同层次的经济管理过程，而最重要的是适用于国家层面的经济管理过程，因为这个层面的决策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其他层面的经济管理也应加以注意。经济管理的较低层面包括地区或区域政府，较高层面包括跨国界的综合实体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整个世界经济需要建立一种恰当的制度。在全球层面，新实用主义需要一种能适应发展挑战的新制度，这种新制度应该能满足迫切的使用需求，而不应当是一种官僚主义者在旧国际体制中相互妥协的偶然性选择。

灵活运用经济工具解决实际问题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目前这样的工具越来越少。而问题永无止境。正在进行的经济关系自由化、通过投资和贸易的频繁往来而互相开放国民经济、政府的非集中化、私有部门的扩张和公共部门的缩减等等，这些都需要结构改革。从长远来看，上述几个方面都会刺激增长和发展，尽管刺激

的程度不同。有一些因素会刺激产量增长，但不一定会（或自动地）刺激发展。这些改变带来的产量增长也会拉大收入差距或对自然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当某位经济学家正为可供经济政策调用的经济工具较少而感到振奋时（这样政府对经济大幅干预造成的危害会较小），另一位经济学家则正为类似的经济工具太少而担忧（政府如果掌握更多工具就可以做成更多事情）。实用主义者认为，政策工具箱的内容一直都在改变。一些工具需要被丢弃，同时一些新工具也应被创造。问题不在于工具太多还是太少，而在于这些工具是否管用。一方面，我们反对政府直接参与管理生产过程、管理价格水平；另一方面，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提供某些公共服务（如医院、监狱等），我们越来越需要依靠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形成的新工具。这样的合作关系是实用主义的最佳例证，因为它不用无谓地浪费时间（某些地方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就能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将某些政策工具束之高阁，而将另一些投放到前线。

无论在经济增长中遇到何种障碍，实用主义途径都要求仔细考察每个具体情况之后再采取行动。既然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将所有因素恰当结合，我们就应该尽量把缺失的因素补上。有时，我们缺失的是一部分，而有时我们仅缺少一个关键因素。

我们关注的一些条件以不同方式呈现。对于市场经济而言，这些条件常常以自主的、自发的形式出现。如果我们任其以这种方式出现，有时这些条件会形成一种有利于发展的混合状态；而有时这种混合的状态会变成混乱，打破经济的平衡或阻碍经济发展因果链中的一些条件产生，从而阻碍经济的扩张。这时，就需要对这些条件的混合进行选择性干预，以促进一些不能自发产生的条件产生。

* * *

在理论上，有一套由制度方案和宏观政策参数构成的最优化体系，我称它为“黄金序列”（golden sequence）。它取决于基本宏观经济范畴中各种增长率的特殊组合，它在创造出未来经济增长所需条件的同时使社会满意度有较大提升。有八个这样的彼此相关的基本范畴：

（1）投资

（2）出口

（3）国内生产总值

（4）个人收入消费（也称个人消费）

（5）劳动生产率

（6）国家预算收入

（7）社会消费中的金融消费（也称集体消费）

（8）预算支出

“黄金序列”由以上这些范畴的动态指标构成，并按它们在宏观经济中所占比重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由此可见，投资增长的速度最快，其次是出口（及其所支撑的进口），排在最后的是集体消费和预算支出。所有因素都会随时间而增长，但增长的比率不同。虽然宏观经济比例会发生变化，但是在“黄金序列”的框架下，这种比例的变化会以社会利益为重，并且与长期的平衡发展相符。

“黄金序列”预示着经济效果的改进，这一点通过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体现。而这两者的提高又反映了消费的增长以及国家预算中社会资本投资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支持未来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基础的建立，这可通过投资的增加和出口扩张加强了外部市场的渗透来体现。上述因素的组合方式限制了财政主义（fiscalism）的规模，改善了企业的运营环境。财政主义规模又与预算重新分配规模的缩减、公共支出结构和更倾向于发展的政策密切相关。

在实际发展进程中，上述各因素很少呈“黄金序列”排列。只有在很短暂的时期，尤其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在社会凝聚力较强、政治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宏观经济参数才会按这种方式排列。这种“黄金序列”大多出现在北欧国家和一些试图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其中，波兰是个特例，在“波兰战略”时期（即宏观经济参数发生巨大变化）和1994年的体制转型之后，波兰的发展曾连续几年遵循“黄金序列”。此后，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出现显著增长，沿着“黄金序列”的发展轨道，1995年至1997年间更是出现了充满活力和平衡的增长。投资（19.3%）与出口（17%）的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平均6.8%）；个人消费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较缓，分别为6.7%和4.7%；预算收入（2.6%）和集体消费（2.7%）增长水平相当，预算支出（1.2%）增长最缓慢。

当出现新就业机会时，个人消费的增长就会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失业人员找到一份有薪水的工作，或者某个家庭中原来没有工作的成员开始工作。这时，由于个人收入的增加而引起人均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家庭收入也因为就业形势的良好而增加，并导致预算支出增长。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是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高于个人消费增长。1994年至1997年这4年间，波兰就业率总的增长了6.4%，而从1995年至1997年间的年平均就业率为2.3%。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家庭收入（以现金或其他方式）增加对其消费水平增加幅度的影响大于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在就业水平相对平稳的情况下，事情的发展又会不相同。

发展往往需要一种催化剂来使之达到临界状态，并激发所需要的过程。尽管有人声称有非常简单的理论存在，事实上却没有一种简单的“魔法石”，这种概念更适合炼丹术士使用，而不适合经济学家。如果的确有某种“魔法”，也一定是不同因素由于不同情况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于具体情况，任何一种经济工具都有可能使上述因素刚好形成某种恰当的组合，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进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需要的推动工具也各不相同。有时，运气也会起到一定作用，但在如此关键的事件里，历史从来不承认运气的作用。最终，一切都归因为深思熟虑的选择。

有时，选择的结果会对作为发展进程催化剂的体制做出本质的改变，于是人力、自然和实体资源的潜力得以释放。有时，选择的结果可以是一种宏观经济政策，也可以是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形成所需文化特征的努力之中，或者是增加研究和发展的投入，或是政策性住房。通过减税和降低利率或许会使以上因素达到最优化组合。在使用货币工具阻止货币贬值的同时，也许应该降低进口关税。这与医学的情况类似，不同的病症需要不同的处方，虽然不是本质上的不同，但处方也不应该一样。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经济学的问题应该更为多样，与之相应需要的诊断方案也更为复杂。

新实用主义不反对开明的干涉主义。历史上曾经有过关于划分上帝和凯撒的疆界的争论，并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今天，认为干涉主义不可避免的观点背后也存在这种“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思维方式——将市场的还给市场，至于将公众的还给谁还是个问题。该还给谁呢？今天，将干涉主义定义在国家范围还远远不够，因为在经济博弈中，还需要干涉跨国机构和国际参与者的作用。

在过去，尽管国家干涉主义的实施道路并不平坦，或者正是因为如此，未来仍需要实施国家干涉主义。在一些时期，这种做法的实施曾获得成功。如果开明干涉主义注重的是实效而不是意识形态，以经济而不是政治为出发点，就会获得成功。这种干涉主义应该建立在对偶然性理论的深入理解之上。对宏观经济再生产的社会机制的干预应该是有选择性的、准确的。“有选择性的”是指在一些混合的条件中，只选择一些可以促进增长的因素，并通过对它的干预使之更自主地发挥作用。“准确的”意味着干涉主义的实施必须非常准确，并非盲目为之，从而避免一些不可控制的消极作用。在实践中，我们所使用的每种工具都会产生各种不同效果，包括并不需要的效果。使用国家、区域和全球干涉主义的艺术在于，使其促进所需要的现象和进程的发生，同时避免不利因素。即使不能达到这种效果，也要将不利因素的作用降到最低。

新实用主义是具有前瞻性和进步的。尽管过去的一切不可忽视，但目前的基本方向应该是面向未来。曾经，谁能将技术进步转化为社会变革，谁就能引领历史进程的发展，而这种技术进步有时是由一些偶然发现引发，有时仅是由基于纯理论的系统研究带动。在这个已经开始的未来，引领世界的不是生活在当下或过去的国家，而是那些充满前瞻思维的塑造现在的国家。这只有将未来的远景坚实地建立在科学之上才能实现。

在现实的社会和经济机制中，过去与未来的交互作用决定着现在。直到现在，过去仍如影随形，并决定着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但是从现在开始，对未来的设想将越来越影响我们生活的世界。这在某些国家已经有所体现，在芬兰表现得比在波兰明显，在北美比在南美明显，这主要是文化差异所致。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未来的构想和充满雄心的计划（如果我们设想的是发展，那么我们的计划总是充满雄心的）将影响现在正在形成的机制和正在实施的政策。有时，这些计划很传统，如利率水平应该基于对未来的商业期望而不是根据过去的推断。有时，这些计划很深刻，例如，高等教育应该基于对未来需要的估计，而不是基于传统。

记得在1997年，我曾在《国际先驱导报》（*International Herdld Tribune*）于布加勒斯特组织的一个会议上做过关于发展的演讲，会议的主旨是吸引国际（或者说“外国”）投资者。罗马尼亚总统埃米尔·康斯坦丁内斯库（Emil Constantinescu）

亲自出席会议，并鼓励与会者到他们国家投资，他列举了许多理由，其中包括罗马尼亚独具优势的地理位置：它位于丝绸之路（Silk Road）和琥珀之路（Amber Trail）的交界处。有人也许会借题发挥，将之设想为旅游胜地，而旅游对于一些没有其他竞争优势的国家而言，的确是非常好的发展机会。然而，现在更应该将竞争力的构建从过去转向未来，不应只为过去感到兴奋。否则，中东地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就该超过北美地区了。

* * *

我所建议的改变，是指从专注于原因向专注于偶然因素的转变，并且通过巧妙操控尽可能多的偶然因素构建各自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这种转变的成果应该既包括物质成果也包括智力成果。新实用主义开辟了可供考察和分析的新领域，但最主要的是，它在全球化时代决定了一种经济实践的新途径，强调了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软实力的作用，尤其是知识或更广泛地说是文化的作用。

经济和技术有许多共同之处：要有收获就必须先投资。有时，你还需要等待收获的出现。在等待的过程中，还必须不断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出版《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之前，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就已经成功地制造出蒸汽机，但他等了很长时间才看到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的到来。当然，瓦特并不是坐在那里等待，因为你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任何成功。

很少有利益群体思考如何增长、如何反对停滞并推动发展。当然，新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上的同伙也会为发展游说，但是只有当这种断续的发展符合少数人利益却牺牲大部分人利益时，他们才会这么做。在一些有着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坚实的制度、繁荣的民主的国家，一些国内投资者、制造商和金融家组成的协会也许会为发展进行游说。然而，更多时候，他们只会为自己的利益游说，而不顾及宏观经济发展或大众的利益。外国投资者往往只为投资游说，虽然投资对于发展至关重要，但是这些投资者关注的是自己的收益，而非所投资国的整体经济状况或总产值。政府官僚机构从来不会为发展游说，因为它们想要的是清静，清静意味着不要有改变，而改变正是发展的所在。

游说团体的存在是必要的。它不能仅由单一的社会阶层组成，即使是开明的资

本家也不行，虽然这些人在类似的团体中不可或缺。游说团体应该能跨越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由各种不同社会职业的人组成，既包括实践者也包括理论家，既包括政治家也包括学者，既包括经济学家也包括律师，尤其是应该更多地包括那些具有前瞻思想的年轻人，少一些背负着沉重过去的年长者。最主要的是，这些人应该更关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不是自己财富的增加。虽然前者可以引出后者，但是优先权应该属于前者。

创建促进发展的游说团体很有必要，但这种团体的潜在成员往往为各自利益考虑。那些本应为共同理念和共同的发展动力而做的努力往往浪费在政治争吵和混战之中。媒体本可以成为这种游说团体的公开论坛，但它却热衷于报道这些争吵。时间一直在流逝，而经济却仍然发展缓慢，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无人问津。

毫无疑问，期望可以把发展的偶然性理论用在一种非意识形态和非政治的环境中未免过于天真。这种情况只可能在没有知识分子话语的（这将是一种极大的损失）、没有意识形态的和政治争端（这不能称为一种损失）的未来实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争论仍将继续，虽然我们可以指望未来更多和平更少冲突。历史告诉我们，可以用不同方式解读理论，这些解读也可以与其创始者最初的意图大相径庭。事实很重要，用于描绘事实的语言同样重要。当错误观点四处传播时，应该积极维护正确观点。未来这一切都不会改变，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冲突不可能消除。我所建议的方法也许能缓和这些冲突，促进可以在国际范围解决问题的方法出现，但还是不可能将之彻底消除。这只能在乌托邦中出现，而我们也将不断看到乌托邦的新版本，如基于因特网的“新经济”[3]、21世纪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以及一个又一个教皇所提出的“和平世界”。我们可以祈祷但不能指望这些乌托邦的出现。

可以确定的是，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和生态长期平衡发展的工具，意识形态和政治诱惑会始终伴随着新实用主义。不少经济学派的初衷都是为了经济发展，但最终被作为学术和政治工具，促成与他们初衷相反的结果的出现。新自由主义的优势是它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因此它可以在更多样的条件下促进平衡发展，并抵抗住使之偏离的诱惑。

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也可以标榜自己的方式为理性的或实用的。这种说法或许正确，但他们的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并没有将各种条件放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相反，他们的理性是一种群体理性（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会将之称为

阶级理性），考虑的是特殊利益，其中一些特点并不符合发展偶然性理论和新实用主义的本质。

显然，在21世纪或更远的未来，人类世界不可能风平浪静，不可能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和政治冲突。虽然我们不会忘记过去的一些问题和冲突，但它们会逐渐隐入历史；另一些过去的问题和冲突则会被唤醒，卷土重来，其中有些则是非常恶劣的问题，如种族主义和文化狭隘主义等。还有一些问题正在孕育之中。

这些冲突不仅会对未来产生影响，还会对真科学的理性特征和世界社区的进步等方面产生影响。我们可以期望未来的生活像乡村生活一样快乐和宁静，但事实不会如此。我们必须继续前行，因为我们不能停止。我们只能希望自己不要迷失方向。

世界上没有奇迹，但有时会有幸运的巧合。

注释：

1. 弗朗西斯 · 福山：《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纽约：法勒 · 施特劳斯和吉鲁克斯出版公司，2002年。

2. 丹尼 · 罗德里克：《让千种增长模型百花齐放》，www.project-syndicate.org；《增长战略反思：广阔视角看全球经济增长》，汉普郡，新罕布什尔和纽约：帕尔格雷夫 ·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2005年，201–223页。

3. 本书作者就所谓“新经济”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及意义有诸多波兰语著作，可参见tiger.edu.pl。也可以见托马斯 · L · 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纽约：法勒 · 斯特劳斯和基诺出版公司，2007年。

第十章　充满变数的未来

在不久的将来或更遥远的未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又拥有什么

我们正面临人类最壮观的迁移——向未来的迁移。

我们正在为自己创造世界，这是文化和经济维度上的世界，而不是自然世界。我们所知所懂的越多，能创造的也就越多。几乎每个人都在构想未来，常常带着疑虑和担忧。人们对未知的东西充满恐惧。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选择：一个是相互理解的未来，一个是充满误解的未来。而后者将会让发展付出沉重代价。我们要知道，许多误解不是源于“文明的冲突”而是因为“愚昧的冲突”。时间在飞逝，明天就要成为今天，而今天即将成为昨天。

听伊朗人谈论美国，或美国人谈论伊朗，你很难从中感受到乐观，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不带偏见的、明智的、实质性的对话，这两个国家仍然可以达成许多共识。而且，它们并非真正地在彼此竞争，或开始竞争。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样的极端情况，如果没有强大且共同的外界干预，将不会达成明智的解决方案。此外，另外一些似乎有很多冲突的国家，如美国和委内瑞拉、英国和津巴布韦等，它们之间的共识之多足以让一个客观的旁观者感到惊讶。而波兰和邻国白俄罗斯、俄罗斯

和邻国格鲁吉亚之间的误解则非常深。当然，在华盛顿或纽约，你听不到关于俄罗斯的好评，同样，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你也不可能听到关于美国的好评。在日本，所能听到的是追忆关于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只不过现在这种追忆是每天在以光速传播，而且，只要想听的人都可以听到。

今天，这些误解并不能像当年中国被迫购买鸦片或日本被迫对外开放商业往来一样，通过派出英国军队和美国战舰来消除，而是需要误解的双方采取明智的努力和政治行动。今天的经济往来不仅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同时在教育和研究领域成就非凡。最近几年的最好例证是中美关系，两国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双边关系增进了相互理解，还为后社会主义国家做出了榜样，激励着这些国家融入到全球经济和世界文化之中。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作用，他们通过没有政府干预的直接商业接触，为创建相互理解、宽容和尊重的氛围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为发展机制和动力等问题寻找答案时，我们常常担心实践会被无知、贪婪或情绪带入歧途，甚至在针对这些问题的学术研究中，也会出现这些状况。时间会被白白浪费掉，而且浪费的是大多数人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同时也总会有人从这样的状况中获利，而且一直会有人这样做。

有时，一些“理论上可行”的事情却没有发生，这恰恰证明了实践高于理论（至少在物理学中是这样）。这正如我们还在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而理论上它现在就应该到来。如果世界末日现在就出现，那么它不会是无知的结果，而是大量知识的积累和人类另一项伟大工程的成果。2008年初，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一台机器启动了（也是最昂贵的一台，因为它造价超过80亿美元）。这台机器比古希腊的安提基齐拉器械要复杂的多，它就是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这个粒子加速器坐落于日内瓦近郊一个27公里长的隧道内。这台大型强子对撞机能帮助我们回答关于宇宙或多重宇宙结构的问题。有趣的是，这些试验和理论研究的结果也许会是宇宙大爆炸从未发生过，于是我们将不得不重新书写我们简短的历史上一些曾自以为知道的事情。

有人认为，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onseil Européen pour la Recherche Nucléaire）建造的这个“日内瓦器械”能创造出一个小型黑洞。这仅仅是物理学界另外一种被神秘化的理论吗？或许是。尽管在1999年夏天，甚至《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也曾警告这种可能的存在。这属于“理论上可行”的情况，尽管

可能性接近于零，但是仍然大于零。这种观点提出时，科学家们使用的仪器还是一种相对较小的对撞机，即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的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Relativistic Heavy Ion Collider）。麻省理工大学物理学家弗朗克·韦尔切克（Frank Wilczek）（是波兰移民的后代）解释说，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于黑洞，而是所谓的奇异夸克物质（strangelets）。一些物理学家（物理学家也会提出相反观点，只是出于与经济学家不同的原因）则认为，中子星可能会转变成这种假想的物质形式。这就意味着一种被称为冰九的转变（ice-nine transition）会发生，尽管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如果这种情况可以在地球上发生，那么我们的整个星球就会转变成为一种奇异物质，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将不复存在。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项目的管理者们召集了许多学者，组成一个特殊委员会，该委员会排除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平息了过度兴奋的媒体对威胁的猜测。弗朗克·韦尔切克于200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并非因为其在奇异夸克物质方面的研究。韦尔切克教授作为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他的研究没有或很少有人能够理解。

尽管有理论预测，但世界末日并未到来，至少不会在今年到来。同样地，在理论上，经济学、商业战略和公共政策上很多新错误也有可能会发生。更糟糕的是，有些不可避免的错误是出于我们目前所熟知的一些原因。尽管如此，我们仍必须寻找像复杂的粒子物理学一样精确，但远比其全面的经济理论，并且找到推动进步的因素的实际应用方法。尽管我们拥有不断增多的知识和丰富的历史经验，但问题仍不断涌现。这是发展的另一种矛盾。

有人认为，如果不能使你的读者感到震撼，那么描写未来将毫无意义。这显然不对，但也不应该使读者仅仅陶醉在对现状的自我满足中。关于未来，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其不确定性。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如果没有危机或新的革命，世界将不可能从其所深陷的螺旋中解脱出来。当然，从中解脱的最好方式，是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经济以及金融的平衡且全面发展和进化，但这在现实中难以实现。未来将出现怎样的危机？我们不知道。何时会出现？我们也不知道。但危机早晚会发生，因为矛盾越来越多，而且这些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尖锐。克服这些矛盾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行动：深刻的结构性改革、崭新社会价值体系的采纳以及世界舞台上权力的重新平衡和角色的重新分配。

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说他所有的麻烦都源于自己的想象力比其他人稍为丰富。他不是唯一遇到这种问题的人。但出现这种问题并不是坏事，因为丰富的想象可以激发批判性思维。

对未来的了解，以及在另一种历史模式下的反思非常有意义。理智地问一句“如果……会怎样”会非常有创造性。我们知道事情如何以及为什么以其特定的方式发生，我们也知道很多事情完全可以以另外的方式发生。毫无疑问，未来将仍是这种情况。未来的一部分已经确定，除了等着它的到来，并充分利用其最好的方面之外，我们别无选择；其他部分则取决于我们的行动，这些行动又取决于我们从或远或近的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只有理解历史，我们才能形成自己的见解。

我们很难对假设的未来作出评估，我们无法否定一种还未出现的事物。当事情的对错可以辨别时，它又已属于过去。

所有从事分析和预测的研究中心都会对未来进行构想，即使像美国中情局及其附属机构这样严肃的部门也不例外。它们甚至将这些构想的情形发表于众，对于情报机构而言，这样的做法有些令人意外，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们不会把一切都公之于众。它们会在一些最吸引人的情景打上“最高机密”。但是，公布在网上的那些场景也足以激发我们的思考[1]。需要补充的是，这些公布了的场景旨在影响未来，因为它们能影响期望的形成，从而影响不同实体的行为。一些预言的目的是阻止事情发生，而不是促使其发生；另一些预言则旨在促进事情的发生。就短期而言，为投机资本服务的金融分析家也起到类似的作用，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操纵着市场。对一些重大事件而言，时间框架非常漫长，因此我们得等30至70年，才能看到一些标有“最高机密”的文件解密。为了避免被吓到，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拥有比别人更为生动的想象。

然而，我们都错了。不论大事还是小事，只有在事后，我们才知道自己做得怎样。如1975年，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ly*）预言了无纸化办公时代的到来，但在当时，美国纸张消费却增长了3倍。再比如，按照以往的预言，我们现在乘坐的应该是超音速飞机，而事实上，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我们的飞行速度没有任何变化（而且，飞机上提供的餐点变得越来越糟糕，但没有人预言到这一点）。20世纪中期，由于核电的出现，有人预言电将变得非常廉价，人们甚至不用交电费。按照预言，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生活在其他星球，以减轻地球的污染，

并消除贫困和饥饿。而现在，我们的期望只是到2015年时，人类的这些苦难能减轻一半。

人造物质本应能够解决人类资源贫乏的问题。我上学时，书中写道，2000年时各地都会出现移动的人行横道。当时报纸的科学专栏上写着机器人将会为我们做饭煮茶。今天，很多经济学家，当然还有其他人，热衷于“新经济”。然而，没有任何“新经济”可以解决我们长期固有的问题。

这些无心之错将会给规划带来严重后果。为了将这种后果限制到最小，我们需要提出尽可能多的问题。有时，一个好的问题比一个偏颇的答案更能提供信息。与答案相反，问题不会强调某一点，只会暗示。问题会提醒我们应该注意哪个方向。

我们应该全面地思考问题。我们可以将影响未来的大事件分为12个方位点。对于这些事件，我们应该时刻加以关注，努力从中窥得未来，并能提出问题，“下一个将是什么？”未来发生的事情将取决于其同时期发生的事情。许多事情会让我们吃惊，但大部分事情应该在意料之中，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取决于有意识的人类行动。这12个方位点是：

（1）经济增长的速度及局限

（2）价值的进化及其对发展进程的文化意义

（3）全球化的制度化以应对混乱状态的增加和协调的缺失

（4）地区的一体化及其融入全球化的方式

（5）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6）自然环境以及对逐渐减少的自然资源的争夺

（7）人口增长过程以及人类的迁移

（8）贫穷、苦难和社会不平等

（9）知识型经济和社会

（10）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11）网络的发展及其经济影响

（12）冲突与安全，战争与和平

* * *

第一个方位点，即经济增长的速度及局限，这既是我们思考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如果我们知道增长速度指的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幻想过去5至1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能延续到未来50年或100年。尽管一些人会感到意外，但事实是，世界的增长速度正在逐渐放慢。当然，“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成员国或每个地方，也不意味着放慢的程度相同。

贫穷国家应该加速自身经济的发展，既包括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包括与之相关的经济结构的改革。这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正如我们所知是可行的。然而，贫穷国家要真正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将发展战略建立在正确的理论之上。它们还必须制定国家发展的长期战略，而这应基于新实用主义，并与正在进行的全球化相吻合。这些国家不可能重复欧洲和北美的成功，它们最多只能大幅缩小与这些最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在未来一代人的时间里，即大约在2035年至2040年期间，中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保持两倍于欧洲较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它们确实有机会实现这种发展。这样的经济发展将消除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并显著缩小生活水平差距。然而，这种发展不可能自然发生。进行经济转型，并融入高度发达国家联盟，尤其是欧盟之中，将会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有很大帮助，当然，这些的实现都有赖于恰当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

在这些国家中，拥有丰富能源资源的国家将具有很大优势，但前提是它们要能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包括丰厚的自然赠予、持续上升的能源价格以及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到目前为止，它们做得还不够出色，因为它们过分依赖于唾手可得的地球母亲的恩赐，而不是自己的智慧、组织和辛勤工作。

前苏联的其他国家将处于一种更为艰难的境地，而且，在未来几十年中，这些国家与欧洲较发达国家和亚洲的距离也许会拉大。在后冷战时期的协作和对抗中，有着非常重要战略地位的乌克兰处于一种特殊的尴尬境地。它的命运取决于在未来一二十年中，能否加入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决裂还是更加亲密。对于乌克兰而言，最有利的选择是加入欧盟，只要它不将此当成削弱俄罗斯的一种手段，而是当成一种互利合作的地缘政治平台。白俄罗斯不久也将面临与乌克兰类似的问题。然

而，所有后社会主义国家，从蒙古和塔吉克斯坦到科索沃和马其顿，都将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发展速度将会减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的警告一直不断，但这个时刻还未到来。我们可以断言，西方国家试图瓦解中国的努力不会成功。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与过去的30年一样，中国政府将继续把旨在结构改革和市场制度建设的各种开明政策与发展结合起来。如果他们继续通过一种系统的、渐进的方式分散政府权力，同时使政治体系更加民主化，那么在未来一二十年中，这个国家将继续以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增长水平发展，虽然增长速度不会像最近几年这么快。尤其当中国大陆南方地区的发展水平与台湾不相上下时，台湾或许会回到祖国的怀抱，而台湾的回归将会使中国变得更加强大。

非洲应当加速发展。非洲大陆必须首先以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发展，才能使自己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差距不再扩大，然后再将差距进一步缩小。2005年至2008年间，非洲大陆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5.8%的速度增长，同时期的世界平均水平为5%。这是按总体水平计算的，如果按人均水平计算，非洲的增长速度则略低于2%。需要说明的是，经济进步的关键条件包括限制人口增长，以及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保持在2.5%至3.5%的水平。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并非不可能实现。

富裕国家，尤其是美国，必须放缓其经济增长。显然，这些国家不可能自愿这样做，因此必须对其施加压力。这既可以通过渐进和缓和的方式，即价格的高涨和某些原材料的难以获取使其增长减慢，也可以通过激烈和突然的方式，即某种巨大的危机来实现。这种危机可以以不同方式爆发。最经典的方式包括从不动产领域的运转不畅到金融领域的结构失衡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然而，这种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放缓不会像深度危机（没有人知道有多深）时明显，此后增长又会继续，只是增速会低于危机之前。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增长的放缓还应该伴随一部分金融积累的主动放弃。这部分金融资本不应该用于国内或世界其他经济体的直接或间接投资，而是应被转移到非洲、中亚和南亚以及加勒比地区的贫穷国家。“富裕国家0.7%的国内生产总值转移到贫穷国家”的建议，越早地从一种国际机构的政治标语转化为一种世界发展战略就越好。这种转化同样有利于发达国家：它们面临的来自贫困地区的移民压力会大大减小，因为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减少了。

富裕国家取出其收入的很小部分用于对贫穷国家的资助，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警告这种资助面临被白白浪费的风险，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尽管如此，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不管这种资助多么微薄，总会引起进步。毫无疑问，在战胜贫困与经济停滞方面，东南亚国家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这些国家所接受的外部援助非常少，主要是通过贸易扩张和自身进取获得的。非洲国家没有做到这点[2]。事实上，在过去的20多年中，最贫穷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百分点应归功于外国的直接援助[3]。没有这些援助，那些最凄惨国家的境遇会更糟糕。如果当时资助的幅度更大，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更高。我们也已经意识到，需要建立起特殊的制度、采取政治手段来阻止这些援助被白白浪费掉，而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同样，我们也知道援助资金不能用于武器进口（对应另一个国家的出口），也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返还给这些“赠与者们”。

因此，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世界产出的年增长率维持在2%左右将是非常伟大的成就。而如果能使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水平高于发达国家，我们的成就将更伟大。这有可能实现吗？这将取决于我们周围的其他几个方位点。

现在，我们来讨论第二个方位点，即价值的进化及其对发展进程的文化意义。这一点非常重要。截至目前，人类已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一些文明正在形成，而另一些已经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有时候，这些文明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消逝；而另一些时候，这些文明的消逝则是因为其后继文明的强势进攻。今天，我们很难再面临某段“历史的终结”，因为除了苏联社会主义之外，还没有任何一段文明被归到历史的故纸堆中。当然，各种冲突仍然不可避免，尽管不一定是“文明的冲突”。在未来几十年中，将不会再出现新的文明。然而，对多样价值的融会贯通，将会推动地球上这个种族、文化大熔炉继续进化。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新的文明之中。我们是如此地幸运：拥有全球化的经济、世界金融和电子货币；飞越大洋的飞机和大规模的国际旅游业；因特网和可以让全球十亿人同时观看人类登月和世界杯决赛的卫星电视；我们拥有无线通信和大众文化，人们在一天中购买某本书（例如“哈利·波特系列”的最新版）的数量可以超过500年前世界上所有图书馆的藏书量。

在现在的文明中，虽然精神价值开始像古代一样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对物质价值的追求仍然是主导。这种规模的社会优先价值转移将对我们商业往来的方

式以及经济动态问题产生巨大影响。停滞与增长、发展与缺少发展都以新的方式呈现。受惠于人类对自然与文化的深入探索，现在，个人既可以“横向”发展，也可以追求“纵向”发展——即工作的不断晋升与财富的不断积累。有时，相似的情形可以出现在不同社会发展模式中，例如，人们更注重“成为”，而不是“拥有”。当然，为了“成为”，首先至少要有一定的“拥有”。这样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会有所不同，因为在这些地方，优先权应该放在生产的增长之上，这样才能保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

我们需要对消费偏好重新进行评估。贫穷国家不能毫无批判地照搬富裕国家的消费模式，这不仅因为在一些地方客观条件不允许，也因为不值得这样做。世界并非要变成一个大的美国，也不会变成一个大的不丹，它只会处在介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某个位置。

在这个新文明时代，合作、共存、宽容与冲突、排斥、冷酷同时存在。这个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于协作与协调，而不是相互支配。这个文明更像是一场有多名选手参加的竞赛，而不是你争我夺的斗争。竞赛总是有规则的，而斗争则不然。越来越多的国际规则将由这些参赛选手协商产生，而不是强者强加给弱者。在通往经济进程民主化的道路上，将出现根本性的价值转移。经济增长本身会对这个过程起到促进作用，因为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的进化程度密切相关。

世界并非完全民主。而且，即便所有国家都实现了民主（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种状况），各国民主的总和也不等于整个地球的民主。最近发生在联合国的事件清晰地描绘了我们与这种民主的距离。2005年的联合国大会上，182个国家投票谴责美国对古巴的贸易封锁。没有投反对票的只有美国及其忠实盟友以色列，以及太平洋上的帕劳群岛和马绍尔群岛这两个小岛国。这样的结果丝毫没有引起美国的重视，因为这并不是能决定对错的某种世界民主实体，而只是一群老派政治家的忽发奇想。这种情况一定会改变，而且很快会改变。

只有这些变化发生时，这些国家才能根据事情本身的底线来进行投票。两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开展的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美国政府在贿赂某些国家：有15个国家在作为安理会轮值国期间（即握有投票权时），得到的国外援助比平时多了59%[4]。这增加部分的援助在该国作为轮值国的任期内会一直保持，而当任期结束，国外援助又会回到原来水平。这就是“行为上的民主（democracy in action）”。

在当今的多极化世界中，一个控制与民主化之间相互反馈、相互影响的体系已经形成。与世界被划分为两大对立阵营，或世界被单一的超级大国所支配相比，这个体系更有利于生产的增长和产品分配的相对公平。

一个多极化世界应找到一种自我管理的方式。更准确地说，它应该能找到一种方式来引导一些有着全球影响且需要被监督的过程，但这超出了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的监督能力。在此，我并不是呼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这未免过于幼稚。然而，我们确实需要有制度上的简单的解决方案，即行动的协调和国际协议。这种面向全球的控制、协调政策，将会变得越来越常见。在未来几十年里，这些政策对事情进展的影响要远大于科学技术的影响。

在分配中正义感多一些，恃经济优势而行动的情况少一些；对其他国家文化的无知少一些，相互理解多一些；真正的平等权利和相互尊重多一些。这些都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成为新文化的特征。我们应该尽可能促成这些特征的形成，因为这是减少冲突、减少争端和战争，增进合作与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我们也应当以一种清醒的心态来看待这些特征。21世纪将充满文化的碰撞，而且这种碰撞不同于过去的几个时代。这将是科学、技术、经济和政治多个过程和现象重叠的结果：科技对文化的影响与政治不相上下，而经济则会从中获益。政治对这些过程的干预一直存在，有时会把事情弄糟，但有时也会促进其发展。如果我们能恰当应用即将出现的知识型政治，那么政策将更多的是发展的催化剂而不是绊脚石。

在经济学家的思维和政治家的行动中，虽然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在对增长和发展的评估中，我们将越来越少地依赖这个不够全面的指标。它将被新的范畴和衡量指标取代。我希望，其中一个指标将是我之前提出的综合幸福度指标（the Integrated Well-Being Index）。这不仅是我们改变衡量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方式，也是促使我们用正确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知道怎样做比知道怎样衡量要重要。

* * *

第三个方位点是一种亟待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政策，它能创造性地利用现代经济相互依赖的特点。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刻板的选择：或是全球化的制度化，或是混乱程度不断增加以及协调缺失。新制度秩序的诞生将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而且将非常缓慢。这个过程注定痛苦，因为那些大国在放弃自己一部分权力时，一定会感到痛苦，这些国家习惯使用传统的“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的方法。但新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些国家的统治方式也应该有所改变，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用不平等的办法分开而后治理。新制度秩序的行程也会非常缓慢，因为它并非从上到下都已设计好，虽然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相反，它是通过一个艰难的学习过程形成的。至今还没有一个成功事例表明，制度秩序可以基于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知识提前设计完成后，再投入到实践中。相反，基于各种利益的相互作用，这样的实践尝试却屡见不鲜。在现实生活的舞台上，学术知识最多只能作为一个助推器。

重塑美国霸权地位、使之成为世界永久领袖的想法不仅是幼稚的表现，还带有几分怀旧之情和妄自尊大，最主要的是，这种想法只会浪费时间。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不仅能发号施令还能设定游戏规则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不到20年的时间，即从苏联解体到我们目前这个十年的结束（2010年）。在其著作《第二次机会》（*Second Chance*）中，美国的伟大代言人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试图说明，如果美国近三位总统没有犯那么多错误，尤其是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没有在他的两个任期中犯下那些错误，美国或许还能保持其统治地位。这也许有可能，但前提是美国必须愿意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他的权力，哪怕只分享一小部分。不幸的是，美国根本没有这种意愿，更糟糕的是，它现在仍然不大乐意这样做。布热津斯基相信，美国仍然有机会创造“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他说，这些的实现只需要美国在2008年选出一位恰当的总统，而这位总统会选择正确的价值观和正确的道路来处理国际事务。他还补充说，不会再有第三次机会。

然而，布热津斯基错了，尽管一些人对此还抱有期望。21世纪美国地位的改变将类似于17世纪的西班牙。当时的西班牙也是世界超级大国，但它不用大力发展制造业，因为它所需的一切产品都可以从国外购买，而购买所需的金银则源源不断地从其殖民地运过来，一直到某个阶段才结束。这与现在美国以及美元的境遇非常相似。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得视具体情况而定。没有了美国的领导，世界将变得更好，还是更糟？当西班牙不再主导世界时，我们照样发展得很好，因为不久，英国就崛起成为全球领

袖。这次又将发生什么呢？不久之前，美国还对国际事务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力，没有一个国家能与其相比。它本可以建立起更好的、更加有利于发展和协作的制度来管理世界。然而，它以一种过于在乎自己利益的方式来领导世界。更糟的是，它有时还缺乏远见，与其他国家合作时，更像是一个老师而不是一个合作者。长此以往，它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第二次和最后一次建立全球制度秩序的机会，还让我们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并非好事。

另一方面，这也代表着一种机会的出现，有机会总是好事。这不是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第二次机会，而是可以通过一种明智的方法安排事情的机会。世界应该形成一种基于和平共处而不是战争（不论是冷战还是热战）的新秩序，这种秩序将使世界经济运作良好、向前发展。

在恰当机构框架下运行的新制度，必须确保有相对稳定的金融基础以促进宏观经济的再生产。限制投机资本的自由运动将大大有利于发展，这一点的实现需要引进比目前更严格的调控。应该运用税收手段为投机资本降温。

美国、英国以及或许还有其他几个国家反对这种新制度，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反对，这种做法使得它们不再具备世界领袖的资格，正如它们对伊拉克的占领和自作主张地向其他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一样。

世界各国货币的种类也应予以限制，同时应创建更多的共同货币区域。这不仅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工具，也是最终形成世界统一货币的必要铺垫，而且，只有这样世界统一货币才有可能出现。

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举足轻重。世贸组织是目前最好的大型国际经济组织，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是最民主的。自由贸易制度将比其他任何工具都更能有效地使贫穷国家维持较高增长率，同时也会伤害到富裕国家的利益。这必须是真正的自由，即没有关税壁垒，也没有或揭露或隐藏汇率操纵的津贴补助。

这种能够适应世界经济和多文化文明挑战的新制度，应当由国际机构、区域性一体化群体以及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来行使一些传统特权。在这些机构能胜任之前，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必须全面民主化。这些机构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依据当时分裂的世界格局设计的制度构架，冷战结束后它只进行了非常小的调整。

在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从后社会主义转型中发展起来的新兴国家中，应对较贫

穷国家予以更多支持。中国、印度、俄罗斯，或许还有巴西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并且能发展的很好。其他国家则需要一定的援助，而不是阻挡，以使它们的声音能被听到。在这方面，强大的地区性机构能够发挥作用。

21世纪将不只属于中国，也将属于欧盟。欧盟这个划时代的构想，将结束过去2000多年里国家之间争端和杀戮超过合作的状况，这些国家将团结在欧盟旗帜下，而这个联盟本身也将接受其他国家的监督。如果欧盟这种模式能够获得成功，那么其他大陆上的国家也会纷纷效仿。

我们希望欧盟获得成功，就是希望世界成功。欧盟仍在继续进化的秩序制度，虽然目前仍有很多缺陷（尤其是其官僚机构过于臃肿、浪费公共资金），但它仍然能为其他国家提供许多借鉴。区域性的特征没有代表性，但是在跨国背景下运行的市场经济制度则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一方面，新的制度秩序必须与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和组成部分相吻合；另一方面，也必须与文化价值的发展相协调。它不能只遵循西方模式，而也应该将东方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发展目标考虑在内。从这个角度考虑，中国在新秩序模型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视。欧盟、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占世界生产总值近一半的国家和国家团体，应该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向中国咨询，甚至包括那些不会对中国有直接影响的问题。

全球化经济急需一种全新的制度体系，我们应该时刻留意，不要在通往这个体系的道路上迷失方向。联合国不能胜任建设这种制度的角色，美国对此无暇顾及，目前的趋势将把我们引向何方，我们无从知晓。是将会出现一种新的秩序，还是新的混乱？如果是秩序，那么全球化进程将会加快，全球化也会体现其人性的一面。但如果出现的是混乱，它就会拖全球化的后腿，甚至影响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新的、积极的秩序需要限制世界舞台上某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野心，以使这种新秩序有利于所有国家。而新的、混乱的秩序将限制整个世界的发展，只让少数人获利。上述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 * *

第四个方位点关注的是地区一体化与全球化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相邻国家

一体化将继续成为国家团体进程。这些国家团体采取不同形式、通过不同的关系连接。这些团体的组织结构和制度不一样。世界上已有许多类似团体：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有10个成员国[5]，以俄罗斯为首的12个后苏联共和国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6]，南美洲则有南方共同市场（Mercado Común del Sur）[7]，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8]联系着北美各国，非洲南部则有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9]，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10]有15个成员国，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11]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周边国家，海湾地区6个国家组成海湾合作理事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12]，最先进的国家联合体是欧盟[13]。这不同国家团体的106个成员国，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产出的四分之三。更多的新的国家团体正在涌现。如果中国、日本以及统一的朝鲜半岛能使用一种统一货币，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整个世界经济划分为10个区域性团体。

这里面会出现很多有趣的插曲，因为一些国家团体是相互重叠的，而另一些则一心想扩大自己的范围和影响力。我们不知道周围哪个地方会出现互补的或一体化的结构，哪个地方又将出现对手。

值得注意的一个组织是成立于2001年的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虽然目前它的结构仍然较松散，但未来几十年中它的发展将会非常迅速和明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个后苏联国家。印度、蒙古、阿富汗和伊朗是观察员国，这些国家也希望成为正式会员。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人口总数达15亿，如果算上观察员国，人口将上升到27.5亿，超过世界人口的40%。这个组织综合了独联体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核心成员国，中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上海合作组织将完全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一些政治家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超越西方的策略，的确如此，而且未来它仍会继续发挥这种作用。

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审视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之间关系的发展，区域一体化过程可视为：

——全球化的矫正

——全球化的另一种形式

——进一步全球化的助推器

第一点将全球化视为一个从实践角度看非理性的过程。区域一体化将成为全球单一秩序的避难所，因为从经济角度而言，这种单一秩序缺乏合理性。全球化不可避免，但鼓励和加速区域型结构的形成将有助于缓和全球化的影响。

第二点，即将区域一体化视为全球化的另外一种形式，则更深刻。与形成彼此独立性很强、整体调控又很弱的全球经济相反，世界将出现许多无论从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很相近的国家组织。应该阻止全球化而发展区域化，因为后者更合理。问题是：这些区域性国家群体的总和能让作为整体的世界更为理性吗？

第三点，即区域一体化进程是推动全球化向更高、更成熟阶段发展相对安全和便捷的工具。这种观点认为区域性结构是安全的，因为这些结构能解决区域经济的实际问题，又不会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同时也能避免差异性更大的世界市场上更多的利益冲突。区域结构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即可以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制度创新的实验，而不是刚开始就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欧盟可以体现这一点。如果在欧盟实施失败的措施，很可能也就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而如果能成功在欧盟实施的措施，也许就会对世界有用。更为方便的是，在向全球化更高阶段迈进时，主体不是200多个文化、经济和制度迥异的国家，而是十几个区域性国家团体。这些结构能补偿产出的不平衡，协调生产水平，缩小不同团体之间的差距。

第三种选择将区域化视为理智性的全球化的一种安全、便捷工具，这体现了偶然性理论和新实用主义的特点。它将大大减少非理性的状况，从而使全球化更加趋于合理。我们可以用“跨区域”而非“跨国界”来描述这种结构。参与决定和协调行动的实体越少，效率就会更高。这与厨子多了煮坏汤是同样的道理。

* * *

第五个方位点涉及对全球化进程作出调整的可能。随着非政府组织影响的逐渐扩大，它们会对全球化进程造成影响，尤其是在环境、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非政府组织数量庞大，这既是问题也是希望。一些组织或许一事无成，但另一些组织已经产生积极影响。某些人听到这些组织的名称就非常恼火，这本身就表明了非政府组织干预了一些某些政府、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本来并不想为人所知的事情。

在平衡发展及其对人类影响问题上，一些非政府组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如绿色和平（Greenpeace）、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两千年大赦联盟（Jubilee 2000）、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国际透明度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等。新的世界制度秩序是政治、文化和技术的相互贯通和重叠，而在其形成过程中，这些运动和组织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和两千年大赦联盟积极游说富裕国家免去最贫穷国家的债务，国际透明度组织和无国界记者组织关注世界各国的腐败问题，大赦国际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监督对政治犯的人道主义对待。所有这些努力都得益于科技、政治和文化的进步和改革。现在，我们几乎可以获知世界各地发生的每件事情——不仅仅是发生在大都市的街道上或民主国家的政府办公室里的事情，甚至是发生在车臣、达尔富尔、阿布格莱布监狱或关塔那摩监狱的事情。这些都已成为事实，因为这些事件的录像总能被放到因特网上。非政府组织在此发挥着积极作用，它们能把世界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些事件上。

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不仅在于游说和施加压力，还包括一些非常可贵的行动，政府和营利性机构往往对这些行动不感兴趣或不擅长。毫无疑问，21世纪非政府组织将面临更多挑战，主要是在教育和文化领域，但也会涉及环境保护、社会福利和医疗，尤其是预防性医疗等方面。独立的经济学专家将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会忙于对有新兴市场或发展程度稍低市场的国家提出如何培育企业的建议，这些专家往往比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组织中来的专家或被某些国家政府高薪聘用的专家做得更好，因为后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面对众多问题时，非政府组织必须拒绝承担本属于政府和市场的责任。不论是在地区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非政府组织都不应该做本应政府机构做的事，都不应该向公众承担本应政府机构承担的责任。非政府组织也不应该允许企业把本应该由企业税收支持的项目揽到自己身上，例如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援助。非政府组织不应该为企业收拾摊子，尤其是在环境保护方面。

非政府组织不是商业机构，也不是政府或政府间实体的代理人。它应与这些实体一起，成为现代经济的第三个支柱。这就是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应发挥的作用。

随着全球市场经济的进步和世界民主的逐渐发展，人类将开始在世界范围建立起一个文明的社会。未来几个世纪中，人类面临的最伟大任务是协调这些大趋势。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应该可以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

* * *

对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的激烈争夺和对自然环境状态的激烈争辩成为第六个方位点的主要特征。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和对环境的保护相互交织，公众的环境意识逐渐增强。于是，就出现了像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14]这样的大型评估项目。种种有关增长的极限以及自然对世界经济中耗能巨大产业的容纳程度的疑问不断涌现[15]。同样，关于环境污染限度的问题也不断出现。从这些角度看，世界的现状不容乐观。不久前地球所供养的是二三十亿人口，而现在要向60亿人提供生活必需材料，不久的将来则是90亿人，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处理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垃圾也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这种背景下，21世纪以及未来几个世纪的世界将会呈现出非常复杂而多样的特点。有时，世界关注的焦点将会落在减少对原材料的使用上，而有时则会落在新技术以及材料工业的进步上。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从以前不能接近的区域获得能源，将某些“存在”的价值转移为“拥有”的价值。妥协与谈判将成为某些时期的主题，而另一些时期则又充满冲突与争夺。这种种情况的连续转变将弱化甚至消除某些障碍，但不可能消除所有障碍。在某些领域，事情会变得更糟。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就如过去一样，改变将是多方向的。半世纪之前，一方面天然材料的供给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化学工业的飞速发展以及服装零售业的刺激，人造材料取代天然材料成为新宠。妇女们跑去买尼龙长袜，男士们自豪地展示自己的免烫衬衣。人们以穿人造纤维外套、瑙加海德革夹克和聚酯纤维西装为时尚，而今天这样的穿着则会被人嗤之以鼻。农业技术的进步和服装零售商们的鼓动使得大部分人又开始回归天然原料。因此，今天的人们追捧丝绸、亚麻、棉绒以及从山羊绒到雪兰毛再到马海毛等各种毛绒，这些材料制成的各种服装也频繁地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广告中。

穿着入时的人会越来越多，而高档商品也会越来越多。不久前，在现在一些已经非常发达的地区，人们还赤着脚，穿着褴褛的衣衫。而今天，在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仍有数百万或近十亿的人没有一件可以换洗的衣服。这些人才应该抱怨自己

没什么可穿的。然而，我们却更常在发达国家听到类似的抱怨，一些人衣柜里的衣服已经多得塞不下，甚至自己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仍然在抱怨。可以确定，我们的重孙将会继续这种抱怨，而他们22世纪的重孙也会有类似抱怨。

面对世界原材料的不断减少甚至枯竭，我们不得不做出调整。与此相比，由时尚的风向和新物件的出现带来的改变显得无足轻重。我们知道这些原材料存在，也知道它们数量有限，但不知道它们到底还剩多少。

世界上各种冲突从未间断过，尤其是小型的、区域性的冲突。中东地区的危机和冲突、非洲产油国的冲突，虽然表面看都与其他问题相关，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冲突与争端都与石油相关。因为石油总有一天会被耗尽。而一些传统领域的冲突，则会面临新问题的加入，例如对北极的探索。能源资源，尤其是石油，不论多么关键都只是世界经济供给中的一个因素。其他不可再生资源也面临着逐渐消耗直至枯竭的局面。

石油问题将是21世纪能源和资源领域的首要问题。我们一方面希望石油的供应量更大，而其储量也远比媒体中危言耸听的报道要丰富；另一方面，我们还能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他替代性能源。引用大部分报道中的数据，目前世界日均石油消耗量为8000万桶，如果按这样的消耗速度，那么到2040年世界石油资源将枯竭。英国石油公司最近的预测是石油资源只够再用40年。至于天然气，还可以再用60年。事情将这样发展下去吗？如果不是，又为什么？哪些是真相，哪些是无知？哪些是错误，而哪些又是谎言呢？

事情往往比第一眼看到的复杂。我们面对的是对民意的故意操纵，包括将一些普通的错误观点包装成专家的分析。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恐吓政治家和广大民众，使得石油、天然气和电力价格的上涨变得顺理成章，不至于抱怨重重。有些人把任何事情都归咎于中国，说因为它的购买增多导致原材料的需求增大，价格上涨。当然，任何稍有头脑的人都会发现，中国人并不是罪魁祸首，他们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付出了惨重代价。

这样的博弈将会继续。能源产业的大型跨国公司将继续向政客们行贿，而政客们则将继续试图控制这些公司。跨国公司和政客们一起又通过对其言听计从的媒体恐吓消费者。他们所需做的，就是发布一些伪专家的分析或政治声明，记者则会快速且顺从地完成后续工作。记者们所说的正是那些政客和跨国公司所期望的。

政治家们总追求公正的判决，但他们会发现自己也常处于被审判的地位。有时他们犯了错，就会面临惩罚。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层面，与国家安全和金融市场一样，能源政策的制定暗藏各种危险。有的政治家在这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也付出巨大代价，这样的情形将会继续。

能源领域的一家著名咨询公司曾预测，2005年将是能源开采最多的一年。所有迹象表明，这只是一种无稽之谈。然而，仍然有人乐于接受这样的胡言乱语，因为类似的“预测”能影响市场，抬高油价。在另一个极端，你可以听到有些专家声称，石油开采的高峰永远不会到来，因此，即使我们不能永远继续增加产量增大消耗，我们至少能使其维持在目前水平。同样，这些也只是谎言。

我们所了解的一切都表明，“石油峰值”（peak oil，即全球原油产能将在某段时期达到顶峰，之后就因为产能耗尽而下降）将在本世纪出现。至于峰值究竟何时出现，传统的专家对此意见不一。他们认为，峰值最有可能在2020年至2040年间出现，而这个时间已近在眼前。常被认为独立于政府的美国审计总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在一系列专家预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份权威报告。报告认为，石油峰值将可能在从现在到2040年间的任何一年出现[16]。

峰值时间点难以确定，是因为很难判断现有数据的可信度。石油领域的专家警告说，石油开采商和分销商出于私人利益考虑，很可能会歪曲现有和未来石油储量。此外，还有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而人类石油地质学领域的知识储备也远不够完善。出人意料的是，不断有在加纳和巴西发现新油田的消息出现。还有很多未知的事情。而政治动乱使得一些地区局势变得更为复杂，伊拉克、尼日尔三角洲、苏丹以及周边地区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不久的将来，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其他地区。

我们很清楚，石油产量何时下降取决于很多条件的同时出现。我们也知道，这些条件既包括石油储备和开采收益率等客观和政治条件的综合，也包括不依赖于石油及其副产品的技术转化的速度和能源保护方面的技术进步。我们不应该天真地认为，在能源领域取得的进步已经足够。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世界上最富裕的七国单位收入的石油消耗水平下降了55%，整个世界范围内收入水平却上升非常快，以至于我们必须把单位收入的能源消耗降低1/10才能解决能源危机问题，但这不可能实现。

地球灾难性变暖的幽灵正困扰着世界，这或许是唯一能促使人类进行政治反思并积极寻找人类所需能源替代品的事情了。正因为如此，富裕的美国从仍然贫穷的巴

西身上学到可以大规模利用生物燃料。这种方法的前景似乎很乐观，因为生物燃料，包括玉米、甘蔗和油菜籽等都是可再生的。于是，曾帮助废除奴隶制的波兰甜菜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了。然而，对这些作物需求的飞涨导致以这些作物为原料的食品价格也一路攀升。于是，事情又一次变得违背初衷，未来食品的价格甚至可能超过燃料价格。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出现，这也正是事情发生的方式：很多事情同时发生。

与石油资源相比，稍为逊色的是生态友好的特殊能源，如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这些能源的储量也堪称最大。就这些能源的本质而言，这些表面看来相对廉价的能源并未出现在对其需求最大的地方。山间河流、潮汐以及劲风很少出现在大城市或工业中心的周围。万里无云的蓝天和强烈的阳光是地中海、加勒比海或孟加拉湾的特色，而这些地方对热能的需求与波罗的海、哈得孙湾以及日本海周围的需求相比则非常有限。为了使这些地区的能源能得到广泛应用，其价格必须非常低廉以抵消其运输成本。对风能的应用证明人类对能源的利用可能会取得巨大进步。1千瓦时的风能电从1970年的2美元下降到目前的0.05至0.08美元，而煤电的成本约为0.02至0.04美元。不久，风能电将会广泛应用，只要风不停止。

加利福尼亚州对风能的利用应该会在中欧低地区域之前。在中欧低地以及其他地方，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充分利用核能。这是唯一一种可以在世界各地大规模使用的能源，因为其燃料储备还足够用几个世纪。而且，核能很安全。长期以来，核能不仅便宜而且干净，它比从煤或石油燃烧中得到的非清洁能源更安全。

核能唯一的不足之处是人类对其非理性的恐惧。这是技术、文化及政治之间极不协调的最好例证。克服这个问题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人类准备好利用核能了吗？当然没有！这个能源领域的超级问题需要多方面通过长期复杂、代价高昂并且艰难的努力才能得以解决。也许在事后当人类回头反思时，会奇怪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大惊小怪。

事后又是什么时候呢？会在人类还没准备好应对的石油峰值危机之前出现吗，还是在此之后？石油峰值危机意味着因为能源结构性短缺而造成大幅衰退。这不仅会导致人类生活水平剧烈倒退，甚至会出现战争，因为它所引起的不是简单的威胁或小冲突。理性的预测将防止这一切出现。

如果我们希望在马脱缰之前关上马厩的门，那么就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包括从科技进步到公共教育等，来抵制保守的政治家并战胜特殊利益群体及其媒体

喉舌。我们必须从现在，从我们这代人开始采取行动。石油峰值不会在2040年之前出现，甚至不会在2070年前出现，但是，留给我们采取行动来遏制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间越来越少。

根据对世界经济、社会和产业调整能力的最乐观估计，世界至少需要用20年的时间来进行调整，以适应未来石油枯竭的发生。而我认为需要的时间或许要更长，比较现实的估计是40年。那么，早在40年前就有人警告说，我们的经济增长将出现能源极限，但现在这种极限并未出现，这又将如何解释？这些警告并没有错，只是时间点错了。而这次，我们的预测不会错，因为头40年已经过去了，而未来40年也会很快过去，地球能源的储量一直在消耗。更重要的是，到这80年结束的时候，地球上的人口将是原来的3倍。到21世纪中期，即使算上撒哈拉地区、北极和南极，已探明的能源储量也不会有大幅增加。

有时，一些分析和预测是基于简单或过于简单的模型推断而得出来的，这是错误的。美国能源信息协会（American Energy Information Association）在其年报中预测，如果继续目前的政策，到2030年人类的能源消耗将上升57%。如果石油价格仍与现在不相上下，那么煤将再一次成为使用最广泛的能源，那时，对地球变暖和大气污染状况的警告将会是一纸空文。

为了改变现阶段人类对环境和能源消耗的态度，我们需要适当的经济机制。尽管不应该忽视思想意识和社会途径对这些问题的作用，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正面干涉。

关于政府、公共部门、资本和私人部门作用的话题再一次出现，并以新的形式相互交织在一起。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应该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合作，如果没有商业的参与，将很难取得什么成就。清洁的环境以及对不可再生能源理性的而不是掠夺式的经营必须更有利可图，并且这种情况将更为常见。鉴于生态意识的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的竞争将产生积极效应。波音公司的最新机型波音787，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梦想客机”（Dreamliner），其市场推广时的重点不在于它是速度最快或最舒适的客机，而是最环保的客机，这样的广告宣传更吸引客户。这才是事情的关键。我们怎样做才能使事情有利可图？这又是出于对谁的利益考虑？是出于对每个人的利益考虑吗？

在发展及战胜贫困等方面，新自由主义虽然承诺的很多，做到的却很少。部分

原因是出于对规则的恐惧，部分则出于对高利润的期望，新自由主义往往做出很多承诺。在这里利润起着关键作用。为了让事情在现实社会中可行，必须由上而下，即通过形成制度和符合市场规则的政策使私人资本以环境友好的方式运行；同时也应该采取由下而上的方式，如充分利用人们对利润的追求。英国曾出台了一项措施，要求企业从位于他们工厂下游的河流中取水。这项措施很快促使企业在排出废水之前先进行净化，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取到的水就会是被冲淡了的自己的污水。像禁止在城市中心鸣笛这样简单的措施，就能使我们换得很多清静。当然，这些措施只能在制度和文化比较强势的地方实行，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才尊重规则。有些地方人们随意将垃圾扔到车窗外，而开车时他们的手也很少离开车喇叭。

除了对排放二氧化碳或其他温室气体征税之外，很难有其他方法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这项措施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因为排放税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实施才有效。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提供的数据，如果从2020年至2030年后开始对每吨二氧化碳征收20至50美元税款，那么在本世纪末，二氧化碳的排放将维持在550ppm（每百万分子数的含量），这是一个安全的排放水平。

如果对美国这个世界最大排放国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收50美元的税，将会使石油价格上升15%，电力价格上升35%。与其他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相比，这个涨幅不算大，而且最主要的是这样做有好处。欧洲取得的效果会更大，也会更加明显，但是，单凭欧洲不可能拯救整个地球。甚至把美国拉入这项减排运动中也还不够，应该把未来的排放大国中国和印度也拉进来。只有这些大国一起行动，才能使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计，如果将二氧化碳的排放维持在550ppm的水平，每年地球温度上升的速度将减慢0.1%。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20世纪就已经运用二氧化碳税这项工具，那么地球表面温度值就会上升其实际上升值的89.5%，即上升0.66℃，而不是现在的0.74℃。长此以往，这种改变将会彻底影响地球和人类的命运。

对于全球变暖问题，那些可信赖的诚实的专家还未能达成共识。如果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专家说地球表面温度上升“很可能”是人类活动所致，那么会立刻有人站出来说，他们并没有说“一定是”。或许这只是气候反常，或许如其他

专家所说这只是暂时性变暖，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而人类活动只是恰巧增进了这一过程，地球表面温度会自己上升，也会自己下降。

也许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毕竟，我们现在正处在始于13世纪中期的“小冰期”（“little ice age”）之后的漫长的“次温暖期”（“minor warming period”）。“小冰期”大约于1780年结束，那是人类最后一次能在冰上从楚科其东海岸走到阿拉斯加西海岸（这座亚洲和美洲之间的陆地桥在三四万年前就存在了）。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处于次温暖期。这段时期将持续到2300年左右，甚至持续到24世纪下半期。此后，地球又将开始变冷，尽管那时可能比现在暖和，因为其变冷时的基点温度比较高。在第四个千年，人类又将进入另一个次温暖时期。从现在算起一千年以后，人们或许还会讨论类似于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

即使不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地球气候变暖及其一系列可怕的后果，得出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使地球温度下降的结论也没有错。为人类带来公共福利是我们在21世纪甚至未来最具有意义的使命，同时也是最困难的任务。这是一个独特的全球问题。

从现实看，人类造成气候变暖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影响。因为气候变暖的种种效应使得人类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至于将会变得多难，我们还无法知晓。而且，问题还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除了全球变暖之外，世界各地还经常遭受热浪袭击。自1880年以来，热浪袭击的频率已经翻了一番。每年夏天，遭受热浪来袭的地区越来越多。2007年夏天，中欧的极端热浪造成约1000人死亡。

各国对热浪的界定不尽相同。例如，在美国，气温连续3天超过90°F（32.2℃）就可以称为热浪天气。其他国家则根据自己的典型天气或平均天气状况来定义，但谁又来判定什么样的天气是典型天气呢？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对热浪的定义是，连续5天气温高于当地正常的最高气温。

一些被人们认为不可能的地区也开始遭遇热浪袭击。有一次我在5月份到莫斯科，正常情况下，这应该是莫斯科最为宜人的季节，而那里却遭遇热浪袭击，气温维持在36.7℃，即人体的正常温度，但对于莫斯科而言这实在是太热了。热浪成为世界各地媒体的头条，但这样高的温度却是吉布提的正常气温。不久后，我到了吉布提，那里的气温达到47℃，虽然这并不是新闻，但我在那里时每天要喝5升水。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2004年至2014年的10年间，世界平均气温将上升0.3℃。这是非常具体的指标，而且相对于10年的时间而言，上升的幅度也很

大。与此相应，它还预言本世纪末世界平均气温将上升1.8－4℃。这些数据对2100年的世界将造成特殊影响，也将影响到现在各国的政策。如果世界平均气温只上升1.8℃，那么所影响的只是人类的生活，不至于关乎生死；而如果平均气温比1998年的平均值14.5℃上升4℃，即到了18.5℃，那么将有很多地方不再适于人类生存。

一些地方将会越来越频繁地遭遇热浪和干旱袭击，而另一些地方将会遭遇破坏性的暴雨和洪灾。地球上不是太热就是太干。或者这一切都将不再存在，因为海平面已经上升。如果这种情况真的会发生，那么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并且施行一系列不受选民们欢迎的措施。但是政治家不会选择让选民不高兴的政策。他们宁愿把事情的解决推给下一代也不愿失去下一次选举。这正是民主的不幸：因为总是有下一次选举。

为了把二氧化碳的排放维持在一个安全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实施排放税是值得我们去努力的。如果没有实施排放税，地球表面气温在三代人之后将上升1.8℃。实施碳排放税，如果按使地球表面每年气温上升的速度降低0.1%计算，将使上升的气温减为1.5℃，这样的气温人类或许还能忍受。然而，如果气温上升4℃的话，将其降为上升3℃也将不足以挽救我们。我们应该更迅速地开始采取更为长远和激进的手段，并为之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为改善人类自然生存环境的奋斗过程中，各国之间必须达成前所未有的共识，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努力。同时还应与私人资本合作，虽然私人资本更关心的往往是自己的股东而不是权益相关者。我们目前面临的困难是，必须让这一切现在就发生，并且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

如果说私人资本对自己所带来的副作用，尤其是那些消极作用毫不介意，也未免有失公平。但如果相信私人资本会主动采取行动来保护环境，则未免过于天真。这就如同把羊群交给狼来看守。然而，你可以驯化一匹狼，并逐渐使其转变成为令人放心的牧羊犬。同样我们也可以使私人资本发生类似的改变，而且实现的速度也会更快。在未来，只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在恰当的制度和文化条件下就可以利用私人资本为人类带来共同福利。正如波兰谚语所说，狼会心满意足，羊群也会安然无恙。

在环境与自然上的投入与在武器与战争上的投入有相似之处。因为政府用于战争和军火的经费与用于环境保护的经费所产生的效果差不多。短期而言，投资10亿元生产空气净化器，与花同样的价钱制造新型战斗机效果没什么区别。在美国，投

资10亿美元进行工业废弃物再利用拉动的一系列国内经济需求，与花10亿美元建造一艘航母带来的经济效应别无二致。俄罗斯花10亿卢布清理其位于欧洲的工业区内受污染河流，所带来的产出、就业机会和预算回报，等同于其投入相同数目资金在军用雷达跟踪系统上带来的经济效应。

就长期而言，上述类型的投资除了通过创造额外需求对刺激生产和增长就业产生即时效应外，也会带来结构上的积极效应，包括科技进步及它所带来的益处。当然，这种生产转型是需要巨大的政治决心的。在过去十余年间，后社会主义国家将其武器生产部门转为民用产品生产部门，充分展示了在这一领域可以取得的成就。这样的转换首先需要价值体系的转变以及世界和平的保证。

如果美国将侵略伊拉克的精力投入到降低温室效应上，那么我们都会感到更安全。如果其他国家都能把用于武器制造和维持军队的资源用来购买保护环境的设备，聘请有资质的环保专家，那么这些国家的环境保护就会卓有成效。不论从客观现实还是数字形势来看，气候也将会变得更有利于人类发展。

对于私人资本而言，通过生产为大众所赞扬的产品获得利润（例如波音787），应该比通过生产军火得到的遮遮掩掩的利益更愉快。波音公司通过生产“梦想客机”，或提供其他生态友好产品和服务所获得的利润，与其竞争者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 Gorp）通过制造B－2战略轰炸机，或者提供将年轻人送到战场上的其他服务相比，获利应该相差无几。

然而，这些转变都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一场革命，一场税收革命。且不说要对通过环境友好方式生产取得的收入减免税收，到下个世纪，企业或家庭因收入（或财产）而缴纳的税收应该更少，因消耗资源、污染环境而缴纳的税会越来越多。

所有国家和区域性团体将向这个地球公共财库“纳税”。地球财库是一个全球性的生态预算基金，每个国家都期望从中获得收益，但都不想向其中投入资金。我们将用一个准确的方法来判断，在某个进程中谁起到破坏性的作用，而这将成为对其征税的基础。这些政策同公众意识的改变一道，将给生产手段和消费模式带来全新改变，从而使人类与地球母亲之间的关系转向人们所期望的方向。

最近，人们越来越迅速地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这不仅是因为一些对人类所面临巨大威胁有清醒认识的群体积极发起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科幻小说、电视节目，以及恐怖和灾难影片也起了一定作用，有时这些作品比冷冰冰的科学论证更能促使

政治家采取行动。人们对让自己感到恐惧的书籍和电影产生反应，而政治家又对选民的恐惧产生反应。显然，有时非理性的预感比理性的辩论更能发挥作用。在过去的四年中，认为环境问题“非常值得关注”的美国人从28%上升到41%。有趣的是，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几乎一半的共和党登记选民认为环境没什么问题，而只有9%的民主党选民这么认为。可见，人们的阅读和观察习惯是有区别的。民主党人将从2009年至2017年间领导美国，这的确是好事，如果幸运的话，他们领导的时间会更长。

然而，无论是各国更有效的政策、各国间更好的协作、文化的改变，还是更完善的经济和金融机制以及更有效的管理，都不会为人类带来更多的能源和原材料，使得我们可以像现在的北美和西欧一样消耗资源，像这样的消耗无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或以后的任何时刻，都不可能实现。因为只有再加两个地球，才能提供这么多资源。从长期来看，我们可以想象能源保护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以及包括纳米技术、材料工程和生物科技等方面的新技术革命，这些将相当于使我们获得了又一个地球的资源。人类的智慧并非永无止境，但我们也远没有到达它的边界，尚待开发的区域还有很多。

* * *

第七个方位点是人口。根据联合国最新人口统计预测，在即将到来的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3亿。到那时，我们中的一些人还会在世，但也已经属于少数。那时的人口将是1000年前的30倍，但这并非世界末日。我1周岁时，世界人口为25亿；当我写完这本书时，世界人口将为65亿；而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人口将会比现在多近30亿。世界对于没有我会比我没有了这个世界适应得更快。

这些数据有许多含义。人口统计学的多方向变化将是未来的一个大问题。除了人口总量一直上升之外，人口图景还有如下特征：

——人口自然增长的巨大差异

——一些地区人口过剩

——人口老龄化

——大迁移

每年约有8000万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相当于德国、土耳其或埃及的人口之和。世界各地人口增长率各不相同。亚撒哈拉地区、东亚和南亚地区人口增长最为迅速。拉丁美洲的人口增长则相对缓慢，最缓慢的是欧洲和北美。目前，8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不发达地区，这个比例到本世纪中期将达到90%。

改变是巨大的。1900年，欧洲人口是非洲的3倍（分别是4.08亿和1.33亿），到2050年，这个比例将颠倒过来，非洲人口将为17.66亿，而欧洲人口将为6.28亿。再过100年，非洲人口和欧洲人口的比例将为5:1（分别是23.08亿和5.17亿），虽然那时从非洲向欧洲迁移的人口将远远超过从欧洲向非洲迁移的人口。欧洲大陆和北美洲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将从1950年的28.5%（其中欧洲为21.7%，北美为6.8%）降为2150年的9.4%（欧洲5.3%，美洲4.1%）。

跟据联合国的预测，世界人口在2013年将会达到70亿。然后，达到80亿要再过14年。大约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更准确的年代取决于怎样预测，一些人认为到2046年，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是2054年，但这区别并不大。此后，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21世纪下半叶到22世纪，地球人口的增长速度将是现在的1/10，出现停滞状态，全球每年的人口增长只有600－700万。根据这些预测，再增加10亿人口需要150年的时间。到2200年，人口将为100亿左右，接着人口数目将保持不变。15年前，联合国预测2200年后人口将保持在116亿，那时会发生一些重大事情。在那个时间点前后，同时会有很多事情发生，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人类整体人口增长率正在下降。这是一个好消息。虽然地球上人口越来越多，但是人口增长速度变得越来越缓慢。世界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已从1996年的2.2%下降到2005年的1.2%。这是好事，因为如果按每年2.2%的速度增长，每32年人口就会翻倍。但它同时也是非常糟糕的消息，因为人口即使按照每年1.2%的速度增长，每58年世界人口也会翻倍。地球无法承担这么多的人口。因此，我们必须使人口增长率继续降低。此外，各地区人口增率下降的幅度也应该有显著差别。这是人类在21世纪以及未来几个世纪面临的空前挑战。

1989年，世界人口增长的趋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之前，每年人口绝对增长数（absolute annual population growth）始终是增加的（一直增加到8770万），此后，增长幅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到2007年，增长总数为7730万。美国人口局

预测，人口的绝对增长将一直持续到2015年，每年增长幅度在7600万至7800万之间。此后，人口绝对增长将会出现系统性的下降，到本世纪中期，增长额度将降至每年4600万。

如果说某个地区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看都有利于人口增长幅度的大幅下降，并导致人口的平均增长水平下降，那么我们应该感到振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一些地区，人口增长异常迅猛，而另一些地区则出现绝对人口下降。出现这种大相径庭的趋势，是因为一些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出生率、婴儿死亡率和人均寿命等。这些人口统计学进程反过来会影响未来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对改变的预期。所有这些过程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而且，移民因素也必须考虑在内，因为未来这种趋势仍将继续。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大多数新生儿都出生在最不发达国家，他们在这些地方很难被喂饱、居住好和接受教育。这的确是个坏消息，这正是由社会和文化条件所导致，其经济影响更是可悲。发展程度低意味着收入低、食品短缺和基础医疗缺失。一些孩子出生不久就去世，另一些则活不到5岁。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也生活得非常凄惨。

世界上人口出生率最高的4个国家，即阿富汗、索马里、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同时也位于世界上最贫穷的10个国家之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人均年收入不到800美元。索马里和其他三个最贫穷国家马里、尼日尔和安哥拉，同时也属于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最高的10个国家之列。安哥拉和塞拉里昂的婴儿死亡率最高，分别是184.4‰和158.3‰。在马里和尼日尔，每位妇女平均生育7.4个孩子，这个数据在阿富汗是6.6，在也门是6.5。这些国家平均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个孩子死去。根据联合国对2005年至2010年间的人口情况预测，世界上人口出生率最高的10个国家中的5个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分别是：布隆迪（3.9%）、阿富汗（3.85%）、尼日尔（3.49%）、刚果（3.22%）和马里（3.02%）。最近，最高人口增长率出现在利比里亚，达到破纪录的4.5%。人口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西撒哈拉地区、东帝汶、厄立特里亚和巴勒斯坦。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国家中很多也是地区武装冲突最为频繁的国家。

当你在这些国家旅行时，将感受到其主流的社会风尚，并亲眼看到由于贫穷而导致的人口过分增长，人口增长又反过来使人们生活状况恶化，从而激发武装冲

突，种族间的冲突又使武装冲突加剧。这样的恶性循环如果不能打破，这些地区将无法摆脱结构性停滞，也不可能踏上发展之路。不久之前，中国还非常贫困。如果它不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平均每位妇女生育1.75个孩子，其人口增长率为0.58%），那么今天中国将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悲惨之地，而不是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

另一种极端的情况是一些国家平均每名妇女只生育一个孩子或再多一点。最为极端的是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出生率分别为1.12%，1.07%和0.98%，这些相对而言还没有带来世界性的影响。人口出生率较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包括日本（1.23%）、乌克兰（1.24%）、俄罗斯（1.39%）和德国（1.40%）。在世界上222个国家和地区中，有96个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低于2.1%的人口替换率。

巧合的是，美国的人口出生率刚好接近这个临界点，为2.09%，排名126位。波兰排名206位，属于出生率较低国家，为1.26%，低于意大利、西班牙、韩国和立陶宛，高于斯洛文尼亚、摩尔多瓦、乌克兰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令人惊讶的是，在人口增长率为负的20个国家中，16个是欧洲后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另外4个是人口增长率一直下降的德国和日本，以及统计学上比较边缘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圭亚那。因此，虽然世界人口始终在增长，但实际情况是一些国家的人口越来越多（太多），而另一些国家的人口越来越少（很少）。显然，这种人口统计学上的不平衡状况只会加重已经非常强劲的移民浪潮。

据预测，到2050年，世界上人口出生率低于人口替换率的国家将更多。目前，欧盟的27个成员国已经属于这种情况。1957年，欧盟刚刚成立时，所有成员国的人口出生率都高于2.1%。而现在，这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处于爱尔兰的1.86%和立陶宛的2.12%之间。在这样的背景下，预计欧盟人口将从现在的7.3亿继续下降，至于降到什么程度还没有定论。

一些人预测欧盟人口只会下降1%，即约700万；而另一些人，甚至包括联合国的专家，则认为将下降10%，即超过7000万人。按这样计算，欧洲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将不再是目前的11%，而是7%，因为除了北美的人口增长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外，其他几大洲的人口增长将非常迅速。即使这样，北美的人口也将在目前3.02亿（不包括1000万的非法移民）的基础上增加1亿。

无论何时，人口的统计学预测与对经济的预测相比，会遭致更多的怀疑和保

留。每种预测都基于假设。时间跨度越长，不确定性就越强，而人口的统计学预测本质上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间会发生各种现在无法预料甚至无法想象的事情。经验告诉我们，预测是一项风险很高的工作。鉴于不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难以确定性，以及净移民数量的不可知性，人口统计学预测的基础因此变动性更强。

当我们看到有预测说，俄罗斯人口将从目前的近1.42亿下降到2050年的1.04亿时，我们首先关注的应该是这是否可能，或者我们看到的是否是被歪曲的数据。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是否是故意为之。俄罗斯经历过一个严峻的人口统计学危机，这个危机部分原因是其尝试根据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体制转型而失败的副作用，还有部分原因是环境污染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其正处于危机时的状况来推断它未来几十年的人口趋势，这显然是错误的。

俄罗斯合理的发展进程意味着在未来两代人的时间里，其人口将增长而不是下降。目前，向俄罗斯移居的人口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也表明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尽管西方国家一直宣扬的是另一幅场景：一个仍然没有良好运转的市场经济、没有完全民主、拥有大量人口的国家。在2001年至2003年间，约有5万人从以色列移民回到俄罗斯，这种回迁的情况将一直持续。当然，移民并非化解人口统计学危机的良方，但是它可触及的发展以及对未来的乐观情绪则是最佳解药。许多事情都是彼此关联的。

俄罗斯是否能重复其在19世纪的辉煌，我们无从知晓，但它有这样的迹象。在从1860年至19世纪真正结束（即1914年）这两代人的时间里，俄罗斯一跃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2007年，俄罗斯的总产值超过意大利；2008年，超过法国。而2009年，它的总产值将超过英国。俄罗斯将又一次可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只不过这次不同的是，除了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三大经济体之外，位居前列的不是法国和英国，而是中国和日本。

一些国家的人口统计数字在不断上升，而另一些国家则在下降。据预测，苏丹的人口将从现在的3940万上升为2050年的7300万，而波兰人口在2050年将从现在的3850万下降到3030万（相当于1962年的水平）。因此，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人口比例将从1:1变成5:2。巴基斯坦的人口将从目前的1.647亿上升到2050年的2.922亿，而日本人口将从现在的1.27亿下降至1.025亿，因此，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比例将从13:10翻倍到28:10。目前，澳大利亚人口为2040万，两代人之后这个数据将变成2800万。而在印

度洋的另一边，贫穷的莫桑比克目前的人口和富裕的澳大利亚不相上下，但到2050年，它将拥有3910万人口，两国之间的人口比例将从1:1变成7:5。

与人一样，世界各地人口也面临着老化，不同的是，人口不会像人一样逝去。人口的老龄化会对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和金融等领域产生影响。因此，所有的预测都有可能失效。到了本世纪中期，很可能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许多人将是现在生活在东非的人们的第一或第二代子孙，或者上百万的日本人有着巴基斯坦血统，而波兰街头上人们的肤色也将更为多样。

富裕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最为迅速。例如，到2030年，约30%的德国人将超过65岁。30年后，美国超过85岁的人口将和5岁以下的人口一样多。这个过程不仅可以从统计数据上看出来，也能在佛罗里达的海滩上体现出来：在那不勒斯享受日光浴的“女孩”们的平均年龄将会是70岁。发展迅速的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将更加突出，因为人均寿命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成果之一。

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人口平均年龄从23.5岁上升到了26.5岁。据预测，到21世纪中叶，这个数据将上升至37.8岁，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比重也将从10%上升为22%。在高度发达国家中，有1/5人口年龄超过了60岁。到2050年，这些国家超过60岁的人口将达到1/3。从世界整体水平看，2050年的人均寿命将从现在的66岁增长至76岁。

然而，平均值往往使某些事实变得模糊或过于简单化。某个平均值可以对应完全不同的情况和过程，对于平均寿命更应谨慎对待。儿童的死亡率会使人均寿命显著下降。在非洲某个农村，一个孩子有可能4岁就离世，他母亲的寿命则可能会长于世界人均寿命的66岁，他俩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这就是贫穷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国家，令人震惊的人均寿命统计数据的来源。在一些母亲和孩子的寿命都超过35岁的国家中，这样的平均寿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情况。在那些受艾滋病困扰的国家中，如斯威士兰，其人均寿命为32.2岁；或赞比亚，其人均寿命为38.4岁。

你在这些国家旅行时会看到什么样的情形呢？儿童和年轻人数量很多，很少有老年人，但是正值壮年的人也很少，而正是这部分人口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以及与此相应的生活水平。由于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很少，而需要养活的尚不能工作或已经不能工作的人口还很多，人民生活水平将注定下降。矛盾的是，这又正是这些地方的人们养育很多孩子的原因，尽管养育孩子需要花费很多，但是这些孩子

很小就可以充当廉价劳动力。而且，如果父母能活到66岁，总还有一两个孩子可以照顾他们。

这样的社会结构就像沙漏一样，顶部和基部宽而中间窄。为了战胜贫困，这些国家应该采取缩小基部、扩大中部的社会政策。而防治艾滋病的运动同样非常关键，因为这种疾病严重摧毁了社会中具备工作能力的人口。未来这一切都应该改变，否则，地球上某些地方将会出现这种情况，即有很多人口出生，很多人口死亡，可以工作的人口却很少。

欧洲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将发生巨大变化。据预测，处于大学学龄的人口数量将显著下降。在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数则是暴跌。到2045年左右，意大利处于20至24岁之间的人口数量将下降40%，西班牙则会下降近50%。在法国，这个年龄段人口也将下降8%左右。面对这种趋势，我们能做什么呢？该做出怎样的反应呢？又该到哪里去征兵入伍呢？也许潜在的炮灰越少，无情的破坏性战争也就会越少吧。但是，我们应该担忧中期的人力资源问题以及长期的人口更替问题。大学不能关闭，而从中国和印度引进学生并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毕竟，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也是最有可能结婚、建立家庭的人口。现在出生的孩子并不多，但至少还有一部分。而当不再有父母时，又哪来孩子呢？

虽然影响出生率很难，但我们应该采取恰当的人口政策。就其本质而言，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因此需要使用特殊的政策工具。然而，我们通过使用特殊的预算分配、家庭津贴、免费的儿童看护、义务教育和税收减免等文化和社会政策成功改变了社会年龄结构，它的社会效应只有在很长时间后才会显现。

移民可以作为一种缓解紧张形势的出路，尤其对劳动力市场而言，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将对经济运行和增长产生消极影响。当然，移民并不是让老年人迁移出去，而是把年轻人迁移进来。因此，人口的种族和文化构成也会发生改变，但这是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另外一个问题。类似的变化将会越来越多。

历史在这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教训。移民流向的改变并非像文学作品中描述的那样巨大，也并不总是单方向地流向美国。令人惊讶的是，从1899年至1925年这近1/4个世纪间，约有1/3的波兰移民从美国回到波兰。缺乏适应能力是他们回国的决定因素，毕竟，要融入美国充满竞争的工业文化并非易事。

最近，在另一种背景下，回到波兰的人数超过了1996年至1997年间离开波兰的

人数。最近几年，波兰的年均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在6%左右。这些人回到波兰是因为他们对波兰的未来有着乐观的期望，而这正是决定因素。人们选择移民目的地时，考虑得更多的不是那个地方目前的形势，而是未来的远景和期望怎样。这些未来的期望某种程度上是现在形势作用的结果，它们也是人类站在两个不同地点设想未来的派生结果。

21世纪将成为大迁移的世纪。目前，已有约2亿人永久地生活在自己的出生国之外，而这个数目还将大幅上升。在一些地方，移民已经成为居民的主要构成部分，尽管他们没有公民身份，也无法享受一些基本权利。阿拉伯国家正面临着这种情况，它们通过开采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剥削大量涌入的廉价劳动力来巩固其公民的富裕程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这些国家在不到900万的人口中，近一半是移民，他们大多来自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最近又多了一个越南。同时，还有大量来自北美和欧洲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移民占巴林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卡塔尔和科威特绝大多数人口为移民。阿联酋450万人口中，仅有20%是本国公民。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通过无情的压榨，有时几乎是奴隶式地剥削外来劳动力，以大幅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些精英阶层还存在这样的幻想，即当自己不再需要这些外来劳动力时，可以很容易摆脱他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大部分人最终还会留下来，并且生儿育女，就像数百万的非洲人及其后裔在奴隶制废除后留在美国一样，或者像印度人永远地留在斐济岛一样。当时，这些人大多半自愿地签了为期5年的契约，来斐济的糖料种植园干活。5年契约期满后，他们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中，但大部分人选择留了下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近一半的斐济人是印度后裔。很多近东地区的移民曾一度被剥夺了各种权利，而今天，他们也已获得公民身份，并赢得很多特权，其中一些人甚至已经对这些地方产生了家的感觉。

另一个划时代的迁移时期已然到来。正如过去一样，其主要轨迹仍然是从穷国向富国迁移，这个进程还会加强。任何想通过强制手段阻止这个进程的尝试都只能是政治上愚蠢的表现。有选择性的政策，例如把一些人关起来并遣送出境，而邀请另一些人来的政策，只能证明富裕国家的虚伪：被驱逐出境的往往是没有文化、贫穷野蛮的人；而后者往往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用别国纳税人的钱培养出来的专家，引进他们可以改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

仅2003年一年，英国就向1万名来自非洲的有职业资格的医生和护士发放了签证和工作许可。在这些人中，有5,880人来自南非，2,825人来自津巴布韦，1,510人来自尼日利亚，850人来自加纳。在英国工作的医生中，有近1/3的人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完成的教育。在坦桑尼亚，有1/4的大学毕业生移民到高度发达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并留在这些国家工作。这个数据在安哥拉是57%，在斐济是62%，而在更为贫穷的海地是79%，在牙买加是81%。

这是典型的人才流失，还有点像种族隔离。对于那些自己需要的人才，发达国家几乎是请求他们移民过来，甚至根本不考虑这些人的引进对本国专业人员造成的冲击；对于其他人，则在他们的脚刚踏上目的地时就被遣返回国。这些发达国家应该对那些遭受人才流失的国家给予慷慨的补偿。这不只是一个人口迁移问题，因为这样的人力资源转移对整个宏观经济再生产过程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那些失去或者得到很抢手的高级劳动力的国家，其竞争能力（以及发展潜力）将会有很大区别。

我们不应该仅从功利和文化的角度看待移民问题，也不应该仅关注其经济影响。在全球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贫穷的国家不但已经被迫接受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且人们还被剥夺了自由迁移的权利，这是令人感到耻辱的。当人类不再用四肢爬行，成为两足动物，就获得了第一种人权：即运动的权利。迁移也是一种运动。在21世纪，这种权利将越来越引人关注。它不能再受各种经不起推敲的借口压制了。那种设置栅栏、围墙、铁丝网的时代应该属于过去，而不应该再回来纠缠我们。当人们没有自由迁移的权利时，任何关于民主与人权的说辞都只是一种讽刺。而这正是目前世界的现状。现在，仍有一些国家将护照和签证当成把人们限制在某个地方的工具，这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封建主义或种族隔离主义，只是现在村庄已变成地球村。在未来，虽然签证不能像封建奴役制一样被废除，但其作用应被极大地削弱。从长远的和跨越国家的角度看，这将是发展的伟大进步。

应对移民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挑战，应该主要依靠世界上富裕国家的复杂综合行动。一方面，这种行动应该成为贫穷国家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另一方面，它应该为这些国家创造一种广阔的文化、制度和政治框架，以吸引移民的流入。富裕国家越快决定将自己一部分国内生产总值以一种明智的方式转移到贫穷国家，它们就可以花越少的钱来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合法或非法移民。

低出生率、寿命的延长以及大规模的移民，将给医疗保健系统、退休制度和社会福利事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甚至会导致反抗、变革和革命。这种社会的动荡，在社会市场机制更发达的富裕国家是一种形式，而在其他国家又会表现出其他形式。挪威可以应对这种社会巨变，葡萄牙呢？日本有机会成功处理这种变动，而法国呢？西班牙将比波兰更有能力来应对，但两个国家都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虽然不至于像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面临的问题那么严重，但也足以引起社会动荡。

只有当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水平显著下降时，才能保证世界的相对和平，人口迁移也将得到控制。如果以纯数据形式说明，即人口增长每下降1‰，（假设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值不发生变化）相对应的1‰人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会自动增加。如果巴西人口以0.51%而不是1.01%的速度增长，那么只要其他一切都不变，其2007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幅度就是4.1%而不是3.6%。在单独的一年看来，这个变化非常微小，但如果放在10年的时间段里，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长7%，20年的话就是20%。这种差别是巨大的，并且可以决定发展的质的改进。因此，降低人口增长率和提高整体经济增长率一样意义重大。对于改善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平而言，这两方面同样关键。人口的数量决定着我们的生活质量。

* * *

在我们考察未来的过程中，吸引我们注意的第八个方位点是贫穷、苦难和社会不平等。关于“不平等和战胜贫困”的专著或许已经可以塞满一个大图书馆。越多的经济学家写关于不平等问题的作品，这个问题就越频繁地出现。当然，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这样的关联性。然而，它们之间存在另一种关联：对于为数不少的专家、社团组织者、记者和政治家，更不用说一些官员，写关于不平等问题及其后果成为他们不错的谋生手段。研究、咨询贫穷和不平等问题已然成为一种产业。当考虑到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援助资金，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价值非常可观的产业。一些作者已经注意到这个背景下一些国际组织的新殖民主义问题[17]。

未来的男政治家们或女政治家们（地球上还会出现更多杰出的女政治家），或许会关注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样判断形势，以及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以避免另一场大革命的爆发。这些问题的答案是，除了自然环境的改变和人口运动之外，还应该

注意贫困、不平等问题及其后果。没有任何一场革命是以不平等的名义爆发的，任何通情达理的人都不会要求完全平等，这只会比某些形式的不平等更加不公平。危险存在于过度不平等的不公正之中，必须在为时过晚之前采取行动。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而是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在其著作《雪》中写道："被压迫还不够——你必须正确！被压迫的大部分人都犯了一个错误……即太愚蠢了！"[18] 马克思主义者会说，不论多么凄惨，这些人仍然没有形成自己的意识。事实是，许多穷人的确任由别人来误导自己，或者可以说是被当成了愚蠢的人，甚至其中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被压迫者。今天，消息传播非常迅速，尤其是坏消息。过不了多久，像"TINA"（别无选择）这样的短语都会成为历史。未来面临的困境是：我们应该减少对这些被压迫人的压迫呢，还是等他们不再愚蠢，并发展出自己的反抗意识？

古典经济学（包括其自由主义分支）都认为减小收入不平等是可以实现的，可以通过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人力资本的流动仍然有限）来实现。这个理论是建立在假定生产要素的完全流动的基础上的。按照这种理论，资本将向回报率最高的地方配置；当资本向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转移时，就会刺激当地的经济增长。众所周知，这个理论没能通过测试，不仅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越来越多的资本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转移，还因为新自由主义对资本集中的假设并未在现实中实现。按照他们的假设，贫穷国家应该比富裕国家发展得更快，但事实并非如此。

即使在最极端的自由主义设想下，如果没有干预，生产要素本身也只会向有利益的地方移动，而许多最需要资本的地方却是最不值得投资的地方。如果没有超越国界的或世界范围的恰当干预，我们不可能期望看到什么重大改变。因此，当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改革时，我们仍然无法看到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和高度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缩小的迹象。而且，不同国家之间收入以及财富的差距比以前更为扩大了。

问题是：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吗？如果是，国家之间生活水平差距的极限是多少？而国家内部不同社会群体生活水平差距的极限又是多少？或者说，世界现在已经到了极限的边缘，必须立刻采取行动来遏制不断加大的不平等现象，从而扭转这种不利的趋势？

如果不用数据进行讨论，可以得出的一个比较合理的结论是，应该减缓收入差

距扩大的速度，加快贫穷国家以及国家内部相对贫困社会群体的发展，这将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并会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这个道理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也适用于这些国家人口收入的增长。我们知道，这将首先引起价值的改变，随后是根据这些价值的改变而制定的战略和政策的变化。我们也知道，这一切不会自动发生。贪婪和愚蠢在与合理性和深谋远虑的较量中占了上风。

或许世界还不存在足够的合理性和深谋远虑，以形成基于新实用主义的发展政策。相反，很多政策都带有教条色彩，并且受特殊利益的支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不久我们将会面临全球范围的对抗局面。这就意味着，问题将以一种狂暴的方式（即通过革命和冲突）、失去控制的迁移和重新分配来解决。这将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停止增长，但用这种方式实现对增长的限制只是动荡的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一种战略手段。

许多政客和一些经济学家喜欢到处去说："事情不会像这样继续下去的。"但是，它会的。战略上的不平等具有决定作用，而且这种不平等已经延续了不少代人，它还将继续延续下去，正如历史和现代世界所展示的一样，它会一直延续到某个时间点。目前，我们还无法预测这个时间点将在何时出现，它不会是历史时间框架中的某个点，它最多只是在一代人时间中的某个点。人类耐心的极限、社会对如此规模的不平等和响应程度的社会排斥（如贫穷和苦难的忍耐度），都将经受考验。至于这种考验是将一直持续到某个临界点，还是在离爆发还有一段时间时人类的常识就会发挥作用，这一切我们都只能拭目以待。我们知道，某个地方的某个人一定知道应该怎样使事情好转，但是却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有人来将其扭转。更糟糕的是，我们仍有相信事情不会被扭转的余地。

俗语说，独燕不成春。但是，当燕子四处歌唱时，春天就已经到来了。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Lula da Silva）已经摈弃了新自由主义推动者的声音。如果在他领导下的巴西所实现的事情，也能在世界其他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实现，那么我们或许就得救了。现在，我们只能静观巴西式的道路将通向何方，我们看到的是结构性的变革，还是只是短暂的、有限的改变?

巴西政府正在实施一项非传统的、注重实效的经济政策，这项政策与之前的黑奥计划（Plano Real）大不相同。在此前的10年，黑奥计划重点在于抑制通货膨胀，当时，这个政策是正确的。然而，期望通过这项政策改善穷人的命运则未免过于天

真。基尼系数不降反升，到2001年上升至0.596。这也正是卢拉·达席尔瓦领导的左翼政府在民主选举中胜出并得以执掌行政大权的原因之一。

卢拉的社会政策配合以财政约束，使得巴西的基尼系数在2005年降为0.567。在卢拉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巴西的基尼系数一直在下降。这种情况的出现，正是得益于明智的干涉主义，以及与发展各要素相配合的经济政策的实施，保证了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最高收入群体。在2002年至2006年这四年间，较贫困的一半人口的收入在整体收入中的比重从9.8%上升至11.9%；而收入最高的十分位人群的收入比重，从49.5%降为45.8%。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比重，它阻碍了平衡发展，使得失去的时间很难被补偿回来，但至少它已实实在在地扭转了一部分此前灾难性的趋势。如果这种态势得以继续，那么将出现伟大的成功，巴西的前景将非常光明。

巴西的"零饥饿运动"（Zero Hunger）意义更为显著。这个项目直接向穷人提供预算补助。这种补助的数额不大，最贫困的家庭可以领取60雷亚尔（按汇率计算为31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53美元）；有15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只要这些孩子在上学，就可以领取120雷亚尔的补助。所有接受补助者都必须接受疫苗接种，所有这些情况都会专门记录在案。虽然这些都是非常直接的措施（因为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和服务行业的不发达，其背后的后勤学一点也不简单），但是这些措施都会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

显然，这些措施都需要开支，这些开支来自何处？事实上，与一些国家花在军火或者过度臃肿的官僚机构上的资金相比，这些钱微不足道，是完全可以节约下来的。此外，国际组织也可以提供援助。七国集团和欧盟国家只需拿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用于对贫穷国家的援助，就足以改变地球的面貌。如果将巴西的这项政策应用到世界其他地方，那么世界上将有10亿家庭可以送他们的孩子去上学、为他们接种疫苗从而抵御各种疾病。对于发展和战胜贫困而言，还有什么良方比更健康的、受到更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更有效呢？

大数字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小数字含义更为丰富。对于那些被期望给出资助的国家而言，这个1‰意味着什么呢？在美国，这相当于每人每月拿出4美元；在波兰，即为每人每月拿出2.5兹罗提。然而，这样的政策需要决心，需要拥有像巴西总统那样情怀的人来实施。更具体的是，我们需要一种理论概念、政治决心和行动技

巧来解决发展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再只是口头上说：“事情不会像这样继续”，而是开始真的期望它不再这样继续。

令人惊讶的是，人类在这方面的成就微乎其微，尽管已经具备以下条件：

——对发展经济学的大量知识储备

——在实践中克服增长障碍的积极经验

——目前限制贫困规模的成就

——世界一些地区较高的财富和资本积累程度

人们必须能理解，必须有行动的意愿，还必须有行动的真诚动机。一些人必须愿意每月拿出4美元或2.5兹罗提，而另外一些人必须主动来组织这些用于援助的资金进行转移，受助者应该努力不要使这些资助白白浪费。贫困问题的解决需要价值、制度和政策之间的协调。发展偶然性理论的熟练应用可以带来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有时，在一些较小事件上，只需运用常识、拿出最基本的诚实即可。这些品质的缺乏，是人类战胜贫困和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最大障碍。

* * *

教育和研究的进步、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中创造的新的制高点，将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这些也构成了地平面上的第九个方位点。扩大教育规模、减少教育障碍，将使数十亿地球居民接触到信息和知识，而信息和知识除本身的丰富价值之外，也是经济进步的无价工具。人类的经济活动将越来越依赖知识，而知识也将成为改变社会运行的方式。

黑格尔及其后继者马克思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反之亦然。意识，尤其是文化层次对经济及其发展的影响、对物质条件的影响，远非微不足道。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强大的反馈机制。未来，这种反馈机制将使这种因果关系更加强烈，因为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几十年来，科学、研究和知识一直被当成生产的直接要素，它们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知识是意识的关键元素之一。“我思，故我在”——也可以说成：我知，故我能。

一些理论认为，应该将知识区别对待，因为它同土地（自然资源）、资本、劳

动力一样，是决定产量增长的一个变量。这取决于我们怎样理解资本。如果我们以一种非传统的、现代的观点看待资本，那么它不仅包括实际资本和金融资本，还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把知识区别对待。将知识更广义地视为产量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立决定要素，不仅更为有利，方法论上也更为清晰。在多因子增长模型中，应该将知识当成一个独立的范畴。而这也正是偶然性理论看待知识的角度。至于在未来，我们必须理解的是，不仅知识的作用会越来越凸显，作为一种关键的人力资本，知识的作用也将更加多样化。

与各种关于建设知识型经济的论调保持一定距离是一件好事。有人或许会问：知识型经济的反面是什么，难道是一种无知型经济？不管人类所知多么贫乏，他们好歹还会知道一些事情，不是吗？因此不会有所谓的无知型经济。所有的商业和所有的文明一样，都深深地植根于知识。今天，与以往不同的只是知识更丰富了。现在，较好的中学出来的学生或大学生知道的事情，要比1个世纪以前诺贝尔奖获得者知道的事情多。他们知道，但他们不一定理解，这就是区别。未来，不仅知识的储备将以指数形式持续增加，而且人们对事物本质的理解也越来越广泛。在经济的各个层面，从微观的公司经济层面，到宏观的国家经济层面，再到超宏观的全球经济层面，通过创造性地利用海量知识，使物质和精神价值成倍增加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关键。

就定义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知识的概念很模糊，而且这种情形将一直继续。从功利主义角度看，知识型经济是一种将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特殊安排的经济，在这样的经济中，懂得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毫无疑问，利用知识促进增长能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得更好，这是我们常说的。然而，我们仍要继续播种和收获、打猎和挖掘、装载和搬运、磨面和挖煤、砍伐和缝纫这样的生活。当然，像这样生活的人口数量会越来越少，而花很长时间进行思考的人会越来越多。可以确定的是，“会思考才有未来”这个说法并不新颖，爱因斯坦是在“思考”前面加了个形容词“大量的”。古人早已懂得这个道理。那时，“思考”就已经有“未来”了，那么“未来”它将有更加广阔的“未来”。

我们必须警惕一些来自学术团体中不同角落的特殊压力，他们简单地将建设知识型经济当成宣扬改善其物质状况的借口。我对于提高教授的工资水平没有任何意见。但事实是，他们收入的提高（无论是来自直接的工资还是奖金）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就更加知识化，除非他们那更高的工资能自动转变成更多的知识储备。这

两者之间不存在这种简单的联系。如果要实现这种关联，还需要文化、制度和政策方面的诸多因素同时作用。

用于研究的公共资金投入得越多，这个地方的经济不一定会表现得知识更加密集。然而，当企业强调运用知识的力量、创新和发明产品、专业的管理、对其员工进行长期职业培养，以及对研究尤其是应用研究给予充分的资金支持来增强企业竞争力时，知识密集型经济就能得以实现。基础研究将仍然主要依靠公共资金支持，尽管公共－私人合作机制的普及变得越来越有前景。只有最强大的全球性企业和一些资金非常充裕的基金会，才有能力支持私人的基础研究。

显然，经济成功的国家其知识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因为制造业部门需要技术和制度创新。不幸的是，这种情形没有出现在那些最需要高速发展的国家，即贫穷国家中。知识型经济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富裕国家才能承担得起。在富裕国家，企业有充足的资本，政府有能力与企业一起支持研究和应用，并且也愿意给予这种支持。

而贫穷国家必须逐渐改善其教育和公共信息体系。任何人都不应该使他们心存幻想，幻想能跨越发展的不同阶段，直接可以生产富裕国家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生产的事物。巴西能制造喷气式飞机，因为它知道该怎样制造，其他国家也甚为折服。然而，这些国家应该向巴西学习的不是制造喷气式飞机，而是应该学习像“零饥饿运动”这样的项目。只有通过消除文盲、使技术的发展达到某种程度，才有可能大范围地解决人力资本问题，也才有可能建设知识密集型经济。在这方面，大多数国家要走的路还很长。

建设知识型经济，或更恰当地说是越来越注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需要循序渐进。在所有经济体中，始终有一些部门发挥着领头作用，而另一些部门则紧随其后。跟随时代的步伐，逐渐增多的商业活动将创造越来越多的附加价值，这些价值的创造是通过运用人类智慧资源而不是地球的自然资源。在这方面，世界上一些国家处于领先地位，而另一些国家则紧追不舍。跟随时代的步伐，越来越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将基于人力资本而非实际资本。金融资本始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至少是投资人力资源培养的必要条件。知识需要以金钱为代价。

知识型经济就像是一片被投进了一块石头的池塘，投入的石头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波纹。在经济中，应用在某个地方的知识会立刻被传递到周边，接着又传播到新的企业、行业和各部门。只要最初激起的波纹足够强劲，波纹就会一直持续。正如

随着知识尤其是研究和应用的传播，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紧紧跟随。

对于富裕的国家而言，这意味着什么？那些站在世界金字塔塔尖的国家，通过“发明”对知识经济做出最大贡献。紧挨着塔尖的是为数众多的中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主要贡献“创新”。最后，在塔底的是数量最庞大的一组国家，主要由相对贫困国家组成，这些国家主要通过“模仿”改进自己的状况。这个“3I”模型，即发明（invention）、创新（innovation）和模仿（imitation），将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向前发展。

知识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许可、专利、方案、模式、商标和版权相关的制度性和金融解决方案。如果你观察一幅展示世界知识产权分布的地图，就会发现知识产权的分布比石油的分布还要集中。一直以来，知识产权变得越来越有价值。早在1938－1939年间，在法国，一件由顶级设计师缝制的时装等于进口10吨煤的价值，或者可以换1公升香水或2,000公升汽油。现在，知识产权涉及的不仅有技术，还包括商标，有时商标的价值甚至高于生产该商品所投入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这些产权的所有者，以及产权产生的利润，大多都集中在富裕国家，这并非因为像原材料的分布一样由自然条件所致，而是由于人类智慧的创造力不同。

如果我们绘制一幅人才分布地图，就会发现与原材料和知识产权的分布相比，人才的分布更为均匀。但是如果没有知识和原材料的支持，单凭人才是无法取得很大成就的。可以理解，富裕国家不会热切地与其他国家分享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富裕国家真正想要的不仅仅是富裕，他们还想始终比其他国家更富裕。要做到这一点，维持其科学和技术的绝对优势是最佳途径。未来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中，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竞争将更为激烈。利益的冲突很可能导致各种争端，例如目前各国激烈争夺与军事相关的技术，而其他一些领域，如制药业也面临各种争端。这会导致很多真实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这种战争一般是秘密进行的，因为主要参与者是情报组织而不是军队。

一方面，随着知识向新领域的扩张，每个国家（包括最发达国家）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活动范围将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出现类似经济活动的国家数量也会越来越多。在世界各国，知识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比重的增长越来越快，但在未来几十年中，这个比重增长最多的仍然是那些现在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减少。之所以可以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衡量，是因为它的部分

产值可以不同的产品形式体现，而这些不同产品的价值又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权重下降了20%。我们注意到，在小范围内，一些技术稍为逊色的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现象。

贫穷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将一直加深，至少在那些缺乏教育、人力资本质量较低的国家，这个鸿沟会继续加深。从长远看，只有当人力资本的基础打好了，即消除了文盲、实行全面中等教育、具备充分的高等教育以及一个研发的基础，创造知识型经济才会从梦想变成现实。

未来会带给我们什么新事物？会只是简单地多一些脑力劳动，少一些体力劳动吗？不，应该远不止如此。知识和其他资源一样：重要的不止是拥有它，还在于知道怎样使用它。成功不仅属于那些能创造知识的部门、职业群体、国家和地区，更属于那些会应用它的地方。懂英语的尼日利亚和肯尼亚计算机程序员如果只是一直当黑客，他们最终将不会有任何成就。只有当出现明智的政策，即将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应用到发展之中的政策，来引导伊朗和朝鲜的物理学家，他们的专业技能才不会被误用。任何投入到创造美国下一代反导弹系统或俄罗斯反－反导弹系统中的知识，都将不仅不会改善国际安全局势，并且还会损害发展，因为这种投入仅仅是对稀有人力资源的浪费。知道的更多并不能保证一定是知识型经济，更重要的是知道怎样使用哪些知识。政策也应该更多地依赖于知识。

自19世纪后期以来，由于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的急剧增加，经济活动范围扩大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我们仍然在谈论着“需要是发明之母”。但事实上，这种观念已经在改变。只要看看周围，从各种厨房设备到银行服务，从计算机再到智能汽车，就会发现我们发明这些东西并非我们需要它们，而是因为我们一旦发明了它们，就离不开它们了。

“知识型经济”强化了这一趋势。在非知识型经济中，理论出现在试验之后。知识进步要通过创造出更好的器械、工具、机器、公式、技术或最终产品来实现，但这些都需要经历试验、尝试和错误。现在，理论出现在应用之前。我们首先知道为什么一些事物会出现或会工作，然后这些事物才出现。

经济学家很可能会问这是否也适用于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的确适用，但不全是。原因我已在文章开头有所陈述。如果经济学中少一些意识形态，多一些实用主义，或经济学是一门纯科学，那么的确会适用。例如，对于越来越多的问题，我们

将会首先想到某个事情怎样发生（因此也知道为什么发生），然后它才发生。这是目前我们所遇到的矛盾之一，或许未来也将如此，即使在知识型经济时代，经济政策不一定总是依赖于知识或经济学的发现。直到它已然成为知识型经济时，我们才能真正说这是一个知识型经济。在此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 *

除经济学之外的一些学科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进步。这些进步的本质、动态性和所引起的结果，将构成我们地平线上的第十个方位点。我们应该期望什么？畏惧什么？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复杂的教训。众所周知，人类的智慧常常被用到邪恶的事业中。未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让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而不是破坏发展。科学具备塑造一个创造性的、高度发展的以及和平的未来的潜力，但并不能保证它将能创造这样一个未来。只有当文化、制度和政策三者协调运作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直立行走、火、轮子、货币、印刷、电和因特网之后，21世纪会出现第八大发明吗？或者我们仍需继续等待？这项发明将是什么？我们正拥有历史上数量空前庞大的先进知识。1454年，古登堡（Gutenberg）印刷出第一本《圣经》时，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在电灯下阅读《圣经》。1879年，当爱迪生（Edison）点亮第一盏电灯时，他也不会想象到只要轻点鼠标，世界就可以通过无线网连接起来。甚至在万维网刚刚出现时，也没有人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1989年，当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把建立万维网网站的建议提交给日内瓦郊外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GERN）时，他的上司在这份建议的评语中写道："模糊但激动人心"。1994年，世界上约有1万个网站。2007年，网站的数量已超过1亿个。不久，人们将不再计算网站的数量，因为各种网站已无处不在。万维网的发展比起创始者所想到的更加激动人心。

我们知道下个划时代的发明会是什么吗？或者能否想象到是什么？在人类历史上，只有第一项伟大发明不需要此前大量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基础。所有的发明都需要好奇心、胆量、反复试验、自发过程和卓越的想法。

很多迹象表明，我们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

自19世纪后期以来，任何伟大发明出现之前，相关的理论必定已经就绪，相应的知识积累也已完成。科学构想出或近乎构想出会在未来世界中创造出的事物。在实际科学迈出脚步之前，理论概念和科学解读都已经完成。技术是连接科学观点与文化、经济实践的纽带。我们周围正发生着很多事情，下一个重大发明或迟或早总会出现，而且很可能会早出现。这个发明或许与控制生命的起始和过程相关，包括疾病和寿命。这些都得益于物理学、化学、遗传学和生物学的研究，辅以计算科学和计算机建模的强大功能。事实又一次表明，最有趣的事物都出现在各学科的交界点上。跨学科研究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

回顾20世纪，物理学促成了人类历史上两个不朽的成就，尽管有人会认为我们在评估新技术意义时有夸大之嫌[19]。其中第一个伟大成就是控制自然力量的卓越能力。人类已经驯服了一些自然力量并为己所用，但是，这种驯服并非总以一种让人高枕无忧的方式完成。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我们始终生活在原子弹蘑菇云的阴影之中。第二个伟大成就则使20世纪既不同于此前也不同于此后的世纪，即让人类、商品和信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数量、速度、距离和舒适度顺序运动的能力。这些创造，从汽车和飞机到计算机和因特网，已经完全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今天，展望未来，我们不知道或者说不能肯定，生物技术是否也将在21世纪发挥这样巨大的作用。现在，生物技术所处的情形与100年前物理学所处的情形相仿，这不是指所解决的具体问题或即将出现的具体创新相仿，而是这些进步所带来的未来都既引人入胜又充满神秘。

100年后，我们将知道答案。到那时，在今天看来激动人心且神秘的事情都将变得平凡易见。只有在某个背景下，才能看到跨越式的飞跃。如果考察过去100年中汽车的变化，可以发现某一年的汽车模型和下一年差别不大。但是如果现在把福特T型车和最新款的丰田普锐斯（Prius）相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有着天壤之别。两种车型都有四个轮子一个方向盘，但这只是两者仅有的共同点。这就是我们回顾过去100年时会有的感慨。在那之前，我们周围的变化既难以胜数又连续不断，似乎没什么事情发生，也似乎发生得非常缓慢。事实上，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迅速。以人为例，他们看起来与100年前没什么两样，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完全不同，工作和休息的方式也不同，他们享受的医疗服务也不同，死去的方式也将不同。

哪些变化我们应该欢迎，哪些变化我们应该抵制呢？这在医学、遗传学、生

物学甚至物理学领域有诸多争议。在未来几十年中，基因工程和生物科技将非常关键。这并非确定，但很有可能。1997年英国科学家的克隆实验创造出了闻名于世的多莉羊，这象征性地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在此之前，新的时代已经开始，只是在那一时刻才使我们真正处于一个通向未来的新轨道上。

基因工程里一些简单的程序已经变得十分常见。20世纪90年代科幻小说里描述的情景已经成为我们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这方面的首批专利诞生在人造活体器官上，或者说是在实验室条件下用非自然方式创造的活体器官上。很多人依然难以想象这个过程在技术上可以实现，而且在法律程序上可以受到专利保护。然而，这种技术可以延长人们的生命、造福人类，或者至少我们期望是这样的。

上述问题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科学层面，也越来越关乎伦理层面。特殊利益集团、各种宗教组织或教会常常通过有组织的政策工具、行政权力或舆论压力来阻止或干预这些问题，而媒体则顺从地随声附和。这显然与中世纪的宗教审判和宗教刑法不同，但它仍然与那些试图阻止人们接受那些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事物的非理性尝试有相似之处，例如人类对天体运动理论和人从猿进化而来的理论的接受过程。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最终被接受之前，都经历了许多坎坷。很多真理在被接受为真理之前，其发明者或发现者都得经历许多考验。这些事情无需掩盖。对待这些唯一可行的方式是让有关这些问题价值的辩论继续下去，从而在学术会议或公众论坛中辨别出理性论点和真实存在的威胁。

另一方面，在诸如基因工程等一些新领域中，由于缺乏经验、缺乏经证实的调节机制，一些担忧不可避免。人们有很多顾虑。一个有机体的DNA可以被引入到另一个有机体，这打破了长久以来个体之间、甚至物种之间的界限。基因改良就其本身而言在自然界中并不鲜见，但很多人仍然认为这有悖于自然或者违背了神律。

不过，这种种阻碍的力量只是暂时性的。如果某件事物需要被创造出来，那么它一定会被创造出来。在未来某一天，所有这些将被视为正常，正如现在我们都知道人类是从猿进化而来并非由神创造，或都知道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非太阳绕着地球转。我毫不怀疑未来会接受今天不能接受的事物，或许这在我们的孙子的孙子的年代都不能实现。我也毫不怀疑，一些潜在的或现实的进步需要妥善封藏，正如人类现在对一些人类智慧的产物，如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等不敢轻易加以利用一样。

将来，人类对待某些新事物的态度仍然将是这样。我们不敢冒然遗忘祖先们的发明和成就，正如15个世纪以前，在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1000年以后，这种技术再一次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新技术（类似印刷术）的命运对人类并不构成威胁，其原因有多种，如这些新技术一度只为一些学者、艺术家和工匠的狭窄圈子所知。虽然世界上最先进的知识只集中在某些地方，但地球上这样的亮点依然很多，而且将来会更多。

福山写道："生物技术的最终问题是，如果我们能选择生育什么样的孩子，如有些孩子天生就有某种负担，而另一些孩子则天生就有某种防御能力，那么这些人的政治权利会有什么变化。"[20] 但现在难道没有这种情况吗？一些人出生在博茨瓦纳喀拉哈里沙漠中建在沙地上的防风墙背后，一些人出生在俄罗斯平原上的集体农场，而另一些人则出生在哈博罗内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家里或莫斯科新富裕起来的人家里。一些人的父母是巴黎金融界的人士，而另一些人的父母则是居住在郊区的移民。成千上万的孩子在孟买的贫民窟里度过他们悲惨的童年，其他人则生活在某个城市上层社会人家里，难道现实不是这样吗？显然，前者一出生就有"负担"，而后者则一出生就有"保护层"。

事实是，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后就面临着种种不同的命运。这不是因为某些未来学家的科幻小说中的场景变成了现实，而是人类社会主要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和政治阵营一起塑造了我们的命运。未来，人类仍然将一出生就有不同的命运，这不是由于对基因的改变所致，而是由于缺乏对经济和政治的恰当干预。

研究和创新的进步将导致更进一步的专业化，对发展有重要作用的理论和应用学科将变得越来越主动。自然、社会、技术和经济相互交叉的大趋势意味着大学网站上将贴出新专业，正如生态学、生物工艺学、基因工程学、纳米技术、空间科学和分子生物学在我们有生之年就已经成为大学的学科一样。全球化研究也将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它将专注于研究现代世界体系中生态学、文化、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甚至可以更贴切地将其称为地球研究，因为这是研究我们地球的一门科学。

在某些即将出现巨大进步的领域，需要仍然是发明之母，这在能源资源和新能源密集型技术中尤为明显。不可再生资源将耗尽，能源危机将变得越来越突出。材料工程学和纳米技术在未来将有许多突破，纳米技术是一门非常新的技术，以至于

一些拼写检查程序还常常将其名称当成错误拼写。新术语将不断涌现，用以描述技术和组织的新突破。

组织的作用时刻不能忘记，因为对各种资本流以及资产，如人力资源、不动产和金融资源等的管理意义非同寻常。这对于那些发展程度不是很高的国家尤为重要，合理管理生产、分配过程、人力资源和企业，可以让这些国家的发展取得巨大进步。这就是所谓的非投资进步，这个名词常让人误以为不需要任何投入就可以让情况获得改善。与创造新生产能力和实施新技术相比，改变组织管理的确可以改进效率。

当你在贝宁或厄立特里亚花几个小时等公交车，或花几天的时间等货运卡车，你发现自己会爆发出想改进这里运输体系的组织管理的欲望，有时你甚至会忘了缺乏组织性本身也是一种组织模式。那里的人们仍然需要知道，时间非常重要。在那些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时间比金钱宝贵，而这里的情况与之相反。将其充裕的自由时间（这些事件既可以花在刀刃上也可以被浪费掉）充分用于消费、教育、文化、娱乐、再创造或体育，是这些国家面临的管理挑战。

电子领域将出现很多进展。一些发明将改善生活的质量，而其他一些则是意义不大的小器具。一个MP3播放器里存储的音乐可以让一个人一生都听不完。与MP3大小相仿的设备可以接收几百个电视频道，尽管没有人能弄明白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四分之一世纪后，家用和办公用电脑将可以与今天的超级计算机相媲美。然而，这样的进步还不算完整，因为还没有出现可移动人行道使现在在我母校的孩子们不用走路上学。

* * *

因特网将无处不在，遍布地球甚至地球之外的空间。因特网是未来地平面上的第十一个方位点。这也是人类迄今发明中用来观察我们星球的最完美工具，使得我们可以从画面和文字的角度了解发生了哪些事情，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因特网使得看到每个人成为可能，或至少知道每个人在什么地方。例如，通过网上交流工具Skype，我们就可以找到任何已在上面建立完整档案的人。我在写本书时，Skype已有429万用户，不久之后，其用户将达到几十亿。30或40年后，只要轻点

鼠标，就可以找到任何人，并与每一个人建立无线联系。当然，世界从来都是无线的，从古到今，只要在听力可及的范围内，你就可以通过声音与其他人联系。

20世纪的计算机革命常常被称为信息时代。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世界各国的作家，包括波兰作家，都把信息描绘成通往繁荣的钥匙。尽管许多人至今还未拥有打开繁荣大门的那把钥匙，但毫无疑问，这场信息革命已使世界大部分地方增加了大量财富。这场革命以数字化为中心，通过使用文本、图像和声音的数码，前所未有地方便了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和经济等领域进行信息的存储、加工和使用。

未来几十年将见证无线革命（wireless revolution），这是信息革命的一个新阶段。无线数据传输将使以极低的成本获得关于几乎每个事物的数据信息成为可能，这从边际成本或增长角度看，意义非同凡响。

现在对无线技术的引入和传播以及对该技术应用的预测，与20世纪上半叶电动设备，包括从咖啡碾磨机到缝纫机再到电梯等的广泛应用，以及后半叶电脑技术在从收音机到街灯再到飞机上的应用[21]，有诸多相似之处。这种类推是一个指南，了解过去已发生的事物可以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

这些技术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大部分结果将是有利的，有一些则令人感到恐惧，但所有新事物最初出现时都会让人感到震惊。在波兰，曾经一个住房区才配有一个电话亭，现在每家都有手机，再也没有人为电话线路而烦恼（虽然偶尔信号的覆盖不是很好）。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一个家庭连一部手机都没有，但是新的服务项目，尤其是个人金融服务，却在世界上无线通讯仍然罕见的地方发展起来。在非洲，手机弥补了银行系统的不足。在南非，甚至在刚果，一些准银行服务可以通过手机来完成。手机用户可以通过短信方式查询账户、开设新账户、转账以及支付账单。在肯尼亚，大约只有300万人拥有银行账户，但有100万人使用M－PESA移动支付系统。在博茨瓦纳，17%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拥有手机。在克服硬件设施不足和传统服务不能完成的领域，无线技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对经济效率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将有着积极作用。

未来各种“革命”带来的变化将是多样的，但都主要依靠于生产、分配和消费中无线数据的传输。一般而言，管理质量的提高可以提高效率，这主要将通过减少操作过程中的原材料和能量损耗、简化库存管理和优化人力资源使用来实现。注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部门将取得迅速进步。然而，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正如面对

成堆书籍报纸上的过剩信息时，人们可能会感到无所适从，在面对海量电子形式的文字、图形、画面等时人们更容易感到迷茫。这个主题将不断在喜剧电影中出现。当在2036年时，我们可以像当初人们在1936年看卓别林的《城市之光》时那样，看到令人捧腹的新电影，尽管导演已不是卓别林。伟大的电影制作者总是会不时出现。

一些设备之间将始终保持交流并交换信息以改进其功能。我们不需要随身携带资料，因为不论走到哪里都能查到。我们将仍然需要自己步行去学校，但书包将会变轻，或者可以通过无线传输。我们购物时，冰箱会告诉我们哪些东西已经用完了。商店会把所缺物品的订单传送到批发商那里，批发商又告知生产商，这样就可以实现按需生产。在我们还未走进医生的办公室之前，他们就会知道"你好吗？"这个问题的答案，至于说病人是否真正感觉好转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些人会配备那些今天装备最好的军用设备，以使他们能监控事件的进展并进行实时沟通。不再会有猫狗走失，因为我们对它们所在方位将总是了如指掌。

人们也很难再迷路，这会让一些人感到宽慰，而让另一些人感到烦恼。各种数据的无限自由传输将使我们在道德上进退维谷。人们的隐私、秘密以及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将不同于以往。甚至在今天，当警察在赫尔辛基－图尔库高速路上拦下一个醉驾的司机时，他们不仅能知道他到底喝了多少酒，还能通过无线连接知道他挣多少钱。警察随身携带的一种便携设备可以根据这些参数当场开出罚单，这个罚单既反映出其侵犯法律的程度，同时也符合这个醉驾司机的支付能力。这使得人们熟悉的三种实体，即交规、警察和罚单有了一种新的意义。现在，装备、处理和利用信息要通过人来进行。如果设备可以忽略人作为中介的作用，自行进行交流，将会发生什么呢？将有谁来监视这些监视者，另一些设备吗？可见，在技术和后勤、制度和政治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谷歌（Google）很快成为人们可以免费使用的强有力工具。它不仅仅是一个搜索引擎，而是将卫星摄影学和卫星导航学结合起来，能准确定位世界各大城市中每条街道和小巷，甚至能定位一些村庄和冰山。不久，我们将可以通过谷歌知道谁从屋里走到了后院里，就像村庄的村民们通过看烟囱是否冒烟来判断人是否在家一样。一些特殊项目通过卫星成像来追踪冰架，并研究其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我们可以监控苏丹和乍得边境的达尔富尔难民营的情况，这使得国际组织可以在人道危机出现时向在喀土穆的政府施加公众和政治压力。

我们已经对谷歌称之为“工具”的软件习以为常。此外，新的功能还在不断增加，其中有一些光看名字就知道它们将多么令人不可思议。不久以前，所有这些都还只存在于童话故事中。曾经，人们通过观察天象来判断未来天气状况。现在，三维的气候地球仪会实时告知我们目前的天气状况，以及未来几天的天气。这些信息对经常旅行的人非常有用。谷歌里还有一个地球时钟，告诉我们哪些地方是黑夜，哪些地方已经阳光普照，而哪些地方还未日落。坐在电脑前，我们瞟一眼屏幕左边，就可以知道奥尔胡斯市大学里的天气；看一眼右边就可以知道新西兰是否已经日落，再决定我们是否应该发送那封邮件。

以前，人们会走到前门廊“看看周围发生了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坐在电脑面前，通过在网上冲浪来了解发生了什么。当然，现实的旅行和实地了解当地风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但这至少已经与在地图上看有了显著差别，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人们只能通过阅读地图来了解世界。荒谬的是，由于非直线式的发展，世界上一些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年轻人见过电脑，却从未见过地图。这有些让人难以置信，但世界上25%的人确实仍然不知道地球的形状，因为他们从未看到过地图或地球仪。

令人感到惊讶的不是网络上新事物出现的速度，而是人们接受的速度。现在，我们依然很难想象，对于下一代坐在讲堂里的年轻人来说，由于有了无线设备，世界上所有的知识都已在他们的指尖下。几十年后，所有人都会认为这不足为奇。几年前很多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已经非常普遍，就像在YouTube上看电影或将所需下载到iTunes里一样。官方和一些非法部门的创新使得一切都变得有可能。现在的电驴下载软件（eMule or Morpheus）可以使用户下载“任何可以被盗用的东西”，如音乐、电影、电视节目、计算机软件和游戏。网络成为巨大的藏宝库。

一些非政府或超政府组织将通过网络对某些特殊整治行动施加影响。这种压力将越来越大，从而使得这些组织相对于政府拥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由于不受任何政府、党派或资本的限制，网络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向政府和企业发出指令，就像上世纪一些国家面对反抗的人们的需求时所做的那样。如果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晚200年出版，即2062年出版，里面肯定有对因特网和街垒的描述。虽然雨果已经不在人世，但一定会有其他人来写这部著作，没准还会出现伟大的作家。

未来将有大量图书。网络不会像电视击退电影或电影取代戏剧一样，把书本从市场上排挤出去。然而，人们花在阅读上的时间会相对减少，因为他们会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上网。尤其是在高度发达国家，被海量信息淹没的可能性会更大。虽然文字会越来越多，但相对而言，图像的冲击力将更大。在一些正在前进的国家，包括那些在脱贫过程中刚刚消除文盲的国家，阅读将会普遍和繁荣起来。图书将拥有第二次生命，网络将成为其推动者而不是障碍。

网络已经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以至于有些人甚至无法想像没有网络的生活。一些人如此沉迷于网络，以至于无法看到网络之外的世界。或者，他们仅通过网络来观察世界，网络之于他们，就像食物与空气，或者像一种麻醉剂，但在可以使一个人成瘾的事物中，网络不是最糟糕的。

在未来几十年中，网络将改变几十亿而不只是几百万人的命运。如果“百元电脑”（“$100 computer”）的梦想可以实现，那么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年轻人将有上网的机会。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们将开始上网，其他人也会紧随其后。最重要的是，网络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学生，因为在一些特别需要“发展”的国家，网络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教学工具。

如果富裕国家的保守派、国际组织中思想僵化的官员和专家认为，向贫穷国家提供援助是一种浪费，那么还有一种证明他们错了的方法。支持欠发达国家发展网络，不仅是一项重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它将拉动对硬件和软件的需求，而这些东西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其销售也会促进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这个项目的价值将不止是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人均8美元，看起来虽然不多，但加起来则数量惊人。

不幸的是，网络也是黑客和恶作剧者的操场，他们不怀好意地使用网络。其攻击行为包括盗取他人的个人数据，或是盲目地破坏。有时，一个单一的入侵就可以盗取海量信息，就像怪兽就业信息网（Monster.com）遇到的黑客袭击一样。黑客不断通过在网络上散步恶意软件来攻击每名用户。就在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收到了一封来自名叫乔安娜·布鲁克斯（Johann Brookes）的人的邮件，其附件看起来像是病毒软件，我认为这个乔安娜·布鲁克斯应该在奈洛比或诺夫哥罗德的尼兹尼，甚至是华沙。邮件的标题栏上写着：“昨晚发生了什么？”。昨晚我花了一夜讨论因特网。

大规模的网络危机已出现过，它们威胁着信息流通、航运系统、企业甚至整个

国家。这是安全领域的全新问题，而且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我们对网络的依赖变得越来越深。能够让网络瘫痪的大规模袭击将变得越来越普遍，维护网络安全的成本也将越来越高。一些硬性恐怖袭击（hard terrorism）将转为软性恐怖袭击（soft terrorism）。

我们必须学会应对这种对网络的滥用，并准备好为之付出代价。这是知识没有植根于一种恰当的文化、制度和政治土壤中的例子。那些制造恶意软件、使其他人承受风险，让自己成为网络黑客、强盗或恐怖主义者的人，也是具备一定知识的。一些专家夜以继日地工作，以找到应对新威胁的方法；而另一些人则彻夜不眠地写新病毒或木马程序。据杀毒软件公司Sophos公司预测，每月就有超过8000个新的木马病毒发布。这就是知识和技能（如智慧）怎样服务于不同目的的例子。如果我们想保持清洁、安全和健康，就必须学会保持网络个人卫生。

因特网的美妙令人惊叹，但它不是治疗充满变数的现实世界中我们所有病痛的良方。当列宁说共产主义是苏联加上整个国家的电气化时，他错了。而如果人们认为市场自由化加上因特网等于完美的资本主义，那么他们对“新经济”的热情也是错的。完美的资本主义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

* * *

冲突与安全、战争与和平，这些文字可以描绘整个人类历史。至少从个体或地区的角度看，世界上每年总有某些地方有冲突和争斗，并引发战火。有一些年份相对和平，那些年里冲突少一些、安全多一些。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这些出生在20世纪中期及以后的人们是幸运的。未来会怎样？这就是我们所考察的未来十二大问题的最后一个，也是第十二个方位点。

在过去的60余年中，虽然没有爱因斯坦所说的世界政府，但我们成功地避免了核战争。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位时期，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远胜过苏联解体的可能。20世纪80年代，没有一本严肃的经济学著作来研究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后果，但华盛顿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核战争经济后果的跨学科研究。于是，今天我们就有了一些研究这种从零开始的特殊经济发展的有趣著作[22]。

事实是，虽然我们做了如此多的研究，但还是不能保证使人类幸免于难。

争的几率非常小，人们还没有那么愚蠢。但是，如果核武器落到了恐怖分子手里，他们将会使用这些武器。人们也可以很愚蠢。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要恐怖分子仍然存在，只要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核生化武器依然存在，那么这些武器落到恐怖分子手里将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些核武器将永远存在。于是，问题变成：恐怖分子还要存在多久？我们希望不是永远，但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他们不会让我们安宁，而且未来的几代人也不会安宁。在恐怖分子变少之前，他们会先增多。现在恐怖分子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2001年，虽然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到底有多少。

2001年9月11日的惨剧发生后不久我正好在纽约。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对这次对世界贸易中心的袭击的长期后果将是什么，没有人会想到被这种巨大犯罪所误导了的美国的反应将使恐怖主义的威胁更加激化。保护美国领土和公民免受这种暴行的袭击并不能保证世界其他地方的安全。如果这正是袭击者们的意图，那他们得逞了。

除了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被恐吓，经营企业、输送服务和治理国家的成本也大大提高了。这些成本有时是无形的，但却大得惊人。在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恐惧状态方面，那些政客和记者们为了追求耸人听闻的效果，被迫扮演了这些袭击者的代言人，这比恐怖主义者本身更能达到效果。他们威胁或恐吓民众，使之做出非理性举动。所有这些都对社会造成了消极影响，于是，恐怖主义者的另一个议程也实现了。

应对恐怖主义应该主要依靠全面、全球协作和长期行动来消除其根源，而不是打击一些表面的现象和影响。针对其影响的行动也很必要，但并不能解决问题，即使这种行动比现实中的那些更加灵活。

2005年，西班牙阿托查火车站爆炸1周年纪念时，名为马德里俱乐部（Club de Madrid）的国际组织以“更安全世界的民主”（*Democracy for a Safer World*）为主题召开了一次会议。以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为首的各国专家和政府首脑都参加了此次会议。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的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告诉我，毫无疑问，美国对威胁的反应使世界恐怖主义更加猖獗。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同意这种观点。他们两人均效命于民主党总统，而“向恐怖主义宣战”（War on Terror）则是由一名共和党总统提出的，大部分严肃的分析家和自由学术专家都认同奥尔布赖特和布热津斯基的观点。

在这个有重大影响的会议的宣言中，一些有明显党派倾向的政治学者非常固执

地想加进这样一种观点，即贫穷并不是刺激国际恐怖主义的原因之一。与会的许多人费了很大努力，才没有将这种观点明显地表露在会议宣言开头的经济部分。这个事件有很多含义。

对于恐怖主义，没有比全球经济平衡发展更好的预防措施了。即使这不能减弱恐怖分子的决心，至少可以削弱他们的社会支持。毫无疑问，发展不足是国际恐怖主义最强大的诱因之一。在发展成果分配中少一些不公正、少一些社会排斥、允许自由移民、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以及基于合作的国际关系，都将有重要意义。

这虽然不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解药，但它可以逐渐减弱支持有组织的恐怖主义的社会态度和政治态度。恐怖主义本身已经变得国际化，甚至全球化。它已经在充分利用科学和网络，单凭武力不能将其击败。它不同于过去德国的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Baader-Meinhof Gang）和红色旅（Red Brigades），也不同于秘鲁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爱尔兰共和军和西班牙埃塔组织。我们必须采取恰当的方法来对付它。我们还应知道，对于人性，包括富裕而言，贫穷是最大的公敌。为了避免另一场战争，我们必须在世界范围向贫穷宣战。

毫无疑问，在上个世纪留给我们的遗产中，战争的非国家化和私人化是最大的体制威胁之一，这使得战争恶魔摆脱了国家控制。正如如何将这只恶魔放回瓶中成为问题一样，我们也在思考如何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问题。这种情况不会在拥有强大体制和成熟文化的高度发达国家出现。在这些国家，政府牢牢地将军队掌控在自己手中，并且用纳税人的钱支持着军队。军队发动政变并成立非民主政权的情形越来越少见。而在不久前，这种情况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里非常普遍。

今天，中美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是哥斯达黎加。这个国家彻底取消了军队，但它并没有感到不安全。东南亚最不发达的国家是缅甸，独裁的军事政权掌控着这个国家的政府和经济。然而，缅甸并不安全。政府体制本身混乱或崩溃的地方，形势最为糟糕，例如现在的阿富汗、曾经的尼泊尔和一直以来的索马里。安全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和一个强大的体制。很多国家在巩固其政府和体制方面还需要投入巨大努力。

类似地区冲突不仅会对区域安全造成消极影响，也很有可能会像癌症一样扩散到世界各个组织中。当参与的国家较小时，事情还能在控制之中，但如果参与的是一些较大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则世界和平就危如累卵了。在这里，我

们可以看到全球化的相互依赖特征发挥的作用。为了避免大型战争，我们必须不断阻止小规模战争的发生。

更糟糕的是，在新自由主义为贸易自由的普遍而感到愉悦时，对军火贸易的管制解除已经发展到了一种非理性的程度。政府对武器垄断的解除或许是不理性的，但对于一些游说团体而言倒是有利可图的。军备和武器的生产已经变得私有化。移除对这些方面的政府体制监管成为世界协作的一种障碍。虽然制造坦克、反坦克武器和机关枪与仿制、走私古奇手袋、耐克鞋或朗万领带不一样，但非法军火贸易仍旧在繁荣发展。

荒谬的是，一些事情在民主繁荣时比民主受限制时更加危险。与政府发动的冷战不同，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私人化的小型战争。要改变这种状况将更加困难，因为有更多的参与者、冲突之间的线条也更加模糊、问题也变得更加不透明。因此，军事力量强大的俄罗斯发现自己无法对付车臣问题；而强大的军事集团北约在超级富裕的美国打前锋的情况下，仍然无法消灭在极度贫困的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这些都不足为怪。

我们越快改变用于军火和战争支出（包括无数所谓的“维和行动”）的比例，同时改变用于共同支持贫穷国家发展的资金比例，我们将越能更快地使这些即将爆发的冲突以及明目张胆的战争消失。

不存幻想是件好事。强势的军事工业集团及其相关的政治游说团体（更不用提那些大方赞助的媒体）不是和平主义者或民粹主义者幻想出来的，而是严酷的事实。这个部门的利益也同样严酷。如果和平失衡将会发生什么？如果世界再也没有威胁和冲突，将不再有对军火的需求，不再有收入和利润。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潜在战争和实际战争中的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和人类而言，战争是梦魇。而对于那些“死亡商人”（军火商）而言，战争是生意。别人的梦魇是自己的生意，这种矛盾在一代人或五代人的时间里是不可能消除的，或者永远也无法消除。因此，如果相信这些不存在则未免太过理想化，但这种现象的负面影响是可以减轻的。我们在未来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中，应该尽量往这个方向努力。

我们有理由恐惧，但我们不应该失去理智。我们必须一直像现在这样过机场安检时要脱鞋检查吗？在谷歌中键入“恐怖”一词，会出现8700万个链接。键入“和平”时，会出现1.89亿个链接。键入“战争”时，则会出现5.32亿个链接。这个结果

很有趣，但也有些令人伤感。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类的各种语言创造了如此多的“战争”的同义词，而所创造的“和平”的同义词却相对较少。考察“战争”与“和平”这两个词的词汇链在未来世纪的扩展将十分有趣。我想，最后总应该是和平。经济发展将会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战争与和平的进退维谷将仍然与停滞与发展的进退维谷紧密关联。

* * *

从上述描绘中，我们或者可以透过重重迷雾，清楚地看到未来的地平线。事实是，随着我们缓慢地向前行进，我们每天都会看到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事物出现。世界的面貌将继续变换着。未来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发生改变，但不会像现在这样迅速。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很幸运吗？仅在两代人的时间里，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发生了巨大改变，人均寿命延长了，人口翻了一倍，城市化迅速发展，空中旅行变得普遍，汽车、电视、电话、电脑以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网络都在这期间出现。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像这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出现如此多的变化，或许未来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时期，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变化涉及的范围如此宽广、如此普遍，而且每天都能如此真切地感受到。

100年后，世界的政治版图将和今天相差无几。那些需要改变的事物，很大部分已经完成了改变。未来不会出现哈里发帝国（caliphate），即单一伊斯兰教国家。这只是一种空想。一些国家将面临分裂，首先是伊拉克，随后会有一小部分非洲和南亚国家。其他一些国家的边界会发生改变，大多是非洲国家，它们为了纠正殖民时期的政治遗产，会用一种更明智的方式调整对少数种族聚居区的划分，不再像老帝国主义时期那样把整块大陆当成蛋糕一样简单地用直线分割版图。这些纠正将大多通过谈判和领土补偿完成。

不多的几个国家将合并入新实体中。这种情形将在中东的一些地方出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成为这里的一个范例。这种情形还会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中出现，这些国家大多有很强的文化姻缘。世界上还会出现一些新的联盟，区域一体化群体也会变得比现在强大，尤其是亚洲经济共同体和南美相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自由贸易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从最初的地球另一边国家变成亲西方的美国的同盟，而

后又会被吸引入亚洲的轨道中，更确切地说是中国和日本的轨道中。而中日将继续进行着其和平的竞争。美国将仍然是超级大国，并在中国和欧盟的追赶下努力保持其大国地位。

大规模的人类迁移将继续。许多东南亚的人将迁往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即俄罗斯的库页岛省（Primorsky Krai）（令人惊讶的是，2000年前这里的人口密度曾相当于现在的水平）和西伯利亚，这里的自然环境正变得越来越适宜人类居住。我曾问过比罗比詹（比罗比詹是俄罗斯远东联邦管区的犹太自治州首府）一所大学的院长，英语在这里是否受欢迎，他说有两种外语在这里尤其受欢迎：那些下定决心离开的人热衷学习希伯来语，而那些打定主意留下的人则学习中文。

迁移不但不会引发战争，还将是避免战争的关键途径，例如非洲和中东地区向欧洲的大迁移。欧洲人也会迁移，而且会向各个方向迁移。为了换一种环境，他们甚至会迁移到西伯利亚，这当然是以自愿为前提的。尽管非洲仍将不可能是“天堂”，但也会有上百万的人迁往非洲，尤其是那些有着美丽自然风光的地区，就像今天很多城市里的人搬到农村居住一样，因为物流已经有很大改进，人们也不用再被工作束缚在城市中。

文化将变得越来越多样。世界各地之间大量人口的迁移将使得人们对不同的价值观更加宽容。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培育了这种宽容，媒体在此也发挥了一定作用。相互接触将成为文化和经济进步的助推器，也将使文化差异变得模糊。甚至在今天，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当地文化常常被称为“民间的”，并且已逐渐被淡化，或者仅有一些业余群体来学习这些民间技能以吸引游客。这可以在苏格兰高地以及中欧地区的吉普赛大篷车上看到，也能在土耳其和中国西藏的一些村落里看到。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地都有。

世界将变得越来越明亮，尤其是在夜晚。尽管不一定像歌德临终时的著名遗言“再多些光！”但世界会有越来越多的光。电气化虽然不可能在每个地方实现，但未来在人口聚居的地方，电将远比现在普遍。今天，在一些日落的地方，傍晚会被延长。当你在世界各地旅行时，最让你感到惊讶的地方是北美地区密集的灯光和非洲的一片黑暗。当你乘坐的飞机在洛杉矶机场降落时，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被点亮了。你身下这座巨大的城市消耗的电能是人口稠密的埃塞俄比亚的好几倍。而当飞机在埃塞俄比亚的博乐机场降落时，你会发现周围几乎一片黑暗。现在，很少有

地方可以让你感受到哪怕很短暂的完全黑暗。大部分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们从未感受过，而且也将不会感受到，除非他们来到广袤、空旷的撒哈拉沙漠、澳大利亚内陆、蒙古大草原、西伯利亚苔原或太平洋中央。在这些地方，方圆几百公里以内不会有一盏灯火、一堆篝火，而且这些地方所有的电脑和手机都不能使用。

几年来，“天空黑暗程度表”（Bortle Dark-Sky Scale）一直使用从1到9的等级来划分人工照明以及灯光对黑暗天空的反射程度[23]。哥白尼及其同时代的人们看到的天空亮度大概是1，与今天在尼日尔的巴尔一家看到的天空亮度差不多。纽约人看到的天空亮度是9。如今，在曼哈顿一个晴朗的夜晚，你能看到的夜空是400年前瓦平印第安人看到的1%，此后，他们以60基尔德的价钱把这个岛卖给了荷兰人。除了遥远的阿拉斯加州，美国没有一个地方夜晚天空亮度低于2。即使在波兰比较偏远的山间牧场，夜晚的天空亮度仍然是3，因为那里的天空有周围城市灯光、小城镇灯光以及村落农庄里灯光的反射。

100年后，95%的人将再也看不到我们的祖先每天或每晚都能看到的天空，现在我们中有一些人还能很幸运地看到这些，尽管他们或许还没意识到以后可能再也无法看到“每个人都能看到”的天空。虽然100年后世界大部分地区依然不会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明亮，但按照博尔特等级划分，地球上大部分有人居住的地方夜空亮度将是5－9。只有极少数地方是2－4，而一些亮度只有1的偏远角落将成为最吸引人的旅游胜地。

这不仅仅是失去了看到一些最美丽景致的机会，也是对生物自然规律的干扰，从而产生一系列心理和生理反应。晚上关闭房间里的电灯，你会发现房间里并不是黑的，即使当你睡觉时，房间里也不是一片黑暗，而人们在完全黑暗状态下的睡眠质量会更高。

100年后，一些动物和植物将消失，一些少数民族和语言也会消失。语言将消失得尤其快。语言学家表示，现在每两个月就有一种语言消失，未来只会剩下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这有些夸张，或许他们正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人们注意问题的严重性。然而，事实的确如此，现在一些语言和方言只有极少数的人在使用。

旅行者们之间曾流传着一则轶闻。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南美洲的丛林中旅行时，有一次他到了奥里诺科河（Orinoco）岸边梅

普尔斯（Maypures）的一个小村庄时，听到有一种自己从未听过的语言，却发现是一只鹦鹉在说话。洪堡问当地的印第安人这是什么语言，他们告诉他这是阿图尔斯语（Atures），但只有鸟才会说。会说那种语言的最后一个族人已在洪堡到达前几年的1800年去世了。

今天，只有1500多名卡罗部落（Karo）的人生活在埃塞俄比亚西南奥莫河（Omo）沿岸。人类将从楚科奇（Chukotia）的白令海（Bering Sea）那里听到最后的克里克语（Kerek），因为现在世上说这种语言的人不到30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村庄里，只有几十个老人聚在火边聊天时，才会说他们的母语。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老挝和越南边境的丘陵地带，或者在婆罗洲的丛林里。据说，最后3名说马蒂克语（Mati Ke）的土著民生活在澳大利亚北部海岸。不久，这个部落的最后一个人也会像毛里求斯岛上的最后一棵树一样逝去，不会再有鹦鹉来拯救他们的语言。

路德维克·柴门霍夫（Ludwik Zamenhof，1859－1917）曾经描绘了一个美丽的乌托邦，在那里人们用一种简单的全球语言——世界语来交流。这个梦想永远也不会实现，但是上帝对人类闯入天堂的惩罚却逐渐显现——我们建起了巴别塔（Tower of Babel），并因此受到惩罚使语言变得多种多样。现在，世界上语言的种类一直在下降。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英语，尽管英语永远也不会像一些人所担心的那样成为“麦语言”（McLanguage），但英语将变得越来越强大，尤其是在它战胜法语成为世界商业通用语言后。最终，它也将成为科学和技术（包括经济学）的通用语。成千上万的人会在使用自己母语的同时，将英语也当做自己的一种语言，就像他们会把世界视为自己的世界一样。

世界上的语言种类将越来越少，但词汇数量将越来越多。各种文化的交融，尤其是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将丰富现有的语言。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文学上（即诗歌和戏剧）产生了新的词汇，莎士比亚曾为英语引进了超过两千个新单词。现在，这个丰富词汇的主要角色在由科学扮演。我们即将使用的上千个单词只有在未来的词典里才能找到。在经济学中，许多新词汇与金融和管理有关。这些单词还未存在，是因为它们描绘的现象或过程还未存在，或者还未被知晓。

许多数据和分析将仍然以国家为基础分类，但越来越多的数据将划分到打破国家界限的新类别中。经济进步和社会繁荣的新衡量方式将强调非物质的价值以及自然环境的日趋重要的作用。

一些国家即使没有产出的增长和移民，也将位列世界最发达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拥有干净的自然环境，这将可以转化为物理商品和服务。这些国家不需经历对自然破坏性的工业化、也无需建立起在今天看来它们甚至还无法承担的知识型经济，就能变得富有。它们的资产将是其对游客的吸引力。现在，已经有一些这样的组群国家（通常3个为一组）出现，如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赞比亚和老挝－柬埔寨－缅甸。蒙古也将变得富有，它将成为历史上首个整体成为国家公园的国家，或者说是成为人类公园的国家。

尽管未来世界总产值将是现在的几倍，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将变得越来越少。同样，如果从世界范围看，今天的总产值也比几十年前少。原因之一是国内生产总值中原材料密集型生产减少了而服务产值的比重增加了。但更重要的是，知识的价值会体现在产品中，而不是其物质生产过程中。一个136克重的iPod音乐播放器，价值超过5吨煤。一个2.5千克重的苹果MacBook Pro电脑，价值相当于25吨水泥。知识“越重”，世界总产值（Gross World Product）就越少，而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或世界幸福总值（Gross World Happiness）就越高，这些指数至少反映了教育程度和文化发展水平。

世界将会出现新的共同货币区。现在，已经有4个共同货币区：两个在非洲、一个在欧洲、一个在美国。一个世纪后，世界共同货币区将超过12个，包括以美元为共同货币的中南美洲。美元将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第三种选择。人民币将成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人民币也将在亚洲和非洲部分国家流动。欧元将成为第二大储备货币。它不仅将一直延续使用到下世纪，而且也将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50多个国家中流动。全球货币（或者说世界货币）的出现将仍然在构想之中，因为世界经济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一种共同货币。世界货币或许永远也不会实现，就像世界语从来没有成为现实一样。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将远比现在高，但它仍然不会像现在的国家经济这样高度一体化。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商贸往来将在国家之间进行。届时，人们对国家之间界限的感觉不会超过今天从比利时开车进入荷兰时的感受，但是拉着铁丝网、矗立着警戒塔和有哨兵站岗的国界线将仍然存在。

世界制度的顺序也会发生改变，虽然它距离完美还很远。我们将仍然会抱怨为什么这种制度还不能迎接“现代世界的各种挑战”。然而，从政治和经济力量，从

国家或组织对事件的影响等角度看，世界正变得日趋平衡。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业清理后，一些运转更顺畅的国际金融组织会逐渐兴起，这些组织将基于更为民主和实际的发展经济学，而不是用高调的口号标榜自己，实际却为富裕国家的政治利益服务。这些金融组织的总部将在亚洲，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里是经济思维的中心，而关于发展和增长的理论也将成为主流思想的中心。中国将拿出其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作为原始资本，以吸引其他国家加入这些新组织。

世界民意的影响将越来越强大，这么说并不是要迎合某些对外宣称热爱民主的政客们。由于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和无线网络的技术能量将使得了解人们的想法变得简单。我们距离一人一票的真正的全球民主还很遥远，因为这些选票仍将被放在物质的框架中，至少是非正式地。在全球范围，我们将前所未有地接近普遍选举权。

世界将重新上演20世纪美国人均寿命剧增的情形，美国男性的人均寿命从1900年的48.3岁增长到2000年的74.2岁；女性的人均寿命从1900年的46.3岁增长到2000年的79.9岁。届时，地球上的人均寿命将达到80岁，而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将达到90岁。个人和集体的幸福指数也会像这样上升吗?

在一些国家，“祝你长命百岁”已从一种泛泛的祝福变成短期内能实现的真诚愿望。当现阶段的生育时期过后，世界退休人口的数量将超过他们生育年龄之前时期孩子和年轻人的数量。以德国为例，如果德国继续保持平均3名妇女生育4个孩子的比率，那么如果不通过移民，尤其是从愿意生育的国家移民，它将无法保持现在的人口水平。这种情况一方面将对消费习惯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则对公共金融和储蓄市场产生影响。

在未来，我们将可以用药片治疗癌症，就像我们今天治疗肺结核一样。而曾经，谁要是被诊断为肺结核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到时，艾滋病也会和今天梅毒的情形差不多，梅毒也曾经害死成批的人。当我们感冒时，最标准的疗法仍然包括阿司匹林和卧床休息一周。药物将变得非常昂贵。在富裕国家中，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预防医学、治疗和其他各种旅游、娱乐和体育，尤其是健康食品，将成为国内预算的最大项目。

不幸的是，新的疾病也会出现，而且将非常可怕。我们甚至不能想象这些疾病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来袭击我们。人类为应对这些疾病的爆发所支付的资本与维护

和平的不相上下，但这样做物有所值，因为这是关乎生死的问题。

未来，我们将每天工作4小时，当然如果你愿意工作7小时也没有人反对。上班途中所花费的时间将是今天的两倍。将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在家与办公室两地之间奔波，因为很多人都可以在家上班。单个工作日的空闲时间将越来越少，但整周的空闲时间会增多。因为空闲时间同时也是消费时间，人们有更多可以用于消费的时间是件好事。我们的收入将是今天的4倍。事实上，我们的年收入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或每7年增长10%，就可以实现，这两种算法在100年后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将仍然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因为需求还是会大于收入。一种长期的发展战略将不仅考虑为产量的稳步增长创造条件，还要考虑到对消费者欲望的现实评估。总有一天这种欲望必须停止升级。富裕阶层甚至是中产阶级，只要他们学会把空余时间的价值算进去，就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评估自己的金钱。今天，当你问空闲（即用于工作及工作途中之外的时间）的1小时价值多少，很难得到一个可信赖的答案。而未来每个人都将知道1小时空闲时间的价值。

100年后，我们看到水费单时的表情将和今天看到一路高涨的电费单时的表情一样，因为水变得越来越昂贵。气候关税将从象征性的事物变成一种商业，而且将成为一些拥有绿色草坪、干净水源地区的主要收入之一。为公共物品所纳的税将被视为对基础服务的正常支出，这些服务无法由私有部门提供。对这些服务重要性的认识将与这些服务的支付方式——即税收的认可息息相关。政客和评论员将仍然认为金融体系有利可图，至少对他们而言是这样的。

家庭预算的一大部分将仍然浪费在广告费用上，因为广告费是我们所购买的所有物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在宏观经济领域中，有关广告应该被视为生产的成本还是其生产产品的一部分的争论仍将继续。或许这种明显的不必要的支出即使不能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也应该从幸福指数中扣除。我们还得为企业对广告监控的分析报告买单，这些分析报告是为了使消费者不至于淹没在铺天盖地的营销方案之中。就像今天的广告，从某些方面来看，对消费者的保护既是一种工作也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100年后，人们会对今天广告公司极力摆脱的事情感到好笑，就像今天我们对中世纪的宗教信徒祈求特赦而花费巨资感到不可思议一样。

虽然爱国主义中将包含更多世界主义而非保护主义的成分，但民族主义仍然不可能从政治经济中消失。在社会价值中，“祖国”的比重将越来越轻，而“孩子们

的乐土”的比重将越来越重。换言之，下一代的重要性将超过对过去的怀念。对教育的投资会超过向老人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的投资，老人们必须通过高度发达的私人保险体系来照顾自己。同时，年轻人必须减少各种短期度假的开销，以更多的储蓄留作年老之用。他们将有更长的时间来进行储蓄，因为现在发达国家的平均退休年龄已经接近70岁而不是60岁。尽管如此，人们退休后的时光也会比今天更长，也会更健康、更快乐。

统计年鉴和经济学课本中的数据将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无线更新，当你在网上查询定义时，再也不用起身去查找某个地图或与某本最新发布的书中的原始信息进行比较。获得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信息在技术上将变得可行。

个体和社会了解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的方式有着质的不同。但每个人都认同我们应该净化环境，并已形成强大、一致的压力以促使对环境采取行动。在过去几十年中，人们对抽烟者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将来，人们对污染者的态度也会发生类似改变。我们已经看到事情在转变，不久这些转变将成为划时代的改变。今天，大部分人会对把垃圾倒在我们后院里、倒在与邻居分隔的篱笆下感到不可思议。不久，每个人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会认为，不论哪个地方、哪种形式的环境污染都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一种文化的转变，它将有着深远的文化意义和经济意义。

控制气候在某种程度上会避免一些自然灾难，但这将使得一些贫穷地区，尤其是亚撒哈拉地区面临由于气候异常所引发的自然灾害的袭击，这会比目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还严重。在未来，我们今天能感受到的气候变化将部分地得到控制。对于气候变暖，一些人会高兴，因为去一些以前无法接近的地方开采资源已成为可能，如北极冰盖的消融将使人们从北冰洋开采资源变得可行且有利可图。据美国地质勘探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估计，世界上未发现的1/4能源储备埋藏在北冰洋里。

出于安全考虑，俄罗斯有一项大胆的、技术上无可挑剔的行动，他们将两个命名为“*Mir*”（*mir* 既有“和平”也有“世纪”的含义）的深潜设备送入北冰洋洋底，即北极下方4,200米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插上了一面钛做的俄罗斯国旗，就像1969年美国人把星条旗插在月球上一样。不同的是，从现在开始往后的100年中，不会有人从月球上带回任何原料，因为这样做经济成本太高，而且技术上也不可行。

从莫斯科飞往旧金山将只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但进机场、过安检花费的时

间远长于跨越这两个大洲和其中的大洋的飞行时间，一个5–6个小时的旅程，只有90分钟是在空中度过。在未来，与使用信用卡和护照（这两种事物将依然存在，并且比以往更重要）不同，我们只需把手指放到屏幕上，或注视一下处处跟随我们的电子眼即可完成这些手续。身着制服的人将检查我们，而经特殊训练的狗会在我们身上嗅来嗅去。还会有电子狗，它们的嗅觉将更灵敏。

编写短信和撰写邮件已不再是必须的。我们只要说出自己的想法就行了，信息会自动到达指定接收人那里，他会立刻看到或听到我们的信息。在家里，我们可以欣赏任何一部电影、听任何一场音乐会或音乐作品，我们只需在一个数字式控制台的菜单中选择即可。如果不想动，我们甚至可以不用碰任何东西，只需大声说出来即可。例如，只要说“海顿（Haydn）的《创世纪》（*The Creation*），由约翰·艾略特·嘉迪纳（John Eliot Gardiner）指挥的英国巴洛克管弦乐”，你立刻就会听到；说“安东尼奥尼（Antonioni）导演的《红色沙漠》（*Il deserto rosso*）”，你立刻就可以观看；说“《迷墙》（*The Wall*）”，你马上就可以欣赏。费用将自动从你的在线账户扣除，因此，你可以幻想自己什么钱也没花。

以上所有这些只有一部分人能够享受，其余的人将生活在贫困中。甚至一些地方的人即使过着像今天中产阶级一样的生活，但他们仍然处于贫困中。许多人将继续生活在凄惨之中，平均寿命也只有富裕国家平均寿命的一半，尽管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已大大降低。如果他们无法找到一份工作，他们将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当他们离世后，亲戚和善良的邻居将担负起他们的所有责任。饥饿、瘟疫或文盲还将存在。仍然有很多人不会说英语，或者不懂对贸易至关重要的当地通用语，例如东非的斯瓦西里语、尼日利亚及周边国家的豪萨语、西非的法语或印度次大陆的北印度语。他们甚至不知道怎样用自己的语言进行阅读。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不会发生任何改变，或者只有微乎其微的改变：他们将继续简单而全面的再生产。以前怎样，现在仍是怎样。许多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和他们几代人之前的祖先没有任何区别。物理的和生物的时钟在不停地奔跑，但文化和经济时钟的指针却始终没动。

相当一部分人将既没有需求也没有经济途径来使用现有的信息。需求需要刺激才出现，而途径则需要创造。因此，他们尽管已取得很多进步，但与最发达社会之间的鸿沟将比今天更深。“百元电脑”已经出现，而且它也具备让贫穷国家发生质

的改变的潜力，但是它不能克服缺少道路、电力线路的障碍，或者摆脱不了教育、卫生保健缺失的状况。

一些贫民窟消失了，另外一些又将出现；一些大都会繁荣起来，另一些则逐渐衰落。表面上，地球的面貌也会发生改变。地球上更为发达的区域，即“北方”将变得更加多姿多彩。许多城市将变得越来越像洛杉矶——“有色人种”占据城市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种族的混合将增强文化景观，丰富社会构架（虽然也许会出现对抗状态）。这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这些人将怎样相处？会像一个半世纪之前、第一次令人震惊和感到耻辱的种族屠杀之前的敖德萨吗？或者像现代的一些西方城市（偶然事件不算），如阿姆斯特丹或哥本哈根？还是将像“文明的冲突”的倡导者们所描绘的那样？美国模式的文化融合最有前景。尽管，这种模式仍被一些阴影笼罩，如最近洛杉矶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骚乱，但世界其他地方包括欧洲仍然可以从这种模式中学到很多。其中，最伟大的成就是相互理解和包容，只有这样，少数民族才能融入主流文化中，也才能用自身文化丰富主流文化。

我们将可以避免发生超级大战（Very Big War），这场战争在一天中就会夺去3亿人的生命——这相当于1000年前整个世界的人口。但每隔几年，世界各大洲的不同地方仍然会爆发各种小型战争，而在那些经济贫困、资源丰富的国家，情况将更糟。毕竟，富裕国家生产的武器必须要找到用武之地，并还可以不时地测试一下，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们卖给那些在下一个或下几个世纪里能担负起这种愚蠢支出的贫穷国家。

即使所有这些都将成为现实，那我们又有谁会真正在意100年后世界变成什么样呢，因为到时我们都已不在人世。100年前，有谁会关心一个世纪后，也就是今天世界的模样？即使真有，也非常少。然而，一切都改变得如此迅速。下一个“现在”比电影里的一个画面来得还快。这就是我们生命中跃动的现实。我们中的一些人还能记得我们的祖父母大概是在150年前出生。而我们中最年轻的人的孙子150年后将会读到这些文字。这样加起来就是3个世纪！你只需要把眼光和思维先放在一个方向，然后再放到其他方向，你就会看到一切。这就像先让自己四肢着地——这是一个稳定的姿势，但很单调，然后再站立起来，并环顾地平线四周。你将看到很多东西。

能看到总比不能看到好。最好的是懂得越多，而不是越少；想象事物更精确，而不是更有偏差。这样，未来的很多错误都可以避免，就像我们的祖先本可以给我

们免去很多麻烦一样。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既然他们没有做到，我们就必须要为之付出代价。他们没有从一种全面、长远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没有进行比较，他们没有在时空中进行充分的行走。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些，我们的生活本会变得更美好。如果我们能这样做，那么他们——未来几代人——也将生活得更美好，并且抱怨也会更少。他们是否为我们设立丰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多少理由来咒骂我们。

未来丑陋的事物会变少，鲜花会更多。

注释：

1. 见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勾勒全球未来：情报委员会2020年展望报告。借鉴世界各地独立专家的建议》，华盛顿，2004年11月，www.foia.cia.gov.net。

2. 威廉·伊斯特里：《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的探险与失败》，剑桥、麻省和伦敦：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援助总是收效甚微》，纽约：企鹅出版社，2006年。

3. 保罗·科里尔：《最底层的10亿人：最贫穷国家为何衰败以及如何起死回生》，牛津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

4. 伊利亚纳·库兹埃莫克和埃里克·维克尔：《安理会的一个坐席值多少？联合国中的国外援助和贿赂》，《政治经济学杂志》，总第114期，2006年第3期，413－451页。

5. 东盟的成员国包括缅甸、文莱、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6. 除几个波罗的海国家之外，所有前苏联国家都与独联体有一定联系，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几个波罗的海国家则加入了欧盟。独联体的成员国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7. 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这个自由贸易区域的附属成员还有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

8.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有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

9.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有15个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博茨瓦纳、刚果民主共和国、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塞舌尔、南非。

10.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是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科特迪瓦、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和多哥共和国。

11. 成立之初，南盟包括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马尔代夫、不丹7国，2007年，吸收阿富汗为成员国。

12.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常称为海湾合作理事会，由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和巴林六国组成。

13. 欧盟成员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立陶宛、马耳他、 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克罗地亚和土耳其正在进行入盟谈判，它们是观察员国。

14. 参见《千年生态系统评价系列丛书》，芝加哥：岛屿出版社，2005年，www.millenniumassessment.org。

15. 关于经济增长及其资源极限的第一部最著名作品发表后30年，由德内拉·梅多斯、丹尼斯·梅多斯和乔根·兰德斯组成的权威组合又出了一本新的力作：《增长的极限：30年新进展》伦敦和弗吉尼亚斯特灵：地球瞭望出版社，2004年。

16. 参见美国国会政府问责办公室：《未来石油供应的不确定性使得开发一种改变石油生产峰值及下降的战略显得非常重要》（GAO－07－283），2007年2月。

17. 那些向贫穷国家给予"经济援助"国家的虚伪和卑劣成为格雷厄姆·汉考可启人深思的新作的主题：《贫穷的领主》，奈洛比：卡马拉皮克斯出版国际，2004年。

18. 奥尔罕·帕慕克：《雪》，纽约：诺夫出版社，2004年。

19. 大卫·埃杰顿：《历史的震动：1900年以来的技术和全球化历史》，伦敦：Profile Books 书局，2006年。

20. 弗朗西斯·福山：《后人类的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纽约：法勒·施特劳和吉鲁克斯出版公司，2002年。

21. 见《连接的世界：电信技术特别报道》，《经济学人》，2007年4月28日。

22. 杰克·赫尔什勒菲尔写过克服核战争种种经济后果的办法，见《逆境中的经济行为》，布里顿：维特什拉夫出版社，1987年。

23. 2001年，纽约威斯彻斯特郡退休消防队长约翰·E·博尔特，提出一个衡量夜晚天空亮度的体系，将天空亮度划分为1至9等九个等级，这种划分获得了业余天文爱好者的认可。博尔特是《天空与望远镜》杂志的专栏作家，www.shopatsky.com。

一封信

致我孙女的孙女：

于诺瓦·伊维兹纳，2008

我亲爱的女孩：

你出生在世纪末，即21世纪末；而我出生在20世纪中期。1967年，我从中学毕业，而你毕业时将是2017年。如果我们毕业考试的问题不相同，那一点也不奇怪。岁月如梭，时光飞逝，你会感叹它流逝得如此之快！时间让我们天各一方，但也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未来即是过去。而过去也是未来。

在那些对于你来说是过去，对于我来说仍是未来的年月里，有许多本应该发生的事情的确发生了。我用偶然性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事情以某种特定方式而非其他方式发生，这个发展的理论到你们那个时代已不再新鲜，而是非常显而易见。然而，许多事情，不论好坏，本应该发生却没发生。这正是我们之间的区别，我们与过去和未来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联系。

有些事情本应发生，却没有发生。这意味着其中某个关键元素，即决定什么事情会发生的条件混合体中的某一个条件缺失了。有时，这只是运气问题，但更

多时候是蓄意的人为行动。不论怎样，文字总是重要的。文字富有含义，富有很多含义。

有趣的是，很多本来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却发生了。在我生活的年代，我们缺乏充分的想象。对于一些不可预料的事情来说，想象比知识更重要，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知识来构想它们。

我们所有人，包括你，都是一个或许不会出现的未来的产物。正如你可以从更有利的角度所看到的，我们充分利用了很多机会，但也错过了一些。你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那个世界仍然在变化着，但那个世界本可以更加快乐、更加美丽和更加富有。那里一定有很多鲜花，但本可以有更多。

遥望未来时，我看到——因为我知道——有多少事情可能发生。相反，当你回顾过去时，也一定会看到——因为你知道得更多，即使你没有学经济学——我们失去了哪些机会。失去的无可挽回，或者至少在以后100年的时间里将只能保持原样。

但这都没有关系。未来的100年将很快过去。给你孙女的孙女写一封信（或许到时她会学经济学）。告诉她阅读《真相、谬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看看我们哪些对了哪些错了。还要告诉她一定要给我们写封邮件，或者任何类似邮件的东西，不管他们在2207年称之为什么。

我很高兴你学习应用地球科学。我常说跨学科研究有着广阔的未来。你理解得更深，并且也看得更广，你将有机会助力发展。每个人都应该尽己所能。

20世纪初，埃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说，一名科学家会先告诉自己一个假设，然后用实验检验这种假设是否正确。物理学里，一次实验就能验证假设的正确性，虽然不是所有假设都适用。一些假设直到21世纪初才得到验证，另一些假设则直到22世纪也才有极少数人能够完全理解。而发展经济则只能从历史角度来验证，这有时会付出惨重代价。请记住：事情最好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做正确。

我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你已看过这本书，而你也通过触摸某个屏幕，或点击某个链接，或发出某个语音指令，对其中的事实进行一一验证、归类和解读，因此你可以自己来检验！我希望当看到我说得对时你也很开心。

做到正确和拥有幸运一样美好。

我希望你以及你周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且，你还非常幸运！

你永远的，

格泽高滋 · W · 科勒德克

附：我在这里给你附上1000欧元，因为有个东西告诉我，你没什么衣服可穿，那就好好给自己买几件漂亮衣服吧！

:-)

索引

A

B

C

D

E

G

H

K

L

M

N

O

P

Q

R

S

T

W

X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真相谬误与谎言　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
作者=（波）科勒德克著
页数=386
SS号=12949853
DX号=000008199816
出版日期=2012.01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